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二十八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 · · · ·

第·二·十·八·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二十八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850x1168 1/32 印张11"25 插页12 字数 261,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平) 16,000

统一书号: 11094·166 定价: (平)1.95元

毛泽东博览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目 录

宋庆龄	蒋洪斌	(1)
阎红彦	毕 兴 贺安华	周天德 何盛明 (72)
赵自选	曾长秋	唐伯藩 (111)
沙文求	邢秀华	何锦洲 (124)
欧阳立安	毛和利	庄永淑 (138)
徐朋人		徐达德 (145)
李耘生		李福全 (162)
郑位三		刘光明 (174)
冯达飞		冯釜川 (202)
黄 骅	陆泉生	张广立 (223)
闻一多	胡水清	田子渝 (235)
江竹筠	卢光特	谭重威 (271)
李木庵中共桂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王大成 (289)
嵇文甫	李道雨 李育安	翟本宽 (307)
于毅夫	孙维勤 武 托	李 英 刘景禄 (337)

阎红彦传略

邓小平同志为《阎红彦传略》题签

袁揚同紅彥同志
忠心耿耿，畢生為革命
事業艱苦奮鬥的
精神

彭真
一九八二年

彭真同志为《閻紅彥》題詞

久經考驗的馬列主義
毛澤東思想的英勇戰
士。堅持黨的立場原
則，忠於革命事業的
模範黨員。

黃火青

一九八五年六月

黃火青同志為《閩紅彥》題詞

閩江彥博年浩氣尚存

李达

李达同志为《閩紅彥》題詞

悼念閻紅彥同志詩二首

(一)

忆昔延安同学日，
秉性不阿诚刚直。
身经百战无所惧，
痛斥歪风堪及时。

(二)

南北驰驱度一生，
东西熬过无数春。
料君九泉未忘我，
燃熄自身慰英灵。

魏传统

一九七七年 于北京

(註)原五首有集某公书，记同红彦同志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在昆明桂林地区人排迫令害致无至今已有十五年之久，近思他战身一生对党对人民作此的日大有报，特赋诗以誌。

魏传统同志悼閻紅彥同志詩

悼閻紅彥同志

力闢蘇區建紅軍，
抗日衛土禦頑侵。
列守思想指方向，
主席教導永銘心。
欣陪朱總留合影，
握膝共炕人民親。
赤胆忠誠英雄志，
高風亮節眾所欽。
莫須有罪遭戕害，
反証自縊亂偽真！
千古奇冤寧有此？
撥開雲霧見新春。

莫文驊

一九八四年春于北京



宋庆龄



彦红彦



赵 自 选



沙 文 求



欧阳立安



徐 朋 人



李 耘 生



郑 位 三



冯 达 飞



黄 骅



闻 一 多



江 竹 筠



李 木 庵



嵇 文 甫



于 毅 夫

宋庆龄

蒋洪斌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青年时代就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坚定地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她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工作，团结海内外一切进步人士，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为世界的和平与民主，进行了英勇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新中国诞生后，她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名誉主席等重要职务，在参与重大国策的制定和进行繁忙的国务活动的同时，仍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和妇女、儿童福利事业，为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保卫世界和平、谋求人类幸福，为推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国之瑰宝”，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是国际上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①。

(一)

宋庆龄，祖籍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一八九三年一月二十

^①《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七日（清光绪十八年农历腊月初十）出生于上海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号耀如，本姓韩，名致准，阴差阳错，被舅父收为养子，改姓宋。宋嘉树出生于海南岛，少年时代随舅父到美国波士顿，在舅父开办的茶丝行里当学徒，后来又上到轮船上做工，以查理·琼斯的教名入基督教。不久，他得到友人的资助，进入威明顿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田纳什维尔市万德毕尔特神学院读书，毕业后回到上海，任基督教传教士。二十一岁那年，他与主张妇女平等的中学教师、十九岁的基督教皈依者倪桂珍结婚。夫妻之间，情投意合，生有六个孩子即鸾龄、庆龄、子文、美龄、子良和子安。

宋嘉树秉性刚直，因不满美国传教士的蛮横无理，辞去牧师职业，转而经营工商业，由此致富。宋嘉树渴望中国独立富强，他在辛亥革命前就与孙中山交往，拥护孙中山的主张，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自己开设的印书馆内大量印刷进步书刊。武昌起义前后，他放弃一切活动，全力以赴赶印革命所需要的宣传品。孙中山经常访问宋嘉树，一起讨论革命事宜。这使宋庆龄从小就多次见过孙中山。孙中山不平凡的为人，在宋庆龄童年纯洁的心灵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九〇〇年，宋庆龄七岁时，就读于教会办的位于上海八仙桥之侧的三一堂女塾^①。她温雅端庄，性格娴静，天资聪颖，读书用功，喜欢学习英语，用的英文名字是 Rosamond。她也喜欢音乐，喜欢绘画，酷爱文学，对文艺活动很有兴趣，曾参加女塾的话剧排演，深得老师赞赏。

^①方周：《宋氏三姐妹未入中西女中》。

一九〇八年，十五岁的宋庆龄同妹妹宋美龄一同到美国留学，先入新泽西州的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后到佐治亚州的梅肯市，就读于威斯理安女子大学。这以前，她姐姐宋霭龄已经在这所大学里读书。宋庆龄攻读文学，也喜欢看历史书，尤其喜欢看中国历史的典籍。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威斯理安女大一九一三年的《年鉴》上，就有她担任该校校刊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秘书的记载。

宋庆龄身居异国，却经常浏览报刊，关注着国内的局势。有人问她：“你干嘛老是考虑那么多国家的事啊？”她回答说：“我对祖国将来的事充满着理想和希望。我不能不想中国，更不能忘掉中国。”辛亥革命后，她收到父亲寄来的一面新国旗，当即从墙上取下清朝的旧旗，扔在地上，并高呼拥护共和制的口号。一九一三年，她写了一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①，盛赞辛亥革命“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是一件“造福人间的喜事”。她欢呼中国开展的剪辫运动，认为这是“成千上万的人舍弃了身上的附属物——中国民族耻辱的象征”。她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国土广袤居世界首位，文化光辉灿烂，中国“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

一九一三年，宋庆龄毕业于威斯理安女子大学，获文学士的学位。同年八月，她离开梅肯城，启程回国。此前，国内辛亥革命果实已被袁世凯窃取，孙中山讨伐袁世凯遭到失败后，

^①原为英文，载威斯理安女子大学校刊，后由张珏译成中文，重新发表于《中国建设》1983年第5期。

被迫出走日本，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也改名换姓带着夫人家小东渡日本。因此，宋庆龄决定在归国途中绕道日本，看望父母。当她在东京与亲人团聚时，真有说不尽的欢喜。

在东京，宋庆龄又见到了她深为崇敬的孙中山。当她从孙中山和她的父亲那里了解到国内政局变化的详细情况后，毅然决定暂留日本，投身革命，开始政治生涯。

不久，宋庆龄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协助孙中山处理机密书简和日常事务，诸如整理讲稿、起草电文、致函中国各地和南洋的革命党人等等。她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工作热情，不怕繁忙，深得孙中山信赖。孙中山的革命激情拨动着宋庆龄的心弦，而宋庆龄那种新的力量则投入了孙中山的心灵。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和孙中山的友谊越来越深，决意和孙中山结为终身伴侣。她的想法曾遭到全家和亲友的责难。但她不顾家庭阻拦和亲友的非议，由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在东京市政府办理登记手续，于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东京与孙中山结婚，成为孙中山革命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

(二)

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做了八十三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之中宣布取消帝制。孙中山根据国内局势的发展，决定回国亲自领导革命。宋庆龄于四月二十七日与孙中山由日本启程，五月初回到上海。五月九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南方义军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之效”。此后，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一八年，孙中山由于受到

反动势力的排挤，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思想上极度苦闷，好象已陷入绝望的境地。宋庆龄鼓励孙中山总结经验教训，以启发民主，唤醒民众，继续奋进，并协助孙中山查阅资料，著书立说，研讨三民主义诸问题。同时，帮助孙中山处理大量机密文件和其他日常工作。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宋庆龄按照孙中山的授意，起草致电苏维埃政府和列宁，热情祝贺十月革命的成功，认为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民便生出了一个希望^①；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她代孙中山起草“学生无罪”的援救电报，满腔热忱地支持中国人民这次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决定统一两广、出兵平定广西期间，她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到梧州前线慰问出征的将士；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列宁派马林来到中国，她在桂林陪同孙中山，会见了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表……总之，孙中山提出的一切符合中国人民意愿的任务，不分巨细，不论难易，她都竭尽全力地去完成。

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军事叛乱，并于六月十六日围攻总统府和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宅粤秀楼。当天凌晨二时，孙中山得知陈炯明的围攻企图，要宋庆龄赶快整装离开险地。宋庆龄深明大义，认为孙中山重任在身，应当先行撤离。她以坚强的献身精神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孙中山不得已，令五十名卫士全数留守住宅保护宋庆龄，自己化装成出诊的医生，奔往宝璧舰，后又转登永丰舰，指挥部队，讨伐叛逆。

孙中山走后半小时，叛军的机枪、步枪一齐朝粤秀楼射

^①参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7页。

击，保护宋庆龄的卫队，奋勇抵抗，击退叛军三十余次的进攻。黎明时分，叛军使用野炮，轰塌了洗澡房。宋庆龄镇定如常，一直留在楼上未动。上午八时许，叛军仍在继续攻击，五十名英勇抵抗的卫士大都壮烈牺牲，宋庆龄才在副官和卫士护卫下，走出粤秀楼，冒着纷飞弹雨，冲过约一里长的桥梁式的过道，奔向总统府。射向总统府的炮火更加凶猛，他们到达半小时后，四周交通已经断绝。宋庆龄刚从一间房子里走出来，屋顶就被炮弹炸塌。不一会，总统府的两层铁门被打开，府里的士兵向外冲，府外的叛军向里拥，形势极为紧张，一个叛军的手枪已经指向宋庆龄。幸亏她头戴副官的草帽，身披孙中山的雨衣，未被叛军认出。她又急中生智，将手中包袱里的钱物撒开，趁当面叛军拚命抢拾钱物之际，与卫兵从进出两股队伍的人丛之中脱险而逃。宋庆龄身怀有孕，又累又困，行走十分艰难。这时，从附近一个巷子里又窜出一股叛军，朝他们的方向跑来。躲藏已来不及，她便和卫兵一起，机灵地倒在横陈于马路上的死尸堆旁。叛军离去后，她爬起来走进一家民宅稍事休息，又化装为一村奴，经沙面到岭南大学的一位朋友家里，然后登上了永丰舰。她后来回忆说：“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①。

在这次事变中，宋庆龄虽然历尽艰险，胎儿流产，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但是她经过这场枪林弹雨的洗礼，革命意志更加坚强。

宋庆龄在永丰舰上住的时间不长，孙中山为了使其早日恢复健康，派人送她经香港乘船返回上海。随后，孙中山也于八

^①《广州脱险》，《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页。

月十八日回到上海。

这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宋庆龄襄助孙中山，为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她参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等和共产国际代表越飞、鲍罗廷等的多次会晤和商谈；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积极贯彻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陪同孙中山视察广州港口要塞和根据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建议建立起来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并随孙中山迁居到韶关大本营，为北伐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

一九二四年十月“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这次北上绕道走的。宋庆龄随同孙中山于十一月十二日由广州乘兵舰到香港，十三日由香港乘春阳丸于十七日到上海，二十一日再乘船于二十四日抵达日本神户，下榻东方旅馆。二十八日，宋庆龄应许多团体的邀请，到神户高等女子中学发表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讲。这天，神户女校教室里座无虚席，听众几千，几无立锥之地。当宋庆龄接过日本女学生献给她的一束菊花，抿嘴微笑着走上讲坛的时候，欢声雷动。宋庆龄说：现在，妇女的使命是重大的，我希望中日两国妇女更加觉醒，为人类的进步事业，阔步前进！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乘坐的轮船抵达天津时，受到成千上万群众的热情欢迎。邓颖超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站在孙中山身旁的宋庆龄，“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是“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①。

^①邓颖超：《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由于过度劳累，孙中山在天津肝病发作，仍接见各方代表；谴责段祺瑞的卖国行径；一九二四年岁尾，又抱病入京，住北京饭店休养，以期早日恢复健康。但病势有增无减，又进协和医院，后转铁狮子胡同行辕医治，均收效甚微。宋庆龄为孙中山的病心急如焚，守在病榻前日夜侍候，体贴入微。

孙中山在弥留之际，曾对宋庆龄说，他有一个愿望，即亲自访问苏联，与革命友人会谈。宋庆龄答应一定代替他访问莫斯科。孙中山在口授了那份已为后世传颂的《总理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之后，还口授了一份家事遗嘱，其中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宋庆龄悲痛欲绝，难以自己。孙中山又以微弱的声音，呼喊身旁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完全理解孙中山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心境，轻声对孙中山说：“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实行三大政策，抵抗帝国主义，爱护孙夫人，海枯石烂，不会忘记。”孙中山潸然握着何香凝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接着，孙中山又支撑着精神，望着宋庆龄，喊出“和平……奋斗……救中国”。宋庆龄悲泪涔涔，泣不成声。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一瞑不视，与世长辞。出殡那天，宋庆龄身穿黑色衣服，面罩黑纱，走在三十万送殡人群的前头。她强忍着巨大的悲痛，没有哭泣，没有流泪，紧闭着嘴唇，显示出内在的毅力和沿着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道路前进的坚强决心。

(三)

一九二五年四月，宋庆龄由北京回到上海。她向国内外介

绍孙中山的遗嘱，解释新三民主义的内容，深切注视政治形势的发展，积极投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对上海《国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她呼吁全中国的“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为民族独立，共同奋斗，“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切“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并国亦不爱也。……吾人当知此次惨剧，为中国三十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她在谈话中，还提出要“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以“援助失业之工人”^①。

为声援广东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宋庆龄于七月二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一文，认为孙中山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大无畏精神，表明了“中国人民之不可侮，帝国主义之武力不足畏”，而这次广东和全国人民“毅然挺身以战强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是“患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先生有知，地下亦当含笑矣”。

同年八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宋庆龄在上海惊闻哀耗，“南望涕零”，深感痛切与愤慨。她本来打算赴广东“亲致祭奠，惟因事所羁，不克如愿”，于是，便在《为廖仲恺遇刺逝世给廖夫人的唁电》中，号召革命党人学习廖仲恺的革命精神，“勉承先志，竭力进行”^②。

^①载 1925 年 6 月 9 日上海《民国日报》。

^②载 1925 年 8 月 25 日广州《民国日报》。

年底，宋庆龄带病到广州，住在长堤大马路中央银行大楼的三楼上，继续不遗余力地为贯彻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而辛勤奔波。据当时曾经拜访过她的陈丕一（外交家陈友仁之子）回忆说：“无论处在什么不利、充满风险的情境中，她的天性的庄重、美貌和风度，依然不变。她对革命、她对丈夫和中国人民大众的忠诚、坚贞和信念，也从不动摇。”^①

一九二六年一月，宋庆龄在广州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她和与会的共产党人及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决议》和《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等议案，重申国民党一大制定的纲领。她在会上发表演说，谴责违背孙中山遗训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宣扬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国民党二大闭幕的第二天，即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宋庆龄出席了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广东省妇女部、广州市妇女部和各女校、女团体联合召开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说。她回想数年前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的情景，看着眼前与众多姐妹聚前一堂的欢乐场面，“觉得无限地快感”。她“希望诸姊妹们，齐领导妇女们向国民革命战线上走”。她说：如能这样，“国民革命成功便不远了”^②。

此后，宋庆龄满腔热情地投入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国民政府决定由广州迁往武汉时，她于十一月与先遣人员一起先期到达武汉，筹备迁都事宜。十二月十三

①陈丕一：《回忆宋庆龄》，载1981年6月7日香港《大公报》。

②宋庆龄：《在广州女校女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载《妇女之声汇刊》，1926年5月31日出版。

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委员会，宋庆龄为委员。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这期间，蒋介石背叛新三民主义的迹象日益明显。他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公开对抗迁都武汉的决定。宋庆龄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于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同何香凝、邓演达以及共产党人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一致努力，使全会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一系列重要决议案，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措施，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实际上取消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职务，限制了他所掌握的军事权力。

宋庆龄非常重视妇女工作。为培养妇女干部，她在武汉开办了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聘请恽代英、张太雷等革命志士担任教员。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宋庆龄亲往参加并发表讲话，论述训练班的开办理由。她说：“中国国民革命是要全体国民来参加共同奋斗，方才可以成功的。中国妇女虽然受了二千多年的专制压迫，对于眼前的革命工作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妇女是国民一分子，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妇女自身的自由平等，妇女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这个党务训练班，就是妇女国民革命军的预备”^①。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宋庆龄义愤填膺，当即与国民党许多左派人

^①宋庆龄《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载1927年2月14日汉口

《民权报》。



士和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此后，她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蒋介石为了借助宋庆龄的威望来壮大他的反革命声势，于七月十二日亲笔写信给宋庆龄，说：“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务请即日来沪，这样，“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宋庆龄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于七月十四日写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发表在汉口《人民论坛报》上，作为对蒋介石来信的答复。她在声明中说：“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她郑重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她还说：“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①这是一篇充满生机的与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断绝关系的战斗檄文。

为了挽救革命，对蒋介石的大屠杀实行武装反抗，中国共产党于八月一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宋庆龄坚决支持这次起义，同毛泽东、吴玉章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执委一起，发表《中央委员宣言》，严正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国民革命的罪行，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唤起民众，共同为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反对新军阀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革命委员会，宋庆龄当时虽不在南昌，仍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

^①《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8、22页。

(四)

宋庆龄为了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表明她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立场，决定出访苏联。

出国前，宋庆龄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上海《申报》发表声明，说明此行的目的。她指出：“中国如果想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各国的斗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改变半封建的生活情况，并以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她逐一阐述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再一次肯定“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痛斥依赖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说“他们必然失败，走上以前企图以同样方式来统治人民的那些人的道路”。宋庆龄的声明最后说：国民党“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因此，我要亲自到莫斯科去说明这一点”^①。

八月下旬一天凌晨，宋庆龄和《人民论坛》主编美国人普洛美女士悄悄离开上海莫利爱路寓所，乘车直驶浦江码头，搭舢舨登上开往海参崴的一艘苏联轮船。同船前往的还有鲍罗廷夫妇以及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儿女”^②。

八月底，宋庆龄一行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各界人士、华侨代表和中山大学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她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下

^①宋庆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宋庆龄选集》第25—28页。

^②杨小佛：《宋庆龄在上海的活动片断》。

榻以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参观访问活动，並应邀到莫斯科大学演讲，勉励中国留学生牢记孙中山的遗训，坚持三大政策，实现新三民主义。九月，与鲍罗廷、邓演达去农村参观，并登上终年积雪的高加索山脉最高峰。十一月七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被接到红场参加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庆典。这天下着鹅毛大雪，她脚上穿的是薄底皮鞋，冻得双脚发麻，仍兴致勃勃地观看完莫斯科军民的庆祝游行。此后，她常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家里作客，和加里宁夫人结成亲密朋友。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蒋介石悍然决定要同当时支持中国革命的苏联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将这一决定电告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宋庆龄。宋庆龄于十二月十七日电复蒋介石，说：“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断交并要求撤销苏联领事馆”。她表示反对采取这一步骤，要蒋介石“悬崖勒马”，并说：“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再电宋庆龄，进行污蔑恫吓。电文说：“您今日发来的电报我已收到。除了这份电报外，对于以前许多去电和去信，不论是我，还是您家里其他人，均来得到回复，显然您的信件被扣押了”；“您的电报和您在俄国继续逗留不可能是自愿的”。他威逼宋庆龄“速归”，以“亲自而非被迫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宋庆龄收到这份电报，异常气愤。十二月二十三日，她再次发出复电，痛斥蒋介石的谰言。她说：“我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的逗留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的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我对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诽谤，再一次说明你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思考问题，

使你作出了致命的决定。至于要我亲自表明自己的看法，即它只能使我回想起在汉口的经历。那时我的声明不仅被销毁，而且在上面签字的国民党员也受到残酷迫害。这就是我没有回答你以前给我的几份电报的原因。”宋庆龄接着说：“这次互通电报证明，我们之间交换看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之间的分歧犹如一道鸿沟”；“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继续前进，……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关于这一点，我在离开汉口前的声明中已经说清楚了。也正是在这点上，我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血腥的反动派”^①。

宋庆龄在苏联大约住有两年时间，以后又转赴德国，住柏林近郊。这期间，她还同高尔基、罗曼·罗兰以及巴比塞等，发起成立国际反帝大同盟。这个组织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总部所在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成立大会，宋庆龄出席大会并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一九二九年，南京中山陵建成，国民党政府请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国葬仪式。宋庆龄决定回国。为了不使人把她的回国之举误解为将要同蒋介石合作，她于动身前特地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声明，表示她同蒋介石集团一刀两断的坚强决心。声明说：“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②。

^①以上三份电报最初发表于1927年12月24日苏联《真理报》，译文最早刊载于1937年12月的《新闻报》，新译本刊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3)，其中宋庆龄的两份电报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老一辈革命家书信选》。

^②宋庆龄：《关于不参加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原载1929年6月1日《密勒氏评论报》，本文引自《宋庆龄选集》第42页。

她在寄给杨杏佛的英文“声明”稿中说：“我正回国准备参加孙逸仙博士下葬紫金山的葬礼。紫金山是他希望埋骨之处。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必须声明，我仍断然坚持我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发表的声明，即鉴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反革命政策和行动，我宣布不再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因此，我的参加葬礼显然并不表明也不意味着我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所改变或推翻”^①。

宋庆龄回国后先到北平，于五月二十六日与儿媳陈淑英等一起在香山碧云寺参加孙中山移灵仪式后，即相偕南下，在浦口把灵柩迎接到南京。六月一日，她在南京紫金山参加了孙中山奉安典礼。

孙中山国葬仪式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二九年六月二日，宋庆龄就由南京回到上海。尽管她五月间已经明确地表示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民党的任何工作”，但是，蒋介石还是派了他的心腹戴季陶由南京到上海游说。

八月十日，宋庆龄在莫利爱路寓所接见说客戴季陶夫妇。戴季陶想探听宋庆龄今后的去向，假意说他自己身体极坏，几次想离国远去。宋庆龄明白戴季陶的企图，马上打断了他的话，回了一句：你没有出国，是很可惜的，把戴季陶顶了回去。戴季陶的妻子又接上来问宋庆龄为什么不到南京去。宋庆龄说：葬礼已经过了，我为什么还要到南京去呢？！戴季陶之妻继续说：陵园真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那儿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作些贡献。宋庆龄坦率地答道：我对于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

^①杨小佛：《宋庆龄在上海的活动片断》。

海都没有言论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这时，戴季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着的纸，宋庆龄一眼看出，那是她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电报底稿，她气愤地质问戴季陶为什么扣压她的电报。戴季陶说：这真是从你那里发出去的吗？我不大相信，象你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宋庆龄说：“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为共产党的捏造不免太愤愤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的。”

戴季陶马上露出了凶相，冲着宋庆龄嚷嚷道：“你没有权公然地说话。”

宋庆龄说：“你竟有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没有权利说话。你们可以把我当作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蓄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那个以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的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是你也知道的。……你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留下了多少的玷辱，民众将有一日和你们算帐啊！”她指着戴季陶又说：“你已经不再是热心于革命、正义与改革的青年戴季陶了……你的心理已经堕落了。”

戴季陶并不以为耻，继续游说：“你意欲和平，但是你又在制造歧意，让我们彼此尊重互相间的意见，我可以听从你的。”

宋庆龄不屑一顾地反驳道：“对于这种埋葬在坟墓里的和平，和对你浪费我时间的游说，我都不存在一些幻想。”

“孙夫人，我希望你不再发表宣言。”戴季陶道出了他此行的本意。宋庆龄拍案顿足，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

直就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和我一样的光明，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计，派侦察来包围我。”

戴季陶见劝说无效，只好告退，临行时又说：“我从南京回来以后，再来看你吧。”

宋庆龄干脆拒绝：“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彼此的鸿沟差得太远了啊！”^①

这次谈话充分显示了宋庆龄高尚纯洁的道德情操、矢志不移的政治立场和光明磊落的革命胸怀。

不久，宋庆龄再度赴欧洲。她对国民党反对派不抱任何幻想，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却十分关切。一九三〇年她在德国，经常与当时也居住在柏林的何香凝交谈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一九三一年七月，她在柏林得悉母亲黄培珍去世的消息，万分悲痛，彻夜未眠，泣不成声，当即由胡兰畦陪同，经苏联回国奔丧。火车到达满洲里时，她激动地说：回到祖国了！又感到中国文化之优秀了！她们由大连转青岛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到宋子文的官邸守灵去了”^②。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宋庆龄正在设法营救，蒋介石急令把邓演达押解到南京。邓演达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城东麒麟门外沙子岗惨遭杀害。宋庆龄闻讯，极度悲愤，旋于十二月十九日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

^①宋庆龄与戴季陶的谈话稿是宋庆龄亲笔用英文记录的。英文原稿发表在燕京大学出版的《明日之中国》第1卷第12期上；译文以《孙夫人与戴传贤谈话笔记》为题，刊于1929年12月12日天津《大公报》，本文引自《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胡兰畦：《陪宋庆龄先生回国奔丧》。

力量》的声明，以斩钉截铁的语言指出：“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

(五)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京、沪、平、济、皖、苏等省市一万多学生在南京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不料，这种正义的爱国行为却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宋庆龄对此十分气愤，在上海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揭露国民党是“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谴责他们向帝国主义投降，棒打枪刺请愿学生的罪行。她悲愤地指出：“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①。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上的推动，上海全市日商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各界爱国群众纷纷组织反日救国会、救护队、运输队、宣传队、募捐队，积极支援前线。宋

^① 《宋庆龄选集》第53页。

庆龄奔波呼号，不遗余力，坚决“主张积极抗战到底”。一月三十日^①，日寇再度向十九路军闸北防地进犯，就在这一天，宋庆龄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亲赴上海真如十九路军前线指挥部与军长蔡廷锴亲切交谈。二月十二日，她又到吴淞前线，由翁照垣旅长陪同，巡视阵地。当时，日本飞机正在当空向地面猛烈扫射，她镇定自若地鼓励翁照垣说：“旅长守吴淞之功极伟，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人之手。”通过这两次巡视，宋庆龄深为“十九路军卫国抗敌之忠勇”所感动。她说：日本侵略军叫嚷四十八小时消灭十九路军，“今十九路军于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续抵抗，中国不特未因抵抗而亡，反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②；十九路军“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③。

在前线，宋庆龄目睹抗日救国的部队给养不足，缺医少药，大批伤员得不到及时护理的情景，认为“自应各尽绵薄”。经过磋商，她与何香凝亲自筹划，由杨杏佛帮助，向人募捐，在交通大学内创办了一所约有三百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宋庆龄在谈到她们为什么要创办国民伤兵医院时说：“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我辈

①一说二月六日。著名爱国将领蔡廷锴在他亲笔写的自传中说：六日，天阴晴。拂晓，敌人以少数兵力来扰，均被我军击退。拂晓后，炮声已停。九时，孙夫人宋庆龄等来部劳军，并慰勉，约一小时辞去。

②③《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神州国光社1947年版。

立之设此医院，仅站在民众一分子之地位，对此空前之革命战士表示其敬仰感谢而已”。由于宋庆龄爱国精神的感召，四面八方的鼎力支持，国民伤兵医院一时中西名医云集，慰劳品源源不绝，广大妇女争相参加护理，使许多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

从“九一八”到“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秋。而对着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大祸，蒋介石国民党对外步步退让，屡屡下达“不准抵抗”的命令，对内则“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民主运动，宋庆龄对此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她决心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组织进步团体，营救爱国志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二年夏，宋庆龄就与蔡元培、杨杏佛开始酝酿组织民权保障同盟的筹备工作。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申报》公开刊登宋庆龄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的消息和由蔡元培题签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章程》。宋庆龄在阐述民权保障同盟的性质和任务时指出：要“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同时指出：“不是革命在中国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征服和瓜分中国。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我相信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所以我相信革命一定会建立自己的权利，建立中国的统一、独立和完整，以及人民自治的权利。我以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推动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工具之一”^①。十二月三十日，蔡元培和杨杏佛在上海华安大楼（今华侨饭店）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由宋庆

^①宋庆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为新中国而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胡愈之等七人组成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宋庆龄担任主席，蔡元培担任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同盟成立上海分会，宋庆龄、鲁迅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有盟员四十余人，大都为文化教育、科学、新闻和法律界的知名人士，还有外国朋友伊罗生和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史沫特莱。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同盟成立北平分会，杨杏佛、胡适、蒋梦麟、李济、梅贻琦、任鸿隽等二十余人以及来宾和新闻记者十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二月一日，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选举胡适为主席，李济为副主席。民权保障同盟总部活动地点在上海亚尔培路三三一号即今陕西北路一四七号，宋庆龄经常到这里开会，与执行委员们讨论如何营救革命者和进步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申报》等新闻单位，公开发表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非法捕人杀人的消息。宋庆龄热情地希望新闻界同人与民权保障同盟的盟员“并肩站在一起，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并在这共同的事业中，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忠诚地合作，全心全意与民权保障同盟共同努力，为人类社会进步事业而斗争。

还在民权保障同盟发起之日，宋庆龄等就以筹委会的名义，打电报给蒋介石、宋子文（行政院长）、于学忠（平津卫戍司令），对他们在北平“非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的行径表示抗议，要求他们立即释放因抗日救国而被捕的一切爱国师生，“以重民权，而张公道”。宋庆龄对许德珩非常关心，就在十二月十七日发出电报的当天，宋庆龄和蔡元培还委托杨杏佛由上海亲赴北平探监，慰问和营救许德珩。北平军政当局对开罪于教育界有所顾

忌，便“趁杨杏佛代表民权保障同盟北来之际，顺水推舟”，释放了许德珩。许德珩出狱后当即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

宋庆龄对革命同志关怀备至。为营救革命志士，她四处奔波，费尽心血。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国民党政府与上海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相勾结，先后逮捕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罗登贤、秘书余文化、中华海员工会廖承志、红军将领陈赓以及陈藻英等。宋庆龄闻讯，不遗余力地进行营救。她与杨杏佛带着新闻记者到监狱探望，委派吴凯声律师为他们进行辩护。罗登贤、陈赓等被引渡到南京囚禁的第二天，她公开发表《告中国人民》书，反对蒋介石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压迫反帝抗日战士的罪行。她赞扬罗登贤等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和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说罗登贤等“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她还说：“如果我们容许这些革命战士们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害，那就是容许了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国民族生命的根苗”^①。宋庆龄曾一再嘱咐史良：“要多多注意为被捕的革命同志进行辩护”，“使正义得到伸张，使革命力量得到保护”^②。

四月三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沈钧儒、吴凯声、王造时、陈彬和七人为委员。宋庆龄与蔡元培联名打电报给行政院长汪精卫，认为

^①《宋庆龄选集》第68—71页。

^②史良：《人民的力量必胜》，载1981年6月2日《人民日报》。

罗登贤等的罪证不能成立。接着，宋庆龄偕同杨杏佛、沈钧儒以及美国友人伊罗生由沪赴宁，提交书面意见给汪精卫，要求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废止滥刑，禁用镣铐。她还与杨杏佛同往军事监狱去探望罗登贤、余文化、陈赓等，使狱中的反帝抗日战士受到很大的鼓舞。

宋庆龄还以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声援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及其夫人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后，她接受德国无产阶级领袖克拉拉·蔡特金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及一百多名德国文学家和教授的委托，主持正义，多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一文，抗议德国政府对德国人民的法西斯暴行，指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全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①。这一天，她还与鲁迅、蔡元培等前往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他们共同签名的抗议书，对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行径，“特提出最严重之抗议”。

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之声，震撼着浦江两岸，震撼着中国的山南海北，震撼着全世界。同盟的工作，成就卓著，有目共赏，人民大众为之欢呼。而国民党反动派对民权保障同盟却恨之入骨，不惜采取血腥手段予以镇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晨，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由亚尔培路住所外出，车子刚刚开出大门，就遭到四个凶手围击，杨杏佛腰中一弹，心中一弹，倒在血泊中。

^① 《宋庆龄选集》第72页。

(六)

杨杏佛殉难之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迫停止活动。但宋庆龄等没有被吓倒。他们化悲痛为力量，在更加广阔的战线上，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开展英勇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六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决定同年九月在中国召开一次会议。宋庆龄是这个国际进步组织的中国代表。她于同年八月六日在《中国论坛》上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宣布了这一消息，号召一切愿意参加反帝运动的人们，不分党派职业，都可以派遣代表出席大会。《声明》在强调这次会议的意义时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是“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破坏，人民惨重的死亡、灾难和贫困的加深”。因此，必须把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苦大众的战斗力量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计划“归于无效”。

不久，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派遣的代表，远涉重洋抵达上海码头。国民党当局采取恐怖、诽谤和迫害等各种手段，不许外国代表登陆。宋庆龄“违抗禁令”，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阻挠，亲自上船，在令人窒息的船舱里会见来自欧洲的反帝战士，与他们交谈开好这次大会的意见，并把他们迎接上岸。

这次远东反战大会由于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不能公开举行。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终于在上海霍山路的一幢楼房里“秘密举行”。出席的有苏区红军、东北抗日义勇军、十九路军的代表，工人、农民、学生的代表，以及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派来的英国前陆军大臣马莱，法国女作家、《人道报》编辑伐扬·古久里，《大美晚报》记者伊罗生等，共五十多人。日

本、朝鲜和我国台湾省的代表，因在会议之前被捕，未能参加。

大会于九月三十日举行。那天凌晨，宋庆龄甩掉密探，乘汽车赶到霍山路，由中共上海地下交通员接到会场。会场上几乎没有什么陈设，所有代表“都坐在地板上”^①。早饭后，宋庆龄宣布大会开始。继中外代表讲话之后，宋庆龄发表长篇演讲。她说：“如果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当局的恐怖和干涉，而我们能够公开举行一个会议的话，那就会有成千成万的代表，为中国亿万被剥削人民发出他们的呼声。虽然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人数为了明显的理由不得受限制，可是这个较小的集会仍然充分地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代表着他们抗议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战争。”她指出：“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又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也只有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象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做到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成。”最后，她响亮地提出：“让我们在整个远东，尤其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②。大会决定成立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宋庆龄当选为分会主席。下午四时许，会议圆满结束。宋庆龄在代表全部安全离去之后，才镇定地步出会场。

一九三四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独占中

①宋庆龄：《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载1953年10月3日《人民日报》。

②宋庆龄：《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在上海反战大会上的演讲》，《宋庆龄选集》第84—91页。

国的“四一七”声明。四月二十日，宋庆龄与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联名公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号召“全体武装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并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及其地方分会和下层组织。《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武装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正义的战争，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使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当亡国奴的神圣战争！这个号召得到国内人民群众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公开签名赞成者达十万人。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随即在上海正式成立，由宋庆龄担任主席。

这一年，宋庆龄在上海史沫特莱家里，参加了在华的一些美国朋友组织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活动。她用流利的英语畅谈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在座的朋友们叹服不止。此后，有两位“重要的共产党人”要经上海到苏联去，宋庆龄为此作了巧妙的安排。她要马海德“穿上时髦的西装，开着一辆天蓝色的福特轿车，护送客人到了码头”^①，躲过了国民党军警的盘查，顺利登上开往苏联的轮船。

(七)

宋庆龄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

^①《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247页。

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庆龄和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影响巨大”^①。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蒋介石集团迫于形势，通过好几条渠道，想方设法寻找同中国共产党接触的机会，其中一条就是通过宋庆龄向共产党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宋庆龄约董健吾到她家晤谈。董健吾曾经是共产党员，公开身分是牧师，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董健吾应约来到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交给他一包重要文件，要他送到陕北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且叮嘱道：此行胜利成功，将“益国非浅”。宋庆龄把旅途的一切都替董健吾准备好了，诸如“要件一包，行资百元，还有南京财政部委员的名义，作为沿途的护身符”^②。

宋庆龄送走董健吾后，又在考虑如何按照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转达的中共中央的意见，选送两位国际友人到陕北去。时在上海的美籍医生马海德，曾经不止一次地向她吐露过要到红军中去的愿望，他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之一。另一位，她想到了驻在北平的《世界日报》记者埃德加·斯诺。把“寻求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为自己毕生事业”的斯诺，听到中国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便下决心到“河的彼岸”去了解那“未知之地”——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为此，他曾专秘由北平来上海，请求宋庆龄帮助他到红区去访问。宋庆龄答应满足他的

①新华社：《宋庆龄同志伟大光荣的一生》。

②石肖岩：《一份宝贵的资料》。

愿望。斯诺回到北平之后，一直在等待着宋庆龄的回音。

一天，宋庆龄派人送信约马海德来寓所，对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夙愿实现了。”又说：“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马海德听后喜出望外，告别宋庆龄，整理行装去了。

正在宋庆龄思谋由谁护送这两位国际友人到陕北去的时候，董健吾由陕北回来了。他向宋庆龄报告了此行经过，递交了他从瓦窑堡带回的毛泽东写的重要信件和秦邦宪代表中共中央转赠给宋庆龄的三枚由红军铸造的、有斧头镰刀图案的银币和布币等珍贵纪念品。宋庆龄对董健吾此行非常满意，接着便向他提出二上陕北，护送斯诺和马海德去瓦窑堡的要求。董健吾没有推辞。他们一起商榷了沿途应注意的事项和与斯诺接头的地点、时间与方法。一切安排妥当，宋庆龄写信告知斯诺，要他由北平直接到西安和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接头，然后相偕去红区。

在这之前，宋庆龄的阑尾发炎，经常疼痛不适。但她厌恶进医院，因而一拖数月，直到非割治不可，才住院手术。就在这种情况下，她仍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抱病支持沈钧儒、邹韬奋等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工作。不久，传来鲁迅病重的消息。宋庆龄十分想去看望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可是，她自己手术后的伤口尚未复原，仍然不能起床行走，只好写信慰问，“恳求”鲁迅“立即进医院去医治”。信中说：“因为你迟延一天，你的生命便增加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

需要你。”“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担忧，为你感觉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进医院去医治。假如你怕在医院听不到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①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宋庆龄接到冯雪峰打来的电话，告诉她鲁迅先生已经逝世。她强忍悲痛，立即赶到鲁迅住宅，瞻仰遗容之后，就忙着料理丧事。二十日，由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肖参等组成鲁迅治丧委员会，主要的事情大都由宋庆龄主持。考虑到中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对鲁迅的爱戴，她陪许广平到万国殡仪馆以数千重金购买了一具有玻璃窗口的棺木，以便群众向鲁迅的遗容告别。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上海街头万余群众为鲁迅送葬。宋庆龄紧紧扶着鲁迅夫人许广平的臂，缓步行进在队伍的前头。在万国公墓举行的殡葬仪式上，宋庆龄含着眼泪，用英语作安葬演讲。她说：“鲁迅先生之革命工作尚未完成，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追悼鲁迅先生，须效法先生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精神，为民族求解放。”^②。她的讲演，真切动人，催人泪下。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到上海，商谈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潘汉年拜会了宋庆龄，并向她呈送了毛泽东九月十八日写给她的亲笔信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的信。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重新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恳切希望她为此

^①宋庆龄给鲁迅的信（1936年6月5日），载《老一辈革命家书信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②《鲁迅纪念集》，北新书局1936年版。

作出努力。这封信，措词恳切，战友之情，跃然纸上，其内容是：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请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①

毛泽东的信使宋庆龄进一步认清了国内的形势和自己肩头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62页。

的责任。她决心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作具体实际之行动”。然而就在这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被国民党非法逮捕了。事发后的第三天，即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出版的报纸《每日新闻》竟公开造宋庆龄的谣，说她“今早被法租界当局逮捕”，“罪名是从事与第三国际有关的共产党活动”；《上海时报》也刊有同样内容的消息。宋庆龄无比气愤，于二十六日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的名义发表抗议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主使的。”她愤慨地说：“我要在这里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手段，与他们的意图相反，只能更引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怒火和爱国的义愤。至于对我个人所捏造的罪状，那是不值一笑的，用不着我来驳斥这些日本报纸的污蔑。他们惯于诽谤造谣，早已臭名远扬。”声明最后说：“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被逮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吧！他们虽然可以在幕后指使逮捕七位领袖，但是全中国的人民是不会饶恕他们的”^①。

沈钧儒等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被押往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囚禁在吴县横街看守所。宋庆龄联合各界著名人士，为营救“七君子”出狱而奔走呼号。

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压了不顾民族危亡、坚持“剿共”政策的蒋介石。

^① 《宋庆龄选集》第 97—98 页。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宋庆龄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主张，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极好的时机。宋庆龄抓住这一时机，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与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三人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主国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提案说：一九二四年孙中山确立三大政策后，革命阵营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一九二七年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在眉睫。近半年来，中国共产党致函致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所以，“特提此案”^①。宋庆龄还在二月十八日的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严正指出“抗日必先剿共”是“荒谬”的论调。她大声疾呼：必须停止内战，“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②。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民主派势力的努力，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同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

此后，宋庆龄多次撰写文章、发表谈话，论述国共合作的道理，宣传抗日必胜的思想，卓有远见地提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③。她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

① 1937年4月15日《救国时报》。

② 《宋庆龄选集》第99—102页。

③ 《宋庆龄选集》第120页。

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所以，“中华民族的斗争的确是有国际意义的。”她按照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九月来信的要求，热情指导潘汉年同国民党中枢要员的接触，当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正式谈判国共合作的中共代表南来时，她又在寓所同他们会见，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七君子”被捕关入苏州吴县监狱之后，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抗议声明。国民党当局无视人民意愿，竟指使江苏省高等法院提起公诉，以“危害民国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罪名”，将沈钧儒等继续羁押。宋庆龄忍无可忍，便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与何香凝、诸青来、胡愈之、张定夫、王统照、潘大逵、沈兹九、陈波儿、张天翼、彭文应、刘良模、潘仰山、张宗麟、汪馥炎、胡子婴等十六人发起“救国人狱运动”。他们向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并具状呈送江苏省高等法院，坚决表示愿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具状说：沈钧儒等从事救国工作，并无不法可言，羁押囹圄，已逾半载，倘竟一旦判罪，全国人民均将为之惶惑失措。为此特联名具状束身待质，仰请钧院将具状人等悉予羁押审讯，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爱国究竟有罪无罪，要求高等法院“迅予办理，以解天下之惑”。

具状送出十天，不见批答，宋庆龄等再次请求入狱，与七君子并案处理。消息传开，全国各界人士踊跃响应，纷纷呈状江苏省高等法院，请求与七君子并案处理。宋庆龄表示，“愿意永远陪沈先生等坐牢”。她说：我们准备去入狱，是为了“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

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①。

七月的一天，宋庆龄不顾体弱病痛，率领柯香凝、陈波儿、王统照等十余人，避开国民党警宪的耳目，冒着酷暑，由上海奔赴苏州，同江苏省高等法院进行说理斗争。法院院长听说宋庆龄带队到了苏州，慌了手脚，推辞不见，只派一书记官出来敷衍。由于大家的强烈抗议，首席检察长才被迫出面。宋庆龄又正词严地说：“如果他们七位因主张抗日救国有罪入狱，则我们十余人亦应共同负责，一同坐牢，如爱国无罪，则应同享自由，立即释放他们七位。”检察长无言以对，支支吾吾，语无伦次地说：“苏州天气太热，还是请你们早点回上海去休息吧。”宋庆龄寸步不让，严肃地说：“我们不是来苏州乘凉的，而是来自请入狱的。”检察官无可奈何，只好说：“救国会本身是无罪的。”

宋庆龄等发起的“救国人狱运动”，给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沉重打击。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沈钧儒等终于在七月三十一日获释出狱。^②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危，致电建议她撤离上海到香港去。宋庆龄感激中共中央对她的关心，遂由新西姑朋友路易·艾黎掩护和“我党同志陪同到达香港”^③。

① 《宋庆龄选集》第112页。

② 《纪念宋庆龄同志》。

一九三八年六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宋庆龄任主席。这个组织的宗旨与任务是：在抗日战争中，一、“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①。

保盟成立不久，就收到诺尔曼·白求恩自陕北贺家川寄来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陈述了八路军的医疗情况、各医院伤病员的情况，强调了医疗设备不足的严重困难，还提出了发展八路军医疗事业的设想。他在报告中深情地说：“我能在此为英雄的中国朋友略尽义务，该是多么快活”^②！宋庆龄领导的保盟成员看过这份报告，无不为之感动，并想方设法援助八路军。从此，白求恩与保盟一直没有中断联系。宋庆龄后来说：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与我个人关系特别密切，这不仅因为他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贡献，而且由于我个人在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内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秋，中共中央派邓颖超去香港看望宋庆龄。宋庆龄为保证邓颖超的安全，先期回到广州，亲自安排与邓颖超的会见。这时，日本侵略军正在空袭广州，飞机俯冲，投下的炸弹成千上万。“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宋庆龄在日本侵略者滥轰滥炸的危险时刻，置生死于度外，亲自率领广州民众深夜举行爱国游行示威，并连续召开华侨会议和妇女会议，宣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在她的建议下，爱泼斯坦串联组织国外旅居广州的侨民、教师、留学生，成立了保盟广州分会。

①《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1938年6月），载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诺尔曼·白求恩关于八路军医疗状况的报告。

当美国侨民看到日寇投下的炸弹是美国制造的、日寇飞机是用美国汽油发动的、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略物资是购自美国的这些事实，心里感到很难过，纷纷表示同情中国人民，尽力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保盟广州分会虽然“成立还不到一个月”^①就因广州失陷而停止活动，但它确曾起过不小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九月，宋庆龄在汉口《新华日报》发表《华侨总动员——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文。她在这篇文章中热情赞扬“香港侨胞小贩牺牲血本，义卖献金，继以各行商贩的继续义卖运动，堪称先后比美的壮举”，热情赞扬在欧美、在新加坡、菲律宾、南洋、安南、暹罗、印度以及在香港地区的华侨，节衣缩食，积极捐款，组织救国团体，扩大国际宣传，成立战时服务团体，回国参加抗战等等事迹；希望第二届华侨会员代表大会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而“应该是议而有决，决而有行”，努力实现大会的一切决议，以促进反侵略和平阵线之进展，以扩大国际援华行动。

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香港的三百余名外国妇女集会，纪念国际妇女节。宋庆龄到会演说，向朋友们介绍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呼吁她们支援中国人民同法西斯势力的生死搏斗。她说：在中国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有成千上万穿上军装的妇女，有的从事实际斗争，有的在火线上从事后勤工作；在后方，妇女们负起照顾伤员，替军队征募寒衣，收容和教育战时孤儿的繁重任务；作家丁玲则领导着数百名学生和产业工人出身的妇女在华北前线进行文化工作。宋庆龄激动地说：“你们都已经体验到我们六千万名难民和孤儿的悲惨与困

^①爱泼斯坦：《回忆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工作》。

苦的情况。现在我要你们想一想我们英勇的游击队战士们，他们不仅面对同样的情况，而且能够不顾一切，继续不断地打击配备优良的侵略者。这些英雄们不仅是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配备的敌人作战；他们不仅是连最起码的医药供应都没有；而且，由于不甘心做奴隶，他们离开了自己的田地和工厂；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衣服和粮食。”所以，“我觉得我不仅有权利向你们呼吁，而且有权利向你们要求援助”，使那些“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抗日游击战士们，得到应有的物资^①。

不久，宋庆龄又发出“救济战灾儿童”的呼吁。中国的战灾儿童数以百万计，他们有的是为了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战士的遗孤，有的是被空袭炸死的父母的子女，有的是流离失所并被饥饿和疾病夺去生命的难民的后代；还有成百万的儿童，是正在前线战斗的战士和被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的难民们无力照顾抚养的孩子。为了拯救这些无依无靠的战灾儿童，保卫中国同盟发起了为战灾儿童服务的运动。一九三九年春，保盟在陕西三原建立的孤儿院，已收养有五百个儿童。宋庆龄要求一定要管好、教好这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因为“他们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中国”^②。

为了争取更多的国际组织和各国友好人士支援中国抗战，

^①宋庆龄：《关于援助游击战士们的呼吁——在香港国际妇女节集会上所作的演说》，载《为新中国奋斗》。

^②宋庆龄：《救济战灾儿童》。

宋庆龄经常给外国机构、组织和朋友们写信。她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写的《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里，热诚希望国际朋友“支援那些坚决要收复被敌人占领的土地，并正在敌人后方为新的民主的中国建立根据地的英雄游击队员们”，为游击队的伤病员服务，为游击区人民的医疗事业服务；同时，积极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以便重建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流为难民的中国工人有工做，能够恢复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①。

宋庆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她的一封封呼吁支援中国抗战的信函，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国际友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华侨，商人和船主，文人学者，社会名流，包括香港总督，都热情支援保卫中国同盟的募捐活动。保盟成立一年之内，就从各国朋友那里募集到捐款约有二十五万港币，还有十辆卡车、数千条毯子，以及包括显微镜和X光机在内的医疗设备、战地临时帐篷等大批物品。由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许多救济物资往往运不到解放区去。宋庆龄为此想方设法，亲自安排，一九三九年，英国工业家约翰·桑尼克劳夫爵士捐赠了一部大型救护车，车内装备有一个手术室，最适合战场使用，宋庆龄嘱咐保盟组织一个车队，一定要把这部救护车送到最缺乏医疗用品的延安去。这部救护车运到延安后，遵照宋庆龄的意见，赠送给了白求恩担任院长的国际和平医院。

一九四一年十月初，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兵力，对奉命由皖南向江北

^①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7—8页。

移防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发动围攻，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以下大部指战员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月十二日，宋庆龄得到消息，当即与柳亚子等打电报给蒋介石，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电报说：抗战进入第五年度，敌人失败之期已定，国际于我有利形势已成，“不料最近讨伐共军之声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宋庆龄等认为：“共党问题原为世界性之问题，世界病态不除，则此种势力组织必存在，我总理早已揭示其端倪矣”。这种世界性的组织，“即或假武力作一时侥幸之解决，仍必复活滋长，决不能以人工之力以消减”^①。因此，必须“撤销剿共部署”，而且“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②。宋庆龄领导的保盟还在二月十五日的《新闻通讯》上发表皖南事变的消息，向世界人民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实。

当时，国内外有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许多误解。他们中有的出于恶意，有的则是由于不了解真相。宋庆龄针对这些误解，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为纽约《亚细亚》杂志撰写了《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性质和前途作了详尽的论述。她在精辟地阐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定义之后，坚定地指出：“只要还有一个日本兵在中国国土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一定会存在”。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开方便

^①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255页。

^②1941年1月26日延安《新中华报》。

之门。文章还对那些“主张投靠罗马——柏林轴心，赶快和日本妥协”的反动派，以及“企图使‘日本脱离轴心’，‘稳定太平洋局势’，缔结一个远东慕尼黑协定”的英、美一些阴谋集团，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谴责和抨击。

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以后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作为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宋庆龄，活动十分繁忙。她住在九龙，距设在香港丰山区西摩道西的保盟总部还有一段路程。但她经常到总部主持会议，部署工作，连许多外国朋友也赞叹不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爆发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时，保盟成员有的在反法西斯侵略的战斗中光荣牺牲，有的被关进集中营，有的则化装转移。十二月八日，香港沦陷。宋庆龄一直坚持到日本侵略军逼近九龙启德机场的危急时刻，才从硝烟弥漫之中乘飞机离开香港，飞往重庆。

在一九四二年春季的悲惨岁月里，保卫中国同盟不仅丧失在香港的基地，而且在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一向大力支持保盟的爱国华侨组织，也都落入敌人之手。但是，任何残暴的侵略者都休想阻止宋庆龄坚持保盟的工作。还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她就曾立下誓言：“不论日本的封锁严密到任何程度，不论远东的形势变化到什么地步，不论保卫中国同盟的总办事处可能迁到什么地方去，只要国外的朋友继续尽他们的一份力量，我们也将在这方面竭尽全力”^①。所以，宋庆龄一到重庆，就聚集陆续由香港转移到重庆的保卫中国同盟成员，继续开展保盟的工作，并且很快就同纽约援华会及其驻重庆代表、美国国际皮裘制革厂工会、美国全国海员

^①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22页。

工会和职员、职业工作者工会建立了联系，收到了他们的大批捐款。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有关机构虽然不知道保卫中国同盟总部是否存在，但还是继续汇款给保卫中国同盟。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还采取各种方式募集款项。他们组织的戏剧义演和举办的舞会，得到各界人士和当时在重庆的国际朋友的大力支持。在宋庆龄的感召下，王安娜还约了一位法国女友马丽丝到酒吧卖酒，所得收入全部捐赠给保盟^①。据宋庆龄回忆：保卫中国同盟“为救济河南和广东的灾区人民”，还“设立了两个国际组织。通过义务工作人员和英、美、苏的外交和军事机构，举行戏剧义演和球类义赛”。一次，广东旅渝足球队与一个外国球队义赛时，特务及歹徒百般刁难。宋庆龄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亲临现场主持，并亲自开球，给中外运动员以很大鼓舞。

宋庆龄不仅为报刊撰写文章，还经常给海内外朋友们写信，宣传中国抗战必胜，介绍中国人民和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功绩。她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说：“在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武装部队仍然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卫，中国人民的武装部队进行斗争、实行民主，把许多孤立的游击据点扩大为敌后强大的抗日根据地。现在，他们已经不是孤军作战了。他们正同所有国家的数百万兵士并肩作战，逐渐勒紧敌人脖子上的绞索”^②。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她盛赞北平、天津、湖南、云南、广西以至她的祖籍海南岛的妇女，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①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90—391页。

^②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41页。

抗日根据地的妇女们，在抗击侵略者的神圣战争中发挥的伟大作用。她说：“只有在陕甘宁、晋察冀和其他的边区，才产生了继承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伟大传统的真正的妇女运动。在这些地区，被组织起来的妇女人数不是以千计而是以十万计的，同时她们不仅从事救济工作而且全面参加作战，全面参加政治和经济的工作”^①。鉴于这种情况，宋庆龄提出保盟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放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她强调，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但是它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宋庆龄在她的文章和通信中，继续呼吁各国友好人士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民主的伟大斗争，共同努力，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宋庆龄在重庆期间，同中共驻重庆的代表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一九四二年冬，董必武等要回延安，宋庆龄在自己的家里举行茶餐盛会欢送，应邀的客人中还有周恩来、邓颖超和冯玉祥及其夫人李德全。席间，人们被室内壁炉架上交叉垂摆着的两株黄澄澄的禾穗所吸引。李德全夸赞道：“这两株禾穗简直象金子铸成的一样！”宋庆龄微笑着说：“这比金子还要宝贵呢！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就好比金子还好吗？”^②周恩来用手抚摸着禾穗，点点头说：“将来打下了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面去”^③。大家共同祝愿抗

^①《宋庆龄选集》第161页。

^{②③}徐舜英：《我们时代的一颗巨星》。

战早日胜利，祝愿新中国早日诞生。

宋庆龄在雾都重庆度过了五个寒暑。在这五年里，任何阻力、威胁，都没有截断她同共产党人的联系。愈在危难艰险的时刻，愈显示出她同中共中央的一致，愈显示出她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愈显示出她不畏强暴的大智大勇，愈显示出她是共产党人可以信赖的亲密战友。

（九）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的全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的伟大胜利。宋庆龄与中国人民一起，欢呼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九月，宋庆龄在上清寺桂园张治中寓所，会见来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和平的毛泽东。不久，她迁回上海。

十二月，宋庆龄发表《保卫中国同盟声明》，对一切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给予中国人民以物质和精神支援的国际组织、各国朋友和国内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声明还说：由于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治愈，因此中国还希望得到国际朋友在“道义、物质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她宣布：保卫中国同盟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中福会”），继续同国际救济机构保持联系^①。

^①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48—50页。

宋庆龄认为，中福会工作在新形势下“必须扩大视野，制定新的目标”，而新目标的重要一项就是进行儿童福利和社会救济事业。依照宋庆龄的意见，中福会从一九四六年起，先后在上海劳动人民集中的地区办了三个儿童福利站，负责儿童保健，组织儿童学习，宋庆龄有时还亲自去看望孩子们，教孩子们识字。由于宋庆龄的倡导，儿童福利事业迅速发展，很快就

有约五千儿童得到“靠自己没有办法能够享受到的益处”^①。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宋庆龄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公开揭露“反动分子企图将美国卷进我国的内战，从而将全世界都卷入这个战争”的行径。她认为“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解决的办法“就是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应用它”，“立刻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宋庆龄还吁请美国人民阻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②。这一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很大震动，得到世界各国人民广泛的响应。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国统区的文化、艺术和教育界的不少人士，处于贫病交加之中。宋庆龄对此极为关注。她为此专门设立文化救济基金，使郭沫若、臧克家、叶浅予、艾明之、刘白羽、艾芜等许多著名人士得到捐助，得以维持生活、继续工作和从事创作。宋庆龄为此感到欣慰，她说：“为了使

^①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85页。

^②《宋庆龄选集》第179—181页。

中国文化生活在这困苦的岁月中不致凋谢，我们将继续帮助她的贫困的艺术家。”

宋庆龄主持的中福会，一直“把中国人民为消灭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作为它的中心课题”^①，工作重点是在援助解放区。由她援助建立起来的原在淮安后移鲁南的第四国际和平医院，经常收到经她细心检查、安排运来的药品。一九四六年夏，医院又一次收到药品后，华中军区张鼎丞司令员和邓子恢政委当即给宋庆龄写信表示：“蒙赠西药伍拾箱，已如数点收，深情厚意，至为铭感，特代表指战员致谢。”人民军队一直把宋庆龄当作最可信赖的同志。部队短缺什么药品，都由第四和平医院院长齐仲桓医师毫无保留地开列给她。宋庆龄对齐仲桓的来信，都认真地过目、答复。她在一次复信中说：“你的报告，一向令人感到兴趣。尤其是那张所需物品的清单更为可贵。它可作为我们今后争取物资的参考。虽然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满足你们的需要，但一俟一批急需物资到达后，我们仍将争取把它们运送给你们及其他国际和平医院”^②。

宋庆龄主持的救济组织自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八年十年间，共援助解放区建立了八所国际和平医院、四十多个分院，有一万一千八百多床位；此外，援助解放区开办了好几十个制药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是胶东新华制药厂；还成立了几十个医疗队，为千千万万的解放区军民服务。解放战争开始后，中福会克服种种困难，把整吨整吨的手术器械、药物、医学书籍、种子和农业书籍，以及儿童服装，运送给各国际和平医院和白

①②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98页、第91—92页。

求恩医科大学、制药厂、孤儿院和实验农场。

一九四七年秋，国民党的宣传工具散布谣言，说宋庆龄在广州参加国大代表“竞选”。宋庆龄当即在上海辟谣，发表否认参加国大代表竞选的声明^①。

蒋介石发动内战，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部进步人士的反对。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等秘密酝酿，计划发起在香港召开“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实现国内外民主和平问题”。随后，他们与谭平山、蔡廷锴、柳亚子、陈此生等云集香港，准备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九四七年底，何香凝、李济深上书宋庆龄，提出了成立这个组织的计划，并表示“以夫人二十余年来一贯之主张为主张”，深切盼望她“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一九四八年一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宣布成立，发表《宣言》和行动纲领，宋庆龄被推为名誉主席。

一九四九年元旦，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一月十日，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在南线战场上的精锐部队被消灭，国民党集团已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日暮途穷的蒋介石，演出了一场“引退”的闹剧，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这时，社会上有“宋庆龄将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的谣传。宋庆龄得悉，立即签发了一份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发表的声明：“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

^①宋庆龄：《否认参加伪国大代表“竞选”的声明》，载1947年9月20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①。可是不久，李宗仁真的写信给宋庆龄，要她“出为领导，共策进行”。宋庆龄泾渭分明，坚决不去南京。

在蒋家王朝行将崩溃之际，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在上海的处境，曾由毛泽东、周恩来联名打电报，邀她去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这份电报由中共中央发给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指示他们“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②，电文如下：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为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③。

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猛发展。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获得新生。五月二十八日，史良到宋庆龄的寓所，一见面，宋庆龄就高兴地拉着史良的手说：“我们现在解放了！”接着，她又欢乐地说：“国民党的失败是意料中的事，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

①《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席宋庆龄的声明》，载1949年1月11日《字林西报》。

②③《纪念宋庆龄同志》。

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①。

中共中央领导人得知宋庆龄很安全的消息，十分高兴。周恩来当即写信说：“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

七月一日，上海党政军民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宋庆龄应邀出席大会，并发表了《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演说。她用诗一般的语言，说中国共产党的灿烂光辉，照耀着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的波涛，荡漾着每一个岸口。她表示热诚地“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并说：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正在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②

七月七日，宋庆龄又出席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大会，发表题为《帝国主义，滚开吧！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的讲话。她说：“在我们悠久的历史，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在他们的后面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力量。”因此，“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③。在上海市纪念韬奋同志逝世五周年的大会上，宋庆龄高度赞扬了邹韬奋革命的一生，说韬奋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一位英勇的人民战士，并号召大家向韬奋学习，指出：“他的斗争历史，提供了革命知识分子所

①史良：《人民事业必胜》，载1981年6月2日《人民日报》。

②《宋庆龄选集》第185—186页。

③1949年7月10日《人民日报》。

走道路的一个最光辉的榜样”①。

这时，邓颖超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由北平抵上海，专程邀请宋庆龄去北平共商国是，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信中说：“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蒞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周恩来在信中说：“现在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宋庆龄展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后，当机立断，随邓颖超离沪赴平。

秋高气爽，北平火车站喜气洋洋。当宋庆龄乘坐的列车徐徐进站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在站台迎候，使宋庆龄深受感动。

（十）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宋庆龄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一起，共商建国大计。她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和策略的英明，歌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她指出：“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

①1949年7月25日上海《解放日报》。

诞生！”中国人民的这一胜利的进军，在国际战线上，“已经把整个世界的形势改变了”。她又说：“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①。会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自此，她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进行国务活动，开始了为新中国奋斗的新篇章。

十月一日这一天，宋庆龄容光焕发，特别高兴。她穿着整洁的衣服，和毛泽东、朱德等一起，参加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她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欢欣，说：“今日北京——这座历史古城，与我一九二五年所经历的，真有天壤之别。那个时候，这古城是各帝国主义的基地，是孙中山逝世的地方；而现在，这古城已变成人民的讲坛，新中国的诞生地。当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宋庆龄的眼睛里滚动着晶莹的泪花。她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

国庆大典后，宋庆龄返回上海。十一月九日，她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畅谈这次北京之行的感受，说：“在一连串各种各样使人兴奋的事情中，‘有两桩是最使人感动的’：第一桩‘是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二桩‘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她激动地说：“北京的整个空气，使每个人离开以后，都带了决心，要献出他的每一份力量，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②。“十月一日”这一天，给宋庆龄的印象太深了。她在为庆祝开国十周年而撰写的《新中国的第一年》一文中，满怀喜悦地说：“一九四九年十

^①《宋庆龄选集》第190、192页。

^②宋庆龄：《华北之行的印象》，载1949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

月一日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一个快乐的日子。它标志着解放了的人民、新生的中国的开始。从那一天，我们跨过了一个新的世纪的门槛，走向未来，走向人民的时代。”她接着说：“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是一个发放信号、除旧布新的日子。它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年的完成，和第二年的开始。它是总结我们的成就、准备向更加壮丽的目标跃进的日子”^①。

建国一周年庆祝活动之后不久，宋庆龄同林伯渠等一道，赴东北地区视察。每到一地，她都认真听取汇报，进行个别访问，找工人、农民、战士和干部谈心，仔细阅读大量的书面材料。工矿和农村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使宋庆龄感到无比振奋。她深信：“新中国确实在朝着它光辉的未来，向前迈进”^②！

一九五〇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威胁着我国东北边境。中国人民当即掀起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宋庆龄不仅与郭沫若、周恩来等亲手在和平呼吁书上签名，而且于六月八日发表《中国人民签名拥护世界和平》一文，高度评价这一有“数千百万的人们”参加的群众运动。她说：“在和平呼吁书上的大量签名表示了我们斗争的决心是多么普遍”，“四万万七千五百万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正鼓舞着全亚洲走向世界和平”^③。随后，她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庄严指出：“我们在战争贩子面前摇动我们的巨大的拳头：‘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建设，不要破坏！我们要真诚的国际合作，不要

^①《宋庆龄选集》第241页。

^②宋庆龄：《新中国向前迈进》，载1951年5月1日《人民日报》。

^③《宋庆龄选集》第240页。

帝国主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所共同发布的号令”。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宋庆龄于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一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朝鲜人民的斗争在亚洲所起的作用》一文，愤怒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热情赞扬朝鲜人民“为着自己的美好世界而斗争”的精神。她预言：“朝鲜爱国人民要解放自己的铁一般的决心，必将使外国侵略者一败涂地”。

当时，我国政府曾接二连三发表声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美帝国主义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强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于是，中共中央及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十九日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并肩抗击美国侵略者。宋庆龄精辟地论述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和前途，认为抗美援朝运动是一次重大的反帝反殖斗争，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是可以完全被打败的”^①。

宋庆龄为发展进步文化，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英勇奋斗，不懈地工作，数十年如一日，贡献巨大，功勋卓著。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她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理事，并荣获一九五〇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八日，宋庆龄在北京参加授奖仪式的答词中谦虚地说：“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我只是努力尽着我个人对人类所应尽的责任。”她把得到的十万卢布奖金，全部献出，用于发展中国儿童和妇女福利事业。

一九五二年三月，宋庆龄与郭沫若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

^①宋庆龄：《伟大的中国三大运动》，载《人民中国》1951年国庆纪念专号。

区域和平会议。这次会议于十月二日在北京召开，宋庆龄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她在大会开幕词里说：“这次会议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史诗意义的事件。”她回顾了一九三三年九月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会议的情景说：“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欢聚一堂，这件事本身就标志着人类历史中的和平事业的重大发展。对于居住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甚或更远地方的广大而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这是有着辉煌的意义的。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她说：“以美国统治集团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朝鲜和远东许多地方进行的“细菌战，疯狂破坏和兽性屠杀”的罪行，“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引起了深切的关心和普遍的愤恨”。“只要亚洲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地保卫和平，我有充分的信心，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地达到我们的目标”^①。这次会议产生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宋庆龄被选为主席。

十二月，宋庆龄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维也纳，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并在会上以《人民能够扭转局势》为题发表演讲。十二月下旬，她由维也纳回国时，在苏联逗留数日。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她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

随后，宋庆龄进行了十分繁忙的外事活动。由莫斯科回国后不久，她在北京的寓所，会见了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六年八月，她先后出访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为发展中国人民和

^①宋庆龄：《团结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载1952年10月3日《人民日报》。

亚洲各国人民的真诚友谊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五七年一月，她在为《中国建设》杂志社成立五周年撰写的《五年以前和现在》一文中自豪地说：中国已经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重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平等中的一员，“这正是中国无数革命者和先烈在屈辱的、受殖民主义压迫的漫长年代里梦寐以求的。”她强调要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消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说“这是一条通往和平、繁荣的道路，通往人类智慧得到发展的道路，各国人民在一个世界里共同生活的道路。”同年十一月，她随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活动。

一九六四年二月，宋庆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身分，同周恩来、陈毅一道访问锡兰（今斯里兰卡）。二月二十八日，宋庆龄在锡兰斯里帕里学院发表长篇演讲。她说：锡兰和中国之间虽然远隔高山重洋，却有许多因素使我们两国人民真正成为兄弟姊妹。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通过密切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真诚的友谊，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她还说，当今世界的主要特点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已经觉醒，“他们正在摆脱迷信，摆脱那种以为旧秩序是不可改变的想法”。以新的观点武装起来的人民，决心要从生活中消除压迫、剥削和战争的根源。二十世纪的伟大经验是，只要人民思想上的目标明确，紧密团结自己的队伍和团结同盟军，勇敢地同压迫者进行斗争，人民就能够赢得胜利。伟大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人民用小米加步枪先后抗击了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坦克加飞机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人民相信：“团结起来的人民是不

可战胜的”，“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①。

由锡兰回到北京后，宋庆龄会见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是宋庆龄和中国人民的诚挚朋友。三十年代他来到中国，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进入抗日根据地采访，曾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惊人事迹介绍给美国和各国人民，并因此受到美国当局捕风捉影的政治迫害。一九六〇年，斯诺第一次来到解放后的新中国，很想看看老朋友宋庆龄，但由于宋庆龄病得很重，未能如愿。一九六四年，斯诺第二次来到新中国，宋庆龄于十二月十八日在北京寓所会见了她。故友重逢，百感交集，二人就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话题，进行了亲切交谈。几年后，埃德加·斯诺溘然长逝。宋庆龄得知噩耗，顿时陷入悲恸之中，随即发出如下唁电：

埃德加·斯诺夫人：

适才接到来电，痛悉我们最诚挚的朋友不幸逝世，他在我们抗战期间坚定地支持了我们反对国内法西斯反动派和日本军事侵略的斗争。我们的坚强友谊也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的互相支持。我确信，你和你的子女将继续完成他的遗志，保证我们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你可以感到宽慰的是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人民心中的记忆将永葆常青。

宋庆龄在频繁进行外事活动的同时，还不时出席全国人民

^①宋庆龄：《团结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载1964年2月29日《人民日报》。

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时常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保持着联系。一九五六年九月，宋庆龄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她在向大会的致词中热情洋溢地说：中国人民积了几十年惨痛的经验教训，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很快地解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消灭了封建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这在人类进程中，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她由衷地说：“中国共产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联合所有民主党派，建立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府。它运用这个国家政权的力量，肃清了反革命分子，恢复了国民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文艺工作的百花齐放，科学工作的百家争鸣，正在开辟着一条光辉灿烂的道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世界上广大人民的热情的支持，……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团结国外爱好和平的人民，发挥文化交流的作用，发展平等互利的贸易，把协商和合作的精神扩充到整个世界。”她说：“我深信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到那时，人类也就要进入真正的大同世界，而“这种社会制度，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也一定会实现”^①。

宋庆龄列席党的八大期间，思潮起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又一次涌上心头。不久，她在上海寓所接待刘少奇时，便恳切地说：“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觉得这是一件重要

^①宋庆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载1956年9月27日《人民日报》。

的事，便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后来，刘少奇和周恩来在上海向宋庆龄转达党中央的意见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怀着不平静的心情，含着泪花点头表示理解党中央这些话的意思。的确如此，诚如刘少奇所说：“我们党把她作为党内负责同志看待，一切大事都告诉她，并听取她的意见，她也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与党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又说：“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①。

（十一）

宋庆龄是中国妇女的杰出领袖，一向关注国际妇女运动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不久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亚洲各国的妇女云集北京，召开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宋庆龄于十二月十一日向与会代表作了长篇讲话，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人民大众，特别是对妇女的蹂躏。她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妇女遭受的痛苦最深，“在社会上及政治上都沦落到奴隶的地步，充其量也不过是二等公民”。她号召尚未获得解放地区的妇女们，努力提高政治觉悟，积极反对帝国主

^①王光美：《永恒的纪念》，载1981年6月27日《人民日报》。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争取从苦难的深渊里解放出来。她说，要得到解放，就要进行斗争，因为“‘解放’不会是别人装在银盘子里给我们送上来的。”宋庆龄向各国姊妹们介绍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情况，鼓励她们为争取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斗争。她说：亚洲的妇女们曾经长期与男子并肩进行武装斗争，参加罢工、示威运动，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她们曾经面对过枪口、集中营的酷刑，以至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仍然统治着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姊妹们还要为争取妇女的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而继续斗争，并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妇女们通力合作，成为世界和平的先锋。

为了推进这种斗争，为了使全世界都明了这次在北京集会的自由妇女的立场，宋庆龄建议会议给“亚洲的妇女们”和“西方的妇女们”发出两份通电，并建议“会议一定将这些通电传递到有关的每一个人手里”^①。当她依次宣读了两份通电的电文以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两封战斗性的通电，使亚洲和西方妇女受到很大的鼓舞，使她们进一步明确斗争的方向。

宋庆龄对我国的妇女运动进行了有力的指导。建国后，她曾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一九五三年四月，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在给大会的贺词中，一再强调妇女在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巨大作用。她说，在我们的国家里，法律已确

^①《宋庆龄选集》第221页。

认妇女和男子有平等地位，我们在铲除男女不平等的封建关系方面已有了伟大的进步，这种伟大的进步，是由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活动使法律得以广泛传播并得以贯彻的结果。但是，中国妇女还没有完全解放，首先是男尊女卑的观点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在思想和行动中随时会表现出来。这种观点需要反复教育才能改变，而不是立刻可以根绝的。同时，妇女们到处都受到家庭繁重工作的束缚，这使她们的聪明才智不能得到发展，“使她们既不能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又不能依照社会对于公民的要求来使自己前进。”她强调：“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保卫整个人民共和国的利益是关键性的问题”，必须把人口中的一半劳动力完全解放出来，使妇女能够参加大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工作，使“妇女能够而且必须成为技师、经理、教员、拖拉机手、工程师、科学家和各种熟练的工人”，“按照必需和可能的速度推动我们国家的前进”。关于妇女工作的计划，宋庆龄在贺词中提出如下建议：一，必须继续教育人民群众重视保护妇女的权利，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且她们也要得到她们的特殊权利。二，必须提供更多的产科医院、托儿所、学校等设备，以便逐步地把妇女从家庭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三，必须加紧扫盲工作，并多设训练机构，使妇女能够自由选择职业。四，必须提高妇女的政治水平和加强她们的组织联系，保证她们尽量地积极地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她在贺词中最后说：“中国妇女的完全解放意味着我们国家的稳固坚强。”而一个强大的、生气勃勃的中国，“就是全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①。

^①宋庆龄：《给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贺词》，载1953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在以后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三次、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都着文祝贺，号召全国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她说：“在我们广阔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千百万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无论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在行政和文教事业方面，妇女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大军，而在持家和教育子女方面，妇女的劳动尤其可敬可贵”^①，这就要求妇女们“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家庭的和睦生活，为儿孙辈的幸福忘我劳动”^②。她强调妇女要做好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工作，说：“精心培育儿童成为可靠的接班人，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是新时期妇女的又一崇高职责”。

建国后，宋庆龄一如既往，致力于中国儿童和妇女的福利事业。她在回顾解放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时说：“象其他的人民团体一样，中国福利基金会在解放后所处的环境，是完全有利于为人民服务的，而且完全免除了压迫，因此我们进入兴奋的工作情绪中”。一九五〇年四月，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召开，董必武抱病作了关于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的报告。宋庆龄在四月二十九日的闭幕词中，完全同意董必武报告中提出的中国人民救济福利事业的总方针，希望全国的救济福利工作者和全体人民，都能了解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是以自救自助为基础的，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生产节约，劳动互助，坚决地以自力更生的精神来克服目前暂时的灾难。她还希望中国人民救济福利组织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地揭露一切帝国主义和

^{①②}宋庆龄给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词，载1957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并建立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我国人民之间的真正友谊。通过这种相互间友谊的援助和鼓励，进而团结一致地打倒共同的敌人，实现全人类的永久和平与幸福”^①。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随后，她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始人和主席的身分宣布，将这个组织更名为“中国福利会”，明确提出这个组织的任务由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转变为发展人民的福利事业。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宋庆龄以《新中国的信息》为题，为中国福利会，向全世界的朋友们作了录音讲话。她首先以兴奋的心情，向朋友们报告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历史性转变：“自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以来，中国最伟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的国号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人民’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不是为了装饰点缀，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同样有史以来第一次表明我们的政府巨大力量之所在——人民。”她在向朋友们介绍了新中国成立第一年救济和福利工作的成就之后，说：为了领导全国所有救济和福利组织，我们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它的宗旨是：“一，统一全国救济和福利工作；二，决定工作范围；三，按照计划支配人员、款项和物质；四，使宣传和行动一致。”救济总会的原则是，帮助人民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欢迎国际援助，并准备在任何可能的地点和时间，帮助国际友人。关于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宋庆龄说，由于大规模救济问题已由政府恰当地处理着，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历史上的新阶段，要在福利事业的各项技术的计划和发展上，担负起一个领导地位。从这一点出

^①《宋庆龄选集》第224—226页。

发，中国福利会将集中力量来做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工作的重点是在医药卫生和文化教育方面起示范性和实验性的作用^①。

根据宋庆龄提出的工作原则和重点，三十年来，中国福利会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福利会保健室发展成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由开始时的五十个床位扩充到三百个床位，每年接收住院分娩的产妇和妇科病人达八千人次，门诊近二十万人次；还派出医疗队到工厂、农村普及卫生医疗工作，创办助产学校；派出工作人员参加医疗队到国外工作；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国际主义的援助。

为了加强对外的宣传工作，宋庆龄在解放初期就与周总理商量决定创办了《中国建设》。参加筹备工作的有陈翰笙。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金仲华和爱泼斯坦夫妇。这份杂志创刊伊始，就致力于报道我国劳动人民，包括教育、科学、文艺、体育工作者的成就，“把中国社会主义进步的事实告诉全世界的朋友”，以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这个综合性的月刊，从最初的英文版，陆续增出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俄文、德文等六种外文版和中文版；发行到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建设》的编辑方针、稿件内容以及增加何种文版，宋庆龄都给予明确的指示；对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宋庆龄都关怀备至；还亲自为刊物撰写了三十多篇文章，使《中国建设》杂志越办越好。

对于妇女医药科研工作，宋庆龄也很关心。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召开时，她曾写信祝贺，希望专家们“在全面总

^①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28、142页。

结经验的基础上，促使妇产科的医疗保健和科学研究工作继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取得新成就”；并要他们“认真研究如何真正做好农村妇产科常见疾病、多发病和计划生育等工作，对妇幼保健和卫生事业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①。

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一九五八年，周恩来曾亲笔题词，祝中国福利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响应党的关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号召，发扬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增进中国妇女儿童的身体、精神和精神健康，为培养新的劳动一代，作出更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一直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她认为，老一辈人们的责任，在于把儿童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知识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儿童的”^②；所以，必须加强对儿童的教育。她说，幼苗纵然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上，但是如果没有农民的细心培育，不去锄草、施肥、灌水、除虫，就很难长成茂盛的庄稼；孩子虽然降生在社会主义肥沃的土地上，但是如果不进行教育，就不能成长为既有文化科学知识又有政治觉悟的新一代。在培养儿童的过程中，物质条件是重要的，但对孩子来说，思想教育比物质更为重要。她认为，教育儿童是全社会的责任，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结合起来，帮助孩子们从小热爱学习，热爱劳动，热爱科学，树立雄心壮志，掌握建设的本领。与此同时，还要注重他们的发育，从小养成卫生习惯，注意体育锻炼，使他们成长为

①宋庆龄：《致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的贺信》，载《中华妇产科杂志》1966年第1期。

②《宋庆龄选集》第447页。

体魄健壮的、勇敢的、能够吃苦耐劳的新一代，将来好担负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重任。

宋庆龄非常重视儿童课外阅读活动。她认为，出版大量的优秀的少年儿童读物，帮助小读者扩大眼界，增长知识，提高觉悟，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是极其重要的。为此，她不仅先后撰写了《源源不断地供给孩子们精神食粮》^①、《让儿童读物更好地为培养革命后代服务》^②等多篇文章，呼吁加强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编辑、出版、发行和评价工作；而且亲自领导中国福利会于一九五〇年创办了《儿童时代》。这份专为小读者服务的刊物，从创刊起，就得到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受到革命长辈、作家、教师、科学家和编辑、记者们象园了一样的栽培，成为祖国百花园中一朵鲜艳的小红花，成为广大少年儿童的朋友。一九六二年在庆祝刊物创刊三百期时，宋庆龄高兴地说：“《儿童时代》为小读者服务，是“光荣而幸福的任务”；应当根据小读者们的需要，把《儿童时代》办得更活泼、更好，使这朵小红花“开得更加鲜艳，更加生气勃勃”^③。

宋庆龄还特别关心儿童剧的创作。她在给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一封信中说：“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

宋庆龄的名字始终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她时时刻刻

^①载1955年9月6日《中国青年报》。

^②载1964年5月30日《人民日报》。

^③宋庆龄：《祝〈儿童时代〉创刊三百期》，载《儿童时代》1962年第23—24期。

刻都在关心孩子们的成长和教育。宋庆龄领导的少年宫，每年都有几十万少年儿童到那里参加科技、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和体育活动，使儿童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训练。一九五八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时，宋庆龄曾亲笔题词，对孩子们进行勉励：

新中国的儿童是幸福的。这幸福是你们的长辈用血汗创造出来的。你们绝不能满足于享福，要用你们的劳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幸福^①！

宋庆龄的心，始终和少年儿童一起跳动着。

(十二)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宋庆龄的心情就很沉重。她忧国忧民，常常终夜不得安枕，以作画来排忧解难。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夜，章士钊先生的住宅被“红卫兵”抄查。次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以保护。”周恩来当即派人保护章士钊住宅，同时写下了一份应加保护人士的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宋庆龄。第二天，周恩来在对首都“红卫兵”的讲话中特别提出：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她“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②。周恩来的讲话，措词委婉地保护了宋庆龄，实事求是

^①见《儿童时代》1958年第11期。

^②《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1页。

是地肯定了宋庆龄的历史功绩。

宋庆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实事求是，忠实于自己的朋友。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她为路易·艾黎写的一份材料，就是最好的证明。她写道：“我在一九三二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迫害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写了许多的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国外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不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由求恩夫人一样，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在这段时期内，宋庆龄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她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在何香凝的追悼会上致悼词，以后又相继参加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追悼会和“毛主席纪念堂”的落成仪式。一九七八年六月，她出席了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并发表演讲；九月中七日，她在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致闭幕词；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她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元旦茶会；三月，主持纪念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大会并致词；随后又在“三八”国际妇女节七十周年大会上致词；五月中七日，她参加了刘少奇的追悼会。与此同时，宋庆龄还经常会见国际友人。一九六六年十月，她在首都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以《孙中山——

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为题作了演讲之后，又在寓所会见日中友协理事长宫崎世民和夫人以及日本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访问团成员，与老朋友宫崎世民和西园寺公一进行亲切交谈。这以后，她还会见过美国女作家、历史学家巴巴拉·诺克曼及其女儿；百岁耄老尔蒂·费舍女士；宴请美国大百科全书主编泰勒、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接见美国知名妇女访华团，美国夏威夷访华团，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泰国妇女代表团，小保罗·罗伯逊夫妇，以及美中友协主席等等；还常在家里同外国友人爱泼斯坦、路易·艾黎、马海德亲切交谈，一起回忆几十年的斗争历程。

宋庆龄在年过八旬以后，对她应允过的事，仍然一件件认真做好。一九八一年初，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请她为《邹韬奋手迹》一书题签封面。八十八岁高龄的宋庆龄欣然应允。但她对沈粹缜说：近来身体不适，手有点抖，等身体好些再写。后来她身体一直不大好，到五月间，多次出现高热现象，仍想着这件事没有做。五月十二日，她让身边的同志扶着她走到写字台前坐下来，用抖动的手提起笔，写下了“韬奋手迹。宋庆龄题，一九八一年”一方字。她吃力地放下笔，微笑着说：“我现在放心了。”

这一年的五月八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在仪式上讲话，热情赞扬宋庆龄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公仆和社会领导人之一”；说宋庆龄“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宋庆龄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

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吸收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宋庆龄过去曾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认真地讨论过她的入党要求。一九八一年春，她病重时，又一次提出入党要求。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一致决定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五月十六日上午，邓小平在看望宋庆龄时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宋庆龄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她内心的喜悦。当天，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一致通过决定，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宋庆龄的病情一天天加重。五月二十日，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一起到宋庆龄的住宅看望，宋庆龄微笑点头致谢。胡耀邦说：宋庆龄同志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这样的评价，她是当之无愧的。

自从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宋庆龄副委员长的病情公告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宋庆龄办公室连续收到国内外发来的数百封慰问函电。大江南北的工人、农民、科学家、医务人员和少年儿童，以及各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和人民团体，衷心祝愿宋庆龄恢复健康，不少人还寄来了药方或药品。英国的肯尼思·康德黎先生（孙中山一八九六年在伦敦蒙难时，曾得到康德黎父亲的营救）也于五月二十日致电宋庆龄表示慰问，祝愿“孙中山与家父所开创的友谊长存”。

孙科的女儿孙穗英、孙穗华，专程从美国旧金山赶到北京，于五月二十二日看望祖母宋庆龄。宋子良也在这一天自美国纽约州哈里森发来慰问电，为宋庆龄的健康祈祷。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孙穗英和孙穗华再次来到宋庆龄的病榻前轻声呼

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从旧金山来看望您了。”宋庆龄睁开双眼，望着她们，微微颌首。孙穗英和孙穗华又连连呼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多爱您呀，希望您早日痊愈。”宋庆龄频频颌首，面露激动的神色。在宋庆龄病危期间，她们姐妹一直守候在祖母的身旁，不断到祖母床前问安，向医生了解会诊情况，热情地感谢医护人员的悉心治疗和精心护理。宋庆龄的外甥女戴成功居住在澳门，也经由香港赶到北京，于二十七日到宋庆龄的病榻前问安。

五月二十八日晚九时，宋庆龄咽部粘膜大出血，呼吸困难。经紧急抢救，继又发生肺水肿，病情危笃。晚十一点多钟，宋庆龄已经恶化的病情急转直下。卫生部领导同志和医护人员的抢救工作持续二十个小时，终于无效。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二十时十八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五月三十日，首都各界三万余人，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起，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到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瞻仰宋庆龄的遗容。三天之中，有十二万余人前往吊唁，缅怀宋庆龄一生革命的光辉业绩。六月三日下午，首都各界近万人隆重追悼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由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悼词中说：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七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高风亮节，永垂千古。

宋庆龄的遗体，由廖承志和孙穗英等护送，移往八宝山火化。六月四日，邓颖超和孙穗英等护送宋庆龄的骨灰，专机运往上海；再由上海迎灵车队护送，缓缓驶向西郊万国公墓宋氏墓地。

宋庆龄从事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卓有成就，有目共睹，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有巨大影响。她逝世的噩耗传出之后，我国收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包括政府、团体和个人的大批吊唁函电，称赞她是“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的象征”，是“中国杰出的和崇高的女英雄”、“全世界妇女的典范”，是“杰出的国际人物和中国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对她表示了无限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宋庆龄洁白无瑕，高风亮节，堪称万代楷模。她为人民生，为人民死。她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新中国而奋斗的一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

宋庆龄的昭昭功绩，永垂不朽。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永远怀念她！

附 主要参考资料：

1. 《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 《纪念宋庆龄》，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3. 新华社，《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

阎红彦

毕 兴 · 周天德

贺安华 何盛明

阎红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一九二五年入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大队长，陕甘游击队大队长、总指挥，红三十军军长，警备第一旅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党的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他英勇无畏，坚强不屈，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终身为革命奋斗不息”^①，不愧为“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英勇战士；坚持党的立场、原则，忠于革命事业的模范党员。”^②一九八四年八月彭真题词号召：“发扬阎红彦同志忠心耿耿毕生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③

(一)

阎红彦又名候雁，一九〇九年九月十三日生于陕北安定县

①彭真1982年6月9日题词。

②黄火青1985年6月题词，手迹见本书卷首。

③彭真1984年8月题词，手迹见本书卷首。

（今子长县）瓦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阎厚基，母亲周氏，终岁劳碌，省吃俭用，维持着艰难的生活。

红彦九岁那年，父亲送他到附近米粮山私塾读书。由于家庭经济困窘，交不起学费，艰难地维持了半年，便辍学回家，到砖瓦窑帮哥哥烧砖做瓦。

一九二〇年，十一岁的阎红彦经人介绍，到离家数十里的关庙坪，帮当地军阀王保民的岳父揽羊放牛，带小孩，做家务。有一天由于放牧疲惫，失手将主人的小孩摔倒在地，挨了一顿毒打。他一气之下，出走长城脚下的神木、府谷一带，靠打短工度日。

一九二四年，陕北久旱不雨，赤地千里，饥民成群结队，奔走他乡。阎红彦一家的生活，也陷入绝境。恰在这时，陕北地方军阀部队石谦团驻安定县的李象九连招兵，他便赶去报名。当时只有十三岁，且只读过半年书的阎红彦，虽然不符合“年龄要在十八岁左右、有一定文化”的招兵条件，但招兵的人见他身躯高大结实，要求入伍迫切，遂破格录取。开始他在李象九连队当号兵，不久调连部给李象九当勤务兵。

李象九一九二四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他领导的这个连，训练内容和生活制度均与一般旧军队不同，每天除两小时的军事训练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政治和文化，还可以公开阅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革命书刊。一批进步青年如雷恩钧、史唯然等先后通过李子洲、谢子长的关系到该连任班、排长和训练工作，党在连队里秘密发展了不少党员。

阎红彦刚入伍时，只是为了谋求生活出路。在连队革命气氛的熏陶下，他追求进步，表现积极，一九二五年四月，在宜

川集义镇由李象九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十一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胜利占领陕西，石谦团改编为国民军第十一旅，李象九升任第一营营长，谢子长任第十二连连长，部队驻防清涧。在我党的工作下，石旅几个营、连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先后发展了一百多名官兵入党。阎红彦参加了连队组织的演讲团和文明戏的演出，深入附近乡镇，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帮助组织农民协会，鼓动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

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不久，陕北土皇帝井岳秀在榆林刺杀了同情革命的石谦旅长，并密谋解除李象九、谢子长两部的武装。这时，在石谦旅任中共党团书记的唐澍和任军支书记的白乐亭等，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李、谢部队不能坐等敌人消灭，应立即举行起义”^②的指示，同谢子长、李象九一起，加紧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阎红彦时任唐澍的党内交通，每天奔走城乡，往返连队，转送文件，传达指示。唐澍对这个青年人十分关心，常给他讲解马克思主义道理，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鼓励他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忠诚党的事业。在唐澍的帮助下，阎红彦的思想觉悟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党在陕北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武装暴动——清涧起义爆发了。当晚，李象九集合部队，宣布起

①《阎红彦自传》，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②雷恩钧：《回忆清涧起义》（未刊稿），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义。士兵臂带红袖章，查封了大商号的银柜，打开了大商号的烟土库，并分头捕捉大绅商。阎红彦奉命带领一队人马，捉拿了县长张友之。

十月十三日，部队挥师南下，二十日占领宜川。

十一月中旬，敌调集部队包围了宜川县城。由于力量悬殊，加之指挥失当，近千人的部队只有二百余人突出重围，起义归于失败。阎红彦逃亡山西绛州，匿居张汉民家。

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原为西北军杨虎城部下，自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后，他被遣送回家。阎红彦在张汉民家住了一年，其间为了筹措活动经费，曾拦截了杨虎城参谋长的一批烟土。为此，他受到严密侦稽，在绛州无法立足，只得又秘密返回陕北。到陕北后，他在清涧一带组织了一支十多人的小游击队，由于处境艰难，无法开展斗争，经党准许，他与雷恩钧重新出走山西。

一九二九年春，根据陕北特委关于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阎红彦被派往宜川、延长交界的后九殿山寨杨庚五^①部做兵运工作，失败后，潜回瓦窑堡。

(二)

一九三一年初，中共北方局从陕北抽调一部分干部，在山西省委领导下组建红军游击队。阎红彦和白锡林奉命东渡黄河，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当时正是蒋、阎、冯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匿身大连，山西

^①杨庚五，曾加入过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失掉关系，后投降井岳秀，被驻延安的高双成师长杀害。

政局动荡，财政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我党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进行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开辟山西革命根据地。

二月，阎红彦来到太原，见到了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刘向阎分析了山西的形势，传达了省委关于在吕梁山创建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当时，在吕梁山区，有一些往来于黄河两岸的武装“土客”。他们是保护走私烟土的一支武装力量，其成员大部分是生活无着、铤而走险的无业游民。山西省委决定，首先把这些“土客”争取过来，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为此，派阎红彦和白锡林、拓克宽等，到“土客”师治贵部担任班长。

师部有三十多人枪，是当地“土客”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股，活动在孝义县西宋庄以及灵石、孝义、隰县三县交界的温泉一带。师治贵长期厮混江湖，打家劫舍，生活腐化，挥金如土。他虽然表示赞同革命，但其本质并未改变，很快就和党发生了原则分歧，收缴了阎红彦、白锡林的枪枝，并强令其离开部队。经过斗争，师治贵归还了阎、白的枪枝，不久，将部队解散，潜逃平遥。

阎红彦离开“土客”队伍后，到太原向刘天章汇报了详细情况。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改变部署，从冯玉祥的汾阳军官教导团和军阀高桂滋部抽调有作战经验的地下党员杨重远、吴岱峰等，从太原兵工厂抽调马佩勋等十多个工人党员，会同阎红彦、白锡林，秘密潜赴吕梁山区，发动与武装当地的贫苦农民，重新开始组建游击队的活动。同时决定，建立游击队临时党支部，由杨重远任书记，阎红彦、拓克宽、黄子文、吴岱峰为委员，并在汾阳建立了联络站，以杨重远为主任。按照党的

决定，阎红彦负责组织联络工作。他时而以国民党军官身分出现在太原，时而以富商大贾身分活动在汾阳，把省委筹集到的枪枝子弹和调配来的人员，秘密护送至离石、中阳交界的九凤山。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有三十多个革命者抵达山区，筹集到步马枪二十五支。

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游击队在孝义县娄底村（现名西泉村）举行成立大会。拓克宽主持大会，并宣布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公布了经省委批准的领导人员名单：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支部书记杨重远，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阎红彦兼任，第二中队中队长白锡林^①。“从此吕梁山上举起了第一面标有镰刀斧头的革命红旗，诞生了山西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②。

敌驻永安镇的一个加强排，约四五十人，装备精良。由于长期拖欠军饷，士兵极为不满，经地下党秘密工作，准备起义。汾阳联络站要求派人策应。阎红彦偕同白锡林、胡廷俊等，化装潜入该镇，经过三天三夜紧张的工作和周密的部署，在王家池打退了追兵，胜利进入山区和游击队汇合。

五月，游击队转移到孝义县西宋庄，并以汾阳县三道川、中阳县上桥村、孝义县郭家庄和温泉等地为中心开展活动，初步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狠狠打击农村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在短短的几个月中，阎红彦率领部队先后惩处了中阳县后狮峪的郝守富和孝义县碾头村的武世功。消息传开，大快人

^{①②}吴岱峰等：《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载《山西文史资料》第20辑。

心。反动派对此十分惊慌，太原、天津的报纸连连惊呼：“山西匪势猖獗”，“大好云山，几沦盗匪世界”^①。吕梁各县的反动政府也纷纷向省里告急，要求派兵“清剿”。在艰苦的“清剿”斗争中，阎红彦曾率部主攻中阳县留誉镇，并指挥了孝义县储家塆和石楼县水头镇等战斗。他机智勇猛，临危不乱，击败了敌人，大长了游击队的声威。

一九三一年夏末，徐永昌接任山西省主席。不久，即调集百倍于我的重兵向游击队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敌人采取“四壁合围”、紧缩包围的策略，妄图把游击队困死在深山密林中。游击队面对强大的敌人，毫不畏惧，依靠群众，昼伏夜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英勇机智地同敌人周旋。但由于寡不敌众，被围困在老鸦掌一带极为狭小的山林中。战士们露宿山头，靠野菜和野果充饥，处境十分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队委会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紧急措施。有的人主张埋枪散伙，待机再起；有的人主张冲下山去和敌人硬拚；阎红彦认为应按照山西省委事前的指示，西渡黄河。他分析和比较各方面的情况，说服了大家，会议最后决定突围西进。当时，全队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每人身背两枝枪，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攀悬崖，登峭壁，艰难地向黄河边上转移，于九月三日到达石楼县辛关渡。由于敌人封锁渡口，大家只好隐蔽在高山顶上的乌龙庙里。入夜，阎红彦找到水手王怀安，并带领游击队员悄悄摸到河边，乘坐羊皮筏子，冲过了浊浪滚滚、奔腾咆哮的黄河天险，进入陕北高原。

^①1931年8月8日、8月29日天津《民国日报》。

(三)

九月六日，部队行至绥德以西的南沟岔，在大雾弥漫中，与敌军六、七人相遇。由于拓克宽、黄子文处置失当，以致让敌逃脱。为此，队员严重不满，一致要求开会，改换领导。经过民主选举，公推阎红彦为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九月八日，部队到达安定县西区枣树坪，通过谢子长的哥哥谢德惠（地下党员）及共青团陕北特委负责人、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马文瑞曾派慕嘉绩向游击队送去油印机和蜡纸等宣传用品，并动员了马云泽、强龙光等当地一批党员和革命青年参加游击队。不久，特委书记赵伯平派张子平前来，指示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很快由渡河时的三十人扩大到近百人。

游击队在安定县得知谢子长不在陕北，于是决定西进寻找刘志丹。九月十日，在乌云翻滚、瓢泼大雨中，阎红彦指挥了平桥战斗。首战告捷后，进抵保安县（今志丹县）境。经多方了解，获悉刘志丹在陇东一带活动。队委遂决定，暂不去陇东，首先沿安条岭北进，迎接红二十四军^①，在陕北开展革命斗争。

安条岭是插在保安和安塞中间的一座大山，沟险谷深，人

^①红二十四军是1931年7月，国民党驻山西平定县高桂滋部一千多人，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之下起义后成立的。万启贤任军长，苏亦雄任政委。在敌重兵围攻下，撤出山西，经雁北转移至陕北一带。

烟稀少。游击队在北进途中，遭到驻保安之敌高玉亭部和民团三百余人的南北夹击。根据侦察情况，阎红彦决定集中兵力，先消灭北路民团，然后再打南路高玉亭部。战斗中，阎红彦身先士卒，勇猛果敢，带领游击队员冲锋陷阵，把高玉亭部和民团打得狼狈溃散。战斗胜利后，游击队士气高涨，声威大震。

九月中旬，游击队进抵靖边沙漠地带。阎红彦一面派胡廷俊化装去神木、府谷一带探听红二十四军的消息；一面根据陕北高原的特点和战斗的需要，决定打土豪、缴马匹，组建骑兵。不久，胡廷俊带回了不幸的消息，红二十四军在榆林以北两岔河被井岳秀军包围，全军覆没；党员七十余人，惨遭杀害。队委会重新讨论部队去向，决定重返安定一带。

九月下旬，游击队挥师南下，沿途取得了寨儿山、营盘山战斗的胜利。这时，长期流窜在黄河两岸的“土客”杨琪、杨森、杨鼎和师储杰等先后主动要求与游击队联合行动。阎红彦和“土客”在山西曾有过一段交往，对“土客”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他们出身贫苦，打仗勇敢，和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势不两立。但是，纪律松弛，抢劫成风，流寇习气十分严重。经队委会研究决定，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争取改造“土客”队伍，同意联合行动。但要求他们必须遵守以下三条：一，服从游击队队委会领导；二，不抢穷人的东西；三，不强奸妇女。他们表示完全接受。陕北特委先后派雷恩钧、白雪山、惠泽仁等到“土客”部担任指导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并组成了执法队，由雷恩钧任队长，查处违反军纪的行为。

十月初，在阎红彦的指挥下，游击队与师储杰、杨琪等步骑三百余人，翻越关道崂山，在一个拂晓时分，突袭敌驻玉家

湾的一个加强骑兵排，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和马匹。接着，游击队乘胜进抵瓦窑堡城郊，对瓦窑堡发起进攻，一部曾突入城内，迫使敌退守米粮山，紧关寨门，死守待援。游击队撤出战斗，转移至延川永坪镇休整。

瓦窑堡战斗，震动了陕北，阎红彦成为当地传奇式的英雄，也成为敌人悬赏追捕的“匪首”。敌人捣毁了他家的窑洞，逮捕了他年老多病的父亲，兄嫂弟妹也被逼投奔亲友，流落异乡。阎红彦的父亲被关押期间，受尽了酷刑，直到一九三五年红军占领瓦窑堡，砸碎铁牢，他才得以重见天日。

十月下旬，驻延安之敌高双成旅，集中步骑兵六百余人，在清平川岔口将游击队层层包围。阎红彦率部与敌苦战一天，当晚又出敌不意，胜利突围到安定县凉水湾。这时，县委转来特委指示，要游击队迅速避开敌人主力，转移陇东。于是，部队星夜向西疾进。途中与敌张廷芝部遭遇，先后在保安县野鸡岔和红柳沟展开激战。战斗中阎红彦被擄下深沟受伤，他忍痛攀山越岭，追赶部队，途经芦子沟，在刘志丹家住宿一夜，次日，由张明科带路，顺利返回游击队。

十一月下旬，部队到达乔山中段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时，打听到了刘志丹的消息，立即派马云泽前去迎接。在阎家砭驻地，阎红彦、杨董远等与刘志丹亲切相会，大家都十分高兴，阎红彦还把自己一支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刘志丹^①。

找到了刘志丹，对部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接着游击队派马云泽去平凉与负责兵运工作的谢子长取得联系。不久，谢子

^①阎红彦：《回忆陕甘高原早期的革命武装斗争》，载《星火燎原》第2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吴岱峰、马佩勋、马云泽：《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载《宁夏文史资料》第9辑。

长偕同省委交通高硕卿（即高岗）来到部队。根据省委指示，他们首先传达了成立陕甘红军的决定。接着成立了新的队委会（即游击队的党委会），谢子长为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为委员。随即召开了队委扩大会，总结晋西游击队的工作，研究今后的行动方针，决定以南梁地区为中心，扩大红军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会后，游击队进驻新堡，进行整训。尔后，队委会抽调了十余人枪，新组建了一个支队，由阎红彦任队长，到乔山北段陕甘交界的曲子、环县、定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阎红彦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牛羊，抗捐、抗款、抗粮，扩大武装。很短时间，部队发展到步骑一百余人。

一九三二年一月初，省委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决定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阎红彦任第一大队长^①。

这期间，阎红彦奉命到西安，除向省委汇报部队有关情况外，还同在杨虎城部担任警卫团团长的地下党员张汉民和副团长阎揆要、军械处处长史唯然等老相识取得了联系，为游击队筹措了一批枪枝弹药。特别使大家感到兴奋和鼓舞的是，他带回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它对部队的整顿和改造，对克服各种错误倾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根据省委的指示，部队经过整

^①《阎红彦自传》，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顿，在甘肃正宁县三甲原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后叛变）兼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阎红彦任第一大队大队长，吴岱峰任第二大队大队长，白锡林任警卫队长。“从此，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①。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根据省委进军渭北各县，在关中平原建立苏区的指示，于二月十三日拂晓进驻关中旬邑的职田镇，捣毁了反动的区公所，收缴民团的枪枝，处决了唐碧武等八个大土豪，开仓放粮，赈济贫苦农民。二月十五日，敌猛扑职田镇，次日，在阳坡头展开激战，阎红彦指挥突击队三十余人，迂回侧袭，插入敌阵，猛打猛冲。敌指挥失控，顿呈混乱。我军乘势反击，毙俘敌三百余名，缴枪三百余支。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胜利。

三月十九日夜，游击队奔袭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战斗失利，部队进入四村原、湫头原。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遵照队委会的指示，在这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摧毁地主政权，召开了四村原七十二村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了正宁县革命委员会。接着又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少先队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

四月十三日，我军再度袭击山河镇，仍未得手。二十日，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游击队由山河镇撤回，星夜兼程，直捣旬邑。阎红彦率一大队猛攻东城，吴岱峰率二大队直取西堡山寨，全歼守敌三百余人，一举解放旬邑城。

这时，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陕西省委书记杜

^①李振民等：《谢子长》，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卷第243页。

衡（后被捕叛变）来到部队巡视工作。他不从省委要求游击队攻打城镇和平原地区这一“左”的错误指导方针上去总结两次攻打山河镇失利的经验教训，而把责任全部推到指战员身上，指责谢子长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强令其离开游击队。接着，在旬邑马家堡，他把游击队改组为三、五两个支队。三支队队长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吴岱峰，前往西兰公路永寿、乾县、礼泉一带活动；五支队队长阎红彦，政委黄子文，参谋长杨重远，开赴三原新字区、武字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三原的新字区、武字区，大革命时期就有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阎红彦率部到这里后，在地方党的协助下，收缴了田家营、孙家坡民团的枪械，建立和发展了各种群众组织。游击队也很快得到了发展。

五月十日，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总指挥兼三支队队长。根据当时的形势，队委会决定集中三、五支队，进军陕北，建立根据地。五月十五日，在刘志丹指挥下，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部攻破马栏镇，歼灭陕北军阀井岳秀部两个连及民团一部。十七日，在乔山主峰凤凰山歼敌两个连之后，又乘胜攻入焦家坪和五里镇，一天之内，歼敌五百余人，缴枪四百余支。在五里镇镇压了土豪杨百万，发动群众开仓分粮。游击队也迅速扩大至一千余人。五月二十七日，部队进驻吉子峁。阎红彦正在组织群众，开仓分粮，敌特务团尾追而至，向我发起进攻，事前混在分粮群众中的敌便衣队，从内策应，我军受到内外夹击，仓促撤出战斗，涉水抢渡洛河。恰在这时，天色突变，暴雨倾盆，我军踏上洛河左岸时，河水陡涨，洪峰咆哮而下，把敌隔在对岸。我军遂得以安全地撤退至洛川交道原休整。队委会总

总结了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阎红彦对自己麻痹轻敌，防范不严作了检讨。

交道原休整后，五月三十一日，三、五支队分两路急行军进攻英旺镇。阎红彦率尖兵连逼近敌营，发出信号，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敌指挥部，全歼敌一个营。接着，攻打临真镇。队委会命令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时任三支队二大队政委）指挥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战斗开始后，阎红彦率部攻入镇内，二大队也占领了东山制高点。当敌组织力量反扑时，高岗带领十余人临阵脱逃，致使攻入镇内的我军，遭受重大损失，伤亡七、八十人，被迫撤出战斗。事后，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开除高岗党籍，军籍，总指挥部下令通缉，以正军法^①。

六月上旬，阎红彦根据队委会指示，率陕甘游击队少先队六七十人^②，深入黄龙山发动群众，筹款筹粮，配合主力，扩大政治影响。与此同时，游击队主力经宜川集义镇，进抵韩城上官庄。原拟在这一带开辟根据地，后因强敌袭击，难以立足，只好又横穿韩城、蒲城、白水、宜君等县，西撤至甘肃正宁县麻子掌，部队锐减至二百余人。在讨论行动方向时，领导人中发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乔山”的争执。有的认为渭北一带群众基础较好，主张把部队拉到三原新字区、武字区，采取“昼伏夜出”的办法打游击。有的认为，三原一带是平原地

^①1955年4月5日阎红彦在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原件存中央档案馆。贺晋年：《回忆阎红彦二、三事》，载《山西文史资料》第23辑。

^②3月下旬，陕甘游击队在艾蒿洼战斗后，谢子长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并任命王有福为队长。

区，离敌统治中心西安太近，游击队不易立足，主张北上乔山，那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域开阔，回旋余地大。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有人便提出，“愿意到北边的北边去，愿意到南边的南边去。”于是，部队各驻一个村子，准备分兵。正在这时，阎红彦从黄龙山赶回部队。争论的双方都派人来争取阎红彦。他明确地表示：“我那边都不去。”并且说服双方，认识“南北分兵”的严重后果^①。最后，在梁掌堡召开的队委扩大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了阎红彦的意见，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一致推举阎红彦担任总指挥。接着，整顿了部队，刘志丹、吴岱峰率二大队深入照金一带活动，阎红彦率骑兵队、少先队战斗在盘客原一带。七月九日，驻甘肃合水县西华池的新编警备十一旅一团一连连长、共产党员高鹏飞率两个连举行起义，阎红彦亲自率部接应。陕北特委和三原党组织也及时地输送来一批党员和战士，游击队又发展壮大到七百余人。

正当游击队得到恢复的时候，推行“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却提出要“彻底转变陕甘游击队与苏区机会主义的领导”^②。七月二十三日，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昆（亦名愚痴）接替李杰夫担任游击队政委。李昆到职后，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修筑防御工事”，“坚守阵地”^③。他指责阎红彦、刘志丹、杨重远等是“游击习气”、“上山路线”、“逃跑主义”。在游击队占领只有六、七户人

^①1945年7月16日阎红彦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原件存中央档案馆。阎红彦：《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几个重要问题的事实经过》，未刊稿。

^②《陕西省委关于愚痴同志巡视边区的决议》，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③陕西省委来件：《边区军事计划》，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家的五顷原以后，李良提出：“死守五顷原，不让敌人铁蹄踏进五顷原一寸土地。”限令二十天之内分完土地，并命令游击队消灭附近敌人的顽固据点，建立新的根据地。李良的错误受到了阎红彦等的抵制。李良便利用职权，把阎红彦等集中整训，强制推行他的错误主张。他还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非法成立了“秘密队委会”，错误地认定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有反革命嫌疑，进行打击迫害^①。由于李良的错误指导，致使游击队在王朗坡、三甲原等地的三次战斗中接连失利，损失惨重。八月二十日，部队在牵马原被敌冲散。

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八月三十日，省委重新派谢子长回游击队担任总指挥。谢子长到任后，会同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部南下。九月十二日，攻破照金，歼敌四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击毙富、铜、耀三县民团总指挥胡景铨、副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民团大队长蔡子发，大大振奋了我军的士气。但九月二十六日攻打保安失利，接着又在墩儿梁、八卦寺一带遭敌袭击，十月中旬，几经辗转，被迫撤退到南梁附近人烟稀少的平正川、瓦子川梢林地带，住在破烂的窑洞里，缺粮缺穿，处境极为艰难。队委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部队情况，决定分散游击，开展群众工作，筹粮筹款，恢复战斗力。此后，阎红彦和杨重远率骑兵奔袭耀县照金地回。他们忽东忽西，神出鬼没，打土豪、截烟土，获得了极多现款、衣物和药品。不仅解决了游击队过冬的衣食困难，还拿出一部分现款送给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托他上缴陕北特委和上级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①阎红彦：《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几个主要问题的事实经过》，未刊稿。

十二月上旬，省委根据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指示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命令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进行整编。这时，杜衡以中央特派员身分来到部队，并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宜君杨家店召开党团员大会，宣扬“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诬蔑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的错误；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并擅自决定给谢子长、阎红彦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后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查明事实真相，撤销了这个错误决定），强令谢子长、阎红彦离开部队，送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

（五）

一九三三年初，阎红彦和谢子长到上海中央局，经过短期学习审查，被派往河北省委工作。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后，准备大规模进犯华北地区。为推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我党派出大批党员和干部到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部工作。四月，阎红彦和谢子长一道，受命到热河前线参加和改造“老北风八千岁”^①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这支部队“成分非常坏”^②，阎红彦和谢子长无法在那里开展工作，很快又返回张家口。

五月二十六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察哈尔民

①“老北风八千岁”是当时一支抗日义勇军领导人的绰号。此语引自《阎红彦自传》，作者查询了多人，一直未弄清具体姓名。

②《阎红彦自传》，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北路军总指挥。为了对这支队伍进行“革命的改造”，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成立了前线工作委员会^①，由柯庆施任书记，阎红彦是前委成员之一。遵照前委的指示，阎红彦潜入孙殿英部组织兵暴。他会同在该部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刘振远（时任孙部副团长）等，经过周密的策划，七月下旬打死了反动的敌团长，成功地举行了“包头兵变”，拉出一个团，进驻商都以北的武川。在这里，阎红彦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并抽调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建了一个骑兵团，作为这支部队的骨干，由阎红彦任连长。

这时，蒋介石一面配合日军夹击抗日同盟军，切断交通，断绝粮秣；一面施展各种阴谋，从内部对抗日同盟军进行分化瓦解。八月初，冯玉祥被迫下野，抗日同盟军处境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在党影响下的部队约一万余人，于八月九日同前委一起撤至张北。阎红彦和刘振远奉调率部至张北，编入许权中（共产党员）的第十八师。不久，阎红彦的骑兵团又调归同盟军北路军总指挥吉鸿昌，改编为特务连，仍由阎红彦任连长。

八月二十七日，前委在张北县北部之工泉井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问题。阎红彦提出“将部队拉过平绥线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汇合”^②。陈伯达当场指责阎红彦“只知道你们陕北”，是“大西北主义”^③。他主张我们党应当退出同

^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大事记》，张家口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

^{②③}《阎红彦历史报告摘要》（1942年8月），原件在中国军事科学院档案馆。

盟军。阎红彦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气之下，退出会场。第二天，前委常委邹春生（后叛变）批评阎红彦，并要阎红彦检讨，阎红彦拒绝。不久，他被撤销职务，调司令部“休息”。

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阎红彦潜至北平。十一月，他奉命再度到孙殿英部做兵运工作，并任士兵委员会书记。这时，孙殿英受任青海西区屯垦督办，正在以“开发西北”为名，向宁夏进攻。士兵厌战，纷纷开小差逃跑。阎红彦同南汉宸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秘密进行暴动准备。他们提出了“反对军阀混战，不开小差开大差”的口号，短期内掌握了官兵三千余人^①，并确定了暴动时间。由于黄河涨水，渡船缺乏，暴动未能如期举行。其后，宋哲元、庞炳勋、马鸿逵等，在蒋介石的暗中策划下，从东西两翼联合夹击孙殿英，加之孙一旅长倒戈投降，里应外合，一夜之间，孙部全军溃散。阎红彦在混乱中，组织一部分党员，拉出了数百人，退到磴口以东的沙漠里，“人困马乏，饿了几夭，不得出去”^②，最后，被宋哲元部包围缴械。阎红彦只身逃出，经包头、北平到天津，向组织汇报了情况。随后被派往河北省委军委工作。

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海中央局派阎红彦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受命后，他从上海出发，渡渤海湾、越辽宁、吉林、黑龙江，闯过几十道封锁线，经过千辛万苦，于十月份到达苏联莫斯科。

阎红彦在苏联，先后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

①②《阎红彦自传》，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一九三五年四月，共产国际为了尽快地恢复和我党中央的电讯联系，以便及时地了解和指导中国革命，特派阎红彦和刘长胜带着密电码回国。密电码由英文字母编排，阎红彦不懂英语。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废寝忘食，用极大的力气，背熟组编的电码。由于提前回国，阎红彦未能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四月下旬，他和刘长胜从苏联起程，进入我国新疆后，又乔装客商，骑着骆驼，载运着毛毯和灯芯绒，经伊犁、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宁夏、绥远到达北平。这时，中央红军已经长征到达陕北，阎红彦听到这一消息高兴极了，立即去陕北找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在瓦窑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带回来的密电码^①。从此，我党中央又和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

（六）

一九三六年二月，党中央决定组织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渡河前，中央指派阎红彦组建黄河游击师，并任司令。其任务是警戒清涧、延川、延长一线黄河沿岸，保卫驻在瓦窑堡的党中央和陕北省委，协助周恩来为红军东征抗日准备渡河船只。阎红彦与清涧等地方党的负责同志组织和动员群众日夜造船，成立了水手工会，对船夫进行思想教

^①《阎红彦历史报告摘要》（1942年8月）。

育和训练；还领导游击师协助地方筹粮、筹款，发动群众做军鞋。后来，毛泽东回忆东征时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他。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红军能够顺利地完成东征抗日的任务。”^①

二月二十一日，阎红彦奉命率黄河游击师于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之后，亦从河口东渡，先后占领了义牒镇和隰县的午城；拆毁了沿河敌修筑的碉堡；配合兄弟部队攻占了大宁县城；并在石楼、永和、大宁、蒲县、隰县、中阳一带围歼敌人，有力地保障了东征红军与陕北苏区后方的通道。不久，游击师奉命改编为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

三月，红军抗日先锋军节节胜利，准备越同蒲路东出河北，直接对日作战，但蒋介石调集重兵伙同阎锡山部阻拦我军东进。为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国防实力，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宣布红军回师陕北。

红军回师西渡时，阎红彦率红三十军担任后卫，堵击敌人的尾追，掩护主力渡河。由于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三交镇壮烈牺牲，中央决定调三十军政委蔡树藩接任二十八军军长。同时，任命宋时轮为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改任三十军政委。当我军主力经石楼、永和由东向西转移至黄河岸边时，阎红彦和宋时轮奉命率红三十军离开黄河一线，由西向东插向吕梁山的隰县、大宁一带，迷惑和牵制敌人。

红三十军主力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敌分割包围。五月十三

^①访问罗志敏谈话记录（1981年2月）。

日夜烧，部队转移到晋西南吉县平头关渡口，找到了九只木船，准备渡河。但是，天刚亮，敌人就出动飞机轰炸，接着步兵也逼近我军阵地。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宋时轮说：“阎政委！你带着司令部、政治部先撤，我掩护。”阎说：“你才来，对这个部队还不太熟悉，还是我留下掩护。”宋说：“你不放心吗？！相信我，不会把你的部队丢掉的！”阎说：“这不是我的部队，这是党的部队。”宋时轮最后命令说：“你赶快走！”阎说：“好！好！我先走！”接着，宋时轮指挥二六三团一部与敌激战。阎红彦指挥主力胜利地渡过黄河，他自己却仍留在黄河东岸。当宋时轮带着阻击部队撤到黄河边时，见阎红彦还站在那里。宋时轮拉住阎红彦的手激动地说：“阎政委！你怎么还呆在这里？！”阎红彦说：“我在等你们！”^①

红军回师后，宋时轮奉调至红二十八军。阎红彦复任红三十军军长。

这时，蒋介石继续组织力量进攻红军。敌李生达、汤恩伯部进抵黄河东岸，准备渡河进犯陕甘宁根据地。五月十八日夜，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来的“火急”电报，阎红彦指挥部队，渡过无定河，进抵宋家川，配合地方游击队，切断敌人的交通，袭击敌人的船只，使河东之敌，不敢贸然西渡。

就在宋家川形势暂趋缓和的时候，党中央驻地瓦窑堡又遭国民党张云衢部的突然袭击。当时，我军在瓦窑堡只驻有少数警卫部队，力量比较单薄，中央命红三十军立即赶回增援。由于路途遥远，部队到达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等正在向西转移。阎红彦立即指挥部队，坚决阻击进攻之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①访问宋时轮谈话记录（1981年）。

全。其后，阎红彦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部署，率部进驻瓦窑堡和安定之间的十里铺，严防敌人的袭击。

八月下旬，阎红彦奉命率部开赴三边。在这里，他除指挥部队进行战斗外，还帮助地方建立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牛羊。年底，根据中央指示，和三边军阀张廷芝进行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通商往来”的协议。

双十二事变后，阎红彦至西安杨虎城部从事统战工作。一九三七年二月，奉调返回部队，仍任三十军军长。

(七)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三十军改编为警备第三团，阎红彦任团长、杜平任政委。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改称留守兵团）领导下，警三团驻守在河口、界首、高杰村一带，守备河口至枣林坪沿河渡口，阻止日军进攻，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侵占我陕甘宁边区五座县城，并准备进犯延安。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将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主力由华北前线调回陕北，接替警备三团的防线。警备三团、四团、炮兵团这时合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文年生任旅长，阎红彦任政委，杜平任政治部主任，部队南下驻防甘泉、富县一带，守卫着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一九四〇年春天，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在反对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阎红彦奉命到洛川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经过军事打击和谈判斗争，陕甘宁边区南线的

局势相对稳定。其后，阎红彦带职到马列学院和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学习。

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开始，阎红彦最初在中央党校一部军事队第十四支部学习，并任支部书记，后调第三支部（高干支部）学习，任支部生活和组织委员。先后同支部学习的有曹里怀、陈先瑞、王树声、贺晋年、陈锡联、杨勇、陈赓、薄一波等。阎红彦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件，联系实际，总结了自己十多年来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一九四三年，他把学习心得，写成文章，发表在延安中央党校校刊上，受到毛泽东的称赞^①。

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审干过程中，康生夸大敌情，掀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阎红彦多次在支委会上说：“肃反工作绝不能有半点主观主义，我在苏联时，就听到苏联在肃反中出了不少问题。过去我们苏区的肃反教训也不少，我们陕北苏区的肃反，连刘志丹这样的同志都抓起来。如果不是毛主席和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因此，我们作事，必须实事求是，必须慎重。”^②在整风结论中，肯定了阎红彦在抢救运动和审查干部中“能把救党的方针和政策”^③。

整风运动期间的一天晚上，高岗到中央党校来，要阎红彦证明他是陕甘红军游击队队委会委员，还说他在临真镇战斗

①访问阎红彦夫人王腾波谈话记录（1981年）。

②访问贺晋年、张文舟谈话记录（1981年），《访问王定一谈话记录》（1981年）。

③《阎红彦同志一九四四年五月总结》，中央党校第十四支干会通过。

中是被绑架而走，不是临阵逃脱。阎红彦当即指出：“你不要将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你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你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个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真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一套谎言，说战斗紧急时，部队叛变，你控制不住，被绑架而走。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①。两人争吵一夜，高岗倒打一耙，说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并且无中生有地反诬阎红彦有野心，说阎“企图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②。关于成立陕北师一事，是红军改编时，陕北军事干部（包括高岗）在一起的议论。大家说，一方面军有一一五师，二方面军有一二〇师，四方面军有一二九师，陕北红军也应编一个师。阎红彦曾将这些意见向肖劲光反映过，这完全是正常的，合乎组织手续的，并没有组织陕北师^③。高岗在整风中把这作为阎红彦的所谓“问题”提出来，完全是别有用心。

在整风期间，党对阎红彦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充分肯定了阎红彦在创建陕北红军和开展陕甘游击战争中的“重要

①②以上引文见贺晋年：《阎红彦同志二、三事》。阎红彦：《在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4月5日）。阎红彦：《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几个主要问题的事实经过》（未刊稿）。

③访问贺晋年谈话记录（1982年1月）。

作用”，认为他“政治坚定”，“对党忠诚”，“作风正派，没有拉扯情形”，“在团结中央干部和陕北干部的关系上，是起了好的作用”，“作事自信心强，坚决果敢，敢作敢为”。党实事求是地为阎红彦作了历史结论^①。在阎红彦历史结论上签名的有曹里怀、杨勇、王树声、陈先瑞、解方等。

一九四五年，阎红彦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会后，他就高岗问题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指出高岗这个人品质不好，诡计多端，望中央注意，并要求把他的意见记录存档^②。接着，他坦率地告诉高岗，希望他改正错误。高岗更加怀恨在心，在七月份召开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指定人揭发斗争阎红彦，因为没有事实，会议开不下去。最后，康生出面说：“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③。

此后不久，经中央批准，阎红彦调晋冀鲁豫野战军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成立，阎红彦任第三纵队副司令员。

一九四五年九月，阎红彦到达太行山晋冀鲁豫解放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当年十月的邯郸战役。不久，被任命为第三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八月，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向开封至徐

^① 《阎红彦同志一九四四年五月总结》，中央党校十四支干会通过。

^② 《阎红彦在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第三次会上的发言》（1955年4月）。

^③ 访问杨勇谈话记录（1982年2月）。

州的陇海路出击。陈锡联、阎红彦率三纵队攻克碭山后，接着攻打民权，激战三天未克，我军伤亡很大。战斗结束后，阎红彦了解到许多干部和战士在抗战胜利后，产生了“解甲归田”的思想，对自卫战争缺乏精神准备。于是，他向纵队党委提出在部队开展整风的建议。经过这次思想整顿，大大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晋冀鲁豫野战军表扬了三纵的做法，并在全军加以推广。

九月初，在山东定陶战役中，阎红彦参与指挥左集团三、七纵队。在六纵队围歼大洋湖之敌后，驻扎在天爷庙的敌师部，直接暴露在我军面前。阎红彦亲率两个团，楔入敌人的心脏，发挥我军夜战的特点，攻破敌指挥部，生俘敌师长赵锡田。

一九四七年三月，阎红彦参加豫北反攻，历时两个月。五月，根据刘、邓指示，三纵配合六纵，一举攻破汤阴，全歼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活捉纵队司令孙殿英。

六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七月十五日，在六营集战斗取得胜利之后，三纵与二、六纵队一起，对困守在羊山集的敌人发起进攻。由于羊山集三面环水，背依羊山；敌人利用天然地形，构筑了坚固工事，居高临下，凭险固守，我军几次强攻未克。在这样情况下，阎红彦和陈锡联一道，冒着酷暑，穿着裤衩，踏着我方堑壕里淹没膝盖的混水，带着团以上干部，在前沿阵地详细观察地形，重新选择突击方向，制定作战方案。七月二十七日，我军发起总攻，激战一昼夜，全歼守敌整编第六十六师，活捉敌师长宋瑞珂。

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刘、邓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向大别山挺进。八月下旬，越过淮河后，陈锡联、阎红彦奉命率三纵队

开赴皖西，扫除地方保安团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不久，尾追我军的敌人二十三个旅，也先后压过淮河，进抵大别山区。三纵奉命从皖西回师和兄弟部队一道，于九月在商城以北的河凤集地区、以西的中铺地区和光山附近打击敌人。其后，陈锡联、阎红彦遵照刘、邓指示，率三纵队从豫东南的商城、固始向东突围，冒雨兼程，拖走了大别山北麓合围我军的国民党桂系第七师和四十八师两股敌人到皖西，并乘敌之合围态势尚未形成之时，于十月九、十两日，在皖西六安张家店，全歼敌八十八师六十二旅，毙、伤、俘敌四千余人。这是我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一次歼灭敌人一个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张家店战斗后，三纵队即进至长江北岸的望江地区。与此同时，其它兄弟部队也连克团风、浠水、广济、英山、武穴等城镇，我军控制长江北岸达三百余里，威震大江南北。

十月下旬，大别山进入深秋，寒气袭人，我十几万大军这时仍然穿着单薄的衣裳。如何抓住胜利后的有利时机，尽快地解决过冬的棉衣，就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党中央曾打算从晋冀鲁豫根据地送棉衣来或送银元来就地采购，但是，千里迢迢，封锁重重，难于解决。刘、邓报请中央，决心自己设法克服难关。三纵领导开会研究，陈锡联问阎红彦：“你能不能和资本家打个交道，不管白布、花布，只要能穿，有个夹衣也好。”^①阎红彦在六安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做商人和资本家的工作，很快筹借到大量布匹和棉花。同志们用竹鞭、树条制作的弹弓弹棉花，用稻草灰染出灰布，全军上下，自己动手，不久，指战员都穿上了新棉衣。陈锡联说：“穿衣是当时一个带

^①访问陈锡联谈话记录（1981年12月）。

关键性的问题。仗打不好，站不住脚，没有棉衣，过不了冬。阎红彦为部队作了件大事。”^①

十一月下旬，蒋介石纠集了三十三个旅，由白崇禧亲自指挥，对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我军采取了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三纵队奉命与二、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和军区部队、人民武装相配合，坚持内线作战。一九四八年一月，为了拖散和疲惫敌人，陈锡联、阎红彦指挥三纵队，牵着敌黄伯韬和两广部队，围绕大别山进行了十八昼夜的打圈子战斗。从皖西的金寨、六安开始，经舒城、桐城、岳西、湖北的英山、麻城，又回到皖西的六安一带。陈锡联说：“最艰苦的就是这十八天，我们处境十分危险，天天夜行军，早上八九点钟住下，下午两三点钟开拔，后面打，前面走，有时一天走二十四小时，顾不得吃一顿饭。”^②

十八天连续行军，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十分疲劳。为了鼓舞士气，阎红彦向部队作了《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陈锡联回忆说：“真没想到，阎红彦作了那样好的一个报告。它对增强部队斗志，提高斗争信心，的确起了相当好的作用。”^③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我留在大别山的部队，粉碎了白崇禧的残酷围剿，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九)

、一九四八年五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奉命改为中原野战军。

①②③访问陈锡联谈话记录（1981年12月）。

从此，我刘邓、陈粟和陈赓兵团三支大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展开了逐鹿中原的伟大斗争。

五月，陈锡联、阎红彦率三纵队转战到豫西。利用战役间隙，在宝丰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通过诉苦和三查，大大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经过宝丰整军后，我军第一次攻打郑州。刘邓电令，决不能让敌人渡过黄河向北逃跑。“阎红彦坚决执行上级的作战意图，亲自带领下级指挥员，仔细勘察地形，分析敌我态势，拟制战斗方案，并率领主攻部队，穷追猛打，同兄弟部队一道，把敌人歼灭在黄河以南”^①。接着攻打柘城，前线我军在阎红彦、刘昌义的指挥下，一鼓作气，破城而入，歼灭敌一个纵队，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打响了。战役的第一阶段，三纵奉命阻击从蚌埠向北增援之敌。其后，陈锡联和阎红彦各率一部，于十一月十五日攻克宿县，歼敌一个师，切断了敌徐州与南京的联系，使我军完成了对徐州“大包围”的态势。毛泽东对这一战役的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嘉许。

战役的第二阶段，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陈锡联奉命统一指挥三纵和一纵，阎红彦和刘昌义为前线指挥。陈锡联有一段回忆，生动地再现了阎红彦在前线战斗的日日夜夜。他说：“最艰苦的一天是我们准备发动进攻，被敌人发觉，他们集中

^①钟汉华：《音容常在，战绩永存》，载1981年1月7日《四川日报》。

了四个整编师，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抢先进攻我们。打到后来，敌我分不开，敌人跟我们的部队混在一起了。我们组织进攻，敌人又反扑，牺牲很大，血流了一沟。我和阎红彦到前面去看，回来时半身都是血。我们在一辆被打烂的敌坦克下，挖个洞当指挥所，离敌人的工事很近，敌人枪上的刺刀看得清清楚楚。阎红彦爱跑进跑出，我对他说：‘你还看不见，敌人那么近！’他的胆子大，敌机投弹，他还要看看。危险的地方，你越是不让他去，他越是要去。打仗时，你不叫他上，他偏要上。我们在坦克下住了一周，有几次很危险，参谋都很担心。炊事员送来饭就吃，送不来就不吃，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晚上，把大衣一裹，就在坦克下睡觉。阎红彦他晚上不睡，守在电话旁，他白天睡。那里战斗打得最艰苦，阎红彦就到那里。有一次，他到前沿阵地七旅去视察，指挥战斗，敌人排子炮打来，警卫员机智地将他按倒在地，卫生员立即上担架，准备抬他，见他还活着，好端端的。阎红彦嘿嘿一笑说：‘还是我的命大！’”^①十二月十五日，我军会攻敌最后据点双堆集。晚十一时，黄维十二兵团全军覆没，黄维被我三纵队七旅活捉。

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阎红彦由于操劳过度，突然白了一块头发。邓小平曾经和阎红彦的夫人王腾波开玩笑说：“老阎象伍子胥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②

淮海战役以后，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二月，阎红彦被任命为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

^①访问陈锡联谈话记录（1981年12月）。

^②访问王腾波谈话记录。

兼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指挥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长达五百多公里的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三兵团从安庆一带突破长江防线。二十三日，南京解放。陈锡联、阎红彦率三兵团进驻芜湖地区，防止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并进行向西南进军的准备工作。八月十九日，刘、邓下达了《川黔作战基本命令》。三兵团九月初由芜湖出发，十月中旬，抵达湖南常德集结。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我军发起了进军川黔的战斗。三兵团由湘鄂边出动，突破了宋希濂的防线，进入川东，攻取彭水，强渡乌江，占领南川。十一月底，解放重庆。阎红彦兼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川东行署成立之初，阎红彦同志就写下了《在川东行署成立之初》这首诗（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成立。阎红彦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和川东行署主任。当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军阀的长期统治，尤其是国民党军队在覆灭之前的疯狂破坏，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西南局和川东区党委的领导下，阎红彦主持行署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进行了清匪、反霸、镇反、减租、退押、土改，使川东很快得到治理，出现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真是“雷霆风雨，三载奏功。”^①

①张秀熟悼阎红彦诗。

一九五二年，四川合省以后，阎红彦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部队政委、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九月，阎红彦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膺“一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一九五六年九月，当选为“八大”候补中央委员。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报道，比比皆是。当年秋天，阎红彦听说温江地区某公社水稻亩产三万多斤，便亲自到当地察看。原来所谓亩产三万多斤，是把若干亩已成熟的水稻，拼栽在一块田里。他批评干部说：“这样搞高产，不是实事求是嘛！”他要求干部保持冷静头脑，产量一定要搞实在，千万不要人为地层层加码^①。

一九五九年初夏，阎红彦带秘书和警卫班的六、七个战士到乐至县，参加油菜试验田的收打。打完头遍，亩产达到二百六十斤，比大面积产量高出一倍。他十分高兴地说：“再复打一遍菜籽，得出最后产量，开个会庆祝种试验田获得了高产，让《四川日报》发消息，登照片，推广种试验田的经验。”谁知有几个干部看见实产没有达到他们夸口的六百斤，趁阎红彦吃中午饭的时机，偷偷往菜籽底下倒了几箩筐菜籽。阎红彦发现搞了鬼，十分生气，当场批评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他在省委汇报会上严肃指出，一定要警惕这种不良作风的蔓延^②。

当年夏秋之际，群众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阎红彦带了一个工作组到仁寿县，了解和解决那里群众发生的水肿病问题。

①②四川省部分厅局长座谈会记录（1982年10月）。

当时，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忌讳说浮肿病是缺粮造成的。对此，阎红彦深感痛心。他找县委的负责人谈话，解除大家的顾虑，要大家实事求是的反映情况。这样，事实真相很快就弄清楚了。阎红彦连夜召开各种会议，了解缺粮的情况，报请省委批准，调拨五百万斤粮食给这个县安排群众生活。

一九五九年秋，阎红彦奉调至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

一九六〇年三月至五月，阎红彦响应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深入楚雄、大理、道宏、思茅等地区，系统地调查了人民公社的规模、公共食堂、工资制、山林管理、实物分配等问题。五月十日，他在弥渡县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即《阎红彦给毛主席的信》），对上述问题向党中央作了比较系统的汇报，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意见，特别是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建议。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对阎红彦的信作了批示：“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①

不久，阎红彦根据云南的实际，提出坚决缩小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把边疆地区的人民公社调整为初级社或互助组。对居住分散的山区，他指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单家独户的经营，还明确规定了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强调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②，促进了云南农、林、牧、副、渔各项

① 《毛泽东同志转发阎红彦同志五月九日的信》——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1961年5月16日）。

② 《云南省委关于内地高山分散地区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补充规定》（1961年）。

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一九六〇年，在阎红彦的主持下，云南省委制定了“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的边疆工作方针。他说：“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保证边疆的稳定局面，以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斗争。”^①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更特别重视。在边疆工作会议上，他说：“民族干部问题，是个严重问题。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边疆，巩固国防，没有民族干部的生长，是不可设想的。”“从省到各级都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党、政、军，包括群众团体，都应该有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任务。少数民族干部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是衡量边疆工作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②。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初，云南边疆各地都陆续办起了各类学校、识字班、夜校等，以提高边疆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十一）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对林彪接二连三发表的讲话，阎红彦说：“我怎么都听不进去”^③。八月，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阎红彦在会上对西南局几个负责同志说：“我们应该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④九月以后，全国“大串连”，

① 《阎红彦在省委讨论边疆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

② 《阎红彦在边疆会议上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讲话》（1966年1月）。

③ 访问云南省委郭超等谈话记录（1982年）。

④ 访问廖志高谈话记录（1982年）。

党组织瘫痪，地方党的负责人也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昆明和全国一样，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阎红彦十分愤慨，他不止一次地说：“这是什么革命？！这是丑化革命，是丑化我们党！”^①

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阎红彦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其间，阎泽群告诉他，江青在北航对红卫兵讲：“中央正在开会，她和毛主席占少数，很多人都反对毛主席，要准备上山打游击。”阎红彦紧锁双眉，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愤慨地大声说：“怎么能讲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我们跟毛主席几十年，会反对毛主席！会反对毛主席！”阎泽群劝父亲准备回去戴高帽子游街。阎红彦坦然地说：“我怕什么，无非下台当老百姓”，“但是，给共产党的干部戴高帽子，我就是不赞成。这是侮辱我们党，糟踏我们党！”^②

阎红彦当时已年近六十，又患高血压、心脏病，在“横扫”、“火烧”的声浪中，他受到残酷的迫害。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白天晚上不能休息。有一天从早晨八时斗到晚上八时，没有吃一点东西，没有喝一口水。休息中间，一个不知名的小姑娘，偷偷给他送来一碗荷包鸡蛋。他抚摸着孩子的头，激动地说：“多好的人民”^③。

一九六七年一月，昆明造反派积极酝酿“夺权”。他们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阎红彦听了哈哈大笑说：“国民党曾经悬重赏要我的脑袋，我都不怕，现在我又不

^①访问云南省委郭超等谈话记录（1982年）。

^②阎泽群：《这里可真是个好地方啊》，载《时代的报告》（1982年2期）。

^③访问侯勤翰谈话记录（1982年）。

是反革命，怕什么！”这时，中央对阎红彦的安全也十分关心。一月七日，叶剑英打电话询问云南军区：“阎红彦在什么地方？身边有哪些人？”要求云南军区确保阎红彦的安全。当晚，阎红彦和周兴、王银山等开会到十二时，确定第二天召开书记处会议。八日凌晨，陈伯达给阎红彦打电话，由于口音难懂，由汪东兴复述，对阎红彦横加指责。阎红彦几次要回话，对方都不让他讲。他气愤地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①

一月八日五时左右，秘书走进阎红彦的住房，发现他已经辞别人世。

阎红彦死后，林彪一伙下令不准开追悼会。可是昆明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自发地为阎红彦举行了庄严的追悼仪式。

一月十二日，云南省委和军区几个负责同志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阎红彦逝世的情况。周恩来听后沉痛地说：“是啊！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啊！”^②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指出：“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③党中央为阎红彦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历史本来面貌。彭真为阎红彦题词：“悼念坚强不屈、终身为革命奋斗不息的阎红彦同志。”李达将军题词：“阎红彦将军浩气长存。”一九七八年

^① 访问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的谈话记录（1982年）。

^② 访问郭超、王银山等谈话记录（1982年）。

^③ 阎泽群：《这里可真是个好地方啊》。

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

一九七九年春，任白戈赋悼诗一首，表达了人们对阎红彦的深切怀念。诗曰：

携君英名延水旁，
首次相晤在太行。
肝胆照人配明月，
性格爽朗若朝阳，
豪情壮志冲霄汉，
敦厚朴实非寻常。
少年深怀阶级恨，
早将青春献给党。
清涧暴动掌武装，
吕梁割据红旗扬，
横跨黄河闹革命，
开辟陕甘北战场。
百战不殒身未丧，
饮恨死于“四人帮”。
蜀中人民齐悼念，
云南大地亦悲伤；
下关苍山风雪漫，
大理洱海花月残。
而今沉冤得昭雪，
君当含笑九天上。

阎红彦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陕北劳动人民的心上，响彻在巴山蜀水、苍山洱海之间。

作者附记：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及其档案馆、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档案馆、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政协、山西省档案馆、山西省博物馆、山西省吕梁地区文化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档案馆、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协、四川省档案馆、成都军区及其档案馆、昆明军区及其档案馆等单位的积极支持，提供了历史资料。还访问了一批老同志，参考了老同志写的有关文章和回忆，这些老同志是：马文瑞、马云泽、吴岱峰、贺晋年、刘澜涛、阎揆要、李锦锋、高朗亭、崔田民、郭洪涛、赵苍壁、吴志渊、黄石山、孔原、李华生、王震、李达、杨勇、宋时轮、杜平、罗志敏、莫文骅、魏传统、陈锡联、钟汉华、郑国仲、明朗、何德庆、李漠、柯岗、廖志高、任白戈、张秀熟、沈兰芝、王定一、余述甲、秦基伟、王银山、赵增益、孙雨亭以及阎红彦身边工作的人员和他战斗过地方的群众共二百七十余入。阎红彦的夫人王腾波及其子女，也提供了有关资料。王腾波同志积极协助我们到山西、北京、陕西、云南、四川、南京、上海等地访问搜集资料。中国社科院四川分院王治林同志，四川日报记者陈焕仁同志也参加了部分采访。对以上单位和同志，谨致衷心的感谢。

《新湖南》月刊，一九〇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三）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柏家山乡栗木村。父亲赵树生是个老实农民，靠租种地主土地维持一家生活，生有五子，赵自选排行为大。因家境贫寒，赵自选直至九岁仍在放牛割草。一位教私塾的远房亲戚见了，劝赵树生把儿子送去启蒙，并答应减少学费。赵树生见亲友如此关心，便把自选送到离家二十里地的北星桥念书。可是，仅仅读了两年，就因为家庭无力供养，被迫中途退学。

赵自选

曾长秋、唐伯藩

（一）

赵自选，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三）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柏家山乡栗木村。父亲赵树生是个老实农民，靠租种地主土地维持一家生活，生有五子，赵自选排行为大。因家境贫寒，赵自选直至九岁仍在放牛割草。一位教私塾的远房亲戚见了，劝赵树生把儿子送去启蒙，并答应减少学费。赵树生见亲友如此关心，便把自选送到离家二十里地的北星桥念书。可是，仅仅读了两年，就因为家庭无力供养，被迫中途退学。

赵自选不甘心就此失学。他白天随父亲下地劳动，每晚都就着油灯，刻苦自学，并且日新长进。村上的人见他聪颖，便介绍他认识了徐特立。当时，徐特立已把他长沙县五美乡的旧居辟为一所高小，收穷苦孩子读书。五美乡与浏阳的柏家山仅一河之隔，离赵家很近。赵自选自认识徐特立后，常去五美高小借阅书籍，请教疑难问题。徐特立见他学习发奋用功，很是喜爱，不久，便免费将他收在自己的学校里插班读书。此时，他已十七岁了，在班上年龄居长，又接受了一些新文化的影响，思想较之其他同学更为活跃深刻，他写的作文，亦常被徐特立所称

赞。

一九一九年夏，赵自选高小毕业。当时已去长沙的徐特立回到五美，鼓励他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又要他投考自己创办的长沙县立师范学校。赵自选不负所望，终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长沙县立师范学校的校址在长沙荷花池泐潭寺。赵自选入校时，徐特立正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走前还叮嘱赵自选千万不要忘记了普及民众教育的责任。以后，赵自选虽然再也没有见过自己尊敬的老师徐特立，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投身于时代的洪流，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据赵自选的同学许光达回忆：“长沙师范是当时最进步的学校之一。那时我的年纪虽小，不懂得革命的道理，但是在进步的老师周以栗、陈章甫、曹典琦和进步同学赵自选、张义质、谢鑫、罗为栋、杨展等教育和影响下，积极参加了湖南学生革命运动，如支援湖南纺纱厂的罢工，反对杀害工人领袖庞人铨、黄爱；支援安源路矿罢工，反对杀害黄静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①赵自选在这些斗争中，受到了初步的锻炼，并参加了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黄爱、庞人铨被杀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湖南各界在船山学社举行了两次追悼大会，赵自选代表长沙师范的学生发了言。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在长沙新河车站成立时，毛泽东、郭亮分别被选为正副总干事，赵自选与省学联的各校代表到会祝贺。

离长沙师范不远的潮宗街五十六号，设有全省闻名的文化书社。赵自选在这里读到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心里拨亮了明灯，更感到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下决心为国为民除害。他通过新民学会会员陈章甫的介

^①许光达 1963 年 5 月 21 日在长沙师范学校五十周年校庆时写给母校的信。

绍，认识了湖南通俗教育馆的何叔衡和文化书社的易礼容，并被吸收到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址设船山学社）旁听。

陈章甫是浏阳人，曾在五美高小教地理课，是赵自选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他经常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军阀混战带给人民的苦难，结合课文讲解，并在一篇自编的教材中写道：“中国雄踞亚洲之东南，土地辽阔膏腴，罕有能比，诚世界大国也。然自清末道光以来，外交失败，丧权割地，时有所闻……。”^①赵自选等听了，震动心弦。他入长沙师范时，陈章甫亦在这里教注音字母课，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常在一起讨论社会主义问题。当时，陈章甫已参加了共产党的组织，并在湖南自修大学兼课，赵自选从他那里受到的启发更多，逐渐丢掉了教育救国的幻想，置身于实际斗争，并申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三年夏，二十二岁的赵自选从长沙师范毕业，回到家乡，在柏家山集镇上的赵祠小学任教，还开办了一所农民夜校，免费教贫苦农民识字学算，并讲破除迷信的道理。赵祠小学门口有一口公共水塘，一些农民放了鱼苗饲养，到捕捞季节，族上的乡绅红眼，要将鱼捕归祠堂享用。让农民怨愤番声，不敢争抗。赵自选出来打抱不平，帮助写了一张状纸告到县衙，并声明如得不到解决，就去省里登报。县长被迫作出了判决：捕鱼权归农民所有。这件事得罪了乡绅阔阔，赵自选只教了半年课，便被借故辞退。

赵自选回到长沙时，湖南自修大学已被赵恒惕军阀政府解

^①《陈章甫日记》，原件存浏阳县档案馆，访问陈章甫烈士家属记录。

散。他找到了在湘江中学（实际上是中共湘区委员会培训干部的学校）任教的陈章甫，陈把他留在学校以搞杂务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十二月十二日，在湖南省第一次团代会上，赵自选被选为团的湘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一九二四年春，由陈章甫介绍，赵自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时值国共合作之始，黄埔军校在湖南招生，何叔衡受委托到湘江中学和湖南一师选拔进步青年。赵自选受到党组织的推荐，于三月初的一个夜晚，秘密在清水塘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应试。他在以《试述投考黄埔军校的志愿》^①为题的作文中，表示了自己为劳苦大众解放愿效命沙场的殷切心情。湖南党组织初取了赵自选、刘畴西、陈作为、袁仲贤、郭一予等十八人，指定由赵自选带队去上海参加复试。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了复试，据郭一予回忆：我们“于三月底参加长江流域和以北各省考生的复试，也是秘密进行的。经过上海复试，据说湖南送考的学生，思想、文章都好。”^②

赵自选以各科成绩优良的正取生资格，于五月五日到黄埔军校入学，被编在步科第三中队第三区队。此后，他常与党员同学左权、陈赓、蔡升熙、徐向前、许继慎、蒋先云、王尔琢、徐成章、周士第等，研讨军事政治，如切如磋，交往密切。

军校初办时，只有三十枝步枪。这年八月，苏联政府首批运来俄式步枪八千余枝、子弹四百万发。船靠黄埔码头，赵自选与同学们兴高采烈，敲锣打鼓迎接。他们卸了一整天船，肩膀磨破了，垫上衬布又继续干。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军事教学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类，学科包括步兵操典、射击教典、战术

^{①②}郭一予：《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考生复试》，《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军制学等理论课；术科包括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实弹射击、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军事技术。赵自选起早摸黑，投入了严格的军事训练，门门成绩都是优秀。他经常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举行的研讨会，特别喜爱听周恩来精辟的讲演。军校每月发的几元生活补贴费，他舍不得花，买回《列宁传略》、《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等理论书刊阅读，有时还寄一些给长沙湘江中学的学生陈安淮和家里的弟弟赵悔吾，要他们好好学习。

这年秋，香港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策动广州商团武装叛乱。黄埔学生义愤填膺，请缨杀敌。赵自选和同学们包围了盘踞广州西关的商团武装。虽然都是第一次作战，却个个奋勇争先。经过激烈的街垒战斗，终于将反动武装缴械，为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清除了一个隐患。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赵自选由军校毕业，毕业证是在次年的三月一日由孙中山等署名颁发的，上面写着：“本校第一期学生赵自选，按照本校规定，步兵科教育修学期满，考试及格，特给证书。”^①学校给他的评语是：“表现很好，学习用功，艰苦朴素。”^②

(二)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经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委书记周恩来与孙中山商议，成立了大元帅府直辖的铁甲车队。这是我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周恩来亲自从黄埔军校的

^{①②}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存黄埔军校史料；郭一予1977年的回忆和周士第的回忆。

毕业生中挑选出赵自选等人，负责组建工作。铁甲车队驻在广州大沙头一幢四层楼的洋房里，外面挂着一块引人注目的大牌子，上书“建国陆海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部”；徐成章任队长、周士第任副队长、廖乾五任党代表、曹汝谦任政治教官、赵自选任军事教官，装备有几辆铁甲车及一部分其他车辆；成员约一百三十人，加上广东区委派来受训的，常有一百五十人以上。铁甲车队的党组织关系和干部调配归广东区委，重要问题均直接向陈延年、周恩来请示，苏联顾问沙非爱夫亦常来队指导。队员几乎都是从广东各地抽来的工农骨干，政治热情很高，但缺乏军事素质，车队一边组建，赵自选就一边抓紧军事训练。

十二月十一日，应彭湃和周其鉴之邀，赵自选与廖乾五、徐成章、周士第率铁甲车队两个排，赴滨临绥江的广宁县支援农民运动。广宁县农民协会成立于这年十月，由于开展减租斗争，与地主武装发生了冲突。铁甲车队赶到时，县团保总局局长谭倡松委托国民党右派县长蔡鹤明出面，邀铁甲车队负责人赴宴“调解”。铁甲车队将计就计，兵分两路，廖乾五、徐成章去县衙赴宴，控制反动头目；赵自选与周士第率部队趁机包围了团保总局，缴枪四十二枝。土豪劣绅闻之丧胆，退守潭埗的江家大炮楼。这个炮楼耗资数万，高五层，粮弹丰足，一时难于攻下，广宁农运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为了迅速解决广宁的地主武装，年底，赵自选由彭湃派遣，赶面广州文明路，向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军委书记周恩来和农委主任阮啸仙汇报，要求调大炮攻打炮楼。区委负责人立即介绍赵自选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见廖仲恺、胡汉民。廖仲恺在孙中山北上后，主持广州政务，他对工农运动非常热

心，派大元帅府卫士队队长卢振柳带一门大炮增援广宁。

一九二五年一月九日，广宁军委会决定再次攻打江家大炮楼。赵自选率社岗农民自卫军封锁交通要道，截断炮楼与外面的联系。卫士队架炮轰击炮楼，但卢振柳也是个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很抵触。他连发数弹，故意偏离目标，就说没有炮弹了。铁甲车队的火力发挥不上，战士们极为愤慨。

一月中旬，赵自选带着广宁农民向国民党中央控告卢振柳的信，又返回广州。廖仲恺同意将卢振柳调回查办，并拨出三千发子弹补充铁甲车队。二月一日，铁甲车队采用工兵挖坑作业法，逼近江家大炮楼，挖了三天，终于把炸药包送上去，在墙根炸开了一道裂缝。但是，由于敌人火力封锁，仍然冲不进去。赵自选发动农民运来大批柴草，点火焚烧，迫使守军投降。附近的黄家炮楼见势不妙，连夜弃楼逃走。接着，赵自选接受广宁军委会的委派，指挥铁甲车队、卫士队和农民自卫军协同作战，对茶坪岗民团发起总攻。茶坪岗是个较大的集镇，有“广宁第二县城”之称，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赵自选率部乘胜出击，在黎明前涉水过河，炸开工事，将敌军缴械。

在广宁期间，赵自选还积极投入了农民运动。他曾协助彭湃举办《广宁日刊》，发表农村调查的文章，推动减租斗争，有时与战士们一起，在“农兵联合大会”上演出革命话剧。一月二十一日，是列宁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赵自选与徐成章、李镇登台发表演说。据周士第回忆：“他们讲述了列宁伟大的一生和他伟大的思想，……使到会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①当时，广宁县内的“神打”（亦称大刀会）有数万余

^①《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8页。

众，成员多为贫苦农民，但由于派别复杂，常为地主所利用。经过他与铁甲车队官兵的争取教育，表示再也不帮助反动地主攻打农会。广宁的地主豪绅慑于革命军的威力，不得不接受了农民的减租要求。

铁甲车队胜利完成了援助广宁农运斗争的任务，赵自选等在二月十九日返回广州，受到中共广东区委的表彰，广州各界团体还在广州公园为铁甲车队的凯旋举行了祝捷大会。

在大沙头铁甲车队的驻地不远，驻有一个飞机掩护队，隶属航空局，局长李廉是苏联同志，但队长是国民党右派。中共广东区委认为，这支队伍关系到广州的安危，便通过广州政府和航空局，从铁甲车队抽调得力骨干去加强领导。四月初，周士第去飞机掩护队担任队长、赵自选担任该队党代表。

赵自选和周士第到职的时候，飞机掩护队有的干部受人挑动，从中作梗，有个排长甚至还想枪杀他们。他们深入到士兵中间了解情况，从清算原队长严重的贪污问题入手，调走了一些坏分子，中共广东区委又陆续补充了一部分青年工人和农民进来，使部队的政治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久，他们在飞机掩护队开始建党，成立了一个党小组，赵自选任党小组长。

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军阀陈炯明蠢蠢欲动，企图夺取广州。黄埔学生军奉命举行东征，飞机掩护队和铁甲车队则留守广州大本营。正当革命军在东征前线浴血苦战时，帝国主义收买的杨希闵、刘震寰趁机叛乱。飞机掩护队在赵自选和周士第的指挥下，及时掩护了广州各党政机关与苏联顾问团向珠江南岸撤退，随后又转到士敏土厂（即水泥厂），坚守广州大本营。六月初，东征军及时回师讨伐叛军，飞机掩护队和铁甲车队立即转入反攻。他们从猎德渡河，迅速插入敌人背后，向石

牌、瘦狗岭方面的敌人攻击，有力地配合了东征军作战，收复了广州。事后，中共广东区委再一次给予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以表扬。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徐成章调任省港罢工委员会任纠察委员会委员长兼总教练，周士第调回铁甲车队任队长，赵自选则留在飞机掩护队，挑起了队长兼党代表两副重担^①。

不久，赵自选也调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任工人纠察队第一大队教练^②。第一大队有五个支队，约五百名武装工人，他严格实行“三操”（徒手、器械和实弹训练）、“两课”（政治课和军事课），使这个纠察大队训练有素，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七月间，他们开始在珠江三角洲的海岸布防，封锁出进香港的物资，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帮凶。

此时，陈炯明卷土重来，占领东江地区，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十月初，赵自选接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命令，调任东江地区海陆丰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率当地农军投入了支前战斗。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赵自选英勇奋战，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九二六年春，赵自选被从东江前线调回广州，到毛泽东主持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军事教官^③。农讲所的军事课程占三分之一，来自二十个省区的三百二十七名学员，被编为两个中队（由黄征洋、罗焕荣分任中队长）、六个区队（由马天恨、毛华达、杨汉池、张士表、胡珩、田中杰分任区队

①②《周士第回忆录》第27—29页。

③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长)，赵自选任总队长^①，他与教务主任肖楚女一起制定了军训计划，在五月至七月间的整个夏季，集中安排了十周的训练时间，共上操一百二十八个小时，以磨练学员们的意志。学员刚入学不习惯军事生活，赵自选每天清早第一个起床，穿着黄埔军校引人注目的黄军装，在晨曦中吹响口哨，催促学员排队点名；夜间也经常组织紧急集合，使学员们枕戈待旦、闻风而动。他参照黄埔军校的课目，将训练分为三个阶段，即徒手训练、持枪训练和野外训练，每个阶段训练完毕，都亲自讲评。经过三个月的军事训练，使学员们掌握了一般的军事常识。

八月十日，赵自选受所长毛泽东的委托，与彭公达带领一部分学员赴海陆丰进行为期两周的教学实习。他将学员分成十几个小组，分散到附近农村，与当地的农民协会一起调查农村阶级状况，并参加当地农民自卫军的操练。学员们在海陆丰写出不少调查报告，有租率、田赋、主佃关系、妇女地位等方面的内容，回广州后，由农讲所辑成《农民问题丛刊》。毛泽东对赵自选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亲自为《农民问题丛刊》写了序言^②。

九月间，第六期学员提前毕业，分赴全国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赵自选又接受了新的任务，担任广东省农民训练所主任，所址设海丰县的番禺学宫（后改红宫）。在十一月二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赵自选对三百多名学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这里，他参照广州农讲所的教学经验，主持制定了政治、军事

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②广东党史资料丛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第297、310页。

训练计划，为广东各农民协会输送了一批农民运动特派员。年底，训练所结束，赵自逸由中共广东区委调回广州，担任广东省农民自卫军部部长兼军事总教官^①。

(三)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四月十五日，广州的右派势力封闭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杀害了熊雄、肖楚女等革命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广东党组织被迫转移到香港，赵自选主动要求留在广州坚持地下斗争，在六榕古寺附近的花塔街设立了秘密联络机关。为了方便工作，同年七月，组织上介绍他与机关的一名女工作人员谭澹如结为夫妻。

党的八七会议后，赵自逸离开广州，四处奔走，贯彻临时中央政治局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十月十五日，他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与周恩来、张太雷、杨殷等，同被选为南方局军委会委员。此时，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均已失败，党决定在南中国最大的城市广州，发动一场新的武装起义，来号召人民继续革命。

按照党的指示，赵自逸潜回广州，秘密恢复了一批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织。为了准备起义用的武器，他还在近郊的芳村秘密设立了一个炸弹制造所，并亲自动手试制土炸弹。

十二月九日，新成立的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参谋团召开会议，赵自逸应邀参加，在广州禺山市场一间杂货店楼上讨论了

^①王建吾等：《黄埔军校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作战方案。会议决定郊区的农民自卫军由赵自选率领，与叶剑英指挥的起义军主力协同作战。十二月十一日凌晨，震动南中国的起义枪声打响了。赵自选按指挥部的部署，带领芳村、南海、花地的农民武装投入战斗，首先包围了芳村警察局，缴枪数十枝；然后冲进市区，配合教导团与守敌展开激烈的巷战，把红旗插上了反动堡垒的顽固据点——市公安局。

十二月十二日，广州公社（即广州苏维埃政府）迎着弥漫的硝烟诞生，赵自选被任命为代理土地委员（土地委员彭湃因在海陆丰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未能到职）^①。

广州公社仅存三天，就遭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联合绞杀。起义军寡不敌众，退出广州城，转移到东江的海陆丰地区；赵自选则被分配去北江的英德地区发动新的斗争。他把新婚的妻子安排去香港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不久，谭澹如在广州被捕，惨遭杀害）。由于北江地区环境险恶，土地革命一时发动不起来，赵自选无法立足，于一九二八年三月撤到东江地区。

这时，海陆丰县城相继被敌人占领，彭湃率农民武装退到大南山坚持斗争；由颜昌颐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徐向前领导的部分广州起义部队，分别改编为红二师和红四师，也在海陆丰地区活动。赵自选在四月十三日举行的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委员，留在海陆丰指导武装斗争。他贯彻省委关于“加紧完成东江琼崖的割据”这一指示^②，在海丰县委和红二、四师联席会议上，主持制定了将于五月三日举行的海丰暴动计划，打算夺回县城，重新开辟海陆丰苏维埃区域。

五月三日，战斗按计划打响，赵自选与袁国平率红四师首

^①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85页。

^②广东海丰县红宫纪念馆资料。

先投入战斗，凌晨三时从北路偷袭入城，砸开监狱，释放了一百多名被捕的同志，接着，又包围了敌人的指挥部。但是，红二师由于在南路遇上强敌阻击，未能赶来，已入城的红四师渐被增援之敌围住，遭到内外夹攻。时迫事危，赵自选一面指挥部队向朝面山、中峒方向撤退，一面亲自抱着一挺轻机枪断后掩护。冲出县城时，他被敌人机枪射中，子弹穿胸而过，血涌如注，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七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 1.周士第：《在党领导下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2.王首道：《革命的摇篮——回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存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陈列馆。
- 3.周其鉴：《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存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陈列馆。
- 4.郭绍仪：《回忆广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存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陈列馆。
- 5.郭一予：《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考生复试》，《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6.《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7.《广宁农民减租运动之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8.《黄埔军校部分人员简介》（赵自选条目），《黄埔军校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9.《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姓名籍贯表》，存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
- 10.《坚强的老战士》（未刊稿），长沙师范学校编印。
- 11.周士第、郭一予以及赵自选烈士的家乡和亲属的访问记录。

沙文求

邢秀华 何锦洲

沙文求，又名仲已、端已，浙江鄞县塘溪乡沙村人。他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后任共青团广州市委秘书长。一九二八年八月英勇就义。

(一)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二日，沙文求出生在一个中医家庭。父亲沙孝能，体弱多病，弃农行医十余年，三十九岁时去世；母亲陈龄，性格刚直，通达事理，对沙文求兄弟从事革命活动，寄予高度的同情；兄弟五人，文求排行第二；还有八十多岁的祖母。沙文求的父亲去世后，家境困难，只好重点供大哥沙文若（又名孟海）进师范学校读书，其余兄弟在家务农。一九一九年沙文若在师范学校毕业后，沙文求才得以就学。

一九一一年，沙文求入本村小学读书，一九一六年停学，一九二〇年春，由大哥带入鄞县梅墟求精小学高二年级补课半年，同年秋考入宁波效实中学读书。沙文求在校学习期间，很喜爱阅读历史书籍和古典小说，象《左传》、《史记》等史书，他均爱不释手。他很崇敬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对民间的侠义行为也很景仰。在五四爱国运动新思潮的影响下，沙文求下定救国救民的决心，一面发奋读书，阅读了有关新文化运

动的报刊书籍，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一面阅读《武经三书》、《读史兵略》等有关军事书籍，并努力锻炼身体，学练少林拳术等，希望将来能当名爱国武将。他的体育课成绩是全校闻名的。他还认识到要振兴中国，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许多志同道合的青年结合在一起，才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便与一些有志青年结为知己，经常聚集在一起谈理想说抱负。一九二三年，沙文求的四弟沙文威进宁波第四中学初中部读书。这所学校，民主空气浓厚，各种学说如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等都陆续介绍进来，学生的思想非常活跃。沙文求向往四中的学习生活，经常和四弟讨论新文化、新思想。当沙文求听到“劳农俄罗斯”这个国家时，对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俄非常向往，时常希望能有机会到苏联去学习，但几次努力都没有成功。

沙文求所在的私立效实中学，是当地最保守的学校。学生对学校当局的封建教育和各种束缚学生思想的措施非常不满。有一次，因反对一个不学无术贻误学生学业的理化教师，沙文求发动了一次罢课学潮，策动同学离校在外借宿自修，要求校方将这位教师解聘，并表示不达目的决不回校上课。当校方知道沙文求是这次学潮的带头人后，以开除学籍相威吓，但他毫不惧怕，也不屈服。由于同学们团结一致的斗争，校方不得不收回成命并调换教师，罢课取得了胜利^①。

一九二四年夏，沙文求在效实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国语师范补习学校补习了一个时期。一九二五年春，他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办的一所大

^①史永：《沙文求烈士传略》，《浙江革命史料特辑》（3）。

学，名义上由当时国民党左派于右任担任校长，实际上校务由瞿秋白、邓中夏等负责，瞿秋白又是该校社会学系主任。沙文求受到瞿秋白、邓中夏等的教导。他在校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反帝反封建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的日籍职员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并枪伤十多人。工人罢工反抗，上海的学生发动募捐，支援罢工工人和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宣传运动。沙文求参加了这次爱国运动。五月三十日，他参加上海的学生、工人和市民到上海南京路老闸捕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的示威游行，英国巡捕向示威群众开枪，当场被打死十三人，重伤十五人，又逮捕五十三人。沙文求奋不顾身地边发传单边喊口号，同群众一起继续斗争，这就是影响全国的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事后，他写信给他的弟弟说：“这次群众的爱国热情实在太使人感动了，我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五卅运动时，英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先后封闭了上海大学和大夏大学、文治大学、同德医专和南方大学。帝国主义又派海军陆战队占领上海大学，武装驱逐坚持护校的学生，沙文求的铺盖被帝国主义的军队扔出校外。他不得不愤懑地离开学校。六月一日，全上海的工人、学生、商人纷纷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在此期间，沙文求同上海大学的同学一起活动。在租界戒严的形势下，仍然坚持进行散发反对帝国主义的传单等。

同年夏，沙文求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学习。但当他一入复旦，就发现物理学并不能解决他在五卅运动实践中接受下来的许多社会科学上的问题。这种矛盾终于使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书呆子，要救国只有直接参加革命斗争。于是他决心辍学

回乡^①。当时，沙文威已在共青团宁波地委担任组织工作，向他叙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决心和看法，告诉他要改造社会非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可。沙文求表示他早就想参加共产党了。于是由沙文威向党组织介绍，根据沙文求的表现，经中共宁波地委批准，一九二五年冬，沙文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一九二六年初，中共宁波地委为开展农民运动和盐场的工人运动，指派沙文求回故乡鄞县沙村从事农民运动。当时，江浙一带农村，地主、豪绅等反动势力相当猖獗。沙文求回到故乡后，有计划地联系本村贫苦农民，同他们促膝谈心，先把村里的一些骨干秘密地组织起来，再通过这些骨干进行暗地串连。最初，有些农民有顾虑，不敢立即加入农会，到二、三月间，参加农会者只有十余人。为了使农民相信农会确是为贫苦农民争取权利和利益的组织，沙文求找寻一切机会进行工作。一天，村里有个农民误砍了界边的树木，恶霸沙听涛乘机敲诈勒索。这位农民没有钱，沙听涛便把他捆绑起来，以送官府法办相威胁。沙文求抓住这一时机，领导农民进行斗争，吓得恶霸数日不敢出门，农会的威信随之大振。农民们明白了组织农会的作用和意义后，纷纷要求加入。不久，沙村农民协会正式成立。

沙村农会成立后，沙文求除领导大家同土豪劣绅斗争外，还组织会员修筑道路和公共水利；组织贫困农民上公山砍柴，

^①1927年8月22日沙文求给陈修良的信。

以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村里办起农民夜校，帮助农民识字，学习《平民千字课》。他的家里或夜校成了农会开会、活动的地方。他的爱人王弥则为他保存文件、当交通。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农会的威信不断提高，农会的组织得到了巩固。

以后，当地发生了塘头街（距沙村二里的集镇）米商乘饥荒私定米市不设零售（一斗以下不售）的事。农会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立刻在沙村召开大会，决定由文求率领众人，各备一升数合的米款赶往米市，农会会员有计划地插入余米行列，迫使米商作一升数合的零售。经过这番斗争，米商只得依照农会提出的条件，撤销了不合理的规定，实行零售。通过这些活动，提高了农民的觉悟。到一九二六年七月，沙村农会会员已发展到八九十人，还吸收了五、六个农民入党，建立了沙村党支部，沙文求任支部书记。沙村农会的影响已扩展到附近各村^①，与省著名农运领导人卓兰芳在奉化松岙组织的农会相呼应，并为后来象山港地区的农民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六年夏，沙文求奉调离开鄞县，同陈修良等前往广州，由团中央介绍，沙文求进入中山大学哲学系学习。他刻苦钻研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课程，积极参加中山大学学生的革命活动。于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被选为该校共青团支部书记，并根据革命需要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中山大学共青团的活动非常活跃，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当戴季陶等分裂国共合作，叫嚷“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时，沙文求和党团员、进步的同学一起进行揭发和斗争。他指出，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违背中山先生的遗教，是分裂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行为，是

^①史永：《沙文求烈士传略》。

非常错误的。他还领导共青团支部和进步学生捐款支援省港罢工工人，为维护国共合作和支援工农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三)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四月十五日，广州的国民党右派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达二千余人，下狱者千余人。沙文求决心继承先烈遗志，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这时他在共青团广州市委机关工作。四月二十三日，秘密的中共广州市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发动工人举行罢工，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沙文求根据这一决定，联系海员和汽车、人力车等业工人罢工一天。四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他又按照党的指示，参与发动印刷、渔业等行业工人罢工。罢工工人发表宣言，反对敌人封闭革命工会、农会，并提出“打倒蒋介石和一切新军阀”、“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口号。在这次罢工中，有二三十名工人被捕，六名被杀害，其中有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劳动童子团团员。还有十八岁的劳动童子团副团长邓金娣和劳动童子团女童部长罗大妹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前，沙文求团结市内共青团员和青年工人，坚持革命斗争^①。当时，他的大哥鉴子形势险恶，曾屡次劝他回上海。他在回信中答道：“你叫我不要做危险的事情，我想你不必这样说，对于我没有有什么关系。对于你是很有损失，因为这就表示了你的不果断”。

“你对于诸弟，尤其是对我，应当促其入险，鼓其前进。姑无

^①赖先声 1963 年 7 月 19 日的回忆。

论你自己能否临阵，但须知你的弟我能临阵。临阵而亡，我且不悔。你更不必悔。临阵而胜，非我之胜，亦你之胜。总之，你是督促临阵者，我是临阵者，事实应该如此。你切不要再染溺爱之气，而表示中馁的状态了。”^①

大革命失败后，沙村的农运也遭到破坏。沙文求的三弟沙文汉被通缉，五弟沙季同因在沙村从事农会工作被豪绅勾结土匪捆绑装入麻袋，并扬言要把他投入深渊溺死。有人劝他母亲托人说情，他母亲断然说：我五个儿子，被害死一个，还有四个，和他们拼命，看他们敢不敢？情我是不说的。表现了一个革命母亲的气节。结果，白乡间老人主动出来讲话后才把沙季同释放回来。当地的地主豪绅还洗劫了沙文求的家，全家十余人被逼分散流亡。沙文求听到这一消息说：“这次破家，不只在革命意义上有重大底价值，而且在诸兄弟生活的发展上也有长足的补助。出我幽谷，上我乔木，真是天助我也！”^②充分表达了他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对白色恐怖，沙文求对革命充满信心。他曾给在武汉工作的陈修良写信说：

“母亲（指党）的病终于转到这样沉重。你们的责任真要加重得多了。”“我们站在社会上，在一方面而为后凋之松柏，在他方而又为先导之春风。无冰雪之白色不能显松柏之浓郁，无隆冬之严寒难以知春风之慈祥。”^③他决心在“岁寒冰雪之世”，以“不可屈的性和不可挠的心”，去实现革命的理想。他还说：“有决心的人至死不下泪的，或者还可带着笑容”。这种坚强的决心来源于对革命坚定的信念。他已经看到农村革命运

①②《沙文求烈士在广州起义前后的七封书信》，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5辑。

③1927年8月10日沙文求给陈修良的信。

动的曙光，认为“由于这里（指广东）的农村运动已有很长的历史，乡间的革命势力已有很好的基础。如同湖南、湖北一样。”^①所以他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他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认识到了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必然要被人民推翻，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些信念鼓舞着他更英勇地进行革命斗争。

一九二七年六月省港罢工两周年纪念日前，省港罢工委员会办事处和各业工会已被国民党接收，并派“改组委员”占领，工人群众对此表示极大愤慨。中共广州市委和转入地下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发动当时留在市内的省港罢工工人和各业工人举行纪念示威大会。沙文求在团市委同许多党团员秘密地到工人宿舍串连通知。六月十九日那天，二万多工人参加了这次声势浩大的纪念大会，工人们高呼“反对白色恐怖”、“肃清反革命”等口号，显示了工人阶级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决心。

六月二十三日，是著名的沙基惨案二周年纪念日。中共广州市委、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议特别委员会决定召开工人大会举行纪念，并号召工人进行反帝反对新军阀的斗争。沙文求按照市委布置，通过共青团干部分别通知共青团员、省港罢工工人和广州青年工人参加这次大会^②。由于地下党团组织广泛发动，这一天到会的有三万多人，他们聚集到太平路西瓜园广场。高呼“保持罢工工人一切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打倒委派的改组委员（工贼）”、“保持四月十五

①《沙文求烈士在广州起义前后的七封书信》。

②赖先声 1963年7月9日的回忆。

日以前工人和资本家所定的协约”、“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广东新军阀”等口号。这时，反动警察、保安队包围会场，工人们人多势众，毫不惧怕，仍振臂高呼口号。会后，敌人包围省港罢工工人宿舍，逮捕二百多名工人下狱。沙文求处此逆境，并不气馁。他教育共青团员、青年工人不要被暂时的挫折所屈服，要挺起胸膛，继续战斗。此后，他按中共广州市委的部署，经常秘密深入到工人中开展革命工作。六月二十九日，中大反动当局在《第三十六号布告》中开列了要逮捕的共产党员的名单，其中就有沙文求的名字。沙文求本想去武汉。当他听到汪精卫和蒋介石勾结，已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继续留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为便于工作，沙文求经常化装成学生、贫苦青年、富家子弟或商人等，出入于市井街巷之间。九月二十日，他外出联系工作，回到越秀北路新一号三楼住所（党的机关）时，邻居老妈妈急忙告诉他，要他赶紧避开不要回去，可是他听不懂广东话，仍然向住所走去，结果被两个预先埋伏的便衣警察抓住。在这危急关头，他的拳术起了作用，几拳打倒了敌人，夺门而出。警察爬起来不见他的踪影，便追问那位老妈妈，老妈妈故意指了指另一个方向，保护了他脱了险。以后沙文求曾几次转移住址，最后迁到丈新街元素巷十四号居住，改名史永，字文远。

一九二七年九月，沙文求担负共青团市委的领导工作。当时的生活环境极为困难，有时他连寄信的钱也没有，后来，新任两广团省委书记李求实了解了生活困难的情况，才决定由团广州市委供给他生活费用。他非常高兴地告诉家人说：“李兄到后，经济问题随之解决，事业上亦重有整顿。”他曾在自

画像上题诗明志，其中有这样几句：

昆仑为志，东海为心；
万里长江，为君之情。
飞步东行，愿君莫驻；
瞿塘三峡，愿君莫踏^①。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四日，中共广州市委、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议特别委员会，决定发动广州海员为反对轮船公司无理开除参加省港大罢工的海员举行罢工。沙文求根据市委安排，发动海员投入斗争^②。由于工作细致，指导得力，省港、省澳、港澳、港江航线轮船的海员都举行了罢工。那天正午，广州五千名海员在西瓜园广场开大会，广州所有革命工会和省港罢工工人都派代表参加。会后，工人群众举行示威大游行，反对无理开除海员，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委派的改组委员（工贼）。沙文求看见工人斗志昂扬，决心进一步恢复和开展革命斗争。十月中旬，中共广州市委、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又召集工人代表开会，沙文求发动工人代表积极参加这次秘密会议。会上，代表们决定十月二十三日举行总罢工。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工人进行革命活动，于十月十九日逮捕了广州海员工会会员四十五人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三十人，反动警察、宪兵日夜巡逻街头，搜查行人，加强警戒。在环境异常险恶的情况下，市委和广州工代会决定把十月二十三日的总罢工改在晚上举行分散的示威游行。沙文求按照

^①《沙文求在广州起义前后的七封书信》。

^②赖先声 1963 年 7 月 9 日的回忆。

市委紧急指示，到市内各革命工会、共青团支部通知这一决定。二十三日夜半，反动武装认为示威时间已过，放松巡逻。就在这时，一百多个工人小组，每组十人，每人手持红旗，分别出现在市内主要街道，散发传单后即分散离去，既达到了示威的目的，又没有造成损失。事后，沙文求在共青团广州市委会上，表扬了勇敢参加这次革命行动的共青团干部、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

(四)

一九二七年十月，沙文求被任命为共青团广州市委秘书长。十七日，党中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在城乡准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中共广东省委着手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除党所掌握的第四军教导团为主力外，又组织工人赤卫队二千人。在这期间，沙文求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筹组了一支由共青团员、工人、学生三四百人组成的准备在起义后维持交通秩序和进行宣传鼓动的队伍^①。

十二月二十一日广州起义发动后，沙文求被任命为共青团广州市委少先队总队长。他照原定计划，领导宣传和布告标语队在广州市内各主要街道挂横额、贴标语；宣传队员们在大街上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工农兵暴动歌》等革命歌曲；深入进行宣传发动。他还带领部分少先队员到中山大学，逮捕了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广州法院的法官。

经过沙文求等的发动，中山大学等大中学校的部分学生加

^①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州起义》，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4月版。

入了革命队伍，甚至有些女学生也参加了起义行列。学生们在沙文求的带领下，到维新路广州苏维埃政府领取枪枝，与起义武装一起保卫红色政权。沙文求还带领一些共青团员、工人赤卫队员和少先队员，占领市中心一些据点，维持市内联系，参加宣传活动和肃反工作。

暴动取得初步胜利以后，国民党调集军队在帝国主义军舰帮助下拚命反扑，观音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区。广州苏维埃劳动人民委员兼赤卫队总队长周文雍，亲自指挥这里的战斗。沙文求担任赤卫队中队长，在观音山长堤一带抗击，曾打退敌人的几次进攻。起义第三天，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起义指挥部指示尚存的武装力量从市内撤出，向花县及农村转移。当时，沙文求带领的赤卫队已与上级失去联系，仍留在原地继续作战，因队员伤亡很大，后路也被敌人切断，队伍被分割冲散，他同仅有的几个同志冲出重围，在一所马车房子里躲过了敌人的追击。次日凌晨，敌人开始挨家挨户搜查。沙文求等遭到敌人的盘问。他们自称是中山大学学生，因避战乱，在这里暂宿一宵。敌人见他们回答清楚，放他们走了。

广州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异常严重。沙文求悲愤地说，此次广州“被杀戮者根据报上所记，单属共产党本身已逾二千人之多。古人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近数日来广州无数之生命，无数之财产，沦为刍狗。然则谁为之天？谁为之地？是固有人在也！我想为之天为之地者，不特对于此次惨劫无所动于心，且将更进而为天之地以临照斯民耳！”^①

起义失败后，组织上通知各人暂时自我隐蔽之所。沙文求

^①《沙文求在广州起义前后的七封书信》。

即和几个起义人员乔装秘密乘船转移到香港，同设在那里的中共广东省委和共青团广东省委取得了联系，几天后，党又调他回到广州继续开展地下活动。

沙文求回到腥风血雨洗劫后的广州，不顾个人安危，来往于大新街、思宁路、榨粉街、和平路等地下机关之间，了解情况，布置工作。他发现个别同志思想有动摇，不想再干地下工作，就耐心教育他们不要因暂时的挫折而灰心失望，应该继续斗争。他还布置同志油印传单，在市内秘密散发，表明广州起义虽遭失败，但革命者仍在战斗。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周文雍、陈铁军等英勇牺牲，党的地下机构连遭破坏。沙文求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为革命，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说：“若遇颠蹶或沉沦时，我们是‘死而无悔’的。恐怖是可耻的，忧郁是可耻的，焦噪是可耻的，谄媚是可耻的，踌躇回避是可耻的，哀鸣是可耻的。这样才是真正的我们了。”^①他连用六个“可耻的”词儿，表达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情操。

一九二八年夏，广州党组织又遭敌人多次破坏，市委一些同志壮烈牺牲。根据上级指示，广州党、团组织进行了整顿。他继续与李求实、朱光、谢幼川等深入到工人、学生中去做秘密宣传工作，鼓励工人要继承广东工人革命斗争传统，继续坚持战斗；要求学生既要学好文化，又要继承大革命时期广东学生的革命斗争传统，关心国家命运，参加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山大学的控制特别厉害。沙文求

^①1927年10月1日后沙文求给陈修良的信，该信未具日期。

化装成小学教师，晚上步行到文明路中大宿舍，找到过去认识的进步同学，了解反动派在校内的反动活动。接着，他布置进步同学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揭发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中山大学学生毕磊、陈铁军等血腥罪行，揭露敌人在中山大学安插特务、监视与逮捕进步同学的种种法西斯罪行，使中山大学师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有进一步认识，从而团结了一部分学生继续参加斗争。沙文求还到油业工人中去，发动他们进行争取改善生活待遇，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尽管这些斗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是扩大了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团结了部分工人。

一九二八年八月，沙文求不幸被捕。在狱中，他遭到敌人惨无人道的折磨，遍体鳞伤。敌人要他供出广州地下党团组织的情况，他只字不吐，宁死不屈。反动派无计可施，便将他杀害于红花岗，时年仅二十四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沙文求烈士在广州起义前后的七封书信》，《文史资料选辑》第65辑。
2. 沙文求烈士1926年8月30日至1928年1月6日的三十封书信，未发表，原件存其大哥沙孟海处。
3. 《沙文求烈士传略》，《广州革命烈士史料选辑》（草稿），广州革命烈士传略编汇小组办公室编印，一九六三年三月。
4. 史永：《沙文求烈士传略》，《浙江革命史料特辑》（3）。
5. 陈修良：《沙文汉同志战斗的一生》，《浙江革命史料特辑》（5）。
6. 访问宋维静、史永、陈修良、沙孟海等的谈话记录。

欧阳立安

毛和利 庄永淑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我党的一批重要干部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这次牺牲的二十四名烈士中，有一位年仅十八岁的青年，他就是欧阳立安。

欧阳立安，曾化名杨立安、杨国华，湖南省长沙市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父亲欧阳梅生，原为小学教师，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过湖南省总工会秘书长、湖南省工人纠察队政治教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汉阳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等职。欧阳立安在兄妹六人中居长。他自幼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活跃，秉性聪慧，性格刚毅，深受父母喜爱。

一九二〇年，欧阳梅生到湘阴汨罗的龙家牌楼大屋龙氏宗堂教书。六岁的欧阳立安随父亲在那里学习了三年，看到了无数农民遭受地主压榨的种种悲惨景象。一九二三年，欧阳梅生应聘去湘西办十县联合模范小学，一时不能携带眷属，欧阳立安便随母亲陶承回到长沙，入湘春街城区第十二小学继续读书，一九二五年升入长沙市修业学校高小。他学习用功，国语成绩尤好，经常受到老师的称赞。一次他写了一篇题为《檐边的麻雀》的作文，描述一个穷孩子的悲惨遭遇，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平的义愤。

这年十月，安源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的黄静源被反动派杀

害，工人们义愤填膺，抢出他的尸首运往长沙，并于十月二十六日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欧阳立安积极动员同学参加，会后又随抬着烈士灵柩的群众队伍游行示威。他象大人一样振臂高呼：“打倒军阀”、“黄静源精神不死”等口号。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占领长沙后，十三岁的欧阳立安参加了学生纠察队，被推选为修业小学纠察队第一队队长。他带着学生队伍，手拿纸旗，喊着口号，参加了在教育会坪举行的欢迎北伐军民众大会，并被选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因身材矮小，讲话时，他站在小凳子上，慷慨激昂地声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

一九二七年五月长沙马日事变后，欧阳梅生奉命转移至湖北工作。同年秋，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欧阳立安随母亲离开长沙，来到江城武汉，在汉阳泗湾找到了他父亲的住所。不久，党组织指示欧阳梅生与张浩、龙大道等成立汉阳县委，县委机关就设在欧阳梅生家里，由陶承照管机关，欧阳立安则经常站岗放哨，有时还帮着传递秘密文件。

这年冬天，湖北省委为了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揭露反动派的罪行，鼓舞群众的斗志，决定将原铅印的《大江报》改为八开的油印小报，在武汉工人群众中秘密散发。欧阳立安此时已担任了县委的交通员，便肩负起传递《大江报》的重任。每天，母亲把《大江报》和信件折成很小的长条，围在他的腰间，用绳子捆扎结实，外面罩上棉衣。一次捆八张，分送到八个地方。

当时，武汉街头敌人的鹰犬密布，任意搜查行人，欧阳立安有时带着妹妹同行，遇到巡兵、特务，他们便假装吵架、撕打，混过敌人的搜查。有时，为避搜查，他要冒严寒，忍饥

饿，绕大街，穿小巷，奔走十几里路才能完成任务^①。虽然环境如此险恶，工作如此辛苦，但当他听说《大江报》使工人们知道“总工会还在”、“共产党还在领导我们战斗”而倍感兴奋，斗志弥坚时，他就极为欣慰，饥乏全消。

一次，欧阳立安到一个交通站送信。他刚推开虚掩的房门，突然从墙角里冲出一个满脸横肉的特务，用枪逼着他喝道：“站住，干什么的！”他立刻明白这处交通站出事了，便急中生智，镇静地说：“我来收豆腐钱的”。特务凶狠地打了他一个嘴巴，说：“谁欠你的豆腐钱？”他故意边哭边嚷：“你不讲理，我爹病了，叫我来收十八号的豆腐钱，你不给还打人哪，呜呜……”。特务气势汹汹地说：“你瞎了眼，这是十七号，再不滚蛋老子崩了你。”欧阳立安趁势退了出来，赶紧跑到僻静处把信处理掉。他又想到其他同志的安全，便在路边拣了块木炭，悄悄地回到十七号门旁，在墙上划了个“井”号，暗示这里已经出事。回到家里，他把遇到的情况告诉父亲，父亲称赞他说：“做得好，逼见敌人就得随机应变！万一被捕，打死也不能说实话，交通员都是这样的。”他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教导。

欧阳立安家住在龟山脚下，山上有一所庙宇，县委的同志常到庙里碰头。一次，县委的同志在庙里开会，欧阳立安在门口担任警戒。突然远处传来一阵狗叫声，一些警察往山上走来。他立即报警，大家迅速四出疏散，全部安全脱险。事后，县委的同志都夸奖他机灵、细心，是个能干的小交通员。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凌晨，欧阳梅生因积劳成疾，患脑

^①访问李云涛记录（1983年8月）。

溢血逝世。党组织十分关心他们一家，设法把欧阳立安送到武汉一家石印公司做工，并安排了陶承和其他几个孩子的工作。欧阳立安深感觉的关怀与温暖。

同年冬，陶承被调去上海工作，欧阳立安也于一九二九年春到达上海，进申新五厂做工。资本家欺榨工人的手段十分毒辣，规定吃饭不许关车，工人连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欧阳立安所在的铜匠间就曾累死过一个工人，他和工人们都憋着一股怨气。一天晌午，工人们正吃饭，工头走来要欧阳立安去买香烟。他冷冷地说：“等会儿，你没见我在吃饭吗！”工头大声吼道：“谁给依的胆子，叫依还敢不动！”欧阳立安理直气壮地说：“工人也是人，肚子饿了还不叫吃饭，我又不是听差。”工头指着他骂道：“小赤佬，依还敢顶嘴，罚依四角钱。”欧阳立安愤怒地讽刺说：“罚四角钱太少了吧！我一天还挣不到四角呢！”工头大怒：“好，一句话，就罚依四角。”他见工头那副丑态，不禁哈哈大笑说：“你去罚吧，阿拉不做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厂门。

一九二九年秋，欧阳立安跟随何孟雄到沪中区委，担任交通。他经常在浦东、沪西、闸北、南市一带的纱厂和烟厂奔走，传递文件，散发传单和宣传小册子。他把这些传单带进工厂，揉成纸团塞进粗纱筒子里，工人们使用纱筒时，发现眼子不通，用力一甩，传单便出来了。有时，他把宣传品裹在棉花团里，工人捏着棉花团，感觉里面有东西，扒开棉花就见到了。这些传单和宣传小册子在工人中秘密地流传着，他们知道党组织就在身边，指导着自己的斗争，斗志更加坚定^①。

^①访问烈士妹妹欧阳本纹记录（1982年9月）。

这年冬天，经何孟雄介绍，欧阳立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其后不久，他又随何孟雄调到沪东区委，担任团区委委员，从事青工工作^①。这期间，他白天到几个大工厂传达指示，布置工作；晚上借工厂的子弟学校，把工人们组织起来教唱歌曲，排练节目，搞得很出色。

一九三〇年一月，欧阳立安参加了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几千名失业工人为反对关厂而举行的集会、演讲；以后又相继参加了纪念“二七”全国工人争取自由运动周和“三八”示威纪念活动；参加了上海工人声援南京“四三”惨案的游行示威和抗议集会，以及庆祝“五一”节的游行。在这些斗争中，他都勇往直前，毫不畏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因为他工作积极，斗争勇敢，机智灵活，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一九三〇年初夏，经何孟雄介绍，党组织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还只有十七岁。

一九三〇年六月，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国工会代表团的二十余名代表分两批乘船到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组织第五次代表大会。欧阳立安被组织确定随行，他同第一批代表先期到达。八月十五日，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许多国家的工人代表相继发言，控诉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工人的罪行，介绍他们同资本家勇敢斗争的经验。刘少奇指定欧阳立安帮助女工黄菊英准备发言。他认真地为她写好发言稿，并多方鼓励她把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介绍出去。

会议结束后，欧阳立安奉命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会议。十一月七日，他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十

^①1929年12月18日上海工会联合会校团会议记录，存上海市档案馆。

三周年纪念活动。其后，他随代表团到乌克兰等地参观了十多天，这次出国，使他增长了许多知识，政治上更趋成熟。

十二月，欧阳立安回国后，党组织任命他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他感到自己肩头的担子加重了，工作和学习更为刻苦。回国十多天后，在组织的催促下，他才在百忙中抽身回家看望母亲。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下午，欧阳立安按组织通知，到天津路二七五号中山旅社（现天津路四八零号人民旅社）楼下六号房间，参加反对王明错误领导的一次会议。下午一时许，敌人突然闯入旅社，欧阳立安与沪中区委书记蔡博真等三人同时被捕。

欧阳立安被关押在老闸捕房，敌人在他住处搜去了他参加少共国际会议的证件及党内文件。敌人审讯时，他虽因证件俱在，无法隐瞒自己的身分，但他严遵党的纪律和父亲在武汉的教导，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坚决不吐任何东西。一月二十三日，敌人将与欧阳立安同时或稍后被捕的何孟雄、龙大道、林育南、李求实等三十二人押解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

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是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魔窟。牢房分三弄，每弄有十室。欧阳立安与何孟雄、柔石等关在同一弄里。他是“同案犯”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但他表现得非常坚强，在回答敌人的审讯时，他激昂慷慨义正词严地说：“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国民党迟早要灭亡，我是共产党员，就是筋骨变成灰，也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我为正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①这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勇

^①黄理文：《回忆欧阳立安就义》，1949年12月6日《人民日报》。

气概，给狱中的难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①。

二月七日黑夜，牢门突然打开，看守长提着马灯，按名单指挥看守提人。欧阳立安与何孟雄等二十多人一起被敌人押出。他们知道就义的时刻到了，齐声奋力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革命成功万岁！”伴随呼声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英勇地倒在血泊之中。年仅十八岁的欧阳立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荣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欧阳立安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①访问李初黎记录（1982年9月）。

徐 朋 人

徐 达 德

徐朋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由于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根据地的实际相结合，抵制“左”倾错误，被当地干部亲切地誉为“土马克思主义者”^①。

徐朋人字仕洪，又名继玉，一九〇三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紫云区高徐家村。兄弟六人，他排行第六。父亲徐型仪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私塾教师，兼行医。徐朋人幼时随父读书。他学习用功，尤喜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深得父母宠爱。

一九二一年，徐朋人考入黄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历史教员董素怀是徐朋人最崇敬的老师。一次，他讲完蔡锷护国讨袁这段历史后，又激愤地说：不期袁贼虽死，余孽犹存，军阀混战，不绝至今。国家民众何罪之有，累遭劫难。虽松坡再世，也无力回天矣！董先生慷慨激昂，不禁声泪俱下。血气方刚的徐朋人义愤填膺，但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打倒军阀，拯救中华。他陷入忧思之中。

这时，董必武正以武汉中学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发

^①《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几个问题》（1963年8月20日），载《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2）。

展党团组织。董必武非常关心家乡黄安县的革命运动，经常通过武汉中学的黄安籍学生和四叔董紫怀，向黄安高等小学的学生赠阅《新青年》、《新潮》、《黄安青年》等进步书刊。徐朋人读了这些书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如茫茫黑夜望见了指路明灯。

一九二三年，徐朋人高小毕业后，本想到武汉中学读书，无奈父亲年事已高，家庭经济负担日重，不得不放弃继续求学的念头，到离家三十多里的天台山徐家河小学当教员。这年冬季，董必武在武汉中学组建了以董觉生（董必武弟）、王鉴、雷绍全为主的中国共产党黄安工作组。工作组回到黄安后，办农民夜校、平民小学，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马克思主义。徐朋人与这些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先后读到《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等书籍。他学习非常认真，作眉批，写笔记，每天晚上都在油灯下学到深夜。为了了解全国革命的动向，他经常写信给武汉中学读书的同乡挚友，索取新出版的《中国青年》、《向导》、《洪水》、《黄安青年》等书刊。他还和其他同学一起，到附近农村作社会调查，与农民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愿望。

一九二六年秋，徐朋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共产党员刘运舟担任黄安县教育局长，徐朋人被安排到紫云区初级小学任校长。他在教师中和附近农村发展了四个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徐朋人任支部书记。这时候，北伐军正向武汉进军，徐朋人组织学校一百多名学生，分成十多个小分队，连续二十多天到附近村庄、农舍，作讲演，散传单，宣传北伐的意义和我党的主张。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湖北各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徐朋人

在紫云区提出“实行农会自治”的口号，发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同豪绅地主作斗争。一九二六年底，紫云区十多个乡的农民协会相继成立。翌年春，区农协成立，徐朋人任秘书。

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引起了豪绅地主的极端恐慌和仇视。紫云区大恶霸地主袁鹤山和河南光山县的反动武装红枪会相勾结，阴谋里应外合，偷袭农民自卫军，搞垮农民协会。徐朋人积极组织对袁鹤山的斗争。他对那些心存畏惧的农友们说：“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我们人多，袁鹤山就是只老虎，我们一人一口，也把他活吞了。”^①农友们听他讲得有理，个个摩拳擦掌，要同袁鹤山分个高低。

经过周密布置，一九二七年四月的一天，徐朋人带领手执大刀、长矛、鸟铳的自卫军战士，冲进袁家大院，活捉了袁鹤山，押往县城审判。五月十三日，县城召开大会，袁鹤山被农民自卫军枪决。与会群众掌声如雷，高呼口号，会后还举行了游行示威。

徐朋人十分关心妇女的解放。檀树乡王家河有一个寡妇，被三个人贩子合谋卖给一个道士。徐朋人得知后，立即派人把人贩子抓到区农协，在长冲召开群众大会进行说理斗争。他列举封建礼教、买卖婚姻摧残妇女的罪行，提出解放妇女、实行婚姻自主的口号，并宣布对人贩子处以罚款、押到附近十多个村庄游街示众。会后，区农协还就此事发出布告，晓喻全区。

“七一五”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进行血腥大屠杀。黄安县委被迫转移到县北山区七里坪。徐朋人离开学校，在黄安、麻城北部继续坚持斗争。他与曹学楷、

^①访问徐锡官（徐朋人之侄）谈话记录（1981年12月2日）。

戴克敏等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①的口号，以七里坪为中心，发展党团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十月，黄安县委在七里坪文昌宫举行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关于在黄（安）麻（城）地区组织秋收暴动的指示，议定了起义计划，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会后，徐朋人在七里、紫云两区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起义。十一月十四日，黄安、麻城两县数万农军一举攻占黄安县城，活捉了县长贺守中和大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十八日，县城举行祝捷大会，成立了鄂豫皖区第一支人民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和第一个人民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徐朋人参加了大会的筹备组织工作。根据省委“用最简便的方法，将土劣大中地主及一切公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指示，他起草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土地法》。起义的胜利和人民政权、工农革命军的诞生，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仇视。

十二月五日夜，国民党军任应岐部一个师袭占黄安城，鄂东军被敌冲散。徐朋人带领一小部分人突围来到孝感县汪洋店地区。在汪洋店，徐朋人等建立了党支部，争取了两个民团的团长，并通过他们向驻在平汉铁路的军阀岳维峻部购买了一批枪枝弹药，组织了一支革命武装，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黄安县城失守以后，徐朋人的家乡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袁鹤山的儿子袁家珠当上了清乡团团长，带人放火烧了徐朋人家的六间房屋，把徐朋人的二哥徐仕汉抓到监牢，用皮鞭打，炭火烙，要他说出徐朋人的去向。后来徐朋人的父亲筹措了五百块银洋，买通了一个看守，才让仕汉逃了出来。

^①湖北省党史调查组：《党在鄂东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1960年3月），存红安县革命博物馆。

为了避难，全家只得逃到天台山，靠打长工、做手艺维持生计。

一九二八年一月，徐朋人率部上黄陂县木兰山，与吴光浩率领的农军汇合。根据省委指示，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第七军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消灭了罗家岗的地主民团，在公路上伏击打死了黄安县警察局局长“曹屠夫”。

三月，敌人派出一个团的正规军，加上清乡团的配合，向木兰山“清剿”。第七军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由军长吴光浩率主力转战黄冈、罗田等县，徐朋人、曹学楷隐藏在木兰山、洪界山一带，聚集从黄安、麻城老区脱险的革命同志六十多人，用仅有的一枝手枪和一枝破步枪坚持斗争，对外称工农革命军第八军，徐朋人任军长兼党代表。不久，第七军折回木兰山，第八军编入第七军，两军合计一百三十多人。

木兰山虽然山高林密，但离武汉很近。武汉敌军朝发夕至，对第七军威胁甚大。这时，蒋桂战争爆发，驻在黄、麻地区的敌军撤走参加军阀混战。第七军便在陈秀冲举行会议，决定“不打城市”、“用游击战争方式号召群众”，“返黄麻再组织暴动”^①。

清明节晚上，第七军重返黄安北乡，组织“二次暴动”，先后消灭了黄安县上戴家、檀树岗、打鼓岭、灯笼山、长冲、袁英河和麻城县乘马岗、顺河集、廖棚、白凤嘴等十多处的地主武装“清乡团”，恢复发展了各乡、区的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徐朋人带领一个游击小组袭击了郑家堂的“清乡团”，俘虏十余人，缴获了七枝长枪，镇压了本村大恶霸徐禹田。人民

^①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44年），存中央档案馆。

群众兴高采烈，赞颂：“党员游击转回还，黄陂到黄安，光打‘清乡团’，捉土豪，抓劣绅，一致要共产；倘若谁反抗，叫他狗命完；只急得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①

“二次暴动”胜利后，吴光浩、徐朋人等领导人预计敌军内战结束后，马上会向革命势力反扑。他们认为，要对付强大的敌人，就要在反动统治薄弱的边界地区，找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河南光山县与湖北黄安县交界的柴山堡地区，地势险要，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基础好，是个“地利人和”的好地方。于是，吴光浩、戴克敏、徐朋人、曹学楷、戴季英等于五月在清水塘召开会议，决定率七军开进柴山堡地区。这个决定，是工农武装边界割据道路在鄂豫皖区的最初反映。

进入柴山堡后，徐朋人任光山县弦西区区委书记，曹学楷任弦南区区委书记，两人负责地方党和政权建设工作。徐朋人在弦西区发展了二十多个党员，建立了区、乡农会组织和赤卫军。为了培训骨干，他在卡房办了几期党员训练班。在对敌斗争方面，他采取了一些符合当地政治情况的策略，除对反革命首恶分子坚决镇压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对一些开明士绅采取争取团结的方针。徐朋人几次登门到郭家河大地主郭道畅家中，对郭晓以大义，动员他拿出土地分给农民。徐朋人说：“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非解决不可了，民以食为天，农民人多，要吃饭，又没有土地，活不下去了，只好造反。本党在农村的任务就是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望郭先生看清世界大同的趋势，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②在徐朋人的耐心说服

^①《红安革命历史民歌》，红安县文化馆搜集编印。

^②访问戴季英谈话记录（1982年6月30日于郑州）。

下，郭道扬同意把多余土地交给农协分配。

对于当地的土著武装红枪会，徐朋人利用他们与军阀部队的矛盾，采取了分化、瓦解、争取的策略。红枪会首领叶道举，既同农民赤卫军打过仗，也受过军阀部队的欺侮，同两边都有矛盾。徐朋人分析了这一情况，认为只要把道理讲清楚，有可能争取他们靠近革命。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去找叶道举谈判，结果订立了协定：对外一致反军阀，对内互不干涉。后来，这支红枪会逐渐分化、瓦解，大部分成员参加了红军。叶道举成了孤家寡人，跑到外地去了。经过几个月艰苦工作，第七军在柴山堡站稳了脚跟。

七月，中共鄂东特委筹备委员会成立，徐朋人调任筹委会秘书长。十月，特委组成，徐朋人被选为常委兼宣传部部长^①。特委成立后，在讨论工作重心和军事问题时，特委委员余泽涵提出：特委工作中心应放在白区，机关应设在城市，根据地应建立在黄陂和黄安南部，不宜保守在北部山区。徐朋人不同意这些意见。他认为：弱小的革命武装，只有在敌人统治薄弱和群众、地理条件有利的边界地区，才能胜利发展。会议否决了余泽涵的意见，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在光（山）黄（安）交界的山区。会议还决定将第七军改编为红十一军三十一师。会后徐朋人回到家乡，动员叔父徐福仁、侄儿徐锡焱等六名亲属参加了红军。他还写信给他的好友高志敏说：“你们兄弟三人，家无隔夜之粮，也应来参加红军；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在家里则永无出头之日。”^②经徐朋人动员，他的亲朋好

①一说徐朋人任特委书记。

②访问徐锡官谈话记录（1981年12月2日）。

友有三十多人参加了红军。

在特委领导下，红三十一师迅速壮大，在鄂豫边区拔除反动据点，肃清反动势力，组织地方武装。到一九二九年五月，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以柴山堡为中心，发展到跨越两省五县、纵横一百余里的地区，鄂豫边根据地初步形成。

一九二九年四月，中央指示京汉特委与鄂东特委合并组成鄂东北特委，徐朋人任书记。这时，他关于边界武装割据的主张更加坚定。在他的主持下，特委制订了“打通由麻城、商城、罗田以东到皖英、霍界之大别山脉一带……军事割据东由皖英、霍界大别山起一直西到武胜关鄂、豫边界山脉一条横线”^①的军事计划。这个计划为在大别山区开展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创建和发展鄂豫皖苏区描绘了蓝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此期间，中央巡视员来到鄂豫边巡视，对特委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批评。巡视员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一下子列举了二十二条错误和缺点，指责特委“中心区域的努力不够”，全区工作的布置仍然是向“距离政治经济中心更远之北方发展”，“不肯在中心区域、白色区域作艰苦的群众工作”，“地方主义的极端发展”，“农民意识弥漫了党”，“朋人同志个人意见就是特委的决定”^②等等。对于这些批评，徐朋人据事实，讲道理，反复进行解释。接着又有人搬出中央通告来压迫特委改变自己的正确主张，并责备徐朋人是“农民意识”。徐朋人气愤地说：中央通告脱离了鄂东北区的实际，“是洋房子

①《关于黄麻光边界地区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5月7日），存中央档案馆。

②均见何玉琳给党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7日），存中央档案馆。

里想出来的，不能在东北区来实现”，“农民意识就让他农民意识。”^①

为了巩固和发展苏区，特委不顾中央巡视员的指责，进一步加强了苏区内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分配土地、肃清反动势力等工作。在徐朋人的提议下，特委在南胡家创办了党务干部学校，每期招收二十多人，学习三个星期。课程主要有马列主义、社会进化简史、游击战争、军事教育、土地问题、苏维埃问题和特委通过的决议及中央所发的通告等。徐朋人每期都到学校讲课，并亲自编写讲义，引导学员联系实际讨论。徐朋人还主编特委机关报《英特纳雄耐尔》，撰写了《土地与农运》、《论妇女运动》等理论文章。为了把报纸办得为群众所喜爱，徐朋人利用山区人民喜唱民歌的特点，经常编一些通俗易懂的歌曲在报纸上发表。

从六月开始，敌人先后对鄂豫边、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会剿”。

六月上旬，党中央派徐向前到鄂豫边。在黄安北乡箭厂河，徐朋人会见了徐向前，向他介绍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谈了特委及红军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和一系列打算，并要他到红三十一师担任领导工作。徐向前对徐朋人等特委领导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主张和作法表示赞同。他后来回忆说：“徐朋人是学生出身，当过教员，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说话操着浓重的当地口音，有条有理，也很实际，给我的印象，是个勤恳、朴实、能干的人。”他还说：“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土生土长，和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土马克思主义有一些，洋教

^①均见何玉琳给党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7日），存中央档案馆。

条极少。如果搬洋教条的话，闯不出这种局面来。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能妄自菲薄，小瞧上马克思主义。”^①

在徐朋人、徐向前的领导和指挥下，红三十一师采取避强击弱的方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一至数团兵力的三次“会剿”，并乘周围军阀不断混战之际积极出击，消灭了大量反动地主武装，发展了自己，扩大了割据地区。是年十一月，根据党中央关于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根据地和红军领导的指示，在光山县胡子市举行了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鄂豫两省八个县和红军的代表共计二十九人。徐朋人在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政治报告。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徐朋人、曹大骏、王平章起草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郑位三起草的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九个文件^②。这些决议案强调要巩固和扩大苏区，“从游击战争中扩大群众和党的组织，并帮助群众武装”；要“实行保护自耕农及中小商人”的政策，“正确的运用党对富农的策略，分配富农剩余的土地”，“防止无原则地妨碍中农利益”。大会选举产生了鄂豫边特委，徐朋人任特委书记，徐向前、徐宝珊、王平章等九人为委员。接着，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产生了边区革命委员会，曹学楷任主席。这两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从此，大别山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一九三〇年一月，特委将大会情况和通过的各项文件报告了党中央。后来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被指责为“右倾”。对于党中央的批评，徐朋人感到非常委屈，思想压力很重。但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②大会通过之各决议案，均存中央档案馆。

他还是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教训。他进一步分析了鄂豫边区的斗争形势，仍然认为特委的路线是符合鄂豫边区的实际情况的。正在这时，中央派来的巡视员命令红三十一师脱离根据地，“到京汉铁路，向武汉进逼”。特委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蒋、桂军阀混战已经结束，战胜的蒋系军队都返回武汉，京汉路南段——武胜关到汉口驻有重兵，以枪枝不满五百的红三十一师向京汉铁路出击，易遭损失。而根据地内部，又有清乡团匪军袭扰，也不安定。为了慎重研究进军路线，徐朋人主持召开了为时两天的鄂豫边特委第二次执委会议，经过讨论认为，红军不能沿京汉路进逼武汉，决定“三十一师向黄冈北部与麻城南部游击，与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取得联系”。这样，“则黄麻反动势力……不难很短的时间消灭，并可造成鄂豫皖二十余县割据的局面。”^①命令下达后，中央巡视员认为特委“堕落在地方观念的包围中”，“地方最高领导机关没有一贯的正确的政治路线”^②。竟自决定红三十一师可以越过特委，直接向中央写报告，请中央指示游击路线。徐朋人得知这些情况后，异常焦急和忧虑，他说：“照这样搞下去，非把红军搞垮不可，把根据地搞垮不可。”^③于是，他亲自找中央巡视员曹大骏交换意见，疏通隔阂。最后，曹大骏也同意了特委决定。红三十一师在京汉铁路夺取一些胜利后，迅速转回，打退了敌人的袭击，肃清了根据地的反动势力，使根据地转危为安。

①鄂豫边特委《关于红三十一师游击路线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18日），存中央档案馆。

②《关于鄂豫边情况的综合报告》（1930年），存中央档案馆。

③访问戴季英谈话记录（1982年6月30日于郑州）。

一九二九年夏到一九三〇年一月，党又领导了河南商城、安徽六（安）霍（山）的农民起义，开辟了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了红三十二师、三十三师。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发出指示，成立鄂豫皖边特委，统一对三省边界地区三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仍以徐朋人任书记；三支红军统一整编为红一军，并从中央派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等人到鄂豫皖参加特委和红一军的领导工作。三月十七日，中央决定郭述申任特委书记，徐朋人改任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徐朋人愉快接受组织决定，积极配合郭述申开展工作。

三月下旬，特委在箭厂河举行会议，传达中央指示：一切地方武装都集中起来去扩大红军，一枝枪也要扩大到红军中去；红一军只接受党中央指挥，行动不受地方党委节制；红军主要是打城市，攻交通要道，向外发展以夺取武汉。显而易见，这些指示反映了“左”倾思想。徐朋人、郑位三等少数人对将地方武装集中到红军的要求，提出了异议，认为：应当保留一部分地方武装，镇压苏区内部反动民团的暴乱；红一军的行动与地方党委的工作应当配合，但被特委书记和多数人所否决，大家表示拥护中央的指示。

六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及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一整套冒险计划，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八月，中共鄂豫皖特委在莲花背举行了半个月的会议，贯彻中央“左”倾路线。徐朋人表明了不同看法。在集中红军打武汉的问题上，他相应地提出保卫赤区秋收，是当前红军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反富农问题上，他坚持“给出路”的政策。因此受到了点名批

评。结果“左”倾错误的贯彻给苏区造成了严重损失。苏区十五个独立营的地方武装集中到红军后，远离后方，执行限令三个月打到武汉过中秋的指示，苏区不少地方在豪绅地主策动下插了白旗，原有反动据点伺机向苏区骚扰，四周反动团匪乘虚而入，占领了皖西大部分苏区；特委不能指挥红军，工作得不到红军配合，只能集中四十六枝枪打游击；红一军在外线作战，虽取得了不少的胜利，但是几次冒险进攻敌人的城市据点，都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九月下旬，党中央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中央仔细分析了鄂豫皖区的斗争形势后，于十月十八日给特委发出指示信，指出：“过去对苏区的策略是不够的，只是提出猛烈的发展，而没有提出‘巩固’的发展，因此没有根据地的观念”，强调要“巩固苏区与扩大苏区”^①，并决定红一军重归特委领导。党中央的指示给鄂豫皖苏区指明了斗争方向。特委贯彻了中央的正确指示，纠正了“左”的错误。

一九三〇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统一的全国红色政权。十一月，出席大会的鄂豫皖苏区代表团组成，徐朋人为团长。代表团赴武汉途中，有的被捕，有的走散被迫转回，只有徐朋人凭着自己的机智与勇敢，穿过敌人数道封锁线，到达武汉。

徐朋人来到秘密联络点，与省委交通员接头。刚准备对暗号时，突然从里屋和大门口冲出四个特务向他扑来。徐朋人急忙转身，打翻一个拦路的特务，冲出门外。敌人穷追不舍，直喊“抓共

^①《中央关于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及红一军、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的指示》（1930年10月18日），存中央档案馆。

匪，抓活的”，情况万分危急。正好一辆汽车从他身后开了过来。徐朋人情急智生，趁汽车驶过他身边的时候，一个箭步跨上去，双手紧抓住汽车箱板。特务们眼睁睁地望着徐朋人飞驰而去。

徐朋人脱险后，想尽办法与省委取得了联系。在交通员护送下，乘船顺江东下，平安到达上海，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准备会议。这次会议是党中央决定，由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召集的。出席会议的有全总负责人、各省产业工人代表、各大苏区苏维埃代表。会议主要汇报各苏区政权建设情况，讨论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红色政权等问题。会后，成立了全国苏维埃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徐朋人被选为苏准会成员，留在上海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徐朋人以苏准会代表身分参加了四中全会。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夺取了中央领导权。他们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幌子，通过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决议案。徐朋人对此深为忧虑。他认为：王明等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四中全会通过的政治路线不适合中国国情及革命的要求。因而遭到王明的忌恨。会后即被王明集团指控为“右派小组织分子”，撤销了他的职务，接着又多次派人与他谈话，要他承认反对四中全会的错误，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徐朋人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于二月二十四日向中央写了一份三千多字的检查报告，违心地承认了“错误”，说明了自己“在政治上不满意四中全会，在组织上服从中央”^①的立场。殷切表示希望全党同心同

^① 《鄂东北特区苏维埃代表徐朋人对自己反四中全会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2月24日），存中央档案馆。

德，正确领导中国革命夺取新的胜利。他在报告中说：“希望中央集中大部分人力财力到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中去，并迅速将现在停留在各处来分配工作的好的干部派到各地实际工作去”^①，并诚恳请求立即派他回苏区参加实际工作。

但是，王明一伙并不放过他，无中生有地指责他“对于自己的右倾观念，以及与右派小组织的关系是揭发得不够深”^②，决定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回苏区到下层工作，“要他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他真正改正错误，不然，……将讨论他能否留在党内的问題”^③。

徐朋人回到苏区不久，王明即委派张国焘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来到鄂豫皖苏区“改造”党和红军。张国焘到苏区后，对徐朋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五月二十四日，张国焘向中央写报告说：“徐朋人同志违抗中央命令，到这里后，曾有反对四中全会的发言，……因此我们正在调查他右派组织活动的证据，来进行给他一个思想斗争，并给他组织上的严重制裁”^④。五月三十一日，中央指示鄂豫皖中央分局，对徐朋人“立刻执行中央对一切右派分子的决议原则，……将他过去所有的工作线索全部移交出来，然后再决定他的党籍存否问题。”^⑤于是，张国焘分配徐朋人到光山县任税务局长，并对他进行“审查”。徐朋人到职后，整顿财务，开源节流，任劳

①《鄂东北特区苏维埃代表徐朋人对自己反四中全会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2月24日），存中央档案馆。

②③中共中央关于徐朋人报告的批语，存中央档案馆。

④张国焘《关于反二次‘围剿’及其它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5月24日），存中央档案馆。

⑤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及省委信（1931年5月31日），存中央档案馆。

任怨地为革命工作，毫不以受审查、受迫害而松懈斗志。

张国焘为了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苏区土地分配等工作无端地加以指责。他授意发出的布告中说：“土地革命的利益，大部分被豪绅地主和富农窃去了，雇农、贫农……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①，要统统推翻，重新进行分配，并且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当时正是春耕生产时节，反复平分土地势必影响生产，减少收成。特别是根据地正在闹粮荒，各级党委和苏维埃机关每天吃两餐稀粥，很多群众没有饭吃，有的连浆巴都喝不上。如若再因平分土地而耽误春耕，势必造成更大的粮食困难。徐朋人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公开反对大忙季节反复平分土地；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给出路的政策。张国焘闻讯恼羞成怒，对徐朋人加紧进行诬陷和迫害。他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报告中说：“比如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分子徐朋人，在特苏工作反对在春耕时期重新分配土地和把富农的肥沃土地分给红色战士，扩大会得皖西同志报告，知道了他更多的严重事实后，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中央分局号召……坚决同徐朋人、曹大骏、陈定侯等错误倾向作斗争”^②。一九三一年底，张国焘利用“肃反”的机会，栽赃问罪，刑讯逼供，对成百上千不满他“左”倾错误的革命同志进行宗派主义打击。徐朋人遭逮捕，押至新集“审判”。一九三二年四月，徐朋人被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的屠刀杀害于河南省光

①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怎样分配土地》（1931年10月11日），存中央档案馆。

②《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1931年7月1日），存中央档案馆。

山县泼皮河，时年二十九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黄麻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 《红安县革命斗争史》（初稿），中共红安县委党史编研委员会编印（一九八三年）。
3. 《红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编·徐朋人》（1963 年）。
4. 《徐朋人小传》，红安县革命博物馆采编。
5. 徐向前、王树声、陈再道、占才芳、郑位三、郭述申、程启光的回忆材料。
6. 访问梁业忠、罗章龙、董楚英、徐型和、徐锡海、徐锡栋的座谈记录。

李 耘 生

李 福 全

李耘生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南京特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牺牲于雨花台。

(一)

李耘生，原名李殿龙，字云生，一九〇五年六月二日出生在山东省广饶县西李村的一户中农家庭。

李耘生自幼聪慧，品学兼优，一九一九年春，以优异的成绩，由本县振华高小考进益都省立第十中学。这时，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全国，李耘生满怀爱国激情，参加了益都各界人士的万人大会和示威游行。后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他与同班同学及第四师范等校的同伴们一道在青州（现益都县）火车站附近盘查日货。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李耘生对一些封建陋俗非常反感。他在校得悉自己的小妹玉梅被母亲裹上了脚布，非常生气，便写信恳请母亲给妹妹放脚。暑假回乡后，他不顾母亲的阻拦，硬将妹妹的裹脚布撕开扔掉。

一九二二年九月，山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王翔千因传播新思想，引起军阀注意，由济南育英中学来到省立十中任国文教员。他发现李耘生、刘子久等同学的进步倾向，便因势利

导，组织他们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问题讨论集》和其他革命报刊，以后又鼓励李耘生与王尽美通信，探讨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问题。正在摸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李耘生，不知疲倦地阅读这些进步书刊，虚心向革命者请教，思想进步很快。一九二三年十月，经王翔千介绍，李耘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初冬，以省立十中的党员和团员为骨干，建立了青州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耘生任委员长^①。年底，应王尽美信邀，耘生赴济南从事革命工作，开始了他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涯。

(二)

踏上革命征途后的李耘生，在党的关怀下迅速成长。一九二四年二月，经王尽美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八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召开全体团员大会，选举李耘生为济南团的地委秘书（团的“三大”以前，负责人称秘书）^②。一九二五年一月，李耘生作为山东团的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团中央工作^③。一九二五年“青岛惨案”、“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受团中央指派，赴青岛接任团的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长^④。

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李耘生到达青岛，当天就与中共青岛地委接上关系。在中共青岛地委的支持下，李耘生领导团组织发

①《益都县志》第1册。

②③《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辑《济南政治状况》。

④《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辑《团青岛地委关于地委改组情况的通告》、《团青岛地委关于支部改编结果的通告》。

动了一场有七千余学生参加的示威游行，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血腥罪行。许多市民为之激奋，纷纷加入游行行列，使军阀派出的武装军警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六月十六日，青岛市各界三百多人继学生游行之后，举行了悲壮慷慨的雪耻大会，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推上了高峰。

李耘生在青岛的活动，引起了日本领事和军阀当局的注意。一九二五年深秋，党组织决定将李耘生调离青岛，到济南负责济南团的工作。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山东地委改组，地委书记张昆弟将李耘生由济南团地委调往中共山东地委负责组织工作^①。任职不久，军阀张宗昌在山东各地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青年。李耘生采取果断措施，将受敌通缉和暴露身分的益都党的负责人王元盛、团员冀蔚怀等二十二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秘密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分别进入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党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

(三)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从各地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到武汉工作。一九二七年一月中旬，李耘生奉调由山东来到武汉，任硚口特区区委书记。区委的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是杜韞章（即章蘊），宣传部长是王自强。同年三月，王自强调任汉川县委书记后，宣传工作由李耘生和杜韞章两人兼管。

^①《团济南地委关于半年来工作概况的报告》，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辑。

硚口是汉口一个工业区，有申新纱厂、泰安纱厂、既济水电公司、英美烟厂、福星面粉厂、胜新面粉厂、成和昌缫丝厂、康成酒厂等一、二十家工厂，二、三万工人。泰安纱厂、英美烟厂等较大的几家工厂，多为日、英帝国主义开办，工人们在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重重压迫、剥削下，过着牛马般的生活。特别是纱厂、缫丝厂的女工，所受的压迫更为惨重，有的身孕数月，即将分娩，还得站立操作，一天干下来，全身浮肿。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在十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多达十六个小时，而工资收入却十分微薄。为了争得做人的基本权利，在党的领导下，工人们曾先后进行过多次斗争。

李耘生来到硚口后，为尽快熟悉和掌握这里的情况，白天深入工厂顶班劳动，进行调查访问，晚上则利用特区区委开办的工人学校宣传革命道理，通俗地解释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工人当家作主的情况。在他的领导下，扩大了工人积极分子队伍，发展了党员，壮大了党的组织。泰安纱厂、申新纱厂等原来就有党组织的工厂，党员的数量比以前增多了；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单位和地方，如既济水电公司和硚口附近农村的蔡甸、罗家墩、易家墩等地，也建立起党的支部。区委领导下的各级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共青团、劳动童子团、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等群众组织的工作，都活跃起来。

一九二七年春节前夕，李耘生领导发动了一场要求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罢工斗争。斗争先从泰安纱厂发起。这个厂的工人在党员侯步生、张金保的带领下，提出“年关发双薪”的要求，罢工一开始，就包围了工厂洋人的写字楼（即办公大楼），高呼“不答应条件，誓不复工”等口号。厂

主日本人看见工人们组织严密，来势勇猛，吓得当天下午就答应了工人的条件，立即发了双薪。工人们高兴地欢呼：“我们胜利了！胜利了！”同年二月十日，既济水电公司也发起了“按本公司职员收入的比例，增加工人薪水”的斗争。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公司资本家不得不将工人的薪水给予不同程度的增加，达到了罢工的目的^①。

李耘生和杜韞章在斗争中密切配合，彼此尊重，增进了了解。经组织同意，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结为终身伴侣。

五月，夏斗寅进攻武汉，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革命处于紧急关头。李耘生召开区委会议，向党员说明面临的形势，并布署转移暴露身分的党员。由于他的周密而细致的工作，所以当“七一五”白色恐怖到来时，硚口地区党组织的损失较小。就在这斗争最严峻、最残酷的时候，李耘生奉命调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他毅然受命，即刻前往，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

一九二七年十月，李耘生接到上级党的指示，要求在工厂中掀起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为武汉暴动创造条件。他深感这时党的力量已很薄弱，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罢工势必益少害多，便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然而，得到的答复是：要罢工。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得保留意见，执行上级党的指示。他慎重地选择了党的力量比较强、工人基础比较好的武昌第一纱厂着手发动。二十日，市委一声令下，全厂九千多工人立即停机，宣布罢工。接着，震寰纱厂以反对开除四名剪

^①1927年2月12日汉口《民国日报》。

毛女工为引子，也发起了声援一纱的罢工斗争。但罢工最终被武装的反动派镇压了，不少共产党员、工人积极分子被捕牺牲，造成了惨痛的武汉“震寰事件”。事后，第一纱厂停产，几千工人失业，没有生活来源。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并由妇女、老人、孩子组成工人家属请愿团，从武昌的三道街走到武胜门，然后到武汉大学集会，开展反停产斗争，李耘生当即赶到现场，劝说请愿的工人家属：“你们都回去，你们的困难，会有人帮助解决的，会有人组织你们斗争的。”^①出于对李耘生的信任，工人家属的请愿队伍很快散了。中共武昌市委采取应急措施，组织第一纱厂工人进行抢米斗争，帮助失业工人度过了难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李耘生总结这次抢米斗争时说：“一纱工人除此是没有出路的。”^②

李耘生在武汉一年多的工作，受到党的长江局书记罗亦农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一个“得力的干部”^③。

(四)

一九二八年春，党决定调李耘生去南京市委工作。不久，李耘生化名李立章来到南京。这里的白色恐怖也很严重，他的组织关系一时没能接上，只好一面通过南京的一位亲戚在《时

①武汉国棉三厂厂史，原件存国棉三厂。

②1927年11月27日《湖北省委扩大会议记录》，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③《亦农同志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辞》（1928年5月1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事新报》社谋得一名记者的职业，一面继续寻找党组织。四月三十日，李耘生被叛徒王某告密，不幸被捕。叛徒指控李耘生是中学时代的“赤色分子”。就因这个“罪名”，他被国民党江苏特种刑事庭判处十个月徒刑，监禁在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①。

在狱中，李耘生贪婪地阅读妻子冒着生命危险送进狱中的一些政治理论书籍和历史书籍，利用放风机会，与难友们交谈时事，还坚持每天写日记，充满着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②。

在狱中，他遇到了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的难友王井东（即王凯，王荷波之弟），通过王井东，他接上了组织关系。

一九二九年四月，李耘生按期出狱，住在上海新闸路胡康里B六二三号一间只有四五平方米的亭子间里。他自己很少开伙，总是上街买点大饼油条，用旧洋铁盒从老虎灶打点开水，对付着日常生活。尽管生活如此清贫，他仍不懈地坚持革命斗争。

一九三〇年下半年，由于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南京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为了重建南京市委，一九三一年二月，李耘生受中共江苏省委指派，重返南京，任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在南京，李耘生的公开身分是南京贫儿教养院的历史教员。他利用讲坛穿插着讲一些革命道理，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同时，主动接近院内一些有爱国思想的教师、学生，同他们议

①1928年5月1日南京《民生报》。

②《章蕴同志回忆》及杨光政著《入狱记》，原件均存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

论时事，叙说人生观。虽然院内教职员工中有反动派的亲信，但李耘生仍通过不断的培养教育，发展了五名学生、两名教师入党，并建立了地下党支部。

为开辟党的工作，李耘生又机智巧妙地利用党员肖静庵（后脱党）在南京下浮桥国民党政府中央试验所内工作的关系，建立起党的交通站。当时，上级党的文件多在公开刊物《光明之路》上密写，由上海寄到南京的中央试验所，再由肖静庵转交李耘生。交通站的建立，保证了南京市委与上级的经常联系。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南京地下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先后在和记工厂、京华印书馆、中央大学、街道、鸡鸣寺难民区、国民党无线电台、宪兵部队、陆军军官学校等处，恢复和建立起十多个党支部，发展了近两百名党员，还成立了共青团南京特别支部。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市委决定从南京的高等学府中央大学开始，点起抗日烈火，推动全市抗日运动。市委派共青团市委负责同志到中大帮助恢复了团组织，不久又建立了党支部。李耘生多次秘密深入到中大的党员中作政治形势报告，同大家一起分析讨论抗日救亡问题。不久，中大恢复了反帝大同盟组织，吸收了在教育运动中表现积极的王枫、胡济邦、陈明达等青年入盟，并在其中发展了一些青年入党。这样，中大支部党员从开始恢复时的五、六人，很快发展到一二十人，成为领导中大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在救亡热潮中，中大党支部又发动群众先后改组了学生会和救国会，使新当选的学生会的执行委员和救国会的常务委员中，半数以上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从而取得了对中大救亡运动的领导权。

中大的抗日救亡热潮有力地促进了全市的抗日爱国运动。自九月二十二日起，以中大为骨干的全市各大、中学的学生陆续罢课，大家走上街头，开展宣传，并与全国云集到南京要求抗日的学生团结在一起，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示威，怒打执行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变更对内“剿共”、对外不抵抗的政策。一时间，抗日的标语、传单撒满了大街，雄壮的爱国呼声震动了全城。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南京特委，专门管辖江宁、江浦、句容、溧水、溧阳、宜兴等县党的工作，任命李耘生为特委书记。

为了配合苏区红军正在进行的反“围剿”斗争，新任特委书记李耘生在京杭国道（即现在的宁杭公路）沿线的句容、溧阳等地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组织了一支近百人的武装游击队。他经常揣着南京附近几县的简要地图，指挥着这支武装力量，神出鬼没地活动在京杭国道上。一次，游击队在金坛到丹阳之间抓住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老婆，以其为人质，换回一笔钱，补充了游击队的给养。他们的活动，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地打击。

一九三二年二月，李耘生在离溧阳城三里外的焦山上的一座破庙里，召开了一次溧阳党的特支紧急会议，传达党要求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在李耘生领导下，特委还对驻扎在宜兴的国民党政府江苏省保安四团作了策反工作，通过争取、教育，先后把保安四团营副谢绍辉、一连连长杲立民、排长黄炳章策反过来。一九三二年春，特委又领导国民党南京骑兵教导队警卫营内我党的一些同志发动兵变。虽因叛徒出卖，兵变部队在走向天目山途中失散，但这一事件给国民党政府以很大

震动。

(五)

一九三二年初，中共南京京华印书馆支部书记李向荣被捕，供出了南京特委军委委员吴恕、军委负责人路大奎，吴、路被捕后叛变革命，致使南京党员大批被捕，市委遭到破坏。敌人根据路大奎的口供，秘密通缉特委书记李耘生。一九三二年三月的一个夜晚，一阵猛烈的砸门声，把李耘生的妹妹玉梅和儿子小宁从睡梦中惊醒。穷凶极恶的敌人用刀把门拨开，闯进室内，没有搜查找到李耘生和章蕴，便把只有十四岁的玉梅和刚满两岁的小宁抓走。

此时，李耘生仍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留在南京处理党组织遭受破坏的善后工作。在敌人严密地搜查中，他经常更换住地，巧与敌人周旋。他到贫儿院派一个进步学生连夜赶到溧阳找特支，通知党员转移，使溧阳特支免遭损失。

四月初的一个夜晚，李耘生来到中央试验所，在交通站肖静庵处住了两天。第三天晚饭后，他对肖静庵说：“我不能长在你这儿躲反，我还要出去办理善后工作。”话毕，他换了衣服，化了装，到一个接头地点——游府西街探听消息。不料，那里已早有特务埋伏。李耘生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在多次审讯拷打中，李耘生始终坚不吐实，以“李涤尘”的化名同敌人周旋。狡猾的敌人除带着叛徒路大奎当场指认外，又将李耘生年幼的儿子抱来隔窗相认。为了不暴露身分，李耘生硬着心肠正要转身背向儿子，可是只有两岁多的孩子哪

能懂得这是敌人设下的圈套！一见到日夜想念的爸爸，他便大声哭喊，向铁窗扑来：“爸爸！爸爸！”看守班长见李耘生的身分已经证明，便恶狠狠地把小宁带走了。

敌人的监狱、刑讯庭，对每一个被捕的共产党员都是严峻的考验场。在一次审讯中，一个满脸横肉的法官说：“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生路，一条死路……。”叛徒路大奎也在一旁帮腔说：“只要你愿意转变，我担保你有出路。”李耘生轻蔑地一笑，没有理睬。那个法官将桌子一拍，声嘶力竭地嚎叫着：“我只要你说‘愿意转变’四个字！”李耘生晃了晃手臂，怒斥道：“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奋战求解放，这是我奋斗的目标。需要转变的是你，以及你们这一帮为蒋介石卖命，与人民为敌的家伙！”^①李耘生义正词严的回答，气得敌人暴跳如雷，对他施行了严刑拷打。但是，他们仍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在狱中，李耘生不顾自己受刑后的伤痛，总是关心身旁的战友，经常鼓励他们要坚定斗争信念，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有一位政治犯判了五年徒刑，即将押解国民党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李耘生亲切地鼓励他，要他制订五年的读书计划^②。

看守所里阴暗又潮湿，一间小屋挤着十几个人，墙上只有一个碗口大的透气洞，闷得令人窒息。狱中的伙食很坏，一日两餐的霉米饭里还掺着泥沙石子，一碗少盐寡油的汤里仅仅飘着几片菜叶。难友们经常吃不饱，连开水也不够喝。有的看守稍不如意，就随便打骂犯人。为抗议敌人的虐待，李耘生发动了绝食斗争。他代表难友们与敌人谈判，提出了“三不许”条

^①贺逸峰供词，原件存南京市档案馆。

^②杨光政：《人狱记》。

件：一、不许烧霉米烂菜给大家吃；二、不许克扣“囚粮”；三、不许打骂虐待“犯人”。两天过去了，敌人怕出问题，只得答应李耘生提出的条件，当即送来了白米稀饭和新鲜的小菜，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端午节前夕，敌人又将李耘生提出牢房审讯，说是给他最后一次考虑的机会。李耘生怒视着敌人，坚毅地回答：“枪毙就枪毙，我没有什么考虑的。”说完，昂首转身回到牢房，弄得敌人瞠目结舌，无可奈何。

敌人对李耘生无计可施，终于对他下了毒手。

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凌晨，监狱的高墙外，突然传来汽车的刹车声，狱门“框唧唧”一声打开了。李耘生明白，敌人的大屠杀又来了！当看守所长喊到“李——涤——尘”的名字时，他整了整衣服，然后转身将铺旁的书籍一本一本地叠齐，深情地对难友们说：“没有什么珍贵的礼物，这些东西留给你们作个纪念吧！”难友们含着泪水，挤在牢门铁栅栏前，目送着李耘生离去。

在刑场上，李耘生大义凛然，同敌人进行了最后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执法官假惺惺地问：“有什么遗囑？要不要写家信？”他厉声回答：“我的遗囑就是盼亲人们与你们斗到底！”执法官恼羞成怒，连声吼叫：“开枪！开枪！”

子弹射进了李耘生的胸膛。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共产党员，以坚定的步伐，走到了生命的光辉顶点。

郑位三

刘光明

(一)

郑位三，学名植槐，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农历九月二十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檀树乡马鞍山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中。父亲郑维翰原在黄安七里坪镇开中药店，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革命，曾任过黄安县紫云区第六乡苏维埃主席，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三年一月病逝。他有四男一女，郑位三是长子。

郑位三七岁时从郑锡云读书。郑锡云经常抨击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介绍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郑位三很受启迪。

一九一八年夏，郑位三挑着行李到离黄安有三百多里远的武昌，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金工科。他读书用功，成绩很好，生活艰苦朴素，给人的印象是“不为时俗所染，不为富贵所移，精数学，寡言语”^①。

一九一九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浪潮波及武汉后，郑位三积极地投入这一爱国运动的行列。他同其他学生一起，上街演讲、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热

^①刘崇慎：《郑位三同学记》（1950年2月10日）。

情。

五四运动后，郑位三通过同乡、利群书社成员郑南宣的介绍，与书社发生了联系，因而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书刊。从此，他的思想起了重大变化，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太落后，不改造不行”^①。

郑位三在武昌读书期间，还认识了肖楚女。在肖楚女的热心帮助下，他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一九二二年夏天，他在湖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又挑着行李从武昌步行回到老家黄安，开始了他战斗生涯。

郑位三回黄安不久，就到离家两里多路的程门畈（现为檀树乡熊家嘴村）一个祠堂里教书。晚上，他同村子里的程绍续、程维荣、程楚光等几个失学失业的进步知识青年，到农民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斗争。

一九二三年冬，党的黄安工作组成立后，郑位三、程绍续等进步青年很快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不买洋货，不穿洋布，不吸洋烟，反对赌博和封建迷信，提倡剪发、放足，等等。还在青年中建立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小组和青年夜校，进行宣传活动。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黄安后，郑位三根据党的指示，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写标语，印传单，作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党的黄安工作组根据郑位三在斗争中的表现和他的请求，在一九二五年冬，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派遣他和吴焕先等共产党员到七里坪一带开展农民运动。

^①访问郑南宣谈话记录（1980年5月20日）。

郑位三深入到七里坪及其附近的农民之中，通过开办夜校，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吴先恩后来回忆说：“郑位三同志经常利用晚上在农民中进行工作。有一天，他工作到深夜，吴焕先同志派我送他回家。一路上，他耐心地向我宣传革命的主张。他从问我家庭生活状况入手，进而谈到地主的残酷剥削，最后讲到要组织起来才能推翻地主剥削制度的道理。他说：现在全国都在闹革命，只要我们穷人团结起来，就可以把土豪劣绅打倒。”^①

经过郑位三、吴焕先等人的深入宣传发动，七里坪一带的农民群众很快地组织起来了。一九二六年八月，刘家园建立了七里坪区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接着，其它各区的农民协会也相继建立起来了。

一九二六年冬，有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和黄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建立，郑位三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从此，他参加了黄安县的领导工作。

一九二七年二月下旬，正式成立了黄安县农民协会，郑位三当选为县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他根据县农民协会的统一部署，同吴焕先一起，再次深入到七里坪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共黄安县委成立，郑位三被选为县委委员。不久，他又被推选为国共合作的黄安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委员，参与审理、判决了李介仁、阮纯青等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地主，打击了农村的封建势力。

^①访问吴先恩谈话记录（1980年7月5日）。

农民运动的兴起，对豪绅地主的惩办，使整个农村出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好革命形势，大大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斗志。一些农民见到农会干部就竖起大拇指称赞道：“共产党是真正领导穷人革命的！”“现在揭了盖子，革命要革到底。”^①

(二)

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黄安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清剿”，到处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郑位三也是被通缉的一个。面对白色恐怖，中共黄安县委中一部分动摇分子先后脱离革命。郑位三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改选了县委，并代理县委书记。他同戴季伦、陈定侯、曹学楷、吴焕先、戴克敏等共产党员一起，“继续领导各区的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②。

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郑位三根据黄安县委的决定，同陈定侯等人一道去武汉，“找党的机关取得联系，接受指示。”^③他在汉口法租界协和里五号，见到了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并向他详细地汇报了黄安县的斗争情况。罗亦农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发动农民进行秋收暴动的决定。在谈话过程中，罗亦农还拿出“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和中央临时政治局通告及一份鄂南秋收暴动计划给郑位三等看，要他们“立刻返回黄

①②郑位三：《红色的黄安》，载《星火燎原》第1卷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③郑位三：《黄安初期革命斗争情况》（1960年3月22日）。

安，参照鄂南的计划，组织暴动。”^①

郑位三等听了罗亦农的谈话，明确了前进的方向，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当时虽然正值中秋佳节，但他们“已没有心思过节”^②，不顾疲劳，日夜兼程，迅速回到了黄安。

郑位三回到黄安后，立即在七里坪文昌宫主持召集留在黄安坚持斗争的县委委员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吴先筹等人开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拟定的武装暴动计划。大家听了深受鼓舞，高兴地说：“我们找到出路了！”

“我们有奔头了！”^③在热烈的气氛中，大家对党中央的决议精神进行了认真地讨论，制定了中共黄安县委的暴动计划，并组织了新的县委，郑位三任县委书记，吴焕先任组织部部长。

在县委的领导下，从九月下旬到十月间，黄安各区先后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八七”会议精神，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号召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举行武装起义。广大贫苦农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纷纷拿起大刀、长矛，扛起锄头、扁担，架起土枪、土炮，到处搜捕土豪劣绅，掀起了著名的黄安（农历）“九月暴动”。暴动农友没收地主财产，打击反动势力，仅七里、紫云两区，在三、四天内便打死几十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当时，县委其他同志都分别到各区去发动群众，郑位三留在县城主持县委日常工作。县城敌人活动比较猖狂，郑位三又没有自卫武装，有些同志劝他早点转移。他说：“职务在身，不能离开。”^④

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在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的疯狂进

①②③郑位三：《红色的黄安》。

④郑位三：《黄安初期革命斗争情况》（1960年3月22日）。

攻下，“九月暴动”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为了继续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县委又决定派郑位三和戴季英等再到武汉向省委“请示工作”^①。郑位三因身体不好，加上二十多天的旅途奔波，刚到武汉就病倒了，由戴季英一人向湖北省委汇报了情况。省委根据戴季英的汇报，决定组建鄂东特委，统一领导黄安、麻城地区的革命斗争，并派王志仁任黄安县委书记。郑位三因病卧床四十多天，未能参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黄麻起义，但他在病中仍然很关心这次斗争。

郑位三病愈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武汉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他在武汉地下党的掩护下，隐蔽在武昌流芳岭一个老中医舒少轩的药铺里。不久，通过舒少轩的介绍，他又被转移到江西省九江市一个药店里当店员。一九二八年夏，郑位三打听到参加黄麻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已返回黄麻老区开展游击战争，便于同年七月经过长途跋涉，从九江回到了黄安柴山保。从此，他与吴焕先、戴克敏、吴光浩、吴先筹、王秀松、戴季英等在柴山保地区，为创建工农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七月下旬，工农革命军和黄麻地方党的领导人在柴山保的尹家嘴开会，决定将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郑位三被推选为军政治部秘书长。尹家嘴会议还决定恢复党的黄安、麻城等县委和区委，以改变军队和地方党组织不分现象，郑位三兼任黄安县委委员和县委秘书长。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同年十月重建了鄂东特委，郑位三担任鄂东特委宣传委员会的委员。这一时期，他的

^①郑位三：《红色的黄安》。

主要任务是搞政治宣传，日常工作是“规定宣传口号标语，撰写宣言，印刷并分发宣传品”^①。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刻印标语、传单的事常由他一人承担，印好后再交给群众到处散发张贴。那时，“在黄安，我们的传单标语是贴满了各乡村的墙壁”^②。他还发动部队战士，“经常三、五人组成一组，分散在鄂豫要道的凉亭、茶棚等歇脚处，向赶集的农民和行商、摊贩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工农革命军是穷人的军队。”^③郑位三特别重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根据鄂东特委的意见，对一些比较开明的上层分子争取他的中立，对于同情革命的分子则争取他们支持；对红枪会，则派人打入其内部，争取一般成员。经过艰苦的工作，上层分子逐渐分化，红枪会成了有利于革命的武装，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一九二九年春，鄂东特委举办了党务干部学校，抽调县委以下干部进行训练，每期二十余天。郑位三担任训练班的教育主任，多次向学员讲课，结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实际，生动具体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受到学员们的欢迎。

郑位三对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非常关心，而且提出了很好的具体办法。他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和十二月先后起草了《鄂东北地区特委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和《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等解决土地问题的文件，对党在土地革命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作了正确的说明。他还针对当时出现的侵犯中间阶级和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提出了许多符合当时

①② 《鄂东特委何玉林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5月7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③ 王树声：《从木兰山到柴山保》，《星火燎原》第1卷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客观实际的具体政策。如，规定中小商人得享其资本企业，有营业自由权；凡豪绅反动派的家属，经当地革命团体证明无反动嫌疑者，也可以分配土地；没收分配土地时不得侵犯自耕农利益，等等。它“是土地革命前期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中比较早的区域性的土地法令”^①。

郑位三还特别关心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作为黄安县委书记的郑位三，为了贯彻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作出的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定，主持召开了黄安县七里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七里区苏维埃。接着，黄安各区、乡的苏维埃纷纷建立。在此基础上，一九三〇年春，正式成立了黄安县苏维埃政府。

为了统一党对鄂豫皖边区的领导，一九三〇年三月成立了鄂豫皖特委。同年秋天，在特委领导下成立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至此，鄂豫皖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完全统一起来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从这时起直到一九三二年十月，郑位三先后担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等重要领导职务。他在苏维埃政府内主要分管财政经济工作，为红军解决给养问题。为此，他狠抓了农业生产，并组织苏维埃政府机关和部队的工作人员投入生产，帮助农民抢种抢收。此外，他还发动群众因陋就简办起了兵工厂、红军缝纫厂和被服厂等军用工厂，不少地方还建立了盐厂、染坊、五金制造厂、造纸厂、铁工厂等。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投机商人的破坏活动，郑位

^①谭克绳等：《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三通过各县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商业合作社，负责组织物资交流，开展商业贸易，还用免税、贷款、武装护送等方法，鼓励小商小贩通过各种渠道，从白区输入食盐、布匹和军用品，解决苏区军民的物资困难。

(三)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国民党军队在尾追红四方面军的同时，还在鄂豫皖地区留兵二十多万，加上数十万民团、保安队等反动武装，继续向苏区实行“清剿”。他们到处屠杀干部、党员和群众，并逼迫群众插白旗“反水”（敌人逼迫群众用白布做成旗子，插在门上，以示“归顺”，称为“反水”）。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各地党政组织、游击队、赤卫军受到严重摧残，苏区处在一片混乱之中。郑位三这时留在苏区，任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并接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兼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领导鄂东北人民配合吴焕先等领导的红军，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争。

鉴于苏区当时的混乱情况，郑位三和苏区党的负责人沈泽民等，首先抓了安定群众情绪的工作。他说：“我们苏维埃负责人，是群众的领导者，领导越得力，群众越是多得利益。”^①苏区党组织要求各级干部领导群众，配合红军打击敌人。

为了迅速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正规红军作为坚持斗争的骨干，鄂豫皖省委决定将红四方面军留下的五个红军主力团和部分地方武装，统一组织起来，重建红二十五军。郑位三为重建

^①郑位三：《在鄂豫皖省苏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33年3月29日），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红二十五军在群众中广泛地开展扩军活动。他说：目前我们“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扩大武装，尤其主要的是扩大主力。”^①在省委和郑位三积极努力下，红二十五军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组成，全军共七千余人。这就结束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根据地斗争力量分散的局面。

郑位三还强调建立地方武装，他说：“不仅扩大主力，而且还要扩大游击武装，……因为红军多是从游击队锻炼出来的，要扩大主力，同样要扩大游击武装”^②；“我们只要有了群众，有了武装，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③因此，他以鄂东北游击总司令的身分，除了领导各区、乡普遍建立游击队、游击小组外，还以各县的独立团、战斗营和以各级党政机关人员组成的警卫部队为基础，扩编为六个游击师（有的称独立师），总计五千余人。

作好边沿地区和白区的群众工作，特别是作好这些地区“反水”农民的工作，对于巩固和发展苏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开始，有些同志受“左”的思想影响，对“反水”农民抓到就杀。结果造成赤白区群众的严重对立，苏区越来越小，部队和地方干部几乎搞得无处立足。针对这种情况，郑位三及时提出了纠正的办法。他说：要相信白区和边沿地区的群众绝大部分是好的，“群众只要有人好好的领导是不会插白旗的，因为谁也不愿意放弃土地革命利益。”^④因此，他提出不准毁坏白区和边沿地区群众的房屋，严禁打骂和杀害“反水”农民，对

①②④郑位三：《在鄂豫皖省苏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③转引自程子华、郭述申等：《德高望重的位三同志》，1984年6月25日《湖北日报》。

过去在敌人欺骗下做了错事的农民，只要改正错误，为革命出力，可以既往不咎。他还要求各级党组织编写传单、布告，到白区去散发、张贴，宣传反“清剿”的斗争形势和党的正确政策，号召白区群众暗地给红军送物资和情报，“使他们了解，只有斗争，搞起武装来才是办法。”^①各级党和苏维埃组织按照道委和郑位三提出的要求，经过一段工作，很快安定了民心，赤白区群众对立的情绪有了很大的缓和，群众的革命热情逐步高涨起来，白区许多群众都说：“别看我们插了白旗，我们的心是红的。”^②

在郑位三和鄂东北道委其他同志的积极努力下，不到半年的时间，苏区的混乱局面有了明显的改变，鄂东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各县党的组织也恢复起来了。红二十五军主力到一九三三年四月已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在苏区革命形势刚有好转的时候，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向鄂豫皖省委提出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要求。按照这一要求，省委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初作出了夺取黄安七里坪镇的决定。

当时进剿鄂豫皖苏区的敌人超过红军十倍以上，红军根本不可能夺取敌人设有重防的中心城镇。郑位三“认为红军没有攻打七里坪的条件，如不能迅速打下来，造成久攻不下的局面，鄂东北根据地无力支援红军作战。而且当时根据地内有红四方面军留下的大批伤员、病号，治疗、生活供应都很困难，再进行

^①郑位三：《在鄂豫皖省苏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②程子华、郭述申等：《德高望重的位三同志》。

大战，如再有大量伤员，更无法抢救治疗，所以他积极反对进行这次战役。但省委没有采纳位三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仍然决定攻打七里坪。”^①

七里坪战役于五月二日开始，在打了四十三天后，我军损失大半，鄂豫皖省委被迫决定撤出战斗。这一战役后，敌人进行了更加疯狂的反扑，使苏区面临着更大的困难。红二十五军和鄂东北游击队所剩人员转移到黄安、光山和罗山交界的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为了适应大山区的特点和敌人疯狂进攻的严重形势，省委决定部队分散活动。此后，随同郑位三一起行动的只有鄂东北道委秘书长程坦和秘书科长刘华清及一些交通警卫人员，最少时还不到二十人，斗争是极为艰苦的。这时，郑位三又染了疥疮，经常感染化脓，痛痒难熬。但他仍然和同志们一起参加战斗，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还经常向战士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说：“多年斗争事实证明：敌人是不可能消灭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大别山的革命烈火是扑灭不了的，即使剩下几个人，我们还要战斗下去，坚持到最后胜利。”^②

为了加强对各路游击队的领导，郑位三经常到各县、区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当他发现一些区、乡干部三五人一队，携带短枪、匕首，袭扰敌人，串连群众，有效地保存了自己的情况后，便及时地总结经验，提出建立便衣队的主张。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便衣队是一种最有效的游击武装。他们熟悉本地情况，行动灵活、秘密，敌人很难对付。为了便衣队更快地在各

^①刘华清：《忆鄂东北地区两年游击战争》，《星火燎原》1982年第1期。

^②访问刘华清谈话记录（1980年8月7日）。

地发展，郑位三在罗山卡房多次举办便衣队训练班，轮训各乡便衣队负责人。他在讲课时说：“便衣队的任务是作好群众工作，向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宣传红军一定要回来的革命形势，秘密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同时，还要侦察敌情、袭击敌人、筹集粮食物资和安置伤病员等工作。”^①他还给便衣队规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的四位一体的活动方针，要求便衣队严格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做好保甲长的分化工作，争取他们中的一些人为红军和游击队服务。

便衣队的活动，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也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在一年多的艰苦斗争中，便衣队培养了一批熟悉游击战争本领的干部，锻炼了大批与红军有血肉联系的群众，供给了红军和游击队的武器弹药，打开了白区工作的门路，创造了便衣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鄂豫皖省委在评价便衣队这一斗争形式时曾指出：“现在最有发展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队运动。”^②

经过红二十五军和鄂东北游击队的艰苦斗争，在天台山和西高山地区恢复和发展了两块根据地，形势又慢慢地好转起来了。

（四）

一九三四年九月，程子华受党中央的委派，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他在罗山县卡房向郑位三传达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①老红军黄宏儒 1965 年 5 月的一次谈话记录。

^②程子华、郭述申等：《德高望重的位三同志》。

的指示，要红二十五军作战略转移，去创建新的根据地。郑位三为了尽快地实现中央这一战略决策，当即写信给活动在皖西的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说明这一情况。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鄂豫皖省委于十一月十一日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红二十五军向鄂豫陕转移的决定，并对红二十五军领导进行了调整，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郑位三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和鄂豫皖省委常委。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发表《出发宣言》，指出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全国同胞要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当天，全军二千九百多人，由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始西征。十二月九日，部队到达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第二天，省委在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建立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并决定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

郑位三在随军西征中，主要抓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经常拄着一根木棍，跟连队一起行军。部队每到一地住下，他就跟战士挤在一起，亲热地拉家常，有时还给战士讲几句风趣、幽默的故事。由于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基层干部、战士都愿意同他接近。这就使他能及时地掌握部队的思想情绪，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西征路上，郑位三非常重视做好对豫陕边地方民团武装的分化、争取工作。当时，河南中西部地区有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土围子。我军经过这些地方不时遭到他们的骚扰和阻拦。为了迅速摆脱险境，争取时间通过这些土围子，郑位三积极向省委提出开展政治攻势的建议。他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给寨主

写信，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沿途勿加阻拦。他还编了一些通俗的顺口溜，让宣传队一路喊唱：“老乡老乡，不要惊慌。大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拦挡。”^①经过宣传，许多围寨不仅没有阻拦我军通过，而且还在村口摆上茶水、香烟和食品，欢迎红军，使我军赢得了时间，顺利地摆脱了敌军的追堵。

郑位三对群众工作也十分重视。部队每到一地，他都找来当地老百姓和乡绅、教书先生、小商小贩等，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情况。为了稳定群众情绪，解除他们对红军的疑虑，郑位三总是在部队到达之前，先行作好宣传工作。庾家河省委会议召开的当天，他就起草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说明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和红军执行的政策等问题。这份油印传单“在红二十五军开创鄂豫陕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它“是位三同志留在鄂豫陕边区的一份珍贵的杰作”^②。

红二十五军到陕南后，郑位三除了管部队的政治工作外，还具体负责打土豪、筹款等工作。在他的建议下，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首长在组织主力红军反对敌军的同时，还派出了一部分干部和红军，分别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根据陕南的政治、经济特点，郑位三提出我党的主要任务是：首先应领导穷苦农民进行抗捐、抗税和反对抽丁拉夫的斗争，解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当时派到地方工作的部

^{①②}转引自程子华、郭述申等，《德高望重的位三同志》。

队干部、战士，按照郑位三的意见，深入发动群众，组织抗捐军，开展抗捐、抗粮、抗税的斗争，逐步建立了游击队和革命政权，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成立了鄂陕游击司令部（下辖六个游击师）和豫陕游击司令部（下辖四个游击大队），还有华阳地区两个游击队。游击队员达到三千七百多人；同时还建立了鄂陕、豫陕两个党的特委和五个县的工委，有了数十个乡的革命政权和两个县级政权。郑位三先兼豫陕特委书记，不久改兼鄂陕特委书记。

红二十五军在陕南接连打破了国民党军的两次重兵“围剿”，主力逼进西安城郊。这时，获悉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四川西部会师，并将继续北上的消息。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的率领下，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由长安县洋峪口西进，留下一个连的主力部队和一些负伤的干部、战士共六百余人，在郑位三、陈先瑞等的领导下，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当时的形势是很严重的，留下的红军和地方武装不仅人数少，而且分散在各地，彼此没有什么联系；鄂陕和豫陕两个党的特委也是平行关系，没有统一领导。为了把各路武装力量集中起来，建立统一的指挥系统，在郑位三的提议下，两个党的特委负责人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九日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鄂陕和豫陕两个特委合并，组建陕南特委，选举郑位三为陕南特委书记。会议还决定将留下的主力部队和各路游击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由陈先瑞任师长，原豫陕特委书记李隆贵任政治委员。根据当时敌军围攻的形势，郑位三和特委决定，我军行动方针应该采取同敌人“兜大圈子”的办法，在西起江口，东到卢氏，南抵汉水，北至终南山以北这个东西四五

百里，南北一二百里的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主要打击地方反动民团和保安队，消灭小股敌人，避免同敌军主力作战。陕南特委的建立和七十四师的组成以及我军行动方针的确定，统一了陕南地区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为开辟陕南苏区，粉碎敌人的进攻，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此时，国民党集中了二十几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妄图消灭我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武装。红七十四师根据陕南特委确定的活动方针，在郑位三、陈先瑞的率领下，运用灵活多变的斗争策略，先后粉碎了敌军三次大的围攻，给了敌军以沉重的打击。毛泽东后来对红七十四师的干部说：“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听到你们的消息的。中央红军西征出动，你们就在南面闹华山，配合得好啊！”^①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因而对陕南苏区的进攻也较以前缓和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周恩来派李涛到陕南向特委和红七十四师传达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并将红七十四师编为南路第二军，同时组成军政委员会，郑位三为主席，李涛为副主席。一九三七年一月，南路第二军同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在商县汇合。从此，红七十四师成了党中央直接指挥的一支革命武装，准备投入即将到来的伟大抗日战争。

（五）

一九三七年四月，党中央通知郑位三到延安开会。抗日战

^①转引自程子华、郭述申等：《德高望重的位三同志》。

争爆发后，他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派，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从延安到大别山区，负责组织鄂豫皖地区人民的抗战。出发前，毛泽东接见了他并作了重要指示，要求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自红二十五军西征以后，一直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是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郑位三到鄂豫皖后，针对红军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反复宣传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耐心地向他们讲解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红二十八军于一九三七年底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并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开赴皖中、皖东参加抗战。

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赴抗战前线后，郑位三和随同他从延安到鄂豫皖的数十名干部，把留下的几十名伤病员组织起来，成立了新四军第四支队驻七里坪留守处，还以留下的一支二十八条枪的正规武装为骨干，建立了一个警卫排。经中共长江局的批准，成立了七里坪地区党的工作委员会，郑位三任书记。一九三八年六月，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成立了鄂东特委，当时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的郑位三兼任特委书记。鄂东特委领导人民群众，发展革命武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成立了以郑位三为书记的鄂豫皖区党委。区党委根据刘少奇和中原局关于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决定，积极领导人民抗战，成立了独立游击第五和第六两个大队。到一九三九年上半年，第五大队发展到十一个中队、一千余人，第六大队也有三个中队、三百多人。七月，根据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放在敌人后方，向皖东、江苏地区发展的指示，郑位三同鄂豫皖区党委其他主要负

贵同志一起到皖中庐江县东汤池，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以新四军政治教导队的名义联合对外办公。年底，郑位三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委员。

皖南事变后，郑位三又兼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他同师长张云逸在一起，领导二师部队在淮南定远、嘉山、盱眙、来安、六合等县开展敌后抗日战争，为创建以皖北、苏北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针对皖南事变后广大指战员出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义愤，一度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不力的现实思想，抓紧部队的思想工作，耐心地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斗争策略，帮助大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一九四三年九月，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派郑位三作为华中局的代表，到李先念等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战斗的鄂豫边区，参加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工作。

郑位三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到达鄂豫边区后，根据华中局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提出的“今后五师与鄂豫边区党委的任务，是整训部队，加强与发展抗日武装，严格建立各种组织与制度，巩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切实进行群众工作，改造政权机构，广泛地进行友军工作，并设法以适当名义向长江以南敌后地区发展，及沿长江而下，与七师联系。”^①的指示，结合鄂豫边区的实际，提出了巩固边区，建立坚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他说：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前一时期，把重心放在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发展方面是对的，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现在应该根据斗争形势，把工作重心放在组织群众，

^①转引自《战斗在鄂豫边区》第1辑第1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训练部队的巩固方面，边区党委在反攻前的方针应“以巩固为主”^①，建立强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强调：“我们任何同志都要有根据地思想，我们部队好比是鱼，根据地好比是水，鱼脱离水是难得生存的，部队脱离了根据地也是无法长期存在的。”^②他在为边区党委办的《党的生活》专刊的题词中说：

“边区党委数年来完成了伟大的发展工作，现在正要进行更伟大的巩固工作。”^③

为了更好地贯彻“以巩固为主”的指导方针，郑位三强调要狠抓组织人民大多数的的工作。他说：“巩固工作当前的中心是首先把人民大多数组织起来”^④，“群众好比母亲，小孩没有母亲就没有奶吃，我们党没有群众，就不能生存。”^⑤

鄂豫边区党委还根据郑位三的提议，作出了《关于巩固方针下的交朋友工作的决定》，要求五师部队积极开展对友军的统战工作，尽量争取边区周围所有的国民党军队，不论是正规军或地方军，不论是中间的或顽固的，都能与我们和平相处，以造成我们在将来总反攻阶段中更多的有利条件。为此，郑位三提出同国民党军队要“减少战斗频繁”，一切不是敌、顽、我生死必争的重要地区，不妨暂时放松一些，在一段时间内同顽军作战的决定权要集中于高级领导机关。

由于指导方针正确，工作细致扎实，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边区参加农救会的会员已达到了一百二十五万多人。这年

①④转引自《鄂豫边区党委关于组织人民大多数的指示信》（1944年2月17日）。

②转引自边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为巩固根据地争取时间整训部队动员提纲》（1944年2月26日。）

③《党的生活》（整风专刊）第23期（1943年12月）。

⑤访问简文谈话记录（1981年5月10日）。

十一月二十一日召开边区第一次农教代表大会，郑位三在会上作了《迎接天光》的政治报告，号召边区军民作好反攻的战斗准备，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郑位三还和边区党委其他同志一起，狠抓了边区的各项建设工作，如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整顿训练部队，进行减租减息，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领导党的整风，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等等。这些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他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领导边区整风运动时，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审查干部历史阶段，由于康生等人搞的“抢救运动”的干扰，有些地方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郑位三则主张“要从实际出发，干部中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没有特务、反革命就不能把好人当特务、反革命抓。”^①因此，区党委对每个干部经过审查都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政治结论，大大增强了党的团结。

由于郑位三和鄂豫边区党委领导同志一起狠抓了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使鄂豫边区在巩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八月，边区包括有湖北大部和豫、皖、湘、赣的各一部，解放了人口一千三百余万。我军活动的地区有五十多个县，建立了七个专区和三十九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新四军第五师正规部队发展到近五万人，民兵达到三十多万。

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郑位三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①转引自《访问任质斌同志谈话记录》（1980年8月7日）。

(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纠集二十多个师和九个游击纵队的反动武装，从四面八方向我中原解放区扑来，妄图歼灭我中原新四军第五师部队，以扫除其抢占华东、华北和东北的障碍。

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郑位三、李先念和鄂豫边区党委遵照党中央关于“对付将来内战危险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①的指示，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人民，积极地进行反内战的准备工作。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郑位三代理中原局书记（书记徐向前未到职）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李先念为中原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辖三个军分区和两个野战纵队，组成了有六万余人的中原解放军。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后，蒋介石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原地区的包围。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至四月三十日，国民党军对我中原部队进攻达一千一百七十余次，占我村镇一千零七十二处。蒋介石还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底作出决定，要在五月四日至九日向我发起总攻，妄图一举歼灭中原解放军。由于郑位三、李先念等在获此确切情报后立即以中原军区名义发表严正声明，坚决予以揭露和谴责；加上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美方代表赴宣化店查处，才使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但蒋介石

^①转引自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胜利的中原突围》（1981年6月28日《人民日报》）。

并未放弃歼灭我军的企图。从五月十三日到六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又向我中原部队进攻一百二十余次，向我进攻的兵力达三十余万，在我边区周围构筑的碉堡达六千余座，将我中原军区及所属三个军分区割成“品”字形，把我野战纵队包围在方圆仅二百余里的狭小地区，大搞军事蚕食和经济封锁。

根据这一严重形势，郑位三和中原军区领导同志一方面向党中央作准备突围的请示，一方面积极作好伤病员和干部家属的安置、转移工作。六月二十一日，中原局在关于突围问题给党中央的请示电中说：“国民党军队对我边区军事上的包围、封锁，最近已愈益加强”。“因此，我们提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计划。”^①党中央在复电中说：

“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②

郑位三和中原局党委接到中央复电后，立即抓紧突围的准备。他们首先利用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同国民党签订的《汉口协议》的规定，争取合法地转移了一千多名伤病员和干部家属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使坚持斗争和最后突围的部队更加精悍。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拂晓，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分四路向中原军区机关所在地——宣化店围攻，妄图在四十八小时内，将我六万余人的中原部队“一举包围歼灭”^③。

为了粉碎敌人全歼我军的阴谋，党中央在六月二十五日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中，要求中原部队“巧妙避开敌

①②《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3、281页。

③1946年7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

之打击，分途突出包围圈。如遇严重不利情况，则以旅为单位分散前进。留下部队至少万人，坚持原有地区。”^① 郑位三、李先念等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指挥中原部队于六月二十六日晚分数路举行突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等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十三旅、十五旅四十五团，为北路的一支；王震等率三五九旅和干部旅，为北路的另一支；王树声等率第一纵队第二、第三旅，第二纵队第十五旅（缺四十五团）为南路；皮定钧率第一纵队第一旅为东路；张体学率鄂东军区部队一万多人原地坚持斗争，牵制敌人。

郑位三随北路部队，经过辗转战斗，于七月底突进到陕南地区；其他部队也按计划突出重围，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

中原部队突围战役的胜利，在整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起了重要的战略作用。毛泽东在七月十三日给郑位三等的电报中说：“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②

郑位三由于身体不好，突围前夕中央曾打电报给中原局，要他先离开部队到延安去。但郑位三不顾个人危安，坚持要随大部队一路行动。他说：“我是主要领导人之一，不能离开部队。”^③ 在整个突围战役中，他始终同广大指战员一起，参加并指挥部队的战斗。

中原突围到陕南后，郑位三、李先念等遵照中央指示，于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间，由地下党护送先后到了延安。毛泽

①②《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82、283页。

③访问蒲云谈话记录（1980年7月24日）。

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都亲自到郑位三、李先念的住处看望他们，祝贺他们在领导中原突围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

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中原。突围到陕南的中原主力部队于一九四七年二、三月间，奉命北渡黄河到山西晋城休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等中原局领导人也于一九四七年二月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先后在同年五、六月间到达晋城与中原主力部队会合。

在晋城，郑位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原中原局高级干部的整风会议。他在代表中原局作的《关于中原总结问题与整党问题》的报告中，全面地总结了中原地区的斗争。刘少奇在给大会的指示信中充分肯定了郑位三、李先念的工作，指出：郑位三、李先念的工作“一直是大有成绩的，他们的作风一贯是正派的，一般（服从党）来说，郑、李在中原是比较地最能代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①

晋城会议后，郑位三因身体不好，未能跟随部队行动。一九四八年秋，山东解放，郑位三由晋城到山东养病。一九四九年九月，郑位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十六个代表之一，到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于十月一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七）

全国解放后，郑位三因身体关系，没有负责具体工作。但

^①刘少奇给郑位三、李先念、戴季英、陈少敏、刘子久的信（1947年12月26日）。

他在养病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非常关心。他在一九五〇年九月写的一首诗中说：“胜利勿忘烈士功，请将遗志记心中，终极目标共产制，大家努力莫放松。”充分表达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

此后，郑位三曾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一直带病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在给刘少奇等人的信中讲：“我的兴趣第一在研究工作，第二在干部教育工作”^①。所以，他从一九五〇年开始，就着手对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他表示：

“学习意志坚，埋头拟十年，病身都不顾，荣誉放旁边。”^②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间，他曾就农业问题、经济建设规律问题、发展科学教育事业问题和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写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和文章。他的观点，有些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采纳，有些则被某些人视为右倾。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孜孜以求，为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不断努力。

郑位三为了掌握经济建设工作的规律，刻苦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他说：“不精通马列主义就不能系统的了解政策，不精通马列主义就不能系统的制定政策。”^③由于对经济建设工作的比较深入，因而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他早在五十年代末就主张经济建设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反对脱离实际的“左”倾冒进。他对一九五八年那种夸大主观意志和主

①郑位三 1953 年 8 月 29 日给刘少奇、饶漱石的信。

②郑位三 1950 年 10 月 6 日写的日记。

③郑位三 1950 年 11 月 3 日写的日记。

观努力的作用而轻率地发动的所谓“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坚决反对的。他说：“万人以上的大公社以及农村食堂一开始我就不赞成”，“我不赞成报上登的亩产万斤的说法。”^① 郑位三还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实行经济核算，他说：“为了计划法则和计划，客观上这就严重需要精确计算价值、价格，用新精神来处理价值、价格。”^② 他还特别强调要执行按劳取酬的原则，他说：“按劳取酬（劳与酬都要计算）”，“没有货币工资制就没有群众的计算价值的实践”^③。郑位三还主张发展集市贸易。他在回答别人问到集市贸易的作用问题时说：集市贸易是“商品生产、零散性、地区性等特点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都需要，它对国营还有补充作用。”集市贸易“价格波动是不得已的，但不可怕，农民无怨，国家可以调节。”^④ 郑位三这些意见是符合我国客观经济规律的，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郑位三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病逝。他逝世后，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亲自主持追悼会，李先念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悼词中说：郑位三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十年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⑤

①郑位三1971年7月21日写的《思想汇报》。

②③郑位三：《价值法则影响生产》（1958年8月27日）。

④郑位三1961年的一次谈话。

⑤1975年8月5日《人民日报》。

附 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有：

1. 湖北省档案馆、博物馆、红安县革命博物馆保存的有关资料。
2. 郑位三写的论文、报告、读书笔记、日记和谈话记录等约一百多万字。
3. 访问程子华、郭述申、张劲夫、刘华清、肖望东、刘顺元、陈先瑞、任质斌、顾大椿、陈祥、张执一等五十多位老同志的谈话记录。
4. 红安县革命斗争史、红四方面军战史、红二十五军战史、新四军第五师战史和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关资料、回忆文章。

冯 达 飞

冯 荃 川

冯达飞，我军优秀的军事教育工作者，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字洵，又名文孝、国琛，广东连县人，一八九九年七月生于连县东陂镇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冯洪晖，在冯达飞出生前几个月病逝，一家生计全靠母亲做点小买卖维持，生计艰辛。

冯达飞九岁入私塾，后入芝兰小学和文望高级小学学习。一九一四年小学毕业后，得亲友资助，入县立中学。在中学期间，他阅读了不少中外名人传记，思想上受到很大的激励，学习更加用功，立志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

一九一九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连县。冯达飞与县立中学的爱国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组织社团，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号召群众起来抵制日货。这次运动锻炼了冯达飞。

这年九月，冯达飞在中学毕业。他目睹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宰割，军阀连年混战，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痛感非用武力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不可。乃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恰好，广东陆军测绘学校在连县招生，冯达飞立即报名应试，以优异成绩入校学习。一九二一年秋，冯达飞在广东陆军测绘学校毕业后，转入粤军第一师在肇庆举办的西江讲武堂学习。翌年毕业，任粤军中尉军官。

一九二四年五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冯达飞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辞去军职，考入黄埔军校，编在学生第四队。他在黄埔军校期间，孜孜不倦地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开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的教育帮助下，这年冬天，冯达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在这期间，他还认真学习了许多军事理论以及战术、兵器、地形和交通通讯等课程。受到了正规的军事训练。这些为他后来在我军校担任教员和领导工作，以及指挥作战打下了基础。

一九二四年底，冯达飞在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在教导团工作。一九二五年二月，冯达飞参加了黄埔军校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积极开展活动。随后，冯达飞随同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不怕牺牲。

三月，广东革命政府在苏联帮助下成立航空局，并在广州大沙头办了飞行学校，由李维（苏联人）任校长。冯达飞从东征前线调回，入飞行学校学习。他为了早日掌握飞行技术，认真听课，苦练飞行技术。这时，他母亲病危，家里来信要他回家，但他想到当时学习任务繁重，革命形势紧迫，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应以革命事业为重，便决定不回家。他在给家乡好友陈树勋的信中申述不能回家的原因后说：“忠孝难两全，古今来志士之忍痛其可思议。”^①充分表现了冯达飞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

^①冯达飞1925年4月给陈树勋的信，原件存中共连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同年七月，冯达飞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入莫斯科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党组织又选派他入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在这期间，他除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著作外，还勤奋研读了古今中外许多军事论著，学习了苏联红军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党组织再选派他到德国炮科研究院将校组学习。他刻苦学习德语，努力学好炮科理论和技术，成为红军中一位经过多种高级军事院校教育训练，具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和步兵、航空、炮兵等多方面技术专长的优秀军事人才。

冯达飞在德国学习期间，中国革命发生了急剧变化。他身处异国，十分关心国内的革命斗争情况。他从报纸上看到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消息时，心情非常沉痛和无比愤慨；当他看到周恩来、朱德领导了南昌起义和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的消息时，心情十分兴奋，感到中国革命前途光明，并希望早日回国，参加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冯达飞遵照党的指示秘密回到广州。同年十二月十一日，他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按党的指示回到故乡连县东陂镇，秘密地开展革命工作，向亲友宣传党的主张，组织群众坚持革命斗争。

一九二九年秋，冯达飞遵照党的指示，到南宁开展革命工作。这时，邓小平、张云逸等隐蔽在广西地方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准备俟机起义，创建红军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冯达飞便在张云逸领导的教导总队任教员，不久又担任张云逸兼任大队长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机枪连连长。他按照党的指示，对士兵进行深入细致的阶级教育，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

发展党员。与此同时，他发动士兵揭露反动军官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罪行，并坚决把他们清除出去，从而使机枪连的面貌为之一新，并参加了后来的百色武装起义。

一九二九年九月下旬，广西俞作柏、李明瑞发动反蒋战争。我党估计它很可能失败，因而，决定作好应付不利局面的准备，于必要时把掌握的武装力量调离南宁到左右江去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此时，张云逸利用他担任南宁市警备司令的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这里储藏着一大批武器弹药，其中有许多残缺不全的机枪、山炮、迫击炮。这是我党即将举行武装起义急需的武器，必须迅速抢修好。党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冯达飞。他立即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抢修小组，日以继夜地进行抢修。但由于零件缺乏，抢修十分困难，他当机立断，决定拆开残损的机枪、火炮，取出零件，重新装配。经过几天紧张的工作，终于修配好了三十多挺机枪和十几门迫击炮，使这批武器及时装船运抵右江上游百色城。

十月，俞作柏、李明瑞反蒋战争失败，转到左江。我党决定按原计划，立即把部队撤离南宁，向右江进发。邓小平率领党委机关干部和在地方作秘密工作的党员及警卫部队、军械船，乘汽船溯右江而上。冯达飞率领警备大队机枪连在张云逸的指挥下，同教导队一起，沿右江从陆路掩护军械船前进。

部队到达百色后，邓小平召开了党委会议（后称前敌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会议决定加紧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冯达飞根据党委会议的决定，在机枪连向战士公开宣传我党的纲领、政策，进行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建立士兵委员会，并对部队再次进行整顿。之后，冯达飞带领部队到右江两岸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收缴地主、民团的武器，武装工农群

众，扩大革命队伍。

十二月十一日，党领导的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同时，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冯达飞被任命为第二纵队第二营营长。不久，党又领导左江龙州起义，宣告成立红八军，邓小平兼红八军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这时左右江的红色区域，成为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它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百色起义后，敌人不甘失败，立即卷土重来。一天拂晓，一股二千余人的地主武装突然向百色袭来，妄图将我红七军扼杀在摇篮中。当时军长张云逸正率领主力在果德、平马一带消灭反动武装，百色只剩下由冯达飞率领的教导队和机枪连及机关工作人员等四百余人。战斗打响后，冯达飞果断地带领机枪连抢占有利地形，以猛烈火力射击敌人。经过三小时激战，敌人溃退。冯达飞又亲率战士乘胜追击，消灭了不少残敌。

百色保卫战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三月，红七军前委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主力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挺进桂黔边界，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影响。部队经过河池、怀远战斗后，进入苗山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民团长期对苗胞实行残酷的压迫，所以当我军进入苗山地区后，苗族同胞误把我军当成地主民团，都跑上山去了。针对这种情况，冯达飞教育战士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可是，由于长途行军，部队带来的粮食已经吃光，冯达飞和干部开会研究决定，发动战士征集苗族同胞的粮食、猪和青菜，按市价将大洋放在原来放东西的地方，并留下字条说明。我军走后，苗族同胞回到村子，看到自己的房屋不仅完整无

损，而且打扫得干干净净，拿去的粮食、猪和青菜都留下了大洋。少数识字的苗胞从字条中知道路过的是工农红军。这样，广大苗族群众很快认识了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区别。以后，我军每到一地，都受到苗族同胞的欢迎和支持。

四月三十日，我军出苗山，奔袭贵州省榕江县城。榕江是贵州军阀的后方，很多军需品囤积在这里。我军经一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其它军用物资。榕江战斗的胜利，使我军斗志大为振奋。这时，粤桂军阀爆发战争，红七军前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回师广西右江。

六月初，冯达飞率领第二纵队二营指战员到达百色城外。这时百色城周围碉堡林立，已成为桂系军阀反共、镇压人民革命的一大据点。城内驻有敌人岑建英一个团。冯达飞亲率二营指战员勇敢地向敌人发起进攻，经过一天激战，攻占了敌人许多据点。但是，正面的一个碉堡始终未攻下。时近黄昏，如果天黑了，必然增加进攻的困难。这时，冯达飞陪同军长张云逸、总指挥李明瑞冒着敌人的枪弹，来到阵地的最前沿察看地形，并决定用山炮炸掉碉堡。可是，达时只剩三发炮弹。冯达飞决定将山炮移到最前沿的山顶，不用曲射，而直接瞄准，水平射击。他和战士们一起将山炮沿着陡峭的山路，拉到山顶上，接着，与总指挥李明瑞亲自架好炮架，测定距离，校正瞄准，用这仅有的三发炮弹把敌碉堡炸掉了。红七军又攻占了百色城。

一九三〇年九月，正当右江革命根据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党中央代表邓岗来到右江，传达了立三路线统治的党中央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北上去攻打柳州、桂林，并在广东小北江建

立革命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保证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最后夺取广州，完成中国革命。当时，红七军前委展开讨论，邓小平、张云逸等许多同志都感到以红七军的力量，去执行这样大的任务，是难以完成的。但认为中央的命令必须执行，待走不通时再说^①。

九月二十日，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开始了历时七个月、行程七千里的“小长征”。冯达飞奉命率领第二纵队二营为先遣队，由田州镇，向河池挺进。经过几天急行军到达南丹县六排镇，准备渡红水河。红水河两岸悬崖峭壁，河中船只早被敌人掳走。冯达飞立即发动战士上山砍竹扎排。不到半天，就胜利渡过了红水河，但又遇到一座千多米高的大山，只有一条盘旋于峭壁之间的羊肠小道，通向地势险要的高山隘口。在隘口处有一股敌人妄图凭天险阻挡我军前进。当我军前进到山腰时，敌人猛烈开火，部队受阻。冯达飞仔细察看了地形，决定以五连为突击队，趁天黑从侧翼攀登悬崖上去消灭这股敌人。在他宣传鼓动下，五连战士趁着黑夜，以无比顽强的革命精神，攀登了一整夜，于拂晓到达山顶，出其不意地向防守隘口的敌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守敌当即溃逃，我军顺利占领隘口，使后续部队得顺利前进。

十月初，红七军三个纵队到达河池。在这里召开了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在邓岗主持下，错误地提出了“打到

^①1930年9月，党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但是，当时由于交通阻塞，广西右江地区和红七军不知道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已停止执行，直到1931年2月红七军才知道这一消息。3月底，红七军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对李立三错误路线给红七军带来的危害进行了清算。

柳州去！”“打到桂林去！”等口号。大会还将三个纵队改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冯达飞被任命为二十师（师长李谦）五十八团团长。

红军整编后，二十一师大部编入十九、二十师，小部由韦跋群率领返回右江根据地坚持斗争。军部率领第十九师和二十师向柳州方向进发。一路攻下四把、长安等地。我军指战员虽然英勇奋战，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始终未能突破敌人封锁线，加上柳州敌人防备兵力很强。因此，军首长决定放弃攻打柳州的计划，转向湘桂边界，找个落脚地方休整。

十一月底，红七军过瑶山后，在湖南武岗与敌激战，部队损失很大。军首长决定转回广西攻打全州。冯达飞率领的五十八团担任后卫。当我军攀登越城岭时，湖南军阀一支队伍从武岗、新宁穿插过来，向我后卫部队偷袭，用轻、重机枪封锁部队前进的道路。在这严重时刻，冯达飞手举驳壳枪，冒着枪林弹雨，率领战士向敌人猛扑过去。敌人见我军来势异常勇猛，向后溃逃。我军乘势占领全州。前委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少数同志还想攻打桂林。但是，邓小平与前委大多数同志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不打桂林，转到粤北，待机进入赣南，以便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汇合。前委的决定传达到部队。冯达飞从部队离开右江根据地，在敌人占领的白区转战，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血的教训中，认识到以弱小的红军，盲目攻打大城市，同敌人硬拼，必然断送红军，断送革命。因此，他对前委这一正确决定，从内心表示坚决拥护。

部队在全州休整后，冯达飞率领五十八团随主力挺进湘南，直取道州，占领江华，翻越老苗山，胜利地到达湘桂粤三省交界的桂岭。在这里，前委根据部队减员的情况，精简机

构，将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及一个教导队。冯达飞被任命为教导队队长。

一九三一年二月初，红七军到达了广东连县东陂镇，这是冯达飞的家乡。早在红军到来之前，当地群众因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和威胁已“逃难”上山，整个东陂镇空无人烟。冯达飞为了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经批准回家去看望乡亲，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当他回到故居时，刚好见到他少年时的好友谭荣胜。谭荣胜见冯达飞率领红军回来，非常高兴，并立即跑到城外的山上，对亲友们说：“文孝回来了。”不多久，冯达飞家里聚集了许多亲朋好友。他亲切地和亲友们拉家常，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无耻污蔑，说明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为解放工农劳动大众的军队。经过冯达飞的宣传，广大群众又目睹我军指战员态度和蔼，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很快就消除了对我军的疑虑，纷纷回到家里。连商人也回来，纷纷开门营业，有些商会工作人员还主动捐款给部队。

第二天，部队到达星子镇。部分战士在严重困难面前，对革命胜利前途信心不足。冯达飞发现这一情况后，便召开大会，他说：“现在我们的确有许多困难，生活也很艰苦。但是，我们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懂得，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解放工农大众，需要最艰苦最严重的斗争。但是，我们每一个红军战士也懂得，为工农的解放而奋斗牺牲是最光荣的，革命胜利最终定会到来。现在，我们很快就要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合了，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斗争下去！”^①战

^①《访问黄凯记录》（1975年6月8日），存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局。

士们受到很大的鼓舞，特别是听到很快会与中央红军会合，精神更为振奋。

接着，红七军攻占了连县城。这时，获悉敌人一个团从韶关前来增援。军部决定在乳源梅花村消灭这股敌人，并决定教导队和五十八团担任左翼出击敌人。部队到达梅花村后，冯达飞亲自察看阵地，布置火力和选择出击路线。

战斗打响后，敌人即向我阵地发动疯狂的进攻。由于来的敌人不是一个团，而是四个团，情况非常危急。为了支援正面作战的五十五团，邓小平命令五十八团和教导队从侧翼出击敌人。恰巧这时敌人也从侧翼攻来。于是发生激烈的遭遇战。冯达飞指挥连队向敌人冲击。这一战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歼敌千余人，我军亦伤亡七百余人，干部牺牲了三分之二。由于敌众我寡，前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渡乐昌河到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去。部队经两昼夜的急行军，到达了乐昌河。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部分队伍在邓小平、李明瑞的指挥下，顺利地过了河。冯达飞率领的教导队和五十八团二营由于担任后卫，到达河边时，敌人已抢占了南岸，封锁了渡口。张云逸军长命令后撤。冯达飞率领教导队和二营指战员急行军一百多里走到坪石锁附近的一个渡口，但没有渡船，张云逸军长当机立断，命令部队立即涉水过河。冯达飞向战士们说：同志们，千难万险我们都克服了，决不能让这条江阻挡我们前进！说罢，带头跳进冰凉刺骨的江中，和战士们手挽着手，同心协力，终于涉过了乐昌河，向湘赣边进军。

冯达飞率领红七军教导队和五十八团二营涉过乐昌河后，接任五十八团团长。一九三一年二月九日，五十八团攻占湖南省酃县城。三月十四日，冯达飞率领五十八团，在酃县十都墟

附近与王震率领的红独立师三团胜利会师。两支红军会师后，张云逸军长和王震政委决定部队迅速赶回湘赣革命根据地。

湘南军阀得知红七军五十八团和红独立师会合，便调三个团兵力，在酃县湖口墟设防，妄图堵截我两支红军部队北返。我军即东渡洙水，进入湘赣根据地的茶陵尧水以北地区。敌人发现我军东进，急忙分路追击。我军决定在尧水地区选择有利地形，消灭尾追之敌，打个胜仗，作为进入红色根据地的献礼。

当敌人进至尧水地区的陇上，我两支部队迅速摆开阵势。冯达飞率领五十八团抢占陇上通往尧水大道东的前山和花棚山。这时，敌人已抢占了笔架山东侧和将军山，向我独立师三团占领的高山推进。冯达飞即命一个连迅速沿将军山南坡隐蔽前进，从敌人侧后发动突然冲锋，突入敌人阵地，他自己率领两连兵力，向笔架山迂回，以消灭笔架山以东的敌人。敌遭我突然突击，阵容大乱，除少数逃窜外，其余均被我歼灭。几天后，两支红军部队开入永新县城。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红七军五十八团和红独立师三团进入湘赣根据地的西路地区与红二十军一七五团会合，组织了河西临时指挥部。这时，敌人一个师向我发动进攻，先后占领吉安县的永阳镇、敖城等地，逼近永新。河西临时指挥部决心向敌人侧后突击，首先歼灭永阳守敌，威胁敌人后方。四月四日，红军全力围攻永阳镇。红三团与红二十军一七五团向敌发动突击。冯达飞率领五十八团为预备队。战斗打响后，红独立师两个团突破敌人阵地，冲入镇内。这时敌人一方面依仗优势兵力拼命顽抗，一方面集中兵力向红二十军一七五团反扑。由于敌人炮火猛烈，一七五团不得不后退。在此紧急关头，冯达飞率

领五十八团投入战斗。经几小时激战，击退敌人反扑，旋即与红三团会合，全力推进，将敌击溃，解放永阳镇。不久，在乐昌河失掉联系的五十五团，在李明瑞的率领下，经过千辛万苦，赶到了永新。

两团会合后，为配合中央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冯达飞率领五十八团与兄弟部队一起，接连攻打安福、茶陵、安仁、袁州（今宜春）。连战皆捷，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三一年七月，红七军主力开赴中央革命根据地，留下教导队以及百多名伤病员，归湘赣军区建制。冯达飞奉命留在湘赣革命根据地。九月，湘赣军区根据红军迅速的发展需要大批干部，成立了湘赣军区河西教导队，冯达飞被任命为队长。一九三二年初，教导队扩大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第四分校，冯达飞被任命为校长。他为办好学校，倾注了全部精力。他不仅领导全校的行政工作，而且亲自给学员讲政治课、军事技术课。他的讲课深入浅出，注意培养学员的独立思考能力。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还经常听教员讲课，亲自到训练场，考察学员的实际操作水平。同时，他还经常同学员谈心，了解学员的思想和对教学的意见，然后和教员一起改进教学。由于冯达飞的努力，在很短的时间里，为工农红军培养了一批连、排干部。

一九三二年春，冯达飞先后被任命为红独立第三师师长和红八军代军长。不久，上级党委调他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担任上级干部队的地方干部科科长。他不计较个人职位的高低，愉快地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上级干部队地方干部科是专门培养地、县两级党政干部的，他针对地方干部要开

展武装斗争的特点，专门给这些干部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课程。

这年四月中旬，红军攻克漳州，俘获国民党两架飞机。中央军委即派冯达飞前往将飞机驾回瑞金。冯达飞将飞机修好后，在没有任何导航和飞行路线的情况下，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他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负责，以及他的个人飞行技术，驾机飞越高山峻岭，将飞机驾回中央根据地的会昌县。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为了适应长征作战的需要，所有红军学校编为统一的作战组织“红色干部团”。冯达飞仍任红色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地方干部科科长。地方干部科学员是临时由地方编入的县委书记级干部。红色干部团直属中央军委，随同中央军委行动。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党中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的红色干部团同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编为红军大学。刘伯承任校长，冯达飞被任命为炮兵科科长。红军大学建立后，在毛儿盖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鼓舞下，一、四方面军的同志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在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决定组成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红军大学”随右路军，经过茫茫无际的草地到达巴西。行军途中，虽然条件异常艰苦，冯达飞和其他教员、学员仍抓紧时间进行学习和训练，并十分注意团结四方面军的教员和学员，关心他们的进步和提高。这时，坚持逃跑主义的张国焘，实行分裂党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要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全部南下，并秘密命令他截击一方面军。党中央、毛泽东等鉴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决定率领红军一、三军团以及红军大学教员和学员，继续北上。当红军大学队伍正在行进时，追随张国焘路线的一些

人骑马赶来高喊：“停止前进！没有陈昌浩的命令不准前进！”冯达飞和原干部团的教员和学员听后非常愤慨，高声说：“党中央领导的队伍，谁敢不准前进！”这时，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四方面军参谋长）、校秘书黄超（四方面军总政秘书长）也高喊：“不准前进！”毛泽东站在半山坡上，高呼：“愿北上跟党中央的跟着走，愿回去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你们将来还会回来的。”^①冯达飞和原干部团的教员学员和少数四方面军红军学校的教员学员听后立即高呼“我们坚决跟党中央前进！”当晚，红军大学中原四方面军的教员和学员被李特、黄超叫了出来，要他们按原来路线南下。统一合编的红军大学又一分为二，冯达飞和红色干部团的同志们紧跟党中央，继续北上抗日，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到达陕北。

十一月，红色干部面同原陕北的红军干部学校在瓦窑堡合编为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冯达飞任炮兵科主任教员。

一九三六年六月，在原红军学校基础上，成立了红军大学。冯达飞继续担任军事教员。当时学习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教室，经常在露天上课。由于敌人的封锁，没有纸和笔，冯达飞和其他学员就用高粱秆当笔，以大地做纸，在地上写，在地上画。他们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学习马列主义军事知识。

一九三七年，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冯达飞先后任第二大队和第四大队大队长。不久，学校规模迅速扩展，教员奇缺。为此，组织上

^①蒋耀德：《长征中的红色干部团》，《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中华书局出版。

先后举办了教员学习班。冯达飞和郭化若、王智涛等被调任教员班教员，向抽调来当教员的部队干部传授军事知识，作示范教学等。在冯达飞他们的努力下，迅速培养了几十名军事教员，如阎捷三、刘清明等，从而保证了“抗大”教学任务的完成。

一九三八年秋，冯达飞从“抗大”调到新四军任教导队教育长。一九三九年初，教导队扩大为教导总队，冯达飞被任命为副总队长兼教育长。新四军教导总队有学员一千余人，其中第九大队是高干队。这些学员大多数是从大江南北各支队选送来的优秀营、连、排指挥员。其中也有团以上干部以及一些青年学生。冯达飞除了担负总队全面工作外，还亲自给教导总队干部和第九队讲授军事技术课，以及工兵、炮兵知识，深得干部、学员的尊敬和称赞。

冯达飞非常注意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组织学员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对于提高学员坚持红军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军事教学上，冯达飞也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他在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时，常常结合新四军所在江南地区平原、丘陵、水网和村落多的特点进行讲解。

冯达飞工作深入，处处以身作则，对学员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亲自带领部队演习，每周举行总队全体会操，而且每次会操或紧急集合和夜行军时，他总是第一个先到操场，在训练场上，他不仅亲自示范每一个动作，而且要求每一个学员作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得合乎要求，不容一丝一毫的马虎。为了培养学员的顽强战斗作风，他有意识地选择一些恶劣天气把学员

拉出去进行战术表演，在风雨中摔打。正是在这样的严格要求和反复训练下，学员大都养成了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冯达飞除了担负培训学员工作外，他还经常深入到部队的团、连基层视察，认真观察和听取汇报，帮助他们制订军事训练计划及指导训练。

冯达飞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和战士一起吃粗米饭，穿草鞋，抽旱烟。一次，他到汀潭的老三团一营视察工作后，已是中午，陪同视察的同志请他到汀潭街上面店吃面。他婉言谢绝说：“这里离团部二里路，赶回去还来得及。”在路上，他教育陪同的同志说：“我们是人民军队，应该注意群众影响”。使陪同的同志深受教育。

在这几年的军事教育工作中，冯达飞一直这样勤勤恳恳，把自己所有的本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工农干部，为我军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干部，对提高我军的军事素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四〇年十月，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我新四军在一个月內全部撤至黄河以北，企图在我军转移时加以围歼。十一月九日，我党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发表通电，一方面驳斥国民党对我军的诬蔑，揭露其反共投降阴谋；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挽救危亡”，愿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开赴江北。党中央作出这一决定后，曾多次电令项英提高警惕，迅速渡江北移，并指定具体北移路线。但是，项英对党中央的正确指示始终消极，迟迟不动。冯达飞谈及党中央催促北移的电报时说，党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我们必须立即渡江北移。一九四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四军军部决定渡江北移，并把皖南的部队九千余人编为三个支队（亦称纵队）。冯达飞被任命为新二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周桂生，政委黄火星）。

一月四日晚上，新四军皖南部队开始北移。冯达飞和周桂生率领的新二支队为中央纵队。五日部队到达茂林。冯达飞参加了军部召开的支队首长会议。会上，军首长决定新二支队出丕岭，向星潭前进。冯达飞同司令员周桂生回到支队部后，立即召开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军首长的决定。会上，冯达飞对敌我态势作了分析，指出：“此次我们北渡长江，是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但是国民党却卑鄙无耻地调遣军队阻截我军。现在根据可靠的情报，国民党四十师已在三日前进至徽水两岸的三溪、星潭一带，六十二师也调至旌德；五十二师已进至泾县城南的巧峰一带；一〇八师到了泾县的晏公堂一带；七十九师进驻太平一带；一四四师、新七师盘踞在云岭北贡里以西地区，就以上已发现的国民党军队共有七个师之多，而且已形成对我包围态势。”他说：“现在军部决定我二支队向丕岭、星潭方向攻击前进，谁敢拦阻，我们就坚决消灭它。”^①

六日黄昏，冯达飞率领新二支队向丕岭前进，途中遇到顽敌四十师的拦击。他和周桂生随即命令老三团三营立即出击，务必在拂晓前拿下丕岭，以保证军部安全通过。老三团三营兵分两路迅猛攻击敌人，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就占领了丕岭，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机枪三挺。三营乘胜追击，沿百户坑向南挺进，受到山口两侧暗堡内国民党军的阻击。这时，新三团一、二营也沿百户坑向星潭方向挺进，同样遭到敌人的阻击。

^①《王培臣回忆》（1983年8月10日）。王培臣当时任新四军新二支队作战科科长。

恶战终日，双方在原地处于胶着状态。这时，冯达飞亲到前线视察，并根据俘虏提供的情况，对干部说：“守备星潭的敌四十师，虽是国民党军队中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但只有两个营的兵力，凭小山地构筑的野战工事守备着，两旁的高山，均为我控制，只要正面加强攻击。另派部队从右抄出，星潭是可以打下来的。”接着，他指出：“如果我们今晚不打下星潭，渡过徽水，我军势必被敌人困在青弋江和徽水之间，那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必须不惜牺牲拿下星潭。”随即命令新三团必须在今晚攻占星潭。新三团一营指战员为了全军的突围胜利，英勇奋战，于当晚九时胜利攻占了星潭^①。但是，由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犹豫动摇，错误地决定不打星潭，撤出丕岭，向高岭转移，打算经太平到黄山，致使我军丧失了冲出重围的时机，造成了不堪设想的后果。

八日晚我军获悉敌将向我发动总攻。军首长当即决定改道由茂林东北方向突围，仍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并决定由新二支队为前卫。冯达飞认为这个决定虽然晚了些，可能道到很大损失，但仍不失为良策。他和周桂生司令员立即率领部队转向东流山麓，准备经石井坑、大康王、于泾县、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至孤峰。但部队行至高坦时，受到敌一四四师猛攻，冯达飞即率领部队还击敌人。血战一夜，将敌击退，部队继续前进，于九日拂晓到达石井坑。

当冯达飞率领新二支队占领阵地筑好工事不久，敌人就发动了进攻。我军战士怒火填胸，以密集火力还击敌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昼夜，敌人的无数次冲锋均被我打退，在我阵地

^①《王培臣回忆》（1983年8月10日）。

前丢下了千具尸体。十二日晨，冯达飞到前沿阵地视察，态度严肃、沉着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把机枪架好，狠狠地打击敌人，子弹打完了就打游击。”^①

经过几天恶战，我军伤亡过半，而且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十二日，敌人发起总攻。由于敌众我寡，我军阵地全部动摇，虽经竭力争夺，始终未能夺回。在这种情况下，叶挺军长召开紧急会议，下令部队突围。冯达飞参加紧急会议后，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叶挺军长突围的命令后说：“叶挺军长命令我们突围，这是为了尽可能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叶军长说：‘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我们必须不怕牺牲，冲出重围，冲出去就是胜利。”最后，他说：“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不会垮的，我们还有延安，我们还有党，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的。”接着，他具体地布置了突围路线：新三团和老三团分左右两路向西北方向突围后，在铜（陵）、繁（昌）之间渡过长江到无为。在突围中要根据情况，采取强攻、偷袭、迂回穿插的战术，以求迅速地突破或绕过敌人的重围，争取十四日拂晓前渡过青弋江^②。

当晚十二时，突围大血战开始了，冯达飞同周桂生司令员、黄火星政委分别率领部队突围，他们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杀出了石井坑。十三日破晓，冯达飞率领的新三团共四百余人冲到了章家渡以南的舒溪。他当机立断决定由新三团团团长熊梦辉率领一部分指战员强渡舒溪。他自己率领百余人在南岸掩护。正当熊梦辉团长率领的战士冲到江中沙洲时，为敌人的轻、重机枪火力所阻，被迫退回。部队刚集合一起，敌人又围

^①陈子谷《皖南事变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王培臣回忆》（1983年8月10日）。

攻上来，冯达飞当即命令分路突围^①。就在这时，他的大腿不幸中弹负伤，由几位战士陪同隐蔽在南陵县童村街一姓张的农民家里养伤。

这时，国民党反动军队、特务队四处搜捕我军突围出来的指战员和地方工作人员。环境异常恶劣。在这危急的情况下，冯达飞坚持斗争，组织收容散落的同志。当他从群众中知道在章家渡及丕岭一带有我军活动时，即派人前往联络。二月三日，他托一个农民带信给黄火星、孙仲德。他在信中说：“请你们无论如何设法派些便衣队来此，一方面可以打击那些特务队的活动。同时，也可以接我们过江北去。”“请派些地方得力同志到来，组织秘密机关来收容散落的同志和散枪及向我各方面之部队取得联络（如丕岭、大黄坑、狮子山闻都有我们的部队）。”不幸，送信人在途中被国民党繁昌县自卫队逮捕，搜出了信件。送信人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冯达飞隐藏地址。二月八日，冯达飞被国民党特务逮捕^②。

冯达飞被捕后，囚禁在上饶集中营关禁军事犯的西山监狱。由于冯达飞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蒋介石对他抱有很大的幻想，曾指使特务头子邓文仪（邓和冯达飞同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上饶集中营特务头子对他多次的进行诱降，许以高官厚禄。冯达飞义正词严地对他们说：“你们既晓得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可见得我反对蒋介石并不是盲目的，我到过苏联，可见得我晓得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那么还有什么

①王培臣：《难忘的日日夜夜》，《皖南事变回忆录》，安徽、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国民党繁昌县县长、县党部书记代电皖南行署呈冯达飞给黄火星、孙仲德的信》，《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可说的呢？”^①这一番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答话，粉碎了蒋介石对他的幻想。同时，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质。

冯达飞被关押在西山监狱期间，每天向难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收了许多“学生”，难友们都尊称他为冯老师。因此，国民党说他企图煽动暴动，给他钉上两副铁镣^②。随后，又把他转移关押到七峰岩、茅家岭监狱。但是，他到那里后，仍然坚持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同志们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寇进攻浙赣线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不几天，日寇便从宁波一直打到衢州，第三战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忙着逃命，上饶集中营也准备跟着迁移到福建。就在集中营转移的前两天，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冯达飞在茅家岭被特务杀害了^③，时年四十三岁。

冯达飞一生为我军培养了大批指挥员，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坚贞不屈的高贵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①陈子谷：《皖南事变前后》。

②③叶钦和：《看电影“上饶集中营”后的回忆》，载1951年7月18日《南方日报》。

黄 骅

陆泉生 张广立

黄骅，原名黄金山，又名黄为有，一九一一年二月八日诞生在湖北省阳新县木石港区凤凰乡良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九年加入共产党，抗日战争中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遭叛徒行刺遇难，时年三十三岁。

(一)

黄骅二、三岁时，父母、姐姐、哥哥相继病逝，靠嫂嫂柯九菊抚养，生活极为艰辛。他六岁开始打猪草、挖野菜、拣干柴，七岁给地主放牛，十三岁到地主黄志祥家当长工。

一九二五年，十五岁的黄骅不堪忍受牛马般的生活，逃出地主家到江西瑞昌一位姓胡的木匠门下做学徒。胡师傅为人忠厚老实，有正义感，常给他讲岳飞、武松和洪秀全的故事。他听后很受感动，立志要做一个岳飞、洪秀全式的英雄。

一九二六年春，阳新的革命活动蓬勃发展。同年八月成立的中共阳新县委遵照上级党的指示，于九月间帮助建立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阳新县各级党部，并以国民党名义公开活动，进一步把工农运动推向高潮。

瑞昌与阳新地界毗连，相距不远。当黄骅得知他的家乡木

石港区建立了国民党区党部的消息后，便邀约黄为寿、黄自炎等奔赴木石港，找区党部要求参加工作。区党部负责人柯松涛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要他们在良上村一带发动青少年参加革命活动。很快，黄骅就将良上、桂家林、凤凰山、樟门、上建坪、下建坪、塘畔、竹林头等村的青少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凤凰乡儿童团，黄骅被推选为儿童团团长^①。他带领儿童团员，肩扛红缨枪，站岗放哨，传递信件，贴标语，散传单，监视土豪劣绅，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回师偷袭武汉失败，于六月六日由通山窜入阳新“清乡”。阳新的土豪劣绅、党棍恶霸等反动势力，纷纷依附夏斗寅叛军，“夜间到各村捉人，连无辜群众都被拷打枪决，妇女被奸淫污辱，财产被抢劫一空”^②。阳新城乡，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在反“清乡”斗争中，中共阳新县委书记罗伟等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黄骅对儿童团员讲：“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革命人民是杀不完的，为烈士报仇，为人民除害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胜利一定属于人民。”^③他带领儿童团员，借着月光，在几个村的墙上，用石灰水写了“打倒国民党新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为死难烈士报仇”等革命标语，鼓舞群众坚持斗争^④。

一九二八年春，阳新县各级共产党的组织相继得到恢复，赤卫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也开始建立，反“清乡”的武装斗

^{①③④}访问黄为寿烈士堂弟记录（1982年3月）。

^②1930年4月6日中共阳新县委给湖北省委的报告：《阳新报告》，原件存湖北省档案馆。

争逐步高涨。这时，黄骅找到木石港中共地下区委，秘密参加了赤卫队。在赤卫队里，他把标语传单机智地通过卖柴人，悄悄带进城里，或捆在竹筏上，放入富水河顺水漂入县城，扩大党的影响，扰乱敌人的军心。他还自告奋勇参加处决北冲村清乡团团团长柯亨仁的战斗，受到木石港区委和赤卫队员们的称赞^①。

一九二九年春，黄骅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十月，何长工、李灿率领红五军第五纵队抵达阳新。黄骅欣喜若狂，星夜兼程赶赴红军驻地木石港，第一个报名参加红军。在他的带动下，仅有几十户人家的良上村，就有十四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②。

(二)

黄骅参军后，被分配在部队当勤务员。他殷勤踏实，任劳任怨，经常受到首长的表扬。一九三〇年六月上旬，红三军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指挥红军首先消灭了鄂东南六县（鄂城、通山、咸宁、嘉鱼、通城、蒲圻）的地主武装，接着又乘胜攻克湖南岳州（今岳阳）市，七月二十七日攻占了湖南省城长沙。在这一系列攻坚战斗中，黄骅机智勇敢，奋勇杀敌，多次荣立战功。

八月二十三日，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组红军第一方面军，黄骅担任红八军一个连的党支部书记，

^①访问烈士亲属顾兰青、柯九菊记录。

^②1930年4月6日中共阳新县委给湖北省委的报告：《阳新报告》。

兼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的粉碎国民党反动派三次反革命“围剿”的战斗。他率领全连战士，每天以八十至一百二十里的速度，日夜与敌周旋，寻机歼灭敌人，取得了不少胜利。

一九三一年九月，黄骅升任营党代表，不久又任营长。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黄骅被选派进红军大学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政治指导员，从事培训红军干部的工作。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黄骅先后任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等职。在长征途中，他时而走在队伍的前头，时而又跑到队伍的后面，一路上了解战士的思想情绪，关心战士的冷暖，细心做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体弱多病的战士，他总是把自己的马让他们骑，把自己的粮食分给他们吃，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他们。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难险阻，终于胜利到达陕北。此后，黄骅进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干部团政治委员，与团长皮定均、政治部主任欧阳平并肩工作和战斗。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加强、组建抗日武装，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山西省委成立军事部，并将黄骅由八路军一一五师调任山西省委军事部部长。

当时，日军侵入山西，形势危急，封建军阀阎锡山想借助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力量，保住自己的地盘；我党则根据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利用阎锡山的名义，大力发展抗日力量。黄骅

担任省委军事部部长后，积极参与了在山西组织领导牺牲救国同盟会及建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新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叫“旧军”）的活动，并通过各种方式，做阎锡山及晋绥军的统战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陷，阎锡山和晋绥军节节败退。黄骅等组织新军战士，拣起晋绥军丢掉的不少武器，装备自己和地方游击队。他亲自教练新军士兵使用武器，提高军事素质；在新军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八路军为榜样，把新军逐步建设成人民的军队。

一九三七年冬，八路军一一五师奉命挺进山东，收复失地，留下一个补充团，组成晋西支队（又名晋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陈士榘任支队长，黄骅任副支队长，因此，这支部队又称“陈黄支队”。中共山西省委转到宁乡后，正式组织起省委卫队，对外称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一游击大队，由黄骅担任游击大队长。游击大队开始只有两个连兵力，后来发展到一个团。此时，黄骅还帮助各县先后组织游击大队，在同蒲路沿线活动。

“牺盟会”、新军和八路军在华北的积极抗战，和人民抗日热情的日益高涨，引起阎锡山的极大不安，也成为他进行投降妥协活动的重大障碍。他玩弄阴谋手段，妄图取缔“牺盟会”，夺取新军领导权。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三日（实际拖延了近三个月），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秋林会议）。他在会上公开宣扬投降论调，说：“武汉失守以后，抗战越来越困难，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现在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蒋先生脑筋中决无抗战之意。今天是如何妥协的问题

了”^①。黄骅和到会的其他共产党人一道，同阎锡山的反动言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秋林会议后，阎锡山一方面与日寇勾通关系，一方面积极准备进攻决死队等罪恶活动。十月到十一月间，阎锡山为袭击决死队，派人联络驻山西临汾的日军配合行动。阎锡山在对其将领的指示中说：“共产党、八路军势力日益壮大，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与之合作，我晋绥军将无立足之地；现在我们只有解决新军、牺盟，采用日本所提中日提携办法，达到生存之目的”^②。十二月初，阎锡山开始调兵遣将，包围我抗日军民，企图消灭我抗日武装力量。黄骅得到乔明甫送来的情报后，明确指出：“这是阎锡山‘秋林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也就是中央一再指示我们要防止突然事变的到来。”他果断命令部队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随时准备迎头痛击叛军^③。几天后，阎锡山就发动了通敌反共的“十二月事变”，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军和各路抗日武装力量发动进攻。十二月一日，阎锡山诡称对日发动“冬季攻势”，命令驻晋西的抗敌决死队二纵队立即集结部队，迅速向同蒲路出击，阴谋将二纵队部署于第一线，晋绥军作为预备队靠近二纵队，以便同日寇前后夹击，一举消灭。决死二纵队识破了阎锡山的阴谋诡计，断然拒绝了这一命令。但是，晋绥军已形成了对决死二纵队的包围。十二月六日，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在张家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武装自卫，并宣布成立讨逆总指挥部（司令张文昂，前敌总指

①②转引自杨献珍：《论山西十二月政变》，1940年2月12日《新华日报》（华北版）。

③1959年5月22日乔明甫给黄骅县民政局的复信。

挥韩钧），统率晋西地区所有新军以及晋西支队统一行动。晋西支队由陈士榘、黄骅指挥，是反击阎锡山反共军的主力。阎锡山借口新军不配合冬季攻势，公开向新军发动军事进攻。新军被迫武装自卫，把阎锡山的晋绥军阻击在山西隰县以南。与此同时，由陈士榘、黄骅领导的晋西支队和刘德明率领的决死队约七、八个团的兵力，协同包抄、痛击反共顽固军，歼灭叛军一部。

为了争取阎锡山抗日，北方局指示我军，在给予阎锡山的反共军以重大打击后，应主动撤离晋西南，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划分新军、旧军的管辖区。山西省委随即命令黄骅，准备带部队撤出晋西南。黄骅接到指示，经过反复侦察，认为离石城是敌人的重要据点，防守严密，城北的大武镇由日军驻守，都难以通过，只有西面的柳林镇，敌人防守薄弱，驻有少量日军，主要由伪军防守，我军可从柳林镇通过。于是，他率领我军绕过离石，直奔柳林。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夜晚，黄骅指挥晋西支队，用机枪猛烈扫射敌碉堡，敌人误认为我军要攻据点，慌乱打了一阵枪，弃镇逃窜。我晋西南抗日新军和抗日武装部队，以及北方局机关，乘隙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胜利到达晋西北，和晋西北的八路军、新军在临县会师。

一九四〇年四月，黄骅调任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三分区司令员，领导鲁西地区部队和群众的抗日运动。翌年四月，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考虑到冀鲁边区缺少军事干部，征求黄骅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去边区，黄骅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于是，黄骅又率百余干部赴冀鲁边区，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副旅长。临行时，肖华等领导人为黄骅送行。途经鲁中军区和清河军区，均有部队接送。时值日伪加紧

对我鲁中军区疯狂“扫荡”，征途艰难、危险。一天，黄骅一行刚从莱芜县茶叶口出发，即被数倍于我之敌发觉。黄骅沉着地指挥随行人员边打边撤，退进崇山峻岭。第二天，他带领部队继续行进，不料又与敌人遭遇，被冲散。这时，他和身边仅有的十几个人，与敌人周旋了一昼夜，才摆脱敌人，收拢失散队伍到达小清河以北，与冀鲁边军区政治委员周贯五率领的迎接部队会师，继续向冀鲁边区挺进。当行进到惠民县以南、黄河以北地区时，又遭日寇和国民党顽军顾景良部的联合袭击。部队在黄骅、周贯五的指挥下，躲过敌人的火力，安全到达目的地^①。

当时的冀鲁边区，是抗日最艰苦的地区之一。日伪军在军事上推行“囚笼政策”，不仅占领了县城和交通要道，而且每隔二、三里就修筑一个岗楼，岗楼与岗楼之间有壕沟相联，妄图“竭泽而渔”。我军几乎天天都要移动，衣不解怀，鞋不解带，经常一个晚上要接几个睡觉的地方，战士开玩笑说：“我们白天开展游击战争，晚上开始游击睡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为它的后方基地，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加紧对我华北解放区进行频繁的“扫荡”。一九四二年春，敌人对我冀鲁边区实行野蛮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我军民的生存条件。黄骅率部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断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一次，黄骅率领我军两个连进驻西多庄，准备在这里休整，不料西多庄四周的柳岭庄等村庄均驻清了敌人。傍晚，他乘敌不备，分兵两路，神不知

^①吴鸿儒 1982 年 5 月 20 日、张荣亭 1984 年 1 月 30 日对《黄骅传》（送审稿）的修改意见。

鬼不觉地摸到柳岭庄，突然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袭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我军胜利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安全地带^①。又一次，黄骅率部在宁津县的张大庄宿营，突然被数路敌军包围。他指挥警卫连的机枪掩护突围，正在战斗紧要关头，机枪突然坏了。他纵身跳出壕沟，随手拔出匣子枪，向敌人猛烈射击，并大声命令：“机枪快撤，我掩护！”经过浴血奋战，我军终于突出重围，安全转移。

一九四三年一月，黄骅率部驻扎在庆云县的严家务一带，准备在这里休整过春节，不料因汉奸告密，翌日拂晓即遭九路敌军包围。黄骅镇定自若，命令骑兵排向村西北方向冲去，吸引敌人的火力，自己率部队主力，以刚起义尚未更换服装的伪军为先头，迷惑敌人，向村东北方向前进。临近敌阵时，他下令突然发起猛烈攻击，使部队冲出了重围。

二月十四日拂晓，黄骅刚起床，便听到枪声。晨雾迷漫，看不清敌人，只听见子弹在树梢上“嗖嗖”地穿过。他立即派通讯员通知各部队分头转移；自己带领十六团的“铁帽子五连”，扮成日本军模样，撤离大桑树，冲向西北方向。

五连走了一段路，雾气渐渐消散，隐隐约约看到前面来了一大批人马，黑压压地堵住去路。黄骅仔细听了听，发现对面的人群一边走一边吆喝，声音不象伪军的狂呼，也不象日本兵的嚎叫，便命令部队加快速度迎上去。不一会，他逐渐看清楚前面走的人都是老百姓，跟在后边的伪军端着刺刀，通迫群众列成横队朝前走。这是日本兵“拉网扫荡”的新花招；用抓来的群众在正面虚张声势，日军则散在两旁的道沟中。如果我军

^①1959年5月9日张凤祥给黄骅县民政局的复信。

被正面的人群唬住，拐弯向两侧转移，那就会闯进日军的“网”里，遭到他们的暗算。“铁帽子五连”笔直地朝前走。伪军误以为是“皇军”过来了，赶紧向两边闪开，让出一条路来。五连指战员大摇大摆地到了伪军眼前，突然举起枪，用刺刀逼住伪军：“缴枪不杀，我们是八路军！”

伪军吓懵了，不知所措地纷纷举手投降。几个企图顽抗的伪军，当即被我军击毙。这下老百姓可乐了，围上来问长问短。黄骅担心部队和群众被日军发现，就动员乡亲们赶快离去。然后率领五连押着俘虏，越过鬲津河，进入东光、南皮一带安全区^①。

是年春，黄骅到一分区（在东陵地区）检查工作。一天早晨，突然发现敌人向我军驻地压来。他当机立断，带领分区机关避开敌人，巧妙地在敌人眼皮下穿插，终于向北转移到安全地带。当年参加战斗的许子祯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我们都十分钦佩黄骅首长的革命胆略和指挥战斗的高超技巧。”

为争取抗战的胜利，黄骅按照党的“利用矛盾，团结多数，各个击破”的斗争原则，争取了几支伪军和土匪部队归向人民，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渤海湾有个叫陈志芳的海盗，手里有三四百人的武装。为争取陈志芳参加抗日，黄骅只身乘船前往海岛与陈谈判，向他晓以民族大义，劝他参加抗日，为国立功。陈志芳见八路军的司令员、战功显赫的抗日将军，不带一兵一卒前来会谈，深为钦佩，于是当着部队的面，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尔后，陈志芳的部队被编入我教导第六旅。

^①周贯五：《艰苦奋战的冀鲁边》，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页。

(四)

正当黄骅以高昂的战斗热情，领导冀鲁边区军民夺取抗日战争更大胜利的时候，混入革命队伍，窃取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兼教导第六旅旅长的邢仁甫^①，却在加紧准备谋杀我军干部、阴谋叛国投敌。邢的罪恶阴谋，我山东军区已经识破，正在设法派入通知下属军区，因交通阻隔被耽误。黄骅、陆成道等冀鲁边军区负责人，对邢仁甫的诡密行动也有所察觉，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但就在这时，邢仁甫叛变了。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黄骅率领主力部队到达新海县的大赵村，准备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秋季反“扫荡”任务。三十日傍晚，军区在大赵村召开侦察工作会议，会议由黄骅、陆成道主持。黄骅首先讲话，他说高苗庄稼正在成长，青纱帐快起来了，对侦察工作有利，大家要总结侦察工作经验，为部队出击敌人作好准备。就在这时，受邢仁甫指使收编的土匪部队、旅手枪队队长冯冠奎带着十余个贴身队员，跟踪赶到大赵村，骗过警卫，摸到会议室的门外。黄骅忽见门外有几个黑影在晃动，正要喝问，不料叛徒的枪响了，子弹射进黄骅的前额，鲜血喷涌而出；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陆成道也被打倒了。齐耀庭、池田等刚要举枪还击，但叛徒们的四、五支短枪一阵乱打，都倒在血泊里。黄骅、陆成道、陈彪、崔光华、董兴根五位冀鲁边军区领导人同时遇难。

^①邢仁甫投降日寇当了“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又当了国民党的军统特务。1949年天津解放时被我捕获，1950年押回旧县镇处决。

新华分社发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噩耗传来，冀鲁边区军民悲痛万分，许多人痛哭失声。肖华说：“这是空前的损失，损失太大了……血的教训啊。”“黄骅是个好同志！”^①同年八月，山东军区决定将新海县命名为黄骅县，以表彰烈士为党、为人民、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不朽功勋。一九五三年三月，黄骅烈士的遗骸移葬济南市英雄山烈士陵园。他的英名和光辉事迹象巍巍丰碑，永远屹立在人民的心中。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河北省民政厅，黄骅县民政局，档案馆，山东省烈士纪念馆所藏黄骅烈士档案材料。
2. 烈士亲属顾兰青（妻）、柯九菊（嫂）提供的史料。
3. 周贯五、陈士榘、乔明甫、朱涤新、郭化若、肖华、刘良明、杨尚儒、吴鸿儒、叶尚志、刘济民、燕明、曾旭清、李启华、张凤祥、张玉槐、张稼夫、万钧、康伯明、许子祯、张荣亭的信件、回忆录和访问记录。

^①周贯五：《艰苦奋战的冀鲁边》第303、305页。

闻 一 多

胡水清 田子渝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李公朴遇难后的第四天，在春城昆明，闻一多又倒在血泊中。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闻一多的被害无不表示悲悼和愤怒，对他“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①的献身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

闻一多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复杂而艰难的。他受过十余年美国式教育，曾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教授。但是，在时代的教育下，在人民的教育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之下，他终于由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转变成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战士。

“五四”时期的爱国青年

闻一多，原名亦多，辈名家骅，字友三，号友山，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时改名闻多，笔名有夕夕、一、屠龙居士、T.L、H.C、风叶等，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一个“书香门第、世家望族”的封建大家庭。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父亲闻固臣是清末的秀才，为人忠厚，乐于

^①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84页。

接受新思潮，赞同变法维新，对于闻一多兄弟的思想品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闻一多五岁发蒙，在家塾里和兄长们一起诵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等传统教材。随着洋学堂的兴起，他又接触了国文、历史、博物、算术、修身等新知识，见识日增。一九一〇年，闻固臣把十一岁的闻一多送到省城武昌，考进了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由其叔父闻丹臣照料念书。第二年，闻一多在这里目睹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空前壮举。他也和许多大人一样，兴奋地剪掉了象征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辫子，有时还到司门口、阅马场等热闹处所去看群众集会或士兵练操。此后不久，由于局势紧张，学校停课，闻一多不得不随叔父等家人暂时回到了浠水故乡。他在乡下逢人便说武昌起义的新闻，对国家的中兴颇多幻想，拥护和崇拜革命党。这场革命培育了闻一多最初的纯朴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一九一二年秋，闻一多在武昌实修学校以备取第一名和复试第二名的资格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是当年湖北全省被正式录取的四名学生之一。

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创办于一九一一年四月，当时是一所由美国退还给中国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中学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学制八年；中等科四年，相当于初中；高等科四年，相当于高中和大一。闻一多一九一二年冬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后，首先补习了半年英语，然后才正式进入中等科学习。

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品学兼优，显露出多方面的技艺才华和组织能力，是同学们一致公认的“博学之士”，并深得师

长们的器重。

他热爱戏剧，担任过清华新剧社编演部的负责人。他自编自演的新剧《革命军》、《蓬莱会》等，曾多次在全校的演出比赛中获奖。

他热爱美术，一九一九年秋参予发起成立了清华美术社，社员多达五十余人。他的作品曾被美术教员选送到巴拿马的博览会上展出。

他酷爱文学，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成立的清华文学社的骨干，致力于诗歌的创作与研究。一九二〇年九月，《清华周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白话新诗《西岸》。这首诗用象征的手法，鲜明地倾诉出诗人对于黑暗现实的憎恨和厌恶。他把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比喻为“满天糊着无涯的苦雾，压着满河无期的死睡。”说明在这里，“没有真，没有美，没有善，更从哪里去找明光来？”^①此诗在编入诗集《红烛》时，闻一多在诗首引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的一句诗，大意是：“幻想插上了美的翅膀，希望的春天就会来临”（本传作者译）。于是，诗人又幻想出在这大河的西岸定会有个不同的世界，从而决心“逃脱”这东岸的“樊笼”，“搭个桥，穿过岛，走着过！”去寻求那“西岸底光明！”^②这首诗突出地表现了诗人“艺术为艺术”的唯美倾向，同时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愿为祖国的新生献身的高尚情怀。青年诗人闻一多正是带着这样的爱国主义和唯美主义相交织的复杂个性，登上中国的新诗坛的。闻一多不仅从事诗歌创作，而且更倾心于诗歌理论的探讨和阐发。他曾在清华文学社

^{①②}闻一多：《西岸》，《清华周刊》第191期，1920年9月24日。

内做过《诗的音节的研究》的报告。一九二二年五月，清华文学社出版的丛书第一种就是闻一多的《冬夜评论》和梁实秋的《草儿评论》的合辑。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得到了当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的高度评价。郭沫若飞鸿致贺云：“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杳然。”^①

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每年暑假都要回到家乡读书二月，并将其读书室自名为“二月庐”。在这里，他可以摆脱学校功课的压力和限制，尽情地阅读自己所喜爱的中国史书和诗集等。他边读边思考，随时记下一些独特的心得和感受，评诗论史，褒贬人物，考证史实，均有创见。他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的这些读书札记，从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十四日，以《二月庐漫纪》为总题，在《清华周刊》上连载了十六则。这是闻一多最早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见解。如读杜甫的诗，他发现了：“杜子美父名‘闲’，故诗中不用‘闲’字。‘娟娟戏蝶过闲幔’，原作‘开幔’，刻本之误也。母名海棠，故不咏海棠。坡公有诗云：‘少年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版海棠。’岂未知考也。”^②又如对西施与范蠡的传说，他也进行了仔细的辨正：“自杜牧有‘西于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之句，世皆传范蠡载西施以逃。及观《修文御览》引《吴越春秋》有云：‘吴亡后，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浮沉也。’子胥之被谗，西施有力焉；子胥死，以鸱夷

①转引自《闻一多全集》卷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版第658页。

②闻一多：《二月庐漫纪（续九）》，《清华周刊》第83期，1916年10月18日。

浮之江，今沉西施于江，所以谢子胥也。范蠡去越亦号鸱夷子，牧遂误以胥为蠡耳。墨子曰：‘吴越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岂非明证哉！文士一时趁笔，遂堕后人于疑网。”^①十六则《漫纪》，共有此类考证议论六十余条，它反映出少年闻一多学习祖国历史文化的实绩。

闻一多在清华读书时还十分热心于社会活动。一九一四年在上中等科二年级时，他开始担任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和集稿员；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间，他又担任了学术性刊物《清华学报》的学生编辑；一九一七年在中等科毕业时，他负责主编年级纪念册《辛酉镜》，撰写发刊词和自传《闻多》等诗文共十篇。这些诗文，是闻一多在清华前四年学习、生活和思想状况的真实记录。

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正是中国社会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陈独秀首倡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犹如习习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也吹开了少年闻一多的心扉。他赞颂“《新青年》是中国新文化的鼻祖，当然受一般人的崇拜”^②。正是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鼓舞之下，闻一多勇敢地投身到五四运动的激流之中。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是个星期天，北京城里天安门前爆发

①闻一多：《二月庐漫纪》（续十二），《清华周刊》第87期，1916年11月15日。

②闻一多：《出版物底封面》，《清华周刊》第187期，1920年5月7日。

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示威大游行，从此掀开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崭新一页。清华学校由于远在郊区，消息闭塞，当天没能组织学生进城参加这一行动。这天傍晚，闻一多听到了从城里归来的远房堂兄闻迪纯讲述自己耳闻目睹的新闻以后，无比振奋。他连夜用大红纸抄录出岳飞的《满江红》词，贴到学生饭厅门前的布告栏内，借以鼓动同学们的爱国热情。第二天，清华的学生干部和社团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集体加入北京学生救国会，与北京学生取一致行动，坚持到底。会议选举罗隆基为清华学生自治会主席，闻一多任书记，负责起草《致巴黎和会的通电》和《致全国学界的宣言》等文稿^①。

当五四运动的高潮迅速扩展到全国范围以后，适时成立统一领导全国学生运动的组织就显得极端重要。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成立，闻一多、罗隆基、罗发祖、钱宗堡、陆梅僧等五位同学被选为清华学校的代表。为了全力投入爱国运动，闻一多毅然决定这年暑假破例不回家，并于五月十七日下午写信给父母，耐心加以解释：“一年未归家，且此年中家内又多变故，……二大人愿男等回家一集，即在男等亦何尝不愿回家稍尽温省之责。远客思家，人之情也……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不得已也。”他在这封信中还陈诉了自己对于“爱国”的理解：“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

^①参阅叶逸民：《记闻一多先生》，《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第159页，李闻二烈士纪念委员会编印。

孝也。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男昧于世故人情，不善与俗人交接，独知读书，每至古人忠义之事，辄为神往，尝自诩吕端大事不糊涂，不在此乎？或者人以为男此议论为大言空谈，如俗语曰‘不落实’，或则曰‘狂妄’，此诚不然。今日无人作爱国之事，亦无人出爱国之言，相习成风，至不知爱国为何物，有人稍言爱国，必私相惊异，此为不落实与狂妄，岂不可悲！”①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唤起了闻一多奋起救国、改良社会的强烈愿望。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贫弱的祖国强盛起来，不受外国人欺负，都曾向西方寻求过各种各样的思想武器，希望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作为诗人的闻一多，他的目光当然是更多地是在文艺领域里去寻找自己的精神武器。他热爱祖国，思索拯救祖国的途径，可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艺术救国！一九二〇年秋，他在清华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艺术及其与人生的关系”的团体“美司斯”（Muses），同时还发出了《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的文告，认定“艺术确是改造社会底急务”，呼吁“有艺术天能的朋友们，快起来呀！”②

一九二一年六月，北京教育界爆发了以李大钊、马叙伦为首的“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的正义斗争。其时正面临毕业出洋的闻一多，坚决参加了为声援索薪斗争而举行的“同情罢考”。他是毕业班中为此事而被校方勒令开除的二十九名同学中的一个，后来经斗争虽然保住了学籍，但仍受到了“不悔过

①《闻一多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②闻一多：《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清华周刊》第192期，1920年10月1日。

即留级一年，推迟出洋”的处分。闻一多始终坚持“无过可悔”。他对同班同学吴泽霖说：“正义不能做买卖，讲条件！”^①经过坚持斗争，终于迫使学校当局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取消了对他们的留级决定，准予毕业。对此，吴泽霖佩服地说：“闻一多是正直的人！”^②

一九二二年春，闻一多在清华学业期满。留美前夕，他受父母之命，回到湖北浠水家乡，与姨表妹高孝贞（后改名高真）成婚。婚后不久，闻一多即离别了故乡，告别了亲人，怀着“美育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开始了艰难的人生跋涉。

“艺术救国”碰了壁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闻一多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八月七日到达当时美国的第二大城市芝加哥，九月二十五日开始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西洋油画。由于忍受不了都市的污染、喧嚣和精神的苦闷、孤寂，加之同窗好友梁实秋来信邀请，一年以后，他转学到了美国中西部的珂罗拉多大学美术系。在珂大读了一年后，由于清华校友先后赴美，聚于纽约，他又转学到了纽约艺术学院。

在这几度迁徙求学之间，闻一多亲身感受到了充斥于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这对他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帝国主义者的傲慢神气，白种人的无理刁难，更加激起了他的爱国思乡的情怀。他觉得学绘画，专凭色彩和线条尚

^①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66页。

^②吴泽霖对笔者的谈话，参阅1984年11月25日《武汉晚报》。

不足以表达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火一般的热爱思想感情，于是又重操文学旧业，致力于诗歌创作。身处异国的闻一多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与日俱增，他恨不得骑上太阳，“每日绕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①重阳节要到了，他寄情于菊花：“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②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夜，他将他的新诗作《晴朝》和《太阳吟》抄寄清华校友吴景超，并附信说：“我想你读完这两首诗，当不致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③

一九二三年九月，闻一多将自己在清华学校和留美初期所作的新诗经过认真而严格的筛选后，编成了第一本诗集《红烛》，寄回国内，经郭沫若、成仿吾二人介绍，交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发行。这些新体诗充满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富于爱国思乡的情怀，在艺术形式上讲求格律，独树一帜。

闻一多是经受过五四爱国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留美以后，他从对比中更加看清了旧中国的贫弱腐败，下决心要改造旧中国。但由于他从清华学校开始，长期接受的都是美式教育，过着书斋生活，脱离民众的火热斗争，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所以他的爱国主义在当时就只能是抽象的、模糊的。他只能从自身的具体感受出发，去探求拯救中国之路——“艺术救国”。这里的所谓“艺术”，不独包括文学、戏剧、音乐、图画、雕塑、建筑、工艺等等，“就是政治、实业、教

①闻一多：《红烛·太阳吟》。

②闻一多：《红烛·忆菊》。

③闻一多：《给景超》，《闻一多全集》卷3第601页。

育、宗教也都含着几层美术的意味。”^①很显然，年轻的闻一多根本不懂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一方面，他热衷于艺术，甚至将它视为济世匡时的唯一的良方；另一方面，他又看到旧中国的社会腐败，政治黑暗，朦胧地感到单纯用艺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是苦于找不到一条解决问题的正确出路。于是，他只能将艺术概念扩大，用折衷的办法，将政治、实业等均包容到他的艺术救国观里去。艺术救国，实质上是一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它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医学救国等同出一辙，都是愤世嫉时而又害怕民众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造出来的一条通向“天国”之路。这条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当时坚持沿着这条路摸索下去的闻一多，势必在政治上把自己导入歧途。于是，他信仰国家主义，参加新月诗派，追求艺术“唯美”，直至四处碰壁之后，躲进象牙之塔！

一九二五年一月，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等二十九名留美的清华校友在波士顿集会，正式成立了大江学会。这个组织以提倡和鼓吹国家主义为宗旨，闻一多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同年三月，他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②于是，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宏大抱负驱使着青年闻一多，下决心从文化入手来复兴祖国，他并且把自己的这一主张称之为“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③大江学会成立以后，闻一多似乎有了信

①闻一多：《建设的美术》，《清华学报》第5卷第1期，1919年11月。

②③闻一多：《给实秋》，《闻一多全集》卷3第617页。

仰，有了主义，充满信心。他积极地为“大江”发展会员，壮大组织；筹办刊物，扩大影响。他迫不及待地要回国去大展宏图，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闻一多怀着对祖国、对家人的深切思恋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终于结束了“流囚”^①生活，登上了归国的海轮。

闻一多提前从海外回到了时时梦魂牵绕的祖国。当他的双脚刚一踏上祖国的东大门——上海的码头时，适逢“五卅”爱国反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迅速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大革命高潮。这给了他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使他第一次看到了民众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于是他情不可遏地写下了《一句话》：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②

可惜的是，这仅仅是闻一多一时的激动而已。他此时的阶级立场和思想认识决定了他不可能投身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

①闻一多：《红烛·我是一个流囚》。

②闻一多：《死水·一句话》。

人民革命斗争中去。这时的闻一多尚不懂得共产主义为何物，他只是莫名其妙地把共产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起来，同时又把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等同起来，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①于是，闻一多归国甫定，便在北京与国内的国家主义派取得了联系，主动地与“醒狮”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并参加了一些活动，促其“声势一天浩大一天”^②。

闻一多热衷于国家主义活动时，年方二十七岁，正所谓“少年气盛之时”。他决心“赤手空拳打出招牌来”^③，在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不因人热，亦不甘为人作嫁衣裳”^④。他认为“醒狮社的人如李璜乃一书生”，并不怎么高明，因此“国家主义的实践还待大江”^⑤。他当时身居北洋军阀统治的巢穴北京，囿于阶级的偏见，看不到祖国南方正在兴起的工农革命高潮，反而给远在美国的梁实秋等人写信说：“国内漆黑一团，切望同志快回来共同奋斗吧！”^⑥一九二五年七月，大江学会创办了一个提倡“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的季刊，题名《大江》。闻一多立即将自己在留美三年期间“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⑦，如《醒呀！》、《爱国的心》、《七子之歌》、《我是中国人》、《长城下之哀歌》等爱国诗篇交给《大江》发表，其用意“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

①②③④⑤⑥ 闻一多：《给梁实秋》，《闻一多全集》卷3第622、617、620、623页。

⑦ 闻一多：《〈醒呀！〉后记》，《现代评论》第2卷第29期，1925年6月27日。

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①。当他发现“《大江》在京行销甚畅”，“《大江》宣言发表后亦大有影响”^②时，更是信心十足。

闻一多此时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他一方面反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又有着强烈的爱国激情。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当共产党人李大钊、陈乔年、陈毅、赵世炎等组织和领导北京工人、学生、市民数千人举行反帝大示威时，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竟亲自命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连续射击，打死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余人，造成了一场屠杀中国爱国民众的大惨案。鲁迅曾悲愤地将这一天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③。“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闻一多也认识到，这才是真正的爱国的时代潮流，于是当即写下了一首《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盛赞爱国烈士们“这青春的赤血再宝贵没有了”，劝慰烈士们的亲属“不要愤嫉，父母、兄弟和姊妹们！等着看这红热的开成绚烂的花。”^④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他又在北京《晨报》的副刊《诗镌》创刊号——“三月十八血案专号”上发表了《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一文，进一步主张将文艺运动与爱国运动结合起来。他说：“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

①闻一多：《〈醒呀！〉后记》，《现代评论》第2卷第29期，1925年6月27日。

②闻一多：《给实秋佛西》，《闻一多全集》卷3第624页。

③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④闻一多：《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国魂周刊》第10期，1926年3月25日。

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①

一九二七年，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形势下，正在家乡闲居的闻一多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邀请，到武汉担任了总政治部的英文秘书兼艺术股股长。他满怀着报效祖国的热情，将自己的艺术才华奉献给壮丽的爱国伟业，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遗憾的是，由于他长期过惯了书斋生活，身上存在着较严重的自由散漫和自视清高的弱点，不能适应严格的军事纪律和紧张繁忙的行伍生活，因此在北伐军中仅仅工作了一个月就离开了。

一九二八年一月，闻一多自编的第二本诗集《死水》，由胡适、徐志摩主持的新月书店出版。这本诗集处处洋溢着诗人火一般的爱国激情和对于新格律诗形式的执着追求，自创一格，自成一体，在中国新诗史上竖起了一座璀璨夺目的丰碑。

闻一多在政治上鼓吹国家主义的同时，在文学上又加入了资产阶级的文学团体新月社。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新月社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闻一多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新月社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誉不佳的社团，其主要成员徐志摩、胡适、梁实秋、陈西滢等人，都是反对共产主义、鼓吹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围剿”鲁迅的。闻一多当时与这伙人信仰一致，趣味相投，尤其在创作上曾一度成为“新月诗派”的台柱子。后来，闻一多迫于生计离开上海。随之，由于认识上的分歧，他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正式辞去了《新月》的编辑职务。

闻一多在归国后的最初几年，尚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样，在国家主义派与马

^①闻一多：《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1926年4月1日
《北京晨报·诗铸》。

克思主义展开大论战时，他信仰了国家主义；在新月派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动“围剿”时，他跟着反对鲁迅。这反映了他此时在政治上的失误。然而，他尽管一度将李璜、曾琦、梁实秋、胡适等人引为“同志”，但毕竟和这帮政客、买办文人们有着本质的不同。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是他一生的优秀品质。如他的国家主义就有其特定的爱国主义内涵，这可以从他发表在鼓吹国家主义的刊物《大江》上的爱国诗中得到证明。到了后来，当闻一多认识到国家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自己的思想问题时，他就逐渐地抛弃了这一信仰，并与李（璜）、曾（琦）之流分道扬镳了。

在当时社会动荡、斗争复杂的年代，闻一多在谋生糊口的问题上，信奉的是“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处世哲学。这几年他先后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易名为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等校任教。

一九二八年秋天，闻一多回到故乡，在刚刚定名的国立武汉大学教书。在这里，尚不满三十岁的闻一多，以年轻教授的翩翩风度，以待人诚恳、治学严谨的负责精神，以充满诗人气质而又渐趋成熟的讲课风格，赢得了青年学生们的普遍尊敬。但与此同时，他也招致了一班抱残守阙的所谓“国学大师”们的嫉妒和攻击。为了用事实来回答那些敝帚自珍、顽固不化的“腐儒”们的挑战，为了弄清祖国文化传统的真实情况，也为了给自己在政治上一再受挫以后而变得心灰意冷的精神找到寄托，他便基本上停止了新诗写作，断绝了与国家主义派和新月社的联系，一头钻进了故纸堆，将注意力几乎完全转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来了。他在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为自己制订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科研计划。实现这个科

研计划的第一项成果，就是从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连载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一九三二年暑假过后，闻一多带着一颗四处碰壁、不得安宁的心，重新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清华园。

闻一多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共计五年。这是他一生中生活最安定、平静、舒适而优裕的五年。他说：“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见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证实了自己在这一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①这里说的所谓“向内走的路”，就是把自己闭锁于清华大学新南院七十二号的书斋，远离开尘嚣的现实，潜心于古籍研究，将久蓄的宏大抱负付诸现实。数年以后，他的手稿逐渐增高了，在对于《易经》、《诗经》、《庄子》、《楚辞》、乐府、唐诗、古代神话、古文字学（甲骨文和钟鼎文）、古音韵学、民俗学以及绘画理论等的研究上，都有了自己独到而深切的见解，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成了举世公认的著名学者。郭沫若后来对闻一多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②但与此同时，闻一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也变得更加迷惘和消沉起来。

闻一多本来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的诗人。他目睹国势危艰，人民涂炭，爱憎化为诗句如火山岩浆般地从心中喷发

①闻一多：《给饶孟侃先生》，《闻一多全集》卷3第635页。

②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1第1—2页。

出来。但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民主个人主义的偏见挡住了他的视线，又把他“从诗境拉到尘境来”^①，使他看不到中国的出路，看不到人民的力量，看不到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光明和未来。面对着苦难的中国，他一筹莫展，无可奈何，只好采取逃避的办法，钻进象牙之塔，寻求自我解脱。这不能不被看成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

在抗战的炮声中觉醒

“九一八事变”所引起的形势变化，闻一多似乎并未感觉到，还是深藏在清华园，禁锢在书斋里。“一二九”的风暴，也未能在他的心上激起应有的“波纹”^②。西安事变发生了，他从黄卷青灯之中抬起头来，对世事发表了看法，竟然是责备爱国学生，说什么“由于他们的救亡活动，引起了西安事变，以至领袖（指蒋介石——引者注）陷于险境，国家陷于险境。”^③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响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严酷的现实终于在闻一多“死水”般的心湖上掀起了巨澜。国民党战场抗战形势的日趋恶化，使他逐渐抛弃了对国民党抗战的幻想。七月十九日，在北平沦陷的前十天，他随着逃难的人流奔向火车站。在火车站，当年青岛大学的学生臧克家见到闻一多只随身带着一个大包袱，便问道：“闻先生的那些书籍呢？”闻一多悲愤地回答：“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④

①闻一多：《给吴景超》，《闻一多全集》卷3第601页。

②③刘国焯：《略论闻一多先生》，1946年8月20日《新华日报》。

④臧克家：《我的先生闻一多》，《怀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84页。

他回到浠水故乡小住一阵后，就奉召于十月二十四日赶到长沙。是时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在长沙开学，他将在该校文学院执教。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后，长沙也经常遭受敌机轰炸，临时大学决定再迁云南昆明。这时，已经年近四旬的闻一多为蓬勃兴起的全民抗战所鼓舞，重新焕发了青年时代的热情，毅然放弃了教授可以乘车坐船的权利，参加了由二百多名男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过军事化的生活，步行入滇。当校方和学生为了安全劝他乘坐车船时，他深情地说：“前方在浴血抗战，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在后方，吃点苦怕什么？”他还用屈原的爱国精神鼓励学生：“屈原所以能做出那些爱国爱民的诗篇，和他大半生都过流放生活，熟悉民间疾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屈原的书，就要走屈原的路呀！”^①

湘黔滇旅行团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晚从长沙出发，至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到达昆明，历时六十八天，步行三千余里。闻一多在这长途跋涉中，目睹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他不无感慨地说：“国难当头，是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他重新操起了已搁置十余年的画笔，沿途作了一百余幅铅笔写生画，如实地描绘出祖国西南三省秀美的山川，多彩的名胜，各异的风俗。这些画中凝注着他对于祖国的爱。他还指导学生沿途搜集民歌民谣两千多首，到了昆明以后，编辑成《西南采风录》一书出版。通过采风，激起了学生爱国的热情，也引起了闻一多的深思。他面对祖国遭蹂躏的山河，悲愤

^①陈登亿：《回忆闻一多师在湘黔滇路上》，《闻一多纪念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8月版第276页。

地写道：“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他还庄严地宣告说：“我们能战，我们渴望一战而以得到一战为至上的愉快。”^①

三千里的行程，碰巧多半是三年前红军长征所走过的路线。闻一多沿途听说了许多关于红军的故事，使他对共产党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他深深地感到，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所创造的伟业，虽然没有刻在石碑上，但是却有广大劳苦人民的“口碑”^②为其广为流传，而且这种口碑是磨不灭砸不碎的。

由于旅途生活匆忙劳顿，顾不到修面整容，闻一多到昆明时留下了很长的胡须，美髯飘拂，很是潇洒。他索性当众蓄须明志：“这一把胡子，是因抗战失利，向后方撤退时蓄起来的，我一定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才把它剃掉！”

闻一多步行三千里，上了抗战的第一课，迈出了走向人民的新步伐。他在一封信中说：“抗战后，尤其在步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沿途曾作风景百余帧，到昆后又两度参与戏剧工作，不知者以为与曩日之教书匠判若两人，实则仍系恢复故我耳。”^③这表明，闻一多经历了十年埋首古籍、不问政治的学者生涯后，在祖国的存亡和民族的危难面前，在现实的教育和自身的反省之中，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看到了自己脱离民众的弱点，终于恢复了五四时期的那种昂扬奋进、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精神。

身为知名诗人、学者和教授的闻一多，一旦接近了人民，

①闻一多：《〈西南采风录〉序》，《闻一多全集》卷3第395—396页。

②参阅陈登亿：《回忆闻一多师在湘黔滇路上》。

③闻一多：《给冯夷》，《文艺复兴》第2卷第4期。

找到了真理，他的思想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实使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临时大学奉命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是为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高等学府。比起动荡的抗日前线，这里的生活要相对安定一些。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更加密切关注着抗日战争的局势发展。他首先从国共两党对于抗战的不同态度和表现来认识问题，评判是非。他目睹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皖南事变，挑起事端，排除异己，并在大后方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大发国难财，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甚至使大学教授们都处在半饥饿状态之中。有一次，他亲眼看到一些被国民党政府抓来的所谓“壮丁”（实际上是“瘦丁”、“病丁”），在还没有走上抗日战场之前，就被折磨虐待而饿死在大后方马路旁的惨状。这一切都使他对国民党大失所望。可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共产党却在延安等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坚持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而且还打了一些大胜仗，那里的人民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和希望。这又使他十分向往。尤其是他原来在清华大学教书时的一批青年学生，在参加了“一二九”救亡运动以后，大都到了抗日根据地。他的二哥闻藜青的儿子也化名“黎智”，投奔共产党去了。这更使他在感情上与共产党“那边”有了割不断的联系。

这时，中国共产党也很关心闻一多。一九四三年春，中共南方局派华岗从重庆到昆明来做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就曾专门拜访过他。尚钺和楚图南也经常与他联系，向他伸出热情的手。党还通过不同的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

论》、《反对党八股》等著作。翌年，他秘密地加入了由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在那里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国家论》（即《国家与革命》）等著作。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象灿烂的朝霞，给他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他由衷地称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说：“这本书把我想说的都说透了，我没有想过的也被他说服了。”“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著作。”^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洗刷了他的唯心精神，解开了他长期以来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疑团，使他明白了爱国主义是有其鲜明的阶级内容的，爱国主义只有和民族、民众紧紧连在一起才有意义。这时他高呼“发现了人民！”并说：“我现在思想豁然开朗了，过去我只晓得抽象地爱国，不知爱什么国，甚至过去我曾错误地认为‘国家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现在我才知道‘国家主义’是反动的；爱国只能是爱新民主主义的国，现在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②

闻一多还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来解剖自己的学术思想，总结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他说：“我们觉悟了，我们昨天那种严守中立，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昨天如果我们是因为被人捧为超然的学者专家，超然起来的，那么我们今天确是觉悟了，知道那种捧是不怀好意的灌米汤，因为只有我们超然，老爷们才更敢放手干他们那套卑鄙的吃人勾当。”^③闻一多敢于正视自己曾经误入歧途的事

①参阅闻立鹏：《血土》，《闻一多纪念文集》第412页。

②参阅侯方岳：《忆闻一多同志》，《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01—202页。

③闻一多：《民盟的性质与作风》，《闻一多全集》卷3第551—552页。

实，并毫不留情地与之彻底决裂。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他真诚地说：“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①

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闻一多终于明白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凡艺术救国、教育救国之类，都不过是“白日梦”并不可能真正救国。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使他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认识得更加清楚，从而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民主运动洪流之中。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闻一多说：“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针对蒋介石鼓吹的儒家思想，他斥之为“奴隶管理政策”^②。

闻一多的思想发生了如此根本性的变化以后，便产生了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一九四四年初夏，吴晗、周新民先后找闻一多谈话，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知道周新民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于是向周吐露了自己的心曲：要参加我就想参加共产党。这表明闻一多此时已经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走上了崭新的道路。过了不久，周新民又向闻一多传达了组织上的意见，认为目前闻一多参加民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于是，他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就答应了。从此，闻一多便倾尽全力地为民主运动而奔走呼号。

^①转引自王康：《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327页。参阅闻立鹏：《血土》。

^②闻一多：《什么是儒家》，《闻一多全集》卷3第464页。

实，并毫不留情地与之彻底决裂。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他真诚地说：“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①

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闻一多终于明白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凡艺术救国、教育救国之类，都不过是“白日梦”并不可能真正救国。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使他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认识得更加清楚，从而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民主运动洪流之中。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闻一多说：“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针对蒋介石鼓吹的儒家思想，他斥之为“奴隶管理政策”^②。

闻一多的思想发生了如此根本性的变化以后，便产生了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一九四四年初夏，吴晗、周新民先后找闻一多谈话，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知道周新民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于是向周吐露了自己的心曲：要参加我就想参加共产党。这表明闻一多此时已经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走上了崭新的道路。过了不久，周新民又向闻一多传达了组织上的意见，认为目前闻一多参加民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于是，他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就答应了。从此，闻一多便倾尽全力地为民主运动而奔走呼号。

^①转引自王康：《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327页。参阅闻立鹏：《血土》。

^②闻一多：《什么是儒家》，《闻一多全集》卷3第464页。

同年七月七日是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党决定通过纪念抗战的活动，来推动民主运动的开展。这天晚上，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省立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联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时事报告晚会。这是“皖南事变”以后在昆明召开的第一次公开讨论现实政治问题的群众集会。消息传出以后，群情振奋，特务恐慌。开会时间还没有到，至公堂内外已经挤满了学生和市民，估计约有近四千人。国民党军政当局想要取消这次集会已经为时太晚，于是只好让云大的特务训导长出面宣布：教授们演说时只能谈学术问题，不得涉及现实的政治。晚会开始时，闻一多听说这个会是讨论政治经济问题的，他自认为没有发言权，只是想来听听。这时，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数学家）登台大讲数学，说什么无论数学多么复杂，都可以按规律演算出来，但如果随意改变公式，就会错得一塌糊涂。据此推断，他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大事要听从政府指挥，不可乱变，学生要念书，不应谈什么政治。熊庆来的这一番显然是受人指使的“高论”，着实惹火了台下的听众。闻一多“嚯”地站了起来，要求发言，全场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控制了一下自己被激怒了的情绪，尽量平静地开始发言：“今天晚会的布告写得很清楚，是时事报告晚会。我对政治经济懂得太少，所以是特来向诸位有研究的先生请教的。但是看得很清楚，有人却并不喜欢这个会，不赞成谈政治，据说那不是我们教书人的事情。”^①

说到这里，闻一多停了一下，提高了嗓门继续说：“我的

^①参阅马识途：《时代的鼓手——闻一多》，《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97页。

同年七月七日是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党决定通过纪念抗战的活动，来推动民主运动的开展。这天晚上，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省立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联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时事报告晚会。这是“皖南事变”以后在昆明召开的第一次公开讨论现实政治问题的群众集会。消息传出以后，群情振奋，特务恐慌。开会时间还没有到，至公堂内外已经挤满了学生和市民，估计约有近四千人。国民党军政当局想要取消这次集会已经为时太晚，于是只好让云大的特务训导长出面宣布：教授们演说时只能谈学术问题，不得涉及现实的政治。晚会开始时，闻一多听说这个会是讨论政治经济问题的，他自认为没有发言权，只是想来听听。这时，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数学家）登台大讲数学，说什么无论数学多么复杂，都可以按规律演算出来，但如果随意改变公式，就会错得一塌糊涂。据此推断，他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大事要听从政府指挥，不可乱变，学生要念书，不应谈什么政治。熊庆来的这一番显然是受人指使的“高论”，着实惹火了台下的听众。闻一多“嚯”地站了起来，要求发言，全场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控制了一下自己被激怒了的情绪，尽量平静地开始发言：“今天晚会的布告写得很清楚，是时事报告晚会。我对政治经济懂得太少，所以是特来向诸位有研究的先生请教的。但是看得很清楚，有人却并不喜欢这个会，不赞成谈政治，据说那不是我们教书人的事情。”^①

说到这里，闻一多停了一下，提高了嗓门继续说：“我的

^①参阅马识途：《时代的鼓手——闻一多》，《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97页。

修养不好，说话容易得罪人。好在大家都是老同事，老朋友，虽然意见有不同，可以提出来讨论。”接着，他的眼光扫了一下熊校长，不客气地说：“深奥的数学理论，我们许多人虽然不懂，这哪里值得炫耀？又哪里值得用来吓唬人？今天在座的谁没搞过十年二十年研究？谁不想安心研究？但是可能吗？我这一二十年的生命都埋葬在古书古文字中，究竟有什么用？究竟为了什么人？不说研究条件，连起码的人的生活都没有保障，怎么能再做那自命清高，脱离实际的研究？”闻一多越说越激动，长胡子气得直抖。他忍不住大声吼道：“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讲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①闻一多就是这样，用“学生要管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学生要念书”的论点，使全场听众欢欣鼓舞；也使胆小怕事的熊校长在台下坐立不安，他不时地小声地辩解：“闻先生，你误解我了，你太误解我了！”事后，昆明地下党的同志请华罗庚去做熊庆来的工作，熊庆来表示理解地说：“是训导长让我去的。我上了特务的当。我不该去，你见到一多，帮我解释一下。”闻一多得知此情后，也不无歉意地说：“当时不得不这样啊。自然，我讲话太嫌锋利了一些。”^②

闻一多积极投身到民主运动中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假献殷勤，千方百计地想利诱收买他。国民党西南联大中央直属区分部委员陈雪萍几次想拉闻一多加入国民党，对他说：“你这二年来喜欢公开讲话，加入了国民党后，讲话就更自由了，成了

^①参阅马识途：《时代的鼓手——闻一多》。

^②参阅华罗庚：《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40—141页。

自己人，更可以随便讲话了。再说入了党，生活上也会得到一些帮助。”闻一多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害怕他讲话，企图封住他的口的一个阴谋。他义正辞严地说：“他们想封住我的口是封不住的，人民需要我讲话。这班腐烂透顶的垃圾，大后方的人民迟早会起来清除他们的！”至于说到什么“生活上的帮助”，闻一多更是气得脸色铁青，他认为：“这简直是对我的污辱！”^①

一九四四年暑假的一天，进驻昆明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在北较场军部举行时事座谈会，邀请了闻一多、吴晗等十一位教授参加。闻一多在耐着性子听了几位高级军官的发言以后，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他无所顾忌地站起来说：“刚才听了诸位的讲话，特别是军部几位先生的讲话，知道了不少情况。以前我们看到各方面都没有办法，总以为军事上或者好些。现在才知道军事上也并不妙。这种现象如果继续拖延下去，国家前途如何得了？抗战前途更是不堪设想！看来，现在只有一条出路了，那就是——革命！”^②闻一多在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部里高谈“革命”，使全场顿时哑然。

闻一多在民主运动中，还积极帮助那些仍旧埋首书斋的知识分子觉醒，投身到爱国的斗争中。那时有一些教书人面对“国破山河在”的局面痛心疾首，但又找不到出路，因而陷入极大的苦闷彷徨之中。费孝通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一篇题为《鸡足朝山记》的游记中，借景抒发了这样的心情：面对日寇

^①参阅何善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70—271页。

^②参阅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闻一多纪念文集》第468页。

飞机的轰炸，家庭生活的重压，“心里好象有着刺，拔不出来，要哭，没有泪；想飞，两翅胶着肩膀；想跑，两肩上还有着重担。我沉默了，话似乎是多余的。光明在日子的背后。”闻一多看到这些话，感到作者过分的消极。一年后，费孝通从美国讲学归来，闻一多对这种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意见，指出：“这往往是知识分子对现实无可奈何的一种想法，我自己过去就有过，而且钻进故纸堆，就象你们知道的，听任丑恶去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结果呢？明哲可以保身，却放纵反动派把国家弄成现在这样腐败、落后、反动，所以我们不能不管了，决不能听任国民党反动派为所欲为了。”^①一席语重心长的肺腑言，温暖了费孝通的心。费孝通作为民主运动的一个“新兵”，决心向闻一多等先进同志“学步”^②，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王力也是这样的一个“新兵”。抗日时期，国难当头，王力却在报上发表了一些脱离现实，格调不高的小品文。闻一多看后，以挚友的身分批评他，不该写那样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后来，王力转变了立场，写了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诗，闻一多立即大加赞扬，并与王力促膝谈心。他们谈到了共产党、解放区、毛主席。这次谈话使王力终生难忘，他说：“我是从闻先生口里第一次受到革命教育的。”^③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诱收买闻一多的阴谋失败后，就放出空气，说什么教育部将解聘闻一多，特务也将暗杀他和别的民主人士。面对反动派的威胁、恫吓，闻一多的亲属、师友、学

^{①②}费孝通：《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46页。

^③王力：《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73页。

生都替他担心。有的学生恳求他“爱护自己一点，因为今天讲真理的人太少，我们经不起敬爱的长者们的损失。”闻一多听后十分激动，噙着热泪表示自己绝不能因为反动派的恫吓就退出战斗，“这是做人的态度，……我觉得许多青年人太冷了，……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自己安全吗？我很感激，……可是我还要做人，还有良心……”^①，听者无不动容。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云南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起义三十周年纪念日。党决定通过纪念活动，组织发动广大民众，把民主斗争推向新的阶段。闻一多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他在群众大会上问道：“三十年了，居然国家还象三十年前一样，难道袁世凯没有死吗？”

群众一起回答：“是的，没有死！”

闻一多接着回头对坐在主席台上参加过当年护国起义的老先生们说：“你们比我们清醒，你们知道应该怎样对付袁世凯！护国起义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民主就必须打倒独裁。”

纪念会后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游行，闻一多和吴晗等进步教授走在队伍中间。“继承护国精神”、“扩大民主运动”的口号声，响彻在昆明闹市的上空。游行队伍解散后，学生们又将闻一多等围住。他看到民主力量日益高涨，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同学们说：

我们胜利地纪念了“护国纪念”三十周年。

你们看，我们的队伍这么长！

这是人民的力量。

^①王一：《哭闻一多先生》，《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第306页。

因为是人民的力量，所以它是伟大的，谁也不敢抵挡！

这是时代的洪流，它要冲垮一切拦在路上的障碍。

一九四四年就要过去了，我们要更好地迎接一九四五年！

让那些嫉妒我们，害怕我们的人发抖吧①！

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喜讯传来，正在昆明郊区度暑假的闻一多兴奋不已，立即跑到龙泉镇上的一家小理发店，剃掉了在胸前飘拂了七年半的美髯，践行了蓄须时的誓言，以示庆祝。八月十五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联合举行了一次具有示威性质的“从胜利到和平”时事晚会，主题是反内战，要和平。闻一多被邀请到会演讲。他握着学生们自制的扩音器，如狮子般地怒吼道：“谁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谁！”

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与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了四十三天，被迫签订了《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另一方面则加紧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新的内战。中国上空重新笼罩着战争的乌云，闻一多愤怒地把内战斥为“民族自杀的现象！”②

蒋介石在准备发动内战的同时，又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

①参阅王康：《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31页。

②闻一多：《“一二·一”运动始末记》，《闻一多全集》卷3第523页。

对云南地方长官龙云发动了突然袭击，在枪炮声中改组了云南省政府，由蒋介石的亲信李宗黄代理省主席，关麟征接任省警备司令。李、关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加紧镇压民主运动，使“民主堡垒”的昆明沉浸在腥风血雨之中。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校学生联合召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座谈会，到会者五千余人。这使刚刚接管昆明、立足未稳的蒋介石反动集团万分恐慌。他们派出大批特务扰乱会场秩序，切断电源，四处放枪，威胁集会的群众，使会场出现一些骚动。闻一多当即挺身而出，高声喊道：“不要动！坐下来！我们不怕！”这喊声给了集会师生以巨大的鼓舞。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民主集会的卑鄙伎俩，激起了昆明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极大义愤。全市三十一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决定从第二天起一致罢课以示抗议。此举得到了许多群众的同情支持，反动派为此派出了大批特务暴徒，四处殴打侮辱爱国学生，同时街上还出现了悬赏四十万元现钞收买闻一多的人头的恐吓标语。

十二月一日上午九时到下午四时，全副武装的反动军警和特务分别闯入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西南联大及其附中等学校，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联大学生李鲁连、潘琰（女）、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等四人；联大学生缪祥烈左腿骨被炸断，成为终生残废；另外还有二十余人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在这场斗争中，始终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将这一天称作“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①，

^①闻一多：《“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说这是反动派制造的“黑色恐怖”。事后，闻一多应进步学生之约，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亲笔写下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一文，刻在昆明“四烈士之墓”前面的石柱上。他热情讴歌四烈士“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①，继续战斗。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是四烈士出殡的日子，沿途两万余人参加送葬，闻一多担任四烈士殡葬典礼的主祭人，走在最前面。下葬时，闻一多致词说：“我们一定为死者报仇，要追捕凶手。我们要追到天涯海角。这一辈子追不到，下一辈子还要追，这血债是要还的！”他带领大家宣誓：“人民的道路，是艰苦而曲折的。我们将以更坚定一致的步伐前进！”

闻一多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又兼任了新创刊的昆明《民主周刊》社社长。他虽然很忙，但对周刊十分重视，从组稿、写稿、审稿，直到出版，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用自己犀利的笔，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杂文，为民主力量呐喊。这一时期他的文章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战斗性，篇幅一般都不长，多则数百字，少则几十字，然而却都是掷向敌人营垒的匕首投枪。

这时期，蒋介石沿袭了历代封建帝王的统治手法，鼓吹封建统治的儒家思想。闻一多为此写了《什么是儒家》一文，详细地分析了孔子产生的时代，指出“儒家思想是奴隶社会的产物”^②，它之所以还能在近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有市场，原因有二：一是“客观条件成熟”，二是“主观条件”需

^①闻一多：《“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②闻一多：《什么是儒家》，《民主周刊》第1卷第5期。

要。接着，他又写了《关于儒、道、土匪》一文，进一步论证了儒、墨、道家的传统思想都是“中国文化的病”^①，它们在新时代都只能是为封建买办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效劳。因此，只有批判了中庸之道，才能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又发表了《兽、人、鬼》的讲演，把敌我友三方用形象的语言比喻为兽、人、鬼，指出反动派在“一二·一”惨案中充分暴露出残酷的兽行，他们是刽子手。人对于这类兽行的认识还是清楚的，可是还有一些“为虎作伥”的鬼的想法和做法，人们也要善于识别，充分认识他们的真面目^②！闻一多在这一时期写的杂文和作的演讲，证明他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因此能够入木三分，一语中的，有很强的战斗性。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西南联合大学宣布结束，并举行了结业式。全体师生在校园内竖起了一座由闻一多书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记叙了联大的经历。从此以后，饱受了八年离乱之苦的师生们，都在欢欣鼓舞地准备复员北上，分别回到原来的三所大学。可是，正当学校已放暑假，学生陆续北迁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全面的内战，在昆明也对地下党员、民主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加紧镇压。国民党特务放出空气，企图加害于闻一多。有人劝他尽快离开昆明，他却要求在昆明多留一段时间。他私下向一个朋友透露了心底的秘密：“我想晚点儿回北方去，一方面是为了我和你们安排好昆明的工作；另一方面，因为我有一年的休假，我想借此机会，从北平秘密到解放区去，哪怕是去看一看再回

^①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闻一多全集》卷3第470页。

^②闻一多：《兽、人、鬼》，《时代评论》第6期，1945年12月9日。

来。”^①

六月二十九日，民盟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闻一多和李公朴、张奚若、华罗庚等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针对知识界的一些朋友不过问政治的状况，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谈到，做学问的人，企图不过问政治，而取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接着他宣布了民盟决心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他伸出了自己的手说：

“诸位看一看在我的这张手上是空无所有，满手都是粉笔灰，教书人的手，自然只有粉笔灰，粉笔灰都是白的颜色，在我这张赤手空拳中，是满手纯洁净白的，有什么可怕呢？我愿意伸出这张洁白的手，期待着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② 闻一多语重心长的即席演讲，给广大听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晚十时许，著名的社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的负责人、当年“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市青云街口被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次日晨五时二十分逝世于云南大学医院。闻一多闻讯后，悲愤万分，立即赶往医院，抚尸恸哭道：“公朴没有死呀！公朴没有死！我们要复仇！”随即他又赶回《民主周刊》社，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回校后，闻一多又协助《学生报》编出了《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亲笔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表示了自己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当时，他的夫人高真适逢心脏病复发，眼见局势极度危

①赵汎：《回忆闻一多先生殉难前夕的二三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87页。

②胡笛：《痛悼严师闻一多先生》。

险，忧心如焚，曾再三阻止他外出。有一次，高真拉住了他的衣角，恳求地说：“我的病已经不能治了，万一你再遭反动派毒手，丢下孤儿弱女，谁来安排？怎样得了？”闻一多也知道家里不能没有他，但沉思了一会儿后，仍然坚定地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诸事不能进行，何以慰死者？何以言民主？万一身遭不测，后事我也顾不得了……”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握拳顿足，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出门去了^①。

七月十五日上午，李公朴先生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大会，请李夫人张曼筠报告李公朴的殉难经过，到会者一千余人，里面混杂着许多特务。当时，外面早已风传闻一多已经上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名单，但他仍然带病出席。为了闻一多的安全，会议主持人本来没有安排他发言，但在李夫人由于悲病已极，泣不成声，被扶下讲台以后，闻一多突然拍案而起，怒斥凶顽，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他的正义的责问声在每一位到会的来宾心中震响。他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用嘴，写出了说出了千万人民心中压着的话，大家有笔有嘴有理由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偷偷摸摸的杀！”（鼓掌）他怒目环视全场，大声呵道：“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暗杀了人，还要污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是李先生的光荣！”在这正义而愤怒的谴责下，在场的有些特务面如土色，不自觉地耷拉下了脑袋。最后，他右手握拳

^①参阅赵铭：《闻一多先生死难详记》，《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第23页。

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象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的气吞山河的讲演在会场上掀起了海啸，将听众情绪推向了峰峦之巅。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主持了《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了暗杀事件的真相，于是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度恐慌。散会以后，他在返家途中，突遭一群国民党特务袭击，不幸被美制冲锋枪射中十余弹。他就是这样，为民主运动洒尽了最后一滴血。终年四十七岁。

闻一多遇难的噩耗传出以后，毛泽东和朱德立即从延安联名向昆明发来电称：“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①。正在上海的中共代表周恩来闻讯后，悲愤地流下了热泪。他与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联名给闻一多夫人拍电致哀，并痛斥国民党特务：“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历史之纪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此已暴露无余。”^②同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文化界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致词说：“鲁迅、闻一多都是最忠实、最努力的牛，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在人民面前发誓：做人民的奴隶，受人民的指挥，做一条牛。”

闻一多逝世后，全国各地举行了各种形式的追悼活动，美国、英国的友好人士也纷纷发表言论，抨击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压制民主，实行独裁，挑起内战的罪行。闻一多的牺牲，唤起了千百万青年投入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

^①《毛泽东、朱德唁电》，1946年7月19日《解放日报》。

^②《中共代表唁电》，1946年7月18日《新华日报》。

江竹筠

卢光特 谭重威

(一)

江竹筠，原名竹君，人们常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日，她生于四川自贡市大安区爱和乡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江士林读过小学，婚后到重庆谋生。母亲李舜华独自耕种着几亩田土，勉强维持生活。江竹筠八岁那年，家乡大旱，饿死不少人。母亲带着她和弟弟江正榜逃荒到重庆，寄住在三舅家里。母亲帮三舅带孩子，江竹筠也帮他家做些轻微的家务劳动。两年后，母亲在东水门租了一间小屋，找点针线活做，父亲在轮船上办伙食，多少给家里一点帮助，才勉力让十岁的竹筠和八岁的正榜上了半年小学。以后轮船公司破产，父亲失业，独自回家乡做小生意，几年后病死在家乡。

父亲失业、病故仅靠母亲做针线活无法养活三口人，母亲就在重庆南岸大同袜厂做工，江竹筠也去当了童工。在大同袜厂干了两年，她们母女被袜厂斥退。妈妈又去帮三舅带小孩和干家务劳动，江竹筠姐弟由三舅设法免费送到教会办的孤儿院小学就读。江竹筠重新获得读书机会，学习异常刻苦，各科成绩优异，常得班上第一名，其成绩总分居全校第一，曾荣获学校

银质奖牌。

在孤儿院小学，江竹筠的级任老师丁尧夫对她的影响很大。丁老师循循善诱，在讲历史故事、近代国耻和鲁迅等人的进步作品时，充满着悲愤和激动之情，常使学生感动得流泪。他还辅导江竹筠、何理立等几个跳级的优等生阅读课外书籍，启发她们去认识社会，识破反共谣言。在江竹筠朦胧的思想上，闪现了点点星光。

(二)

在孤儿院小学的后期，江竹筠的妈妈与嫌贫爱富、心胸狭窄的舅母实在处不下去了，就搬到临华街一间破房住下，白天在观音岩摆了个售香烟和兑换铜币的小摊，晚上江竹筠和母亲一起帮别人洗衣服，艰难度日。

江竹筠小学毕业后，以优良成绩考入南岸中学。在南岸中学，江竹筠不但被免缴学费，而且每学期都因学业成绩名列前茅而获得奖学金。

一九三九年春，南岸中学迁往江津。江竹筠在南岸中学毕业，考入中国公学附中读高中，校址在重庆郊区兴隆场。这时她已经十八、九岁。与她同班的女同学戴克宇是地下党员，她们朝夕相处，一起学习，议论时局，办壁报，到场镇作抗日宣传。戴克宇见江竹筠爱看《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求知欲很强，就借些革命书籍给她看，坦率地与她交谈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有关问题，江竹筠也主动向她谈思想。一九三九年夏，经戴克宇介绍，江竹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〇年秋，中国公学停办，江竹筠考入中华职业学校

会计训练班学习，同时担任该校和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同年秋，江竹筠从会计训练班毕业，到曾家岩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党组织指定她担任新市区区委委员，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员和区内的女党员，向他们传达党的地下工作方法，具体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破坏。

一年后，她和区委书记魏兴学有两次在求精中学和南区公园碰头时，发现有人监视。上级要她撤退。她先后转移到綦江铁矿和重庆郊区国民党机关的合作社任会计，都只干了几个月，组织又通知她离开。

一九四三年五月，党组织安排她给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当助手，并和他扮假夫妻，以掩护彭咏梧工作。彭咏梧的社会职业是中央信托局职员，他俩建立“小家庭”后，住在机房街（后来搬到中信大厦）。这个“家庭”即是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地下党组织整风学习的指导中心。江竹筠在达里加强了理论学习与党性锻炼，而彭咏梧在她的全力帮助和掩护下，工作也顺利多了。

有一天，江竹筠从新华日报营业部出来，发现被特务跟踪，用了很多办法才甩掉尾巴。党组织为了保障市委机关的安全，决定让她转移到成都。

（三）

一九四四年五月，江竹筠来到成都。因没有就业机会，组织上同意她投考大学。她考上了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改名江志炜，入川大学习。

江竹筠在川大的两年，正是抗战胜利前后的民主高潮时期。她投身到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中，精神特别振奋。根据川东地下党组织决定，在川大她不转组织关系，不发展党员，以普通学生身分，做好群众工作，主动配合当地党组织壮大革命力量。按这个要求，她置身于进步同学和中间同学之间，仅作为一般成员参加女声社、文学笔会、中国青年民主救亡协会。她避免在学生运动中居显眼地位，却密切注视着运动的整个进程，发现问题及时与进步同学互相商量，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她发现有些进步同学的政治活动过多，经常缺课，因而脱离了班上的群众，就向“民协”的一位骨干反映。化学系一位同学因为功课很好，在中间同学中威信高，中间同学很听他的话，参加民盟后，能带动很多中间同学共同进步。她的意见引起民协组织的重视，在工作中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民协”发现女同学陈光明思想进步，在政治上又不太红，办事能干，在中间同学中很有吸引力。江竹筠主动协助“民协”加强对陈的培养。一九四五年同学们准备选陈当女生院伙食团的年度经理，主持全年的伙食管理工作。陈怕耽误时间太多，不愿意干。江竹筠给她做工作，她终于乐意接受这个任务，在江竹筠等人的帮助下，陈光明把伙食工作管理得很好。因此，陈光明在同学中声望更高。一九四六年春，学生自治会竞选，陈光明当选为理事长。进步学生第一次争得了合法的领导权，从而促进了学运的开展。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组织上批准江竹筠与彭咏梧结婚。翌年四月，江竹筠在成都生了儿子彭云。产假满后，又完成第二年的学业。党组织有新的斗争任务等着她，她在遂暑假期间毅然回到重庆。

(四)

蒋介石政府强加于人民的内战烽火，已经在全国很多地区燃烧起来。国统区人民反独裁、反内战的怒潮，汹涌澎湃。在四川省委领导下，重庆市委正在清理和恢复重庆及川东各地党的地下组织。彭咏梧是市委委员，分管学运及川东部分地方的党组织，工作十分繁忙。党组织决定江竹筠留重庆作彭的助手。一方面协助彭咏梧处理党内事务，另一方面负责和内外联系。

随着时局的变化，江竹筠的三舅李义铭在政治上向左转，并让江竹筠在他办的敬善中学任兼职会计。这个职业，既有一定收入，又有行动自由。江竹筠在这个职业的掩护下，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她不仅和重庆市外的各个秘密通讯站保持联系，有时还要接待农村来的同志。她到成都时，母亲患高血压病去世。她家在观音岩的吊脚楼房子，成为过往同志的临时“招待所”。

一九四六年底，因美军强奸北平女大学生事件，爆发了全国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重庆这次学生运动是在四川省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彭咏梧、江竹筠等按照省委“大胆、放手”的方针，组织全市学生成立了抗暴联合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组织小分队在街头、郊区开展反对美军暴行、反对内战的宣传活动。

一九四七年三月初，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往延安。江竹筠受市委指派，负责联系重庆育才学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学院党的工作和开展学生运动。她紧密依靠这些学校党的组织和进步师生，积极贯彻党的指示，学生运动开展得有声有

色。在学生运动中，江竹筠经手发展了十多个党员，四五十个“六一”社员。这些同志后来都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刘谿铸、陈然、蒋一苇等人创办了油印的地下刊物《挺进报》。《挺进报》从第三期起转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市委通过彭咏梧直接领导该报。作为老彭的助手，江竹筠负责传递稿件和组织发行，为该报做了很多工作。

一九四七年春夏，川东党组织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武装斗争。十月，市委改组，成立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彭咏梧任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直接领导下川东地区的武装斗争。江竹筠以下川东地工委和川东临委的联络员身分与老彭一同前往下川东。

(五)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底，彭咏梧与江竹筠装扮成回老家探亲的模样，乘船离开重庆。他们的目的地是下川东武装斗争的前线——云（阳）、奉（节）、两巫（巫山、巫溪）。行前，他俩把一岁半的云儿委托给王珍如和蒋一苇、陈曦夫妇暂时代养，同时又托亲人谭竹安写信请他的幺姐谭正伦来渝共同抚养。然后，他俩就踏上了新的征途。

川东临委领导的这次下川东暴动是同年春天开始筹备的。一年来，组织群众，筹集枪枝，已形成四个暴动区域，老彭大胆地提出迅速发动大规模暴动的方案，首先在云、奉、两巫拉开，其余地区继起响应。这个方案得到临委和地工委的同意与支持，并指定老彭直接指挥。

彭咏梧和江竹筠在万县稍事停留，即赴云阳。江竹筠担任联络，她沿途细心地设点布线，分别在万县、云阳、云安镇设置交通站，还为过往的同志在各地选择了便于掩护的茶馆、旅社。

十二月，江竹筠随老彭到云阳的汤溪沿岸，老彭在这里召集炉塘坪会议，宣布川东民主联军的建制，下川东编为一个纵队，赵唯任司令员，老彭兼任政委。会后，江竹筠一行又到奉节青莲乡——奉大巫工委和第三支队的暴动中心。老彭与工委考虑到暴动以后缺少干部，便派江竹筠回重庆，向临委要求尽快派干部支援。

江竹筠接受任务后，携带着几张青莲中学的聘书，扮作学校工作人员，离开即将点燃战火的前线，独自回重庆。

江竹筠走后，情况发生变化。暴动计划提前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进行，在云阳、巫溪同时发动，两地首战告捷。一月十日会师青莲乡，在蒋仁风指挥下，在铜钱滩又击溃奉节一个保安分队，生俘敌队长，敌军震慑。但此时敌军已布成四面合围态势，兵力大我十余倍，暴动队伍决定迅速转移到外线作战，于是分兵两路出击。十六日老彭率领的队伍在鞍子山与敌正规军五八一团遭遇，敌强我弱。突围时，老彭英勇牺牲。余部转移到巫溪潜伏……。

一月中旬，江竹筠在重庆对支援下川东的干部（三男一女）细心地交代了沿途交通联络点及注意事项，然后分头出发。一月二十日聚集在云阳董家坝老彭的外婆家。在这里，江竹筠得知部队失利和彭咏梧牺牲的消息。她极力镇定自己，和奉大巫工委副书记小卢研究下一步的行动。鉴于奉、巫、汤溪一带的严重局势，他们认为需立即回重庆向临委汇报请示。

在回重庆的路上，江竹筠强忍住自己的巨大悲伤，象往常一样用极大精力去关心别人，把减轻别人痛苦作为战胜自身痛苦的一种力量。到重庆后，川东临委分别与江竹筠、小卢研究了老彭牺牲后的局面，肯定并赞扬了江竹筠和工委的临时处置，完全同意江竹筠的看法：要谨慎从事，尚未拉开的暂不拉开……。

临委考虑到彭咏梧牺牲后，江竹筠再去下川东很容易暴露，而且孩子太小，需要她照顾，再三要她留重庆工作。好心的朋友也劝她接受组织的安排。她自己也知道此去有危险，可她坚持要去。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临委只好同意了她的要求。

江竹筠在重庆只住了十几天就回到万县。在去万县前，她把自己的家具什物送给别人，甚至结婚时购置的衣柜也送给了办《挺进报》的刘谿铸。她决心在彭咏梧牺牲的地方战斗到底。

(六)

江竹筠到万县后，因暴动地区风声很紧，临委和地工委要她暂时留万县，参加万县县委工作，协助做暴动地区的联络和善后工作。

经万县地方法院一位法官（川大同学）介绍，江竹筠在县法院会计室作职员。县委书记雷震也在法院工作，由于是同事关系，住处又是邻居，可以常来常往，联系非常方便。这段时间她给谭竹安的几封信^①，透露她出征未成的烦闷。她为“惨

^①原件存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

痛的死亡而伤心”，正“反省错误，另定新策”，力求“使乡下人（游击队）以后少吃些苦头”；她认为“死人也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她惦念云儿，感激竹安和幺姐的抚养，为了不太拖累竹安，她还打算必要时把云儿接到万县。

不料就在这时，重庆市委副书记由益智在重庆被捕投敌，引着一批特务来到万县，六月十一日在万县抓到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涂在威逼利诱下叛变，出卖了万县、开县和宜昌的大批同志。十四日上午江竹筠在万县法院附近被捕。

江竹筠与黄玉清、李青林等关在万县警察局一间小屋，江竹筠悄悄告诉黄玉清：“看来可能是涂孝文叛变了，你的关系只有我和他知道……现在是接受考验的时候了，不要承认是党员，不能牵连任何人……勇敢些，坚决不承认”。当天，她们都先后受了重刑，没有一个屈服。关在男室的刘德彬听见特务无可奈何地说：几个女的都硬得很，整死不开腔，有个女的（李青林）脚都撬断了也不说。

江竹筠等十二人被押上轮船，由万县解往重庆。在过河的木船上，江竹筠见刘德彬被捆得太紧，满面流汗，支持不住，便从自己身上摸出仅有的二十元关金券给押解的警察，叫他给刘松了绑。在轮船上，她大骂涂孝文“你这个狗，乱咬人，平白诬赖别人是共产党……你没有好下场。”故意让乘客和船员听见，想使他们把叛徒出卖共产党的消息传开，希望通过乘客传到重庆地下党的组织中去。她的这个目的果然达到了。

六月下旬，江竹筠等被押到重庆不久，特务头子、西南行辕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决定亲自审讯江竹筠。因为涂孝文虽出卖一些地、县委领导人，但把暴动地区党的组织领导，完全推卸在已死的彭咏梧一人身上。当徐远举弄清江竹筠是彭咏梧的妻

子和助手，就特别重视，妄图从她口中打开暴动地区党的组织的缺口。

审讯在老街三十二号徐远举的办公室进行。当班的特务军士搬来老虎凳、吊索、电刑机器、披麻带孝（有刺的钢鞭）、水葫芦、火背笕、撬杠等多种刑具，摆在室内两边，江竹筠衣着朴素，被押到徐远举面前。她胸有成竹，态度十分镇静，对那些刑具只轻蔑地斜视一眼，从容不迫地回答徐的讯问。

徐远举问了姓名、职业等，接着提了许多问题：“你在下川东干什么？你的丈夫是谁？你是哪一个领导的？你领导哪些人？有多少武器弹药？……”

江竹筠昂然回答：“我在万县地方法院当小职员，单身一人，不懂什么组织不组织、领导不领导。根本谈不到这些事，你们应该马上释放我。”

徐威胁说：“这是什么地方，你要明白。到这里来不交组织是过不去的。冉益智、涂孝文你知道么？彭咏梧是你什么人？……”

他一连提了十多个问题，都是江竹筠早已料到的。她一概回答“不知道”、“不认识”。后来对这类重复的讯问，干脆不予回答。

徐远举冒火了，桌子一拍：“你还装哑巴？我马上叫人把你的衣服剥光，你信不信？”

江竹筠立即怒斥道：“我完全相信你会那样干，因为你们是甚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连你的母亲、姐妹、女儿的衣服你也能剥光的。”

徐远举当着许多男女特务的面，尴尬不堪，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坐在旁边的一个特务用脚碰了徐远举一下，轻声

说：“你不会用别的方法么？”

徐指着刑具大叫道：“你看这是些什么东西？今天不交组织就不行，一定要强迫你交。”

江竹筠答道：“甚么行不行，不行又怎么样？我没有组织，马上砍我的头也砍不出组织来的！”

徐远举下令上刑，特务军士随即拿来一把特制的四楞新筷子，把筷子放在江竹筠的几个指叉间，双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在手指上猛夹，夹了左手夹右手，持续了十几分钟，痛得江竹筠满头大汗。徐远举才叫暂停，随即问道：“交不交？”

江竹筠缓慢而坚定地回答：“你们可以整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不行的，永远不行。我没有组织。”

徐叫军士再用力夹。江竹筠昏迷过去了。特务用凉水喷醒。徐又问：“说不说？不说再夹。”江竹筠愤怒地说：“筷子不行，把刀子拿来。你们这是野兽行为。你以为刑具是万能的，我看是无用的。”

酷刑继续着。江竹筠脸色苍白，汗如雨下。徐远举还在叫：“使力夹！”江竹筠又昏过去了。这样死去活来反复多遍，江竹筠一句话未说。门是开着的，门内外很多特务在旁听窥看。停了一会，徐又进行套骗劝降：“快把组织交出来，给你出路。老实告诉你，你的组织早已有人交了，你不说我也知道。涂孝文就在我们这里，你要见见他吗？”江竹筠虽受酷刑，神智仍清楚。坚毅地说：“涂孝文是个流氓，为他一条狗命，平白陷害好人，我不见这个下流东西。我也老实告诉你：要我的命，有；要组织，没有。”

二处法官张界插问：“你不是要革命吗？总要保住你的命才行啊！命都没有了，还革什么命？快把彭咏梧领导的哪些人

谈一谈。”江竹筠轻蔑地看了他一看，说：“革命是什么意思，你我无法辩论。我知道人要活命才能做事，我更知道不能昧着良心说话，昧良心的不是人。我不认得彭咏梧。”

徐远举又暴跳起来，（对军士）嚎叫着：“再不说就把她吊起！”特务军士拿起了一根又粗又长的麻绳，向江竹筠吼道：“快交组织！”江竹筠睬都不睬一眼，愤恨地扬扬头：“吊就吊，要组织，没有。”

张界又插话说：“更厉害的刑具还多得很，你不说还要吃大苦的。你要什么条件才交组织也可以提出来嘛！”江竹筠回答说：“把你们的毒刑统统用出来吧！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徐远举气得在室内来回打转。江竹筠毫无惧色地昂然挺立在那里。旁观的男女特务在门外悄悄议论“这个女人真厉害……”，“不用说……她是真正的共产党。”

从上午九点到十二点，徐远举用尽残酷狡诈手段，一无所获，狼狈不堪。只好自己转弯：“下午再吊，带下去。”

江竹筠被押回渣滓洞监狱。

一个星期后，张界和二处侦讯组长陆坚如奉徐远举之命，到渣滓洞监狱对江竹筠又进行了一整天的轮番刑讯。讯问的内容仍与上次相同，用刑的方式却更加狠毒：张界知江竹筠的手指刑伤未愈，认为在创伤处再施同样的刑，必定更难忍受。为了加强用刑效力，他事先布置特务军士夹筷子时慢慢加劲，到快昏死时就放松，然后再慢慢加劲，使受刑者既不能忍受，又不至昏死。陆坚如更采用了在江竹筠手指尖上钉竹签子的毒刑。

渣滓洞十六间男牢房和两间女牢房的二百多名难友，见江竹筠早晨被押往刑讯室，一直没有回来，都感到揪心的痛苦和

挂念，他们轮流守望在窗口，等待肖中鼎不断来报告江竹筠的消息。肖中鼎是被安排当贩卖员的难友，可以在走廊和各牢房门外走动。

江竹筠深知敌人急欲破坏暴动地区的党组织，决不会放过她，她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在酷刑和死亡面前毫不畏惧、沉着坚定。旧伤未愈的手指又被竹筷子反复猛夹时，她咬紧牙关，汗流满身，蹲下去又站起来，还不停地高声痛骂敌人。当她被敌人残酷地在鼻尖上钉进竹签子，痛得昏死过去，又被凉水浇醒后，仍厉声斥责：“你们简直是一群野兽……杀了我也不知道组织……你们是枉费心机，永远也达不到你们的目的……”

特务们的嚎叫和江姐的怒骂混成一片，站在走廊一端窃听的肖中鼎及较近牢房窗口前的难友都能隐约听见。骂声过去又是一阵沉寂，江竹筠又昏迷了……隔一会儿又听见了江竹筠的声音：“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不是说还有更厉害十倍、百倍的刑具吗？请吧！拼一条命给你们整……”接着声音又低沉下去。只听特务在喊：“把老虎凳搬过来……把辣椒水拿来……”

各牢房的难友隐约知道江竹筠受刑情况，气氛十分紧张，两百多难友都焦虑不安地在等待着关于她的新消息，关心她生命的安危。

特务们见江竹筠在辣椒水、老虎凳面前，视死如归，毫无惧色，心里冷了大半截。明知无能为力了，但仍不甘心失败，喊来叛徒涂孝文与江竹筠当面对质。涂孝文见江竹筠被整得双手鲜血淋漓，仍然正气凛然。他不敢正视江竹筠的愤怒目光，垂头丧气，迟迟说不出话来。江竹筠一见叛徒，就喘着气痛

骂：“你这条恶狗，乱咬人，……你陷害好人，我变鬼也要找你算帐……”陆坚如催涂孝文说话，涂仍然低头不语。特务们黔驴技穷，只得收场。

(七)

江竹筠被押回牢房已是黄昏时分。各个囚室的风门口挤满了人头，闪动着泪眼，难友们用无限崇敬和关切的目光凝望着她，向她致意。女牢房的同志们看见她受伤的手指，看见她疲惫而又坚毅的神态，一个个哽咽欲泣。她们用狱中能够弄到的冷盐开水、红药水、布条，给她的伤口进行消毒和包扎，让她躺下歇息。

当天晚上，慰问江竹筠的热潮在渣滓洞牢房掀起，有的写慰问信，有的收集慰问品。即使是用自制笔墨或竹签子、红药水写在草纸上的赠言，都饱含着难友们金子般的情意。

何雪松代表全体难友献给江姐：

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苏菲娅的精灵，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屈楚代表楼下一室写给江姐：

忍耐和毅力将换得真正的自由，
准备着死也准备着胜利。

.....

每次毒刑给你的伤痛，
象皮鞭抽打着我们的心！
你，我们的丹娥，
你并不孤独。

关在楼下一室的诗人蔡梦慰用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和对江竹筠的衷心敬佩，写下了不朽的《黑牢诗篇》的新的一章：

.....

难道可以把天上的飞鸟捉光么？
即使剪了翅膀，
鹰，你曾在哪一瞬忘记了飞翔？

.....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
木的杠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呵，
用刺刀来剖腹吧，
挖得出来的，
也只有又红又热的心肝！

.....

江竹筠读着信和诗，心情无比激动，眼泪花花地说：“同

志们太好了，我算不了什么……”她的手还不能动，请同室难友帮她写了回信：“……毒刑是太小的考验，筷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江竹筠的行动，在全体难友中引起了强烈的思想共鸣。他们互相鼓舞，相互保证：要象江竹筠一样勇敢坚强。渣滓洞监狱的二百多难友形成了革命的战斗集体。大家都象蔡梦慰的诗中写的：

一手持着信仰的盾牌，
一手挥着意志的宝剑。

当张界向徐远举报告江竹筠的顽强态度时，徐远举不禁叹息说：“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这些地方……彭咏梧死了，看来江竹筠也死心了。”^①

敌人在坚强不屈的共产党人面前，彻底失败了。

(八)

江竹筠在狱中，随时准备着对付更严重的考验，直至洒出满腔热血。但心里坦然愉悦。过了些时候，脚镣取了，刑伤愈了。新入狱的人渐渐少了。种种迹象表明，几个叛徒带来的破坏已被我党制止，她感到宽慰。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隐约透过铁窗，更使她欢欣鼓舞。

狱中没有正式建立党组织，女牢房中她和曾紫霞、黄玉

^①张界交待材料，原件存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

清、李青林实际上起着党小组的作用。她们组织同志们划分小组，有计划地进行学习，安排难友们轮流做清洁卫生工作，照顾伤病员和生孩子的同志。李青林腿断病重，也是她们精心照顾的对象。狱中缺乏学习资料，江竹筠和曾紫霞、黄玉清三人凭记忆默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两书的主要内容，供同志们学习。

女牢中有的同志思想上感到痛苦，江竹筠常和她们谈心，给予安慰和鼓励。在几次全狱性的集体斗争中，女牢都表现得特别出色。一九四九年春节，在敌人的岗哨和机枪严密监视下，江竹筠和女牢的难友们用被面做衣裙，在监狱的小院坝上化妆表演秧歌舞，高唱革命歌曲，迎接新春，迎接胜利。

为了接通狱外关系，江竹筠和曾紫霞利用机会对监狱中的年轻看守黄茂材作教育和分化工作，经过多次考验，证明黄确有转变，就托他带信到狱外，与狱外地下党建立了初步联系。

一九四九年八月，曾紫霞出狱时帮江竹筠带了一信给谭竹安^①。信中提到“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她感激竹安姐弟在困难中对云儿的养育。她对革命即将胜利，非常乐观。她写道：“苦难的日子快完了”。“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

这封信带出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即着手进行对在押革命者的大屠杀。蒋介石两次带着特务头子毛人凤飞到重庆，亲自布

^①原件存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

置其屠杀计划，江竹筠等三十人属于先杀的第二批。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左右，一群武装特务凶神恶煞般地出现在女牢门口，高叫“江竹筠、李青林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江竹筠揣测可能是敌人要杀害她们，她首先把她们默写出来的两本书塞给黄玉清，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旗袍，梳梳头发，用沉着坚毅的目光向难友们点头告别。难友们依依不舍，深深为她们的“转移”而担心。有的竟忍不住哭出声来。

江竹筠跨出牢门，上前搀扶着受刑断腿的李青林。又回头向站在风门口凝望的难友们挥手告别。

敌人佯称转移，先把江竹筠、李青林等三十人羁押在中美合作所礼堂，傍晚又分批押赴电台岚垭。特务已先在那里的废墟上挖了大坑，准备了镪水，以备毁尸灭迹。

江竹筠等在被押步行途中，见周围尽是人迹罕到的荒凉地方，完全明白这是他们为革命献身的时候了，便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同行的难友们齐呼口号，声音穿越夜空，一、两里路内的居民都能听见。刽子手们吓慌了，还未到达预定的杀场，就急忙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在口号声和枪声中，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江竹筠等三十位革命英烈倒在血泊里！烈士们的鲜血，涂染了红岩，装点了祖国江山，光耀了党的旗帜！

李木庵

中共桂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王大成

“法律家，文学家，群推长者；为革命，为人民，功在国家。”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李木庵追悼会上题的一幅挽联，对李木庵光辉战斗的一生，作出了总的评价。

李木庵，原名振堃，字典午，辈名宗潢，北伐时改名清泉，以后在从事地下活动期间曾换用靖康、蔓园、何桑木等名，三十年代到南京后改用木庵。他一八八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南省桂阳县正和乡排楼下村的一个殷实农家，在七十多年的人生征途中，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

(一)

李木庵小时过继给叔父光城为子，幼年随嗣父读私塾，后又就学于乡、县名儒门下，攻读“四书”、“五经”。他聪慧过人，勤奋好学。一次，塾师考查门生智力，要大家在手掌上写一万个汉字。同窗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小木庵稍加思索，别出心裁地从《三字经》书中引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写于掌上，以少概多，从一进万。塾师频频点头，赞他智力超群。清末举行童子试，他考中秀才，在乡、县

有“少年才子”之称。

李木庵不仅学业日进，而且因多年生活在农村，受劳动人民思想的影响，从小就养成了热爱劳动、关心他人的良好品德。在乡、县求学阶段，他常在节假日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离家十多里的正和圩，有个长工胡才才，终年出卖劳力，不得温饱，有时连食盐也买不起，只得用清水煮野菜充饥。李木庵得知后，解囊相助，将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送给胡家，胡万分感激，称他是难得的好人。家乡有些豪门子弟仗势欺人，他即挺身而出，公正评理，表现出不畏强暴的斗争性格。

李木庵中秀才以后，又赴长沙岳麓书院就读，探索研究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因此在古文学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尔后又赴京师国子监太学进修。十年寒窗，使他成为很有学问的人。

维新运动兴起，李木庵敏锐地接受了维新思潮的影响，决心弃经学，习新学，希望以一技之长为国效劳。起初，他投考陆军学堂，因眼近视，未被录取，遂考入京师法政学堂。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披阅各种法典，研究中西法治，取得了优异成绩。一九〇五年法政学堂毕业后，他担任讲席多年，并不新撰写文章，宣传革新观点，传播变法思想。辛亥革命后，李木庵出任广州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后因当地有些人排外思想严重，任职四年即被排挤出省。他怀着愤懑心情离粤赴北京、天津，另觅用武之地。途中在上海小住，一日去外滩公园游览，见公园前挂着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辱华牌示，顿时火从心起，怒不可遏。他认为中国的土地，中国人不能涉足，还将中国人与狗一样对待，真是天下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视洋人的吆喝声如耳边风，昂首挺胸，迈入园内，

或行或憩，神情泰然。翌日，他又跨入园内，虽遭阻拦，但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与洋人进行了说理斗争。

李木庵到京、津后，担任律师，筹组两地律师公会，在北京举办司法储才所，培养了不少司法人才。

一九一四年，李木庵应友人之邀，去福建办学，并在省路局兼理路政；后被该省授任为闽侯县地方检察厅检察长，供职计六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义愤填膺，在登另册峰时，赋诗名志：

大好河山堪镇摄，
忽来海水荡长空。
中原叱咤鹿争逐，
四野昏腾鬼暗纵。
我欲拔剑凌风去，
马尘起处歼群龙。
更当破浪横沧海，
斩取长鲸莫极东。①

李木庵在闽从事检察工作期间，全国招考县知事（即县长）。他应试合格，一九二一年被派到闽侯县任职。以后又改任福建督军公署秘书。因当地派系斗争严重，李本庵于一九二二年卸职回到北京，在家赋闲。

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杂志提倡科学与民主，李大钊等热情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

①《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内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也使李木庵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明确了中国革命所应走的道路。

(二)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正式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随后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北伐。

具有一定革命思想的李木庵，面临新的革命形势，认识到踏上一条新的革命道路的时机已经到来。一九二五年春，他奔赴福建，联络不满北洋军阀统治的闽军第三师旅长曹万顺和杜起云，密谋革命。粤方总部编该部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委曹、杜为正副军长，李木庵为政治部主任。

李木庵返闽传达命令后，即着手组建全军政治工作机关。这时他工作感到茫然，迫切需要党的指引。原先李木庵和中共福州特委有过联系，遂请示特委如何工作。特委要他依靠共产党员，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新型的革命军队。在福州特委的支持下，李木庵从黄埔一期生中和其他方面，邀请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作为全军各级政治机关的领导和骨干；同时对部队官兵进行革命目的和革命纪律的教育，使部队政治面貌迅速改观。

一九二五年夏，李木庵由政治部组长胡一帆、参谋胡秉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十七军编为东路军序列。十七军从福建出发，经浙江、江苏，配合程潜、林伯

渠的第六军，和谭延闿、李富春的第二军，进攻南京。在战斗中，李木庵因马失前蹄，腿部受伤。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发生，李木庵因严词拒绝蒋介石的拉拢，蒋竟密电十七军军长曹万顺将李“就地处决”。由于曹系一名正直军人，与李交谊甚厚，且向来敬佩李的学识渊博和道德高尚，乃拒蒋电令，并馈赠两百银元，敦促他离开部队，脱离危险。

李木庵离开十七军以后，隐匿在上海、苏州一带，靠卖文卖字糊口。不久，他在上海找到周恩来的住处，周恩来派沪中区委徐彬如代为接见。徐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称赞李木庵是年岁较大、党性很强、工作不错的好同志。

一九三一年，李木庵因母病回湖南省亲，同时准备组织农民武装。随即被湖南反动政府发觉，派兵围捕，幸得当地地下党员掩护脱险，转往南京。

在南京，他一面在李奇中（黄埔一期生，曾任红四军三十六团团长，现为国务院参事）家开设“李典午大律师事务所”，以律师作为社会职业，掩护革命；一面在南京八卦洲购买荒地五十亩，将家眷迁来从事农垦，以度生活难关，并筹措革命活动经费。李木庵本人也常来洲上参加劳动或召开有关会议。

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交往中，八卦洲上的贫苦农民，十分敬佩李木庵的学问和品德，希望他主持洲上的政务工作。一九三二年，乡长范某卸职，群众吁请李木庵接任。他征得党组织的同意。担任了八卦洲乡乡长。他深入农家，体察民情，农民把他当作知心的长辈对待，无话不说。任职年余，他坚持卸任，仍回南京作律师。

李木庵在革命斗争中，善于团结进步人士，开展统战工

作。一九三四年在福建莆田县担任国民党保安十三团中校军官的谢乃常（又名谢晋生），不安于位，思想正处在十字路口。李木庵了解这一情况后，即以姻亲长辈和共产党员身分，劝他率队投奔红军，走革命道路。谢欣然应允，后在莆田暴动，夺取全团武装，急电李木庵，要求派人接应，以便进入苏区。但因路程过远，接应不及而丧失良机。谢失利后，一九三五年又经友人举荐赴江苏沛县任保安队长。李木庵考虑该地处四省交界，有重要军事价值，不仅力促谢去就任，而且自己也亲往任该保安队的上士文书。他还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胡一帆、儿子杰南、侄子耀椿、内弟田明德等带往保安队补为士兵，计划在此积蓄力量，待条件成熟时，把队伍拉出去，在鲁、豫、苏、皖四省交界的微山湖（距沛县较近）建立革命游击根据地。

（三）

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均发生重大变化。根据时局的变化，中央军委留沪地下党组织决定派一批党员骨干赶西北开辟工作。李木庵由徐彬如推荐，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奔赴西安。

李木庵到西安后，在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宪兵营挂了个书记的空衔。四、五月间，党在西安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谢华任书记，徐彬如、李木庵为委员。特支成立后，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从学生运动入手，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不久，西安各学校相继成立了教职员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后来各行各业的救国会都先后建立起来。“西北特支”为统一行动起见，于同年六月把西安

各救国会组织起来，成立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下辖二十多个基层组织。“西救”设立总务部（李木庵负责）、宣传部（徐彬如负责）、组织部（谢华负责）。到西安事变时，又增设了联络部、妇女部、工人部、农民部、民众武装部等办事机构。虽为群众团体，人们却把它誉为“救国政权”。

李木庵充分发挥自己的法律知识专长，和敌人斗智斗法。八月二十九日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无端抓走东北籍爱国青年马绍周等之后，又在—个旅社抓捕爱国学生领袖、东北军职员宋黎，结果被杨虎城宪兵营的巡街马队截获带入营部。李木庵参加审讯随意抓人的特务分子，指斥他们任意抓捕、蹂躏人权的行径。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得知马绍周等被抓入省党部，十分愤慨，当晚派兵抢回被抓人员，并捣毁了省党部。这一事件被称为“艳晚事件”（二十九日的代电韵目为“艳”）。

“艳晚事件”发生后，西安各抗日团体纷纷集会游行，声援张、杨的举动。十二月九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此前，“西救”、“东救”等团体准备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请愿活动。“西北特支”对活动作了认真的研究和布置，召开筹备会议，并请中共中央派驻西安的联络员张文彬作指示。会上李木庵等发言指出：西安军民不愿打内战，已积极投入救亡活动。当前要以更猛烈的行动，充分表现反内战的力量，以促进我党团结抗日主张的实现。

十二月九日，西安各界群众万余人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周年游行请愿大会，李木庵等地下党员分头插入队伍进行暗地指挥。示威群众向“西北剿总”、陕西省政府等单位请愿，提出立即撤销“剿共”计划、动员全民抗日等要求，但未

见到张学良和杨虎城。这时蒋介石已率军政要员云集西安，连日召开“剿共”军事会议。蒋本人住在城东的临潼华清池。示威学生在请愿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决计到临潼请愿，要蒋介石当面答复抗日条件。因此，请愿队伍冲破重重阻力，往临潼进发，当队伍行至十里铺时，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担心学生会被蒋介石卫队残杀，急忙驱车赶来，恳切地说明在七天之内一定用满意的事实答复大家的要求。这时，请愿队伍才返回西安。

第四天，即十二月十二日，东北军张学良、十七路军杨虎城两位将领，激于爱国义愤，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如火如荼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终于发动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事变后的第二天，李木庵亲书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会标，贴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门口，接管省党部，开始在这里公开办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北特支”于十二月底撤销，成立中共临时陕西省委。原特支成员转移他地，李木庵仍留西安。他被顾祝同（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委派的西北行营主任）

“传讯”过两次，追查“西救”是些什么人组织的？有没有共产党参加？纲领是什么？有多少武装？……李木庵神情自若，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们都是爱国者，不分党派，共产党可能有，只要他爱国，我们都欢迎；我们的纲领就是抗日救国；至于武装，还没有搞起来。顾祝同又追问：这次事变是谁发动的？李木庵坦率地回答：是群众发动的，群众要抗日，不要打内战。顾祝同无可奈何，只好又把李木庵送回。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西救”被迫暂时停止活动。李木庵转往南京附近，组织巷民三百余人，协助我抗日军队构筑防御工事，并作锄奸工作。南京失守前夕，他把寄居在南京八卦

洲的小孩送往延安，自己衔命第二次回湖南家乡开辟新的工作。

李木庵回到湖南时，湘南特委正准备训练一批抗日游击队骨干。他与湘南特委王涛、卢文取得了联系，主动分担了这一任务，在家乡桂阳县正和圩办了桂阳县东镇乡抗日自卫干部训练班，李木庵为班主任，湘南特委李耀平（谷子元的化名）为副主任，招收农村进步知识青年和贫苦农民四十多人。训练班结束时，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学员回原地举办农民夜校，准备随时响应党的征召。

“七七”事变后，日寇长驱直入，沦陷区失学失业青年，纷纷流入湘南各地。李木庵对这些青年深表同情，打算办一所学校，收留、训练这批青年学生。经当地党组织同意，他动员本族中开明人士，从李族积谷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办学经费，又邀请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中的大学、高中毕业生为教员，于一九三九年春招收一百多个学员。同年下期，学生发展到千余人，并正式挂出桂阳县战时中学的牌子，公推李木庵为校长，李次晶为董事长。学校有党员八人，建立了党支部，朱文担任支部书记。战时中学对学生进行文化、政治、军事及抗日救国教育，为抗日战争培养、输送了一批有用的人才。同时，校党支部还组织学生和当地群众，同国民党县政府贪污不法行为作斗争。

一九三九年冬，广州、武汉失陷之后，食盐来源困难。当时桂阳县政府打着“统配口盐，分售群众”的幌子，组织“利民盐业公司”，借赴郴县调盐之机，中途将部分食盐高价私售，大发国难财。此事被战时中学发觉，李木庵即派教员前往调查。在掌握真凭实据后，由教员李醒园、李安治、骆明夫、

李仲升等二十余人联合署名，多次向上控告，终于使有关不法分子受到应有的惩处。消息传出，人民扬眉吐气，齐夸“战中”为民作主办了一件好事。

“盐案斗争”后，县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向国民党中央指控“战时中学”是赤化学校，李木庵等是“共党分子”。蒋介石即密令省、县密杀李木庵具报。幸得李亚明（当时是桂阳县团管区司令部少校部员，进步军官，一九四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县政府秘书孙怡仁处探悉这一消息，火速告知李木庵，李由地下党员李耀泗等护送，脱离了险境，辗转衡阳、桂林、重庆等地，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到达延安。

（四）

李木庵来到久已仰慕的革命圣地延安，精神格外振奋。从一九四一年起，他主要是从事政法工作，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检察长。

李木庵原系学法律出身，投身革命后特别是进入延安以后，积极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有关法治方面的著作，批判地吸取古代法治理论方面的积极部分，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的科学法治观。他在一首《论刑》诗中写道：“……政权防反动，镇压势所需……无刑固难致，徒戮亦非图。首宜谋教养，去贫与去愚，化邪为良善，四野臻坦途。”^①在日常法治工作中，他强调重证据和调查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依法量刑，执法如山，不徇私情。遇到疑难案件，则再三调查，反复

^① 《怀安诗社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研究，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轻易下结论。他重视法制教育和基层基础工作，在群众中培养骨干，建立耳目，群防群治，预防犯罪，以期从根本上减少犯罪根源和发案率，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李木庵在担任领导工作时，注重知识，大胆起用和培养人才。王怀安是个有法律专门知识的青年，李木庵通过组织把他从外单位调入边区高等法院担任审判员，并放手让他在办案第一线锻炼，给以耐心的指点，使他很快成长为司法战线的骨干。其他与李木庵一起在边区共事的青年同志，也都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和教育。

一九四三年，李木庵担任边区政府参议员、法律顾问和中国解放区行动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他深入调查研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参加边区各项政策、法律、法令、条例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李木庵在延安工作期间，已经年届花甲。他除自己加倍努力工作外，还对在身边的儿女们严加教育，放励他们赤心向党，锻炼成才，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一九四五年冬，儿女离延北征，离别之际，他曾赠诗以壮其行：

辞家万里赋联翩，
塞上因依又六年，
客邸犹能存定省，
老身何用计周全？
饶歌响彻上元运，
俊步踏翻燕北天。
解放途中齐努力，

杖头伫听捷音传。①

一九四六年冬，国民党军队阴谋进犯延安，我党中央机关一部分工作人员开始转移。李木庵一行于十一月十七日离开延安，转移到绥德办公；一九四七年初又搬回延安，住在杨家岭②。三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李木庵按照党中央安排，东渡黄河，于三月底到达山西临县的后甘泉村。一年以后，移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段期间，他担任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与谢觉哉等一起，为迎接解放全中国在法制工作方面作准备，曾参加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土地改革法规和《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等法律条文的起草工作。为了制定这些文件，他和同行们一起，“审时审事运三脑”，以至“梦中删稿犹闻声”③。他们多么期待“国门他日悬新宪，四亿蒸民笑口开”④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五）

李木庵一生勤奋好学，特别对古文学很有研究，擅长诗文。在延安的八、九年中，写下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战斗诗篇，受到诗友们的推崇。谢觉哉曾赋诗赞誉：

钱如工部多忠愤，

① 《怀安诗社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参见《谢觉哉日记》。

③④李木庵：《制宪》，《怀安诗社诗选》第242—243页。“三脑”指政治头脑、法律头脑和科学头脑。

李似昌黎更苦思。
中兴诗韵非余事，
珍重山沟笔两枝。①

诗中把钱来苏（中共党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和李木庵的诗词与杜甫、韩愈相比，称赞他们是陕甘宁边区的大手笔。

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宴请延安诸老。席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倡议成立怀安诗社，李木庵与谢觉哉、高自立、鲁佛民等与会者齐声赞同。林老即席赋五、七律各一首，开唱了这个诗社活动的第一声。两天后，《解放日报》以“延水雅集”为题，刊登了诗社成立的消息。

怀安诗社公推李木庵为社长，主持诗坛，荟集佳作。

诗社的宗旨，李木庵在他主编的《怀安诗刊》的序言里，写得很明白：“一国兴亡，视乎民气；民气升沉，系于士志，士志激越，发为心声。诗词歌曲，皆心声也。时至今日，四海横流，法西肇祸于西欧，倭寇逞暴于东亚。吾国积弱，首遭侵袭，大好河山，竟成破碎。国中志士，敌汽同仇，义愤所激，恒多泣血椎心，歌哭无地。西北为抗日民主根据地，五载以还，相率艰苦奋斗之中，不无慷慨悲歌之士，披襟述怀，吮毫抒愤，情无间于儿女，而敷陈时艰，痛心国难，志不失为英雄。意切共鸣，言出自由，或创作，或译述，辞在雅俗之间，体无新旧之限。不以地囿，相应声同。积篇成帖，随期公布，俾草木天籁，合成巨响；涔蹄浅沼，汇为洪流，既可扬民族之

①谢觉哉：《依韵奉酬李木老见示之作》，《怀安诗社诗选》第203页。

性，亦以振中国之魂。则心声所及，国运可回；军歌与战鼓齐鸣，吟坛共战场并捷。直可辅翼武功，岂徒目为文艺！”^①说明诗社是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擂鼓助威的业余文艺团体。

怀安诗社成立的九年中，李木庵收集革命长者的古风、近体、新诗、译诗两千五百余首。这些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生活气息浓烈，战斗性很强。“怀安一炬火，光辉照人寰。”诗社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战斗号角的作用。

怀安诗社成员有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钱来苏、续范亭、熊瑾玎等革命老人。李木庵作为诗社社长，曾对他们的诗作一一作过评论。他说：“朱总司令的诗，辞气慷慨，规模雄伟”。“凛凛乎抗日民族英雄革命元戎的风概，充满着无限的生命”。“林老的诗，恂恂恭勅，风致霭然……置诸少陵、剑南集中，殆无逊色。”“董老之诗，意新语工，字斟句酌，用事精辟，天衣无缝。”“徐老之诗……叙事如数家珍，遣词雅俗共赏，而有独特的风格，音韵铿锵，读之而余味不绝。”“谢老鎔经铸典，以古利今，清词如海，健笔凌云，绮密瓌研，庄谐并用，沉雄处如魏武横槊，奇矫处如鹰鹞巡天，皆不朽之作。”……

李木庵自己也写了大量诗歌。怀安诗社成立的宴会上，他即以七古数十韵以志其盛。其中有：

号角声飞前进曲，
血溅沙场草不绿。

^①《怀安诗社概述》，《怀安诗社诗选·附录》第292—293页。

汉将杀敌旧家风，
战绩留与新史续。
酒罢主人意倍温，
海内雄文待细论。
独向吟坛张旗鼓，
好把诗魂壮国魂。

诗中提出“诗魂壮国魂”的见解十分精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发生的一切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中，李木庵几乎都留下了这种“壮国魂”的诗篇。

李木庵和诗友们一道，还在改革旧体诗格律、订正诗韵、提倡通俗化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他在《论诗韵改革》中，明确提出了改革旧体诗的主张：

人问改革何者先，
我意改良在格律。
平仄对仗未可拘，
五七定言也不必。
参以长短句何妨，
所贵意明而气适。
音韵亦须谋改良，
旧本诗韵太窄逼。
古人古韵本时音，
今日时音自可立。①

①李木庵：《论诗韵，给怀安诗社同志建议》，《怀安诗社诗选》第87页。

在李木庵的倡议下，怀安诗社的诗作突破了一些旧的清规戒律，出现了旧瓶装新酒、律绝通韵、不拘对仗等较灵活的形式，在通俗化、群众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李木庵利用公余收集、整编、保管的怀安诗社的诗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收入在《十老诗选》、《怀安诗社诗选》、《怀安诗选》的集子中。他个人的遗作，被收入《窑台诗话》一书中。

(六)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北平和平解放。李木庵随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继续参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工作。建国初期，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刑事法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我国国情出发，学习苏联经验，批判国民党的反动刑法，在起草刑法典过程中，克服了不少困难。那时资料很缺，能够找到的只有一本《苏俄刑法典》和《苏联刑法总论》的初译稿。他依靠老解放区法律界的行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草案》。《刑法草案》脱稿后，他又动员陈瑾昆、庞荇菁、蔡枢衡等把他们的“私稿”拿出来，一起刻印分发给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和有关同志研究，成为一九五〇年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司法部后，李木庵任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还兼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的工作。建国初期制定、颁布的一些单行刑事法规，如《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妨碍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婚姻

法》等，他都曾参与起草和审定工作，为新中国的立法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司法行政方面，李木庵也是有建树的。司法部刚建立时，白手起家，百废待举，任务十分繁重。部里干部缺额大，党员骨干更少。就在这种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他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与其他部领导成员一起，依靠地方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支持，首先把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先后一一建立起来，并迅速开展工作，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分子、危害国家安全和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反革命分子及间谍特务分子，打击了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从而维护了人民民主权利。

李木庵在主持司法部工作期间，对干部既重使用，又重培养，亲自培养法制专门人员，他曾在前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和在职司法干部轮训班讲授新中国刑法的指导原则和审判实务等课程，使司法工作骨干在政治上、业务上尽快适应工作的需要。

在司法部工作期间，李木庵已年届古稀，身罹疾患，但仍黽勉从公，坚持上班，亲自听取汇报，审阅文稿，处理大量日常工作。

他生活艰苦朴素，对自己要求很严。住的是司局一级的房子，陈设简陋，从各方面节省公务费的开支。他的日常生活费用掌握很严，有点节余就资助烈士和困难亲友的儿女求学。一九五六年家乡兴建水轮泵站，他把长期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钱，邮回九百元帮助家乡人民发展水利事业。战友们赞扬他“忠诚服党义，人民勤务员。”^①

^①钱来苏颂李木庵挽诗。

一九五五年，中央考虑李木庵年老多病，让他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首席顾问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边休养边工作。他仍然力疾从公，对政法和统战工作出谋献策，发挥余热。一九五九年五月，周恩来邀请中央六十岁以上的老同志座谈，建议他们总结个人斗争经验，以传给后一代。李木庵对这项建议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打算立即动笔，用三年时间完成此事。不幸的是，他的病情日益恶化，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在京病逝，终年七十六岁。李木庵逝世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曾亲题挽联，痛悼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毕生精力的革命长者。挽联写道：

仰不愧天，俯不作人，革命俦侣中允推长者；
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怀安诗社里顿失主盟。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李木庵档案，存中央档案馆。
2. 1914—1923年《福建公报》。
3. 西北大学历史系等三单位1979年4月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4. 李木庵：《窑台诗话》，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
5. 延安革命纪念馆提供的解放前后的任命书、聘请书（复制件）。
6. 陈应中、谢华、徐彬如、王怀安、王悦尘、王汝琪、熊先觉、张尚鸾、魏文伯、王定国、宋黎、童陆生、张协和、李奇中、谢晋生、孙瑞华、李安治、李治杰、陈白琦等和李木庵的儿女李石涵、李斐仪、李德珍，儿媳徐化民、周敏箴、王冬青，以及李木庵家乡、南京八卦洲知情老人的回忆记录。

嵇文甫

李道雨 李育安 翟本宽

嵇文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建国后历任河南省副省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河南大学及郑州大学校长等职，兼任《历史教学》、《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编委，并领导创办了《新史学通讯》（后改为《史学月刊》），为开拓中国哲学史及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嵇文甫，原名嵇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河南省汲县（古卫辉府）城关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父亲嵇占元幼年丧母，与祖父相依为命，过着艰苦的生活。嵇文甫六、七岁时，家境开始好转，父亲便送他入学读书。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嵇文甫结束了私塾和小学生活，升入卫辉中学。这时，全国各地的反清斗争进一步发展，革命浪潮也波及到卫辉中学。该校学监暴质夫、体育教员张宗周和经学教员刘粹轩等都是同盟会会员，他们经常在校内外传播革命思想，抨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其中刘粹轩对嵇文甫的影响最大。嵇文甫经常听他讲述革命形势和革命党人斗争的故事，“谆谆切切，常至

夜分”^①。

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二年（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消息传到汲县，嵇文甫非常兴奋，曾组织二十余人集会庆祝并到街上游行。这是少年的嵇文甫“向往新社会，倾心于革命事业的一个开端。”^②

一九一五年秋，嵇文甫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北大有部分学生并不读书，上学仅是为了追求作官的资格，热衷于寻门路找靠山。有些教师不学无术，敷衍塞责。嵇文甫和那些追名逐利的学生不同，时间抓得很紧，学习非常用功。由于他在中小学时受到刘粹轩、李敏修等人的教诲，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加之攻读锲而不舍，对宋明理学“饶有兴趣”，有些体会常常是比较新鲜的，因而曾受到马彘初（马叙伦）等进步教授的器重^③。

一九一七年一月，著名的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以作为对北大进行整顿和革新的助手。此后，李大钊、胡适等亦相继来北大并参加编辑《新青年》。这样，北大文科的教员就形成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营垒，同反对科学与民主的守旧势力形成尖锐的对立。嵇文甫在后来新写的《“五四”回忆新片》中曾说：“五四前两年，新文化运动已经起来了。为五四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在当时已经非常热闹，新旧潮流激荡的十分厉害，教授们在课堂上，彼此互相冷

①嵇文甫：《辛亥杂忆》，载《郑州大学学报》1964年第3期。

②嵇文甫自传，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③张遂膏：《忆嵇文甫同志》，载《史学月刊》1964年第7期。

嘲热骂，……在学生中也出有《新潮》与《国故》两种刊物，形成新旧对立的局面。”^①他在北大学习的后一年半时间，尤其到一九一八年秋毕业的时候，北大的情形已经是“处于乌云密布，大风暴即将到来的前夕了”^②。这种“风”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三年的大学生活，使他学到了知识，练就了研究中国哲学和历史的基本功，而且也受到了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潮流的初步陶冶。

(二)

一九一八年秋，嵇文甫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河南，在开封省立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同时在开封一中、二中、女师及法政专门学校兼课。河南虽处“铁路四达之区”，但由于河南督军赵倜的严密统治，“新思潮、新事业”的发展较之沿海各省明显落后。三年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虽已波及到河南并正在日渐发展，但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重重阻碍。在开封一师，许多教师都是来自北京高等学堂，他们见识广思想解放，支持新文化运动，但也有不少教师思想较为陈旧。在新旧思想的斗争中，嵇文甫坚决地站在支持新文化运动的一方。

开封一师三年级学生徐玉诺看了《新青年》等刊物后，便学习用白话写作诗文；遭到国文教员张某的指责和反对，使学生们受到很大的压抑。嵇文甫针锋相对，大力提倡白话文，支持并指导徐玉诺等写白话文，还把用新思想、新文体写作的文章作为课文宣讲（其中不少是《新青年》上陈独秀、胡适的文章

^①载 1955 年 5 月 4 日《河南青年报》。

^②嵇文甫自传。

和鲁迅的小说及俞平伯等人的新诗,富有革新意义),使学生们的思想又活跃起来。他学识渊博,讲课生动活泼,很快就成为一名富有威望的青年教师,并获得了“小颜回”的称誉^①。

对于河南社会及教育界的“面貌徒更,精神不改”、陈陈相因的状况,嵇文甫极为不满。为打破这一局面,他到开封不久,便和冯友兰、韩席卿、徐旭生等成立了心声社,出版《心声》杂志,以新思想唤醒人心。这一杂志是五四前夕在河南发行的唯一的新型刊物,以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大路而促进其进步”为其宗旨。《心声》从一九一八年秋开始发行到一九二〇年一月共出版发行十期,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一些社会主义思想,抨击了当时社会和教育界的弊端,对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五四高潮中河南纷纷出现的各种新刊物,是和《心声》启开先河的作用分不开的^②。

嵇文甫既是《心声》杂志组织者之一,又是《心声》杂志的主要撰稿人。这期间他在《心声》上发表了《王船山的人道主义》和《吾所得于文学史者》等研究文章,颇有见地。其中《吾所得于文学史者》一文,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述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引出了新文学的应运而生是顺理成章的结论,启迪人们要顺应历史潮流前进。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声讨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的

①参见苏金伞:《我的老师嵇文甫》,载《河南日报》1979年10月28日;任访秋:《忆先师嵇文甫先生》载《河南文史资料》第5辑。

②参见:冯友兰:《“心声”发刊词》,转引自《五四运动在河南》,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225、233页。

消息，很快传到河南，开封的学生起而响应。嵇文甫参加集会游行，支持青年学生的革命行动。当时，为了有效地抵制日货，开封各界普遍成立了救国十人团。“十人团”以恢复我国主权和土地为目的，提倡使用国货，宁死不买日货，而且十人互相监督，“一人背约，九人议处之”。嵇文甫参加了这一组织，并和张遑青、刘薰宇等积极捐款，支持学生印刷宣传品^①。

在开封的学生爱国运动中，一师是走在前列的。徐玉诺是开封十五所学校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二〇年在全国掀起反对就山东问题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浪潮中，开封学联决定于四月十九日实行罢课斗争。由于反动军阀赵倜的破坏，学生运动受到严重挫折，徐玉诺决心卧轨一死来揭露反动当局的罪行，以唤醒民众。一天嵇文甫上课点名发现徐玉诺不在，即着人四下寻找，终于在开封南关火车站附近找到了徐玉诺，并劝他返回学校。嵇文甫耐心地开导他，指出以死抗争的方式不可取。徐玉诺受到教育重新振作起来，把忧国忧民的炽热感情，凝聚在笔端，创作了大量诗歌和小说，很快就成为当时我国新诗坛上第一个高唱“自己的挽歌”的人^②。嵇文甫教育了学生，学生也促进他坚定了革命的信心。他后来深有感触地说：“与其说当时的学生受到过我的启发，毋宁说我是深深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③

一九二〇年五月，开封创办了文化书社，以“从未有之廉

①参见《省立第一师范十人团捐款人启示及捐款人名单》，转引自《五四运动在河南》第27—79页。

②王子民、谢照明：《诗人徐玉诺》，载《奔流》1980年第4期、第5期。

③嵇文甫自传。

价出售”各种进步报刊，还介绍推销《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河南学界的一些先进分子，通过文化书社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嵇文甫便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

一九二二年九月，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在河南发行。嵇文甫认真阅读它的每一期，并很快就成为它的积极传播者。一九二四年十月，嵇文甫在《心声》上曾发表《做人问题》一文，这是针对梁启超的一次讲演而写的。这时梁启超已成为封建主义的卫道士，无批判地颂扬东方文化，并认为科学已成为西方的祸害。他在《为学与做人》的讲演中，提出用我国古老的文化形态——“仁”去超渡西方的“受害者”。为此嵇文甫写文章给以尖锐的抨击。文章说：梁任公的做人之道和我的主张相距千里，因为“人不是悬空的、抽象的、漫无着落的东西，他与他的社会、国家、周围的一切情况，都是息息相关的”。果真要做人，那就要首先针对当前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等等”，都加以痛快的解决，然后才能来讨论如何做人^①。这里，嵇文甫十分明确地把人看成一个社会的人，人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社会关系，受着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制约，说明他已经开始运用历史唯物论来观察研究社会问题了。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时期，统治河南的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倾向革命，为河南的革命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一九二五年春中共豫陕区委设立于开封，王若飞、肖楚女等先后在此工作，区委机关的刊物《中州评论》公开发行，我

^①嵇明（嵇文甫）：《做人问题》，载《心声》第20期（1924年10月）。

党的影响在群众中日渐扩大。“五卅”惨案发生后，全省各地群情激奋，迅速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高潮。这期间，嵇文甫曾为进步组织光明少年团撰写团歌歌词，并撰文支持开封教会学校学生反对宗教迫害的正义斗争。他在一篇文章中称赞学生们的斗争是光明磊落的“壮举”，并指出：“同胞们！欲实行反抗宗教侵略，今其时矣！欲实行解脱吾呻吟于暴力压迫下之同胞，今其时矣！”^①

一九二六年秋，当北洋军阀被北伐军打得大败的消息传到开封，嵇文甫非常兴奋，曾写诗道：“杀身以成仁，舍身而取义，死者固无憾，生者处何地？”他通过缅怀先师刘粹轩烈士，来激励自己的革命意志。在嵇文甫和其他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一批学生毅然奔赴南方参加革命。也就在这一年底，嵇文甫经学生刘英（明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不久受中共河南省委指派赴苏联留学。他在总结前一段思想变化时说，在走向社会后，虽然“倾向于新的一面，一直向着新的方面走”，但最初只有一些泛泛的新思想，并没有固定的政治立场，只是大革命高潮到来时，我的思想才实现了质的飞跃。“从倾向于进步，欢迎新的到赞同国民党左派的主张，直到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我的思想从民初到大革命初起时”发展变化的历程^②。

一九二六年底，嵇文甫由上海出发经海参崴于次年春到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和他同去的还有开封一师学生段家骥、马景山、马霖、孟炳昶。在“中大”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

①嵇明：《取缔教会学校案通过教联会之后之第一壮举》，载《心声》第23期。

②引自嵇文甫自传。

守主义，曾担任《中国问题》课的课代表。一九二七年三月，当北伐军进入上海的消息传到苏联，莫斯科人民纷纷走上街头，高呼“上海！上海！”的口号，欢快的气氛如同节日。嵇文甫和中大学生对北伐革命战争取得的胜利充满无比的喜悦。五月十三日他们聆听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即“对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很受启迪。正当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苏联和中国的革命问题的时候，不幸得了肺病，虽在学校医治三个多月并辗转克里米亚医治，仍不见效果，终于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征得党组织同意，经中、苏、朝边境回国。

（三）

嵇文甫虽然经过大革命时期的锻炼和在苏联的学习，但他毕竟是一个学者，缺乏严峻的革命斗争实践考验。他自苏联回国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告失败。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他没有采取正确的斗争方法，也没有积极地寻找党的组织，和党失掉了联系。从此以后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他一直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但是他并没有颓废徘徊，也没有迷路转向，他内心里“一直都未曾忘记过党，而且思想上一直都是和党在一起的”^①。

在开封，嵇文甫作了短期的停留和治疗后，便于一九二八年底赴北平，先闲居一个时期，后应邀到北京大学任讲师，同时在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等校兼课。这时，我国学术界正围绕着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历史的发展等问题展

^①引自嵇文甫自传。

开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关系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的问题，关系到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及前途的认识。嵇文甫参加了这场论战，先后写了《周末社会蜕变与儒、法两家思想上的斗争》、《老庄思想与小农社会》、《仁的观念之社会史观察》等许多文章，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等，一会说中国从未有封建社会，一会又说中国从来就是封建社会。嵇文甫在《评陶希圣中国社会史著述》一文中指出，陶的理论尽是一些考试制度、俸禄制度等“支支节节的技术”问题，对于“最紧要的生产方式，反没有确定地把握着”。他进而写道陶希圣“拘执着一个完整的封建制度，而抹杀了封建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形式，由前而言那不是唯物论，而是多元论；由后而言那不是辩证法，而是机械观。”^①他这些文章发表后，受到当时许多进步史学家的重视。不久，嵇文甫所著《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一书出版，这是用历史唯物论来研究我国古代思想史的较早的著作之一，标志着他对马列主义研究和运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北大，嵇文甫用新的观点讲授《先秦诸子思想》、《宋代哲学》、《清代学术思想》、《左派王学》等课程。在课堂上，他曾和胡适唱“对台戏”，听他课的学生非常踊跃，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都反映他讲得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令人佩服。“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声浪日趋高涨，北大学生请他担任《北大学生》的编辑顾问，他还应北京各大学进步学生所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的邀请作《封建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诸形态》等报告，深受青年们的敬佩。但

^①嵇文甫：《评陶希圣中国社会史著述》，载1932年8月10日《北平晨报》。

也因而受到一些旧学者如钱玄同等人的忌恨。说他用新观点讲学，是为投学生之所好。胡适等也采取各种手段对他进行打击迫害，使他在北大的处境日渐困难。加之，这时，国民党特务组织宪兵第三团在北京横行。它在蒋孝先（蒋介石侄儿）的直接控制下，残酷迫害进步师生，实行的是“血淋淋的白色恐怖”政策，倘落入他们的虎口，是“极少能活着出来的。”^①由于嵇文甫的言行已引起宪兵三团的注意，迫使他不得不愤然离开了北平^②。

国民党统治区到处一片黑暗。当嵇文甫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回到开封，任河南大学教授兼文史系主任时，他感到失望。不仅国民党嫡系刘峙任省长的河南政界一派乌烟瘴气，而且在学校里由于CC和复兴社特务组织的明争暗斗，“七、八年内十易校长”，对此，师生们深恶痛绝，嵇文甫和广大师生一起不顾反动派的迫害与监视，积极投入了反蒋抗日斗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北平爆发的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震撼全国。开封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如地下的熔岩冲腾而起，组织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斗争。十二月二十一日，万余学生齐集龙亭后边体育场开会，并请嵇文甫讲话，嵇文甫欣然答应学生们的要求。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他采用了巧妙的方式，在讲话中没有正面提及“一二九”运动的意义，而是首先从北宋末年，国势垂危时的太学生运动的情形讲起，从阐发太学生们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中，委婉地

①曹靖华：《往事漫忆》，转引自《范文澜历史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76—377页。

②贺麟：《两点批判，一点反省》，载《人民日报》1955年1月19日。

赞扬了当前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那时，还没有扩音器，嵇文甫对着喇叭筒讲话，万余学生在寒风中肃立静听，宛若火上加油，斗志更加高昂。会后学生们高呼着“反对华北自治”、“奋发图强、团结御侮”等口号，向市内进发，直至发展到占领火车站，使陇海铁路中断一周。这就是著名的开封学生“卧轨”爱国运动。这一行动为河南全面抗战高潮的到来，揭开了序幕^①。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时，嵇文甫几乎将全部身心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出席各种救亡会议，组织救亡团体，出版刊物；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全面抗战，发展和壮大了河南人民的抗日力量。由于他在学术界的声望日高，加之又善于因势利导，已成为我党团结开封各阶层进步力量的中间纽带。

九月，日军挥戈南下。防守平汉线的国民党“长腿将军”刘峙，不战而退出保定，逃跑到漳河南岸。正当河南危急，开封人心惶惶的时候，嵇文甫和王阑西、姚雪垠等创办的《风雨》周刊正式问世。《风雨》以“促进救亡运动，传播救亡文化”为宗旨，多次刊登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还登载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刘子久等的文章，及时报道八路军在前线奋战的消息。《风雨》周刊名义上是开封文化协会主办的刊物，但实际上起到了我党指导开封及河南救亡运动的作用。该刊自九月十二日起，先后发行三十期，不仅为河南的抗日救亡

^①参见张遼清：《忆嵇文甫同志》；刘惟城：《开封“一二九”学生运动纪实》，载《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嵇道之：《开封学生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情况》，存嵇文甫文集编辑组。

运动作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而且还远销华北前线，甚至在大后方的重庆等地也有很多读者。同时，《风雨》周刊编辑部还介绍了一些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为革命输送了新的血液。这期间嵇文甫在《风雨》上先后发表了《扫除一切阴霾》、《恐日病的消除》等数篇文章，主张对日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风雨》创刊后一个月，为了团结和组织开封文化界比较中间的人士共同抗战，嵇文甫又和郑若谷（即郑竹虚，河大教授）等创办了《大时代》旬刊，由林孟平（地下党员）任主编，在《大时代》上，嵇文甫发表了一篇《一切抗日力量联合起来》的文章，强调指出，在对日作战中，不能只注意军事而忽视政治方面的问题，有了上下团结一致，前方后方相互呼应的政治局面，即使前线偶有挫折，整个战线也不至于根本动摇。文章最后指出，对日作战中，军事不如人，我们并不悲观，我们最关心的是政治，“只要政治有办法，我们军事上的缺陷，可以在长期抗战中得到弥补。”嵇文甫这一既注意军事，又注意政治的主张无疑是对国民党政府单纯军事观点和片面抗战政策的一个有力的批判^①。

这期间，嵇文甫还经常应邀作报告，鼓动抗战。十月初，他在河南大学礼堂，为青年们作了题为《评几种对日抗战的胜败观》的演讲，批评了“短见”的“机械”的胜败观，主张“动的胜败观”。他强调指出，对日抗战既不能灰心丧气，也不能乐观等待，应当积极的全面的参加抗战。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上海抗敌话剧团一队（金山、王莹、贺绿汀等领导），二队（田汉、洪深领导），

^①嵇道之：《回顾抗战初期嵇文甫与范文澜先生在河南的抗日活动》，载《河南史志》第5辑。

十队（由宋之的等领导）和平、津等地的流亡学生，纷纷来到开封，演出抗战话剧，开展宣传活动，加上《风雨》等刊物的影响，使开封的抗日空气大为活跃。这时，以研究哲学和历史著名的嵇文甫，也欣然拿起笔来，写了许多热情奔放的抗战歌词。其中主要有《献给祖国》、《你莫忘记》、《农民战歌》、《走出象牙之塔》以及《黄河三部曲》等，由其长子嵇振民（音乐家）谱曲，出版了一册歌曲集，题名为《抗战到底》。《抗战到底》原是八路军的一首歌，嵇文甫喜其志坚如铁，憾人心肺，也将其作为首篇收入自编的歌曲集并作为书名，借以表达自己对八路军将士的热爱和期望。

《你莫忘记》这首歌中唱道：

你莫忘记，光荣的祖先，大好的河山，
文治武功何彪炳，
艰难缔造五千年。
你莫忘记，长白山之麓，松花江之滨，
铁蹄纵横群魔舞，
腥风血雨痛煞人。
你莫忘记，北起阴山头，东到黄浦江，
一片杀声震天起，
万恶倭寇正猖狂。
战呀！干呀！你莫忘记，
黄帝大禹的子孙，终不做人家的奴隶！①

《你莫忘记》这首歌，声声唤起人们“不要忘记”祖国的过

①嵇文甫存稿，存嵇文甫文集编辑组。

去和现在，为了不做奴隶赶快奋起抗战，既慷慨激昂又情真意切，歌词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在“腥风血雨”时代的共同心声。

《走出象牙之塔》是一首当时较为流行的歌曲，歌词写道：

到街头去！到农村去！到前线去！
当此全民族的生死关头，
我们不能长躲在象牙塔里。
战鼓敲起来了，热血沸腾了，
大家都滚入时代的浪潮，朋友们起来！
用我们革命的烈火，把疯狂的侵略者一齐烧掉！^①

冲破“读书救国”的樊篱，走出脱离社会的“书斋”，到农村和前线去，在当时的爱国青年中，已成为强大的时代潮流。《走出象牙之塔》唱出了一代青年的精神风貌，表达了他们共同战斗的决心。

由于形势需要，嵇文甫和范文澜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组织创办了“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党组织对训练班的工作非常重视。鄂豫边区特派马致远（即刘子厚）到班上讲课。范文澜后来在《从烦恼到快乐》一文中回忆说，有嵇、马“这两位台柱子撑起训练班的金字招牌，声名很好”，在青年中影响很大。由于当时敌机经常袭扰古城上空，河南大学等校和不少机关单位已撤离开封，但青年们热情极高，很快就有二百人踊跃报名参加训练班。训练班由嵇文甫讲《中国革命问

^①嵇文甫存稿，存嵇文甫文集编辑组。

题》，范文澜讲《时事政治》，王希和讲《中国经济》。学生们最感兴趣的是马致远讲的“游击战术”。他除讲理论外，还组织学生到城北沙土岗上进行游击战演习，带着学生到农村演出街头剧。在“训练班”工作的教师没有工资，学生也没有报酬，连吃饭都是自己出钱。但师生们热情高，劲头大，结业后大部分学生都投入了抗日工作^①。

首期训练班结束后，嵇文甫和范文澜从中选出七十名学生，组成河南省抗战教育工作团（简称“战教团”），由他两人自己拿钱资助，准备顺平汉路南下，沿途办抗敌训练班，兼作民运工作。“战教团”以嵇文甫为团长，范文澜为副团长，马致远仍随团讲课。十二月底“战教团”由开封出发，徒步南下，经朱仙镇、尉氏、鄢陵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到达许昌。沿途在城镇、乡村通过讲演、话剧、唱歌、张贴标语等方式进行抗日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满足当地青年的要求，“战教团”在许昌一中办了一期抗敌训练班。其间，国民党顽固派害怕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断干扰“战教团”的工作。嵇文甫不得不时常奔波于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作统战工作，为“战教团”争取活动权利。一九三八年二月初，“战教团”在舞阳渡过旧历新年。舞阳有三千名农村青年希望进城接受“战教团”的训练，却受到国民党驻军的阻挠。他们无理限令“战教团”离开舞阳，遭到全团同志的坚决反对。范文澜十分气愤地说：“我们应该有在中华民国土地上作救亡工作的自由，舞阳难道不是中国的土地吗？我决计不走，决心到舞阳县监狱里找中国土地去。”^②范文

^{①②}参见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转引自《河南史志》第5辑。

澜和全团同志的正义行动，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阴谋，教育了当地群众，同时也感动了国民党军队中下层的爱国士兵和军官，取得了他们的同情。

正当“战教团”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时候，国民党当局竟严令嵇文甫和范文澜离开“战教团”。他们被迫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上了鸡公山（这时河大文、理学院已迁至此）。“战教团”在地下党的支持下，继续活跃在鄂豫边区及湖北襄樊等地，并冲破重重阻力于一九三九年春，到了抗日根据地确山县竹沟镇，实现了坚持抗战“上山打游击”的风愿。

抗战初期，嵇文甫同王阑西、刘子厚等许多共产党人一起工作，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意图，并积极贯彻执行，因而国民党顽固派对他的监视更厉害了。但他还是决定留在国统区里继续坚持斗争。他曾对进步学生说：“留在这里，是带着铁镣手铐抗战，日子是难过的，可是每一块土地上都得有人耕耘呀！”^①事实上当时他的去留都不是个人的意见，是党组织安排好的^②。

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大师生，辗转迁徙，历尽颠沛流离之苦。一九三八年七月豫南形势吃紧，学校迁至镇平。一九三九年五月，日寇进犯南阳，学校又北越伏牛山到达嵩县潭头镇。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河大当局，秉承国民党的旨意，迫害进步师生，空气异常沉闷。然而，在嵇文甫主持下的河大文学院，由于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却呈现着一派蓬勃的生机。进步教授王毅斋，这时来河大任经济系主任，他在嵇文甫支持下，冒着风险在系里创办了一个资料室。收藏的一两

^①李蕤：《把死者埋在活人的心中》，载《奔流》1980年第1期。

^②参见范文澜生前回忆，现存嵇文甫文集编辑组。

千本图书中，大部分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如《资本论》、《反杜林论》、《帝国主义论》等，成为师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①。

学院里还成立了许多学术团体，经常讨论问题，培养了许多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的骨干。一九四一年三月以河大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为骨干的中原青年文艺笔会创办的《青年文艺》半月刊，在嵇文甫帮助和指导下，经常刊登进步学生的文章，以文艺形式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早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间嵇文甫已阅读了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他配合“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就《学术中国化问题》、《民族形式问题》及《大学生是否应参加政治运动问题》等作了专题报告。他精通辩证唯物论，在报告和讲课中，总是把革命道理溶入通俗易懂的语言中，使青年们从中受到启迪和教育，认清了自己应该走的道路。他在师生中的威信极高，进步力量把他作为精神支柱，看作是学校的一面旗帜。因此国民党顽固派对他更加仇恨。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了反共高潮。就在这一年十月嵇文甫被反动派逮捕，关入洛阳北邙山监狱的窑洞里。在狱中的五个月，嵇文甫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由于叛徒的供认，他坦然承认自己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但对于他接触的同志，其中不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从不吐露，保护了党组织和革命同志。他在狱中写了许多诗词，借以抒发思想，表达情怀。“寝馈六经三史，瓣香一峰二

^①冯若泉、卢治国：《王毅斋先生传略》，载《中州今古》1984年第5期。

山”，就是他在狱中写的一幅对联。“一峰二山”指的是三位抗清学者，即孙夏峰、王船山和全谢山。这三位思想家，是嵇文甫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过程中学习的榜样。在哲学理论和治学方法上，他仰慕“船山深微”和“谢山淹贯”。在为人处世上，他效法“夏峰平实”。孙夏峰即孙启泰，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抗清失败后，隐居河南百泉苏门山上，研究宋代理学。他“世法模稜”，但“其中实有一大把柄！”即坚持抗清之志不变。处在清王朝监视下的孙夏峰，和在反动派包围中的嵇文甫的地位十分相似。所以嵇文甫以孙夏峰为榜样，不管反动派怎样压迫，他坚持进步和革命的决心不变。为此，他写诗抒志道：

坎坷何足道，磊落此襟期。
羑里^①艰贞日，龙场^②悟彻时。
精金须百炼，健马终一驰。
默数平生事，飘然壮志飞。

嵇文甫的被捕引起了河大师生的强烈义愤，学生们曾以罢课表示抗议，还通过进步教授向中苏文化协会和冯玉祥、冯友兰、曹靖华等发出函电，扩大营救力量，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旅居禹县的李敏修老先生得知此消息也十分焦虑，曾通过

①羑里，地名，在今河南汤阴县，是周文王被殷纣王囚禁的地方。相传文王在这里曾演《周易》，穷探天人之理。

②龙场，地名，在今贵州省内，明朝唯心主义哲学家王阳明，因得罪了宦官刘瑾，被庭杖下狱，后又贬到龙场。据说他在这里，日坐夜思，突然悟彻，终于创立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

他的学生，致函张治中将军，称嵇文甫为“经师人师”，断没有被捕的理由。河南国民党反动当局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被迫于次年三月将嵇文甫释放。消息传到深山中的河南大学，师生们连夜派出代表，不顾高山路险到几十里外去迎接。到校后又燃起篝火，点放鞭炮。面对这热烈的场面，嵇文甫十分激动地说：“我是一个‘罪人’，你们如此欢迎我实在担戴不起。”后来他曾对人说：“这件事（指被捕）他们一年前就该办了，所以我不感到突然。”^①

（四）

一九四五年三月，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寇，向豫西南发动进攻，侵占南阳。河大师生再一次西迁到陕西宝鸡避郊石羊庙。同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迎来了胜利，饱受战乱之苦的河大师生无不兴高采烈。在庆祝大会上有人介绍了有关原子弹的物理知识。嵇文甫在讲话中则着重强调，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主要是靠世界人民的力量，而不是什么原子弹的威力，从而给师生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四五年底河南大学由陕西宝鸡迁返开封。八年抗战，人民饱尝离乱之苦，渴望休养生息，但蒋介石集团坚持卖国独裁的反动政策，很快就挑起全面内战。他们在国统区镇压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制造了昆明“一二·一”惨案，并公然杀害李公朴和闻一多等民主战士。在这“黑夜与白天不分”的恐怖

^①宋景昌、李光一等的回忆，存嵇文甫文集编辑组。

岁月里，嵇文甫没有停止斗争。他在一九四六年五月起，先后在《前锋报》和《中国时报》上，以“新说书”的形式连续发表了十六篇杂文，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揭露了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如他在武王伐纣的一篇杂文中说，武王伐纣前对殷朝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当他听到殷朝的“坏人压倒了好人”、“贤德的人都被坏人排斥掉了”的报告后，虽然认为殷朝已经乱了，但还是迟迟没有发兵。后来当他知道殷朝的“老百姓都不敢说话了”的时候，才认为殷朝国内是真正地乱了，便立即发兵，一举推翻了殷纣王的腐朽残酷的统治。嵇文甫抓住这段历史故事，淋漓尽致地加以发挥，阐述了“民不敢谤时，就是反动统治即将覆灭之日”的道理，积极支持当时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

当李敏修先生逝世三周年时，为了“唤起河南学术界之精神”，嵇文甫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在《河南民报》上发表了《纪念李敏修先生》一文。文中指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一到了所谓‘学绝道丧’，所谓‘上无理，下无学’，一到了大家都‘不悦学’，不尊重学术，不尊重学者，那就是必亡的征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精神堕落了，腐化了，不肯向上，不求进步了，什么道理原则，正当不正当，都不管了。于是乎卑污苟贱，乱闯瞎碰，……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果说《新说书》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揭露，是“借古讽今”的话，那么《纪念李敏修先生》一文，就是射向他们的投枪匕首了。

一九四七年五月，国统区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高潮，河大进步师生积极响应，举行罢教、罢课，上街示威游行，并派代表赴南京请愿。他们的正义行动遭到了反

动当局的残酷迫害，一夜之间就有七十余名学生被逮捕，这就是著名的河南大学“六二”学潮。然而，学生们的革命行动，却受到一些反动文人的非难。有一位颇有名气的教授，一面斥责学生“不敢反对共产党”，一面却在《大公报》上撰文替蒋家王朝“代谋”，主张“偃武修文”，说这样一来，共产党就可以不消而自灭。这位“学者”是嵇文甫的“老朋友”，但嵇文甫并不给他留情面，质问他道，“你既然这样公正，为什么不写篇文章为共产党代谋一筹，让国民党不消而自灭呢？”^①问得他哑口无言，揭露了他的所谓“公允”的虚伪面目。

那时，嵇文甫虽然名义上还是文史系主任，但却连举荐一位教师来系任教的权利也没有。在他居住的开封潘杨湖南边刷绒街寓所的院内，敌人却安插住下了六十八军的侦察科长，以行监视。河南省伪保安司令部政训处，也在他寓所门外的街墙上，刷制了巨幅标语——“纷杂错综的思想必须纠正”，以示警告。然而，嵇文甫心中有数，处之泰然，照样坐黄包车到河大礼堂讲哲学史。直到“六二”学潮的前夕，即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八日进行“大逮捕”的上午，他还应邀在河大礼堂给学生讲《真理的具体性》，用不带马列的词句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吐嘉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②气得敌人暴跳如雷，这样，他又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嵇文甫觉察到了敌人的险恶用心，并在暗中和范文澜通了消息，作好了奔向解放区的准备。

正当敌人加紧迫害嵇文甫时，第一次解放开封的炮声打响了。党组织对他的安全非常关心，安排他暂时离开开封。就在

^①李蕤：《把死者埋在活人的心中》。

^②赵俪生：《忆嵇文甫前辈的学术风貌》，载《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另见1980年1月28日《郑大校刊》。

开封解放的第四天即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嵇文甫决然带领全家，偕王毅斋、赵俪生、罗绳武、苏金伞等七十余名师生，乘坐解放军开封前线司令部的军车，星夜出发，经通许、鄢陵、许昌、襄县奔赴豫西解放区行署及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鲁山，受到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领导同志的接见。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接见极大地鼓舞了师生们的革命热情。嵇文甫无比欢畅地说：“多年来沉闷窒息的生活乃告结束，象游子返乡一样终于回到了革命的大家庭。”并风趣地说：“现在让国民党再‘请’我们去‘谈话’吧！”他以这样幽默的话语，表示了和黑暗势力的永远诀别^①。

（五）

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原地区四千五百万人口，已有半数获得解放。全国解放区人口达一亿六千八百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三。为了给全国解放培养大批干部，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创办中原大学，由陈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嵇文甫和王毅斋等任副主任委员。陈毅对他们非常信任，称开封的师生是一支不拿枪的“文化大军”。他还说：“有嵇文甫、王毅斋等教授，有你们开封大、中学校的二百多个青年学生，一定能办成一所人民需要的大学校。”^②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中原大学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在宝丰赵官营村

^①新华社消息：《嵇文甫等七十九人安抵豫西解放区》，原载1948年7月16日《东北日报》，转引自《开封战役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嵇文甫自传。

^②侯其侠：《难忘的一课》，载《中州今古》1983年第6期。

正式开学。

中原大学是战时大学，设备非常简陋。校本部只有几间茅草房，树荫下的草地或打谷场就是教室。师生们吃的是小米饭和青菜、萝卜，晚上用土蜡烛或植物油灯照明，生活和学习条件相当艰苦。稽文甫在大树下讲哲学，在草地上作报告，工作认真负责，日夜辛勤操劳。

一九四八年十月开封第二次解放，中原大学迁到开封，不久中原大学又奉命迁往武汉，稽文甫留下来重建河南大学。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许多社会工作也落在他的肩上。这时，他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视力也不好，繁忙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使他没有休息时间，更谈不上学术研究。但是稽文甫从无怨言，常微笑着对人说：“我没有什么本事，有一点虚名，当前革命需要它，对革命有用的事都是有意义的。”^①这期间，他工作热情很高，在重建河南大学、在宣传马列主义和教学、科研等方面都作出了显著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稽文甫有较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并十分重视宣传马列主义。开封刚解放，他即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底在《开封日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学习，学习，再学习！》一文，提倡学习马列主义的新思想、新作风。一九四九年初，他在开封市文庙小学作了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介绍的报告。明确指出，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使与会者受到马列主义的教育。他在宣传历史唯物论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

①李蕊：《把死者埋在活人的心中》。

和宣传。针对在历史评价中普遍存在的要么一概肯定、要么一概否定的两种倾向，他在中国史学会河南分会的会议上，连续作了《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关于历史评价中的几个矛盾问题》等专题报告。告诉人们历史的现象是错综复杂的，“要按其具体情况，分别对待”，而不应持一律“宽容”或一律“骂倒”的形而上学态度。他认为对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正确评价，必须坚持“三个标准”，把握“四个要点”。三个标准是：“第一，对于人民有贡献的，有利的；第二，在一定历史阶段起进步作用的；第三，可以表现我们民族高贵品质的。合乎这三个条件都是好的。相反的，都是坏的。”四个要点是：要根据一定具体的历史条件；要认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要站稳阶级立场，反对客观主义；要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①。这些观点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其中“关于历史评价问题”的报告很快就整理成一本小册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

嵇文甫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不仅观点明确，而且活泼明快给人印象十分深刻。他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间，曾发表过许多哲学小品，其中如《辩证法难学吗？》、《四条不多，三条不少》、《动与矛盾》、《辩证法是具体的》等文章，文字精练，论述精辟，深受读者欢迎。

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动中，嵇文甫还十分重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早在建国初期，在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活动中，他就写出了一些体会文章，以后又写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存稿》等小册子。他在讲课和作报告时，

^①嵇文甫：《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河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0页。

常常提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是马列主义活生生的体现。它是深入研究和探索中国革命和历史发展的“钥匙”，要求大家认真学习。一九五二年，他在《从矛盾论得到的一些启示》一文中说，矛盾即对立统一的观点是辩证法的核心，这是早已知道的，但“我一向是不大认真地对待矛盾的，我不敢正视矛盾，而是故意回避它，不敢揭露矛盾，而是设法弥缝它。”^①总有点“喜同恶异”的味道，因而看问题“不尖锐、不突出、不明朗”，这是我平生极不满意的事。“现在经《矛盾论》这面镜子一照，就格外鲜明了。”^②这虽然是严于解剖自己的自谦之词，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多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这也是造就他学识渊博、精湛，受人尊崇的一个重要原因。

嵇文甫是教育战线上一位有名的耕耘者。他热爱教育工作，在解放后十多年间，始终没有脱离教学岗位。一九四八年十月他回开封中原大学分校，为中大迁到开封作了大量工作。一九四九年五月，他为重建河南大学（先任副校长，不久又任校长）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明确提出，恢复和重建的河南大学，要把它办成一方面具有老解放区革命政治教育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普通正规大学的学术教育的传统的新型大学。根据党的教育方针，他还具体规定了河大“为工农服务，为河南建设服务”的办学方向。在他的组织领导下，采取了以本科、专科、短训班等各种办学形式，在短短的时间内，为河南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各种专门人材。

一九五六年九月，嵇文甫调任郑州大学校长。那时，郑大

^①嵇文甫：《学习毛主席著作存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刚刚建立，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他积极聘请教师，深入课堂，参加教学研究，了解学生学习及思想情况，采取许多措施改善教学条件，使这所综合性大学逐步走上轨道。当时，有些课程找不到人来担任，他就主动承担，先后给师生讲授《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国思想简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坚持在讲坛上舌耕粉书，在教学园地里精心育苗。他讲课时不用讲稿，娓娓而谈。他常对人说，尽管准备的内容很充分，倘若照稿一念，就显得干燥无味了，若是改用自己的话来讲，那就使人听了亲切而又印象深刻。他在讲到东汉神医张仲景的《伤寒论》时说，它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著作，但书里面也掺杂一些五行阴阳的迷信色彩。如果有人说：“他咋不根据解剖学”来写呢？这就太为难他了。因为东汉时代，阴阳五行说是一种最高的理论，张神医自然也无法摆脱这个窠臼，拿现代的“解剖学”和他作对比，就象你斥责黄巢、李自成“咋不接受无产阶级领导”^①一样荒谬，这就等于用非历史主义向历史主义挑战，令人啼笑皆非。通过这一生动比喻，使人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唯物论。

嵇文甫讲课的另一个特点是，从不A、B、C、D“开中药铺”，而喜欢用大量史实为例来讲解。乍一听这一件件史实好象没有联系，但他总是围绕一个中心分析综合，实有银线穿珠、联系贯通，在关键处常用一两句警句，点明要旨，使人豁然开朗。如在讲宋代的包拯为什么会受到人们的赞许时，嵇文甫说是“王法”，包拯就是用王法制裁非法剥削，而主张合法剥削。不超过合法剥削，统治阶级是承认的，农民也就满意了。

^①嵇文甫：《关于历史评论及其他》第6页。

包青天的办法不过是“合法剥削”，只用四个字就画出了他的阶级本质，使人在纷杂的现象中，看到问题的实质。他又说，章太炎本来跟着孙中山闹革命，是三民主义的鼓吹者，可是“闹”了一半就转向了。应该如何来评价章太炎呢？嵇文甫说他“还算不上三民主义，至多只能算是二民主义”^①。

嵇文甫讲学不仅朴实而诙谐，在平易中求精深，而且他讲的内容大都是自己研究的心得，作到了“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堪称是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良师。

河南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文学史家任访秋教授回忆说：一九四〇年我在河大讲授《现代文学》，并着手对晚明文学和袁中郎等作家进行研究时，遇到很大困难，多得于嵇文甫先生的指导，后来写成《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子产》两书。嵇文甫亲自为两书作序，给以热情的鼓励。任访秋说：“平生不论在做人同治学上，在我的师长中，（嵇文甫）先生给我的影响是最大的。”他“是我终生学习的典范”^②。

一九四六年，不足三十岁的赵倜生（现任兰州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自陕西来到河大。嵇文甫和他素不相识，但却把自己教了多年的《明清思想史》课转给他教，这种风格在旧社会是不多见的。后来赵倜生跟着嵇文甫学习“宋代哲学”，又得到嵇文甫的热情指导，使他进步很快。赵倜生深有体会地说，嵇文甫先生是我一生受益最深的两位老师（另一位是山东王献唐先生）之一，如果把学问的长进比作没水的深浅的话，在他的指导下，“一年前我是泡在漫到脚脖的水里，那么，一年

①嵇文甫：《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第8、51页。

②任访秋：《忆先师嵇文甫先生》。

后，我已经泡到齐腰的水里了。”^①

解放后，嵇文甫肩负重任，工作十分繁忙，仍经常深入学生中，从学习、思想、生活上给予关怀鼓励。一九五一年，他当河南大学校长时，一位青年学生写了一篇关于历史问题的小文章，送校刊转嵇文甫审阅。不久，他亲自找这个学生交谈，肯定了文章的优点，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足，耐心地指导他修改，还对他说，“以后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商量。”充分体现了他平易近人，热爱青年，关心青年的优良品质。

为了使青年们了解和认识祖国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一九五八年嵇文甫还专为青年们编写了《春秋战国思想史话》。春秋战国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距我们已两千多年了，那些古老的思想体系及表达的方式、使用的术语，对现代青年来说，都是很生疏、甚至很费解的。怎样用明白生动的现代语言把这些古老的思想表现出来，使青年们容易理解和接受呢？嵇文甫经过一再斟酌，在写法上采取了如下方针：“不旁征博引，作烦琐的考证，不支离蔓衍，在枝叶上纠缠；不模糊影响，讲些连自己也不懂的道理；而是提纲挈领地抓住些明明白白的主要论点，就自己所能理解到的讲个透彻，遇有必需引用的古书原文，该解释的解释，该翻译的翻译”^②，使青年们看后，对这个时代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和学派的重要内容有个基本了解，从中受到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

嵇文甫是一个笃实的学者，自一九一八年发表《老子发

①赵恂生：《为学途程上的一些遭际》，载《书林》1980年第3期。

②嵇文甫：《春秋战国思想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凡》起，几十年来，锲而不舍，著述哲学思想、历史评论、政治理论、杂话等著作三百余篇（本），约二百余万言。他对先秦诸子哲学、宋明理学特别是左派王学研究有较高的造诣。他也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的著名学者之一。解放前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船山哲学》、《左派王学》、《明清思想史论》、《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民族哲学杂话》等。他治学严谨，著书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国化与通俗化，善于用浅显明白的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文风朴实，反对夸夸其谈，不少文章尤其写的“短而要、少而精、深而透。”^①别具特色，其学术成就受到我国学界的普遍重视。

尤为可贵的是，解放后在繁忙的工作中，嵇文甫还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坚持著书立说。为了把自己的学术见解记录下来，他经常牺牲外出度假疗养的机会和其它休息时间，夜以继日地进行写作。他在晚年时除经常发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文章外，还先后出版了《王船山学术论丛》、《王船山史论选评》等著作。由于他一贯坚持进步，忠诚党和人民的事业并做出了显著成绩，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象一条涓涓的溪流，经过千回百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嵇文甫当时高兴地以“水流千里归大海”的诗句，来表述自己的欣喜和激动的心情，决心把自己的晚年，全部奉献给党的事业。他曾有过把船山的学术“彻底的研究一番”的计划，还打算撰写一部中国哲学著作。据初步统计，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三年期间，他共写了七十六篇论文。正当他逐步朝

^①郭晓棠：《在纪念嵇文甫逝世大会上的讲话》，存嵇文甫文集编辑组。

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嵇文甫不幸于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因患脑溢血在郑州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八岁。

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在“史无前例”的动乱岁月里，已长眠地下三年之久的嵇文甫，竟受到诬蔑和诋毁。他的坟墓被破坏平毁，一些著作和手稿被查抄，甚至付之一炬。还在死者身上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冤案。党组织不允许一些轻薄之徒如此胡作非为，粉碎“四人帮”后，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为嵇文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的骨灰重新安放在郑州烈士陵园。嵇文甫为革命为教育为学术研究事业献身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作者附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先后访问了冯友兰、曹靖华、于安澜、任访秋、罗绳武、毛健予、张绍良、牛庸茂、李光一、宋景昌、姚灏艇等嵇老生前的同学、同事和学生，嵇老的后人嵇道之和嵇立群等也慨然相助，提供了许多宝贵材料。初稿草成后又分送樊道远、牟德基、王锡璋、郭海长、严辛吾、赵德政、程炳麟、赵以文、史苏宛、李戏渔等人征求意见，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于 毅 夫

孙维勤 李 英

武 托 刘景祿

(一)

于毅夫，原名于成泽，曾用过洪波、逸凡等笔名，一九〇三年五月九日出生于吉林省双城县辛家窝堡（今属黑龙江省）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父亲于镇清，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任黑龙江省龙镇县设治局长，后由亲属介绍去广州投奔孙中山，被委为黑龙江省宣抚使。一九一六年遭当地军阀吴俊陞通缉，全家迁居天津。母亲是一个农家妇女，朴实厚道，勤俭耐劳，对子女的要求甚为严格，常向孩子们讲述日俄战争时沙俄兵败溃逃途中杀害中国乡民的惨痛情景，对于毅夫后来的思想成长有一定影响。

于毅夫七岁至十五岁在海伦县私塾学堂读书时，曾阅读了不少革命历史故事的书刊，如描写朝鲜爱国者安重根一九〇五年在哈尔滨车站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英雄泪》，描写波兰被沙俄灭亡的惨痛历史的《国事悲》。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反帝爱国的思想。

一九一八年春至一九二〇年夏，于毅夫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他积极地参加了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示威游行和抵

制日货的斗争。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他追随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等学生领袖，参加了为抗议当局查封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而发动的向省署示威请愿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于毅夫进入北平平民大学学习，结识了心理学教授、文学家许地山。在许地山的影响下，他开始爱好文学，并于一九二四年转入燕京大学后，和一些擅长文学的同学积极从事写作和编辑工作，曾先后与刘德元、焦菊隐、董秋斯、张放等主办《燕大周刊》；与焦菊隐、姜公伟等主编《京报副刊》；又与焦菊隐、赵景深、蹇先艾以及被鲁迅称为“诗孩”的孙席珍等人组织新文学团体——绿波社。这一时期，于毅夫写了大量的散文、小说，其中《狼》和《四只雁》等散文，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描写了黑龙江省家乡壮丽的自然风光，读来使人如置身于乌裕尔河畔的大草原上。于毅夫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对他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和领导编辑、出版等工作，打下了基础。

一九二五年，上海和武汉相继发生“五卅惨案”和“汉口惨案”。于毅夫作为燕大学生代表，参加了北京的沪案后援会，热情援助上海人民的斗争，并积极撰写文章，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他在《我宁愿作个战场上的无名英雄》一文中写道：“这次上海和汉口的事变，英国人之惨无人道，可谓已臻极峰，昂格尔人看我们中国的同胞简直不如牛马！英国人哪望承认中国的同胞是人！换言之，亦即不承认中国的国家为国家！那么，我们为争中国人的人格起见；为争我们中国的国格起见，中国应该与英国断绝邦交，宣布作战！”^①他呼吁：“亲爱的

^①于成泽：《我宁愿作个战场上的无名英雄》。

同胞们！怕什么？畏缩什么？没有流血的牺牲是得不着荣耀的报酬的！没有我们这一辈人的反抗强权，我们的后代亦许是永远被人家奴视！”^① 广州沙基惨案发生后，他在《向帝国主义挑战》一文中写道：“帝国主义的妖儿……且看我们这个千万支枯脊的瘦手，任你折摧、残毁，也要脉紧筋张地和你争个最后的胜利！”^②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于毅夫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他带领同学游行示威，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段祺瑞政府下令开枪镇压，燕大学生死伤多人。于毅夫组织同学进行抢救。他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将身受重伤的女同学魏拯之背出重围。

这年秋，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于毅夫在燕大历史系毕业后，决心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到郑州冯玉祥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任编辑股长。不久，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清洗共产党，于毅夫遂在部队北渡黄河时，不辞而别，来到北平。不久，于毅夫经南开好友、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梁岩介绍，任张学良兼校长的民国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出版部总编辑，主编校刊。从此，他与张学良发生了工作上的关系。一九二八年六月，张作霖由北平乘火车途经沈阳皇姑屯，被日寇炸车身亡。东北军全部撤回关外，于毅夫也随着张学良的军团部回到东北。

一九二八年秋，于毅夫应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潘景武之邀，任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同年冬，东北人民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长（春）大（赉）、吉（林）会（朝鲜的

^①于成泽：《我宁愿作个战场上的无名英雄》。

^②于成泽：《向帝国主义挑战》，载1925年8月15日，《京报副刊》的文学周刊。

会宁)两条铁路的斗争。于毅夫组织黑龙江省护路后援会,被推举为会长,积极宣传演讲,并发表文章,反对日本筑路。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和平易帜后,他曾于期间寒假代表护路后援会赴南京请愿。虽受到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傖的接见,但请愿毫无结果。

一九三〇年秋,张学良在蒋阎冯战争中,助蒋打败了阎、冯,东北军再次入关。此时,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出任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局长,于毅夫先后当张学铭的助理秘书和随从秘书。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时,于毅夫陪同张学铭去北平探望张学良,得知日寇炮轰沈阳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以及蒋介石密电不准抵抗,沈阳即将陷入敌手等消息,非常痛心。他立志要为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同年十一月八日至二十八日,天津日本租界的日军和汉奸便衣队不断向华界的中国军警发动武装挑衅,制造了“天津事件”。天津市保安总队队长解如川(解方)事先得到情报,积极建议张学铭采取措施,组织抵抗。当日寇炮击华界时,保安总队进行了英勇的反击。于毅夫彻夜守候在电话机旁,随时向张氏兄弟汇报战况,并负责向反击部队传达命令。

但是,蒋介石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命令保安总队撤退,反击战斗遂以妥协退让而告终。嗣后,蒋介石又答应日寇的要求,下令免去张学铭的本兼各职。于毅夫也愤然辞职,再次迁居北平。

(二)

一九三二年,于毅夫在北平闲居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不少马列主义书刊和文艺小说。当他读了我党中央机关报——

《红旗日报》等书报后，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有了深刻了解，对国民党各派的政治态度看得更清楚了。这时在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决心跟着共产党走抗日救国的道路。于毅夫的燕大同学、上海苏联红军情报站平津方面负责人张放，得知他的思想变化，于一九三三年春在北平发展他为革命阵营作情报工作。不久，于毅夫被张学铭推荐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任挂名参事。他利用这个身分，同东北军将领和华北的上层人士，如蒙古德王驻平办事处处长包悦卿、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的外交人员朱式勤、陶尚铭等密切交往，积极从事收集军事、政治情报的活动。

一九三三年夏，张学铭去意大利看望被迫出国的胞兄张学良。临行前，东北军一〇五师副师长董彦平把一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动东北军“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部署图，交于毅夫转张学铭带给张学良。于毅夫立即找张放，在自己家中将军事图拍照下来。对此，上级领导曾给予嘉奖。

一九三四年夏，于毅夫和夫人以避暑为名去青岛，访问东北籍海军军官鲍宜民，向他借阅日寇侵略华北的材料和国民党的许多机密文件，趁机抄了下来交给情报站，也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于毅夫为苏联红军担任情报工作，直到一九三五年夏由于叛徒告密，上海地下情报组织的核心遭到破坏，情报站平津负责人张放被迫转移才告终止。

从一九三三年春到一九三五年夏这一期间，于毅夫还参加了其它方面的抗日活动。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他和张学良的文职官员高崇民等，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时，成立了秘密的抗日组织——复东会。他和全体会员在关云长、岳飞像前

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决不罢休”^①。

由于复东会的宗旨违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猜忌。一九三四年，根据蒋介石的提议，复东会与复兴社合并，成立四维学会（四维即礼义廉耻），蒋任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参加的有戴笠等特务分子。蒋介石此举，在于扼杀东北爱国者的抗日活动。于毅夫开始表示反对，后经张放的说服，为了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隐蔽自己，也加入了该会。当时，他的好友私下里问他：“和这些臭鱼烂虾搞在一起行吗？”他坦然回答：“在这个局面下，搞那么干净能抗日吗！”^②

一九三五年夏，于毅夫停止情报工作以后，集中精力在东北人民抗日会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抗日会是中共北方局下面的东北特别支部领导的外围组织。于毅夫是该组织的负责人，兼管抗日会的机关刊物《东北之光》。他不但负责华北当权人物宋哲元和东北军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还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去，在东北大学发展会员，宣传抗日主张，在东北中山中学、东北交通中学以及其它学校的东北籍学生中也作了不少工作。姜克夫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一九三五年秋“我参加‘民抗’后，即在毅夫直接领导下做工作。当时，‘民抗’的机关刊物叫《东北之光》，后改名《东北生活》。毅夫叫我帮他办这个刊物，我当时还是个中学生”^③。

①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②1982年11月3日访问宋星池谈话记录。

③姜克夫：《严师诤友，终生难忘》，载1983年8月12日《黑龙江日报》。

由于于毅夫忠心耿耿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经党的北方局讨论决定，一九三六年七月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一九三六年九月，于毅夫给张学良写信，敦请联共抗日。张学良邀于毅夫去西安面谈。于毅夫到西安后，根据党的意图，向张学良陈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张学良很受感动，嘱咐于毅夫返回北平多作东北人的工作。

在西安事变中，于毅夫与王卓然、陈先舟、张克威、宋星池等原东北文职官员，在北平发起成立了图存学会。他们购置电台，架设中共地下党员张克威家中，每晚向西安张学良的总部报告北平方面支援西安事变的各种活动；总部则通过电台提供西安的政治动态，这部电台成了北平与西安联系的根纽，在西安事变期间起了不小的作用。

西安事变后，于毅夫为营救被蒋介石扣押的张学良，在西安、杭州、上海、南京一线，日夜奔走，多方联系，但由于蒋介石顽固不化，终无结果。

十二月二十日，于毅夫、汪之力、董学礼、赵濯华、陈大凡等共同筹划，将东北旅平青年救国会、东北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人民抗日会等抗日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了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东联），团结东北旅平的各界、各阶层抗日人士，对东北人民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

一九三七年六月，各地的东北人感到日寇的进攻迫在眉睫，自己本身的力量必须团结。因此，由京、沪、陕、晋、鲁、

苏、石家庄、保定、扒子补隆、天津等地的东北人商议成立了一个总的组织——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①。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总会会址设在北平，刘澜波担任“东总”的中共党团书记（即党组书记）。于毅夫受党的委托，参加了“东总”的酝酿工作，“东总”成立时被选为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又是秘密党组的成员。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东总”发表宣言，主张死守平津，焦土抗战。于毅夫等人在北平组织印发宣言和传单，并代表“东总”去芦沟桥二十九军阵地慰问，鼓励士兵奋勇杀敌。在北平城内，“东总”也组织劳军，向守城官兵送西瓜、馒头等食品，还派东北大学学生顾少雄等去保定以北的京汉路沿线，慰劳东北军。

八月初，日寇占领北平。于毅夫等根据党的指示离开北平，转道去济南组建“东总”山东分会。在济南，他和共产党员苗勃然、白晓光、孟述先等，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组织平、津和东北的流亡青年一千余人，并选派其中一部分人，分别去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或到马占山、于学忠、万福麟、吴克仁等东北军和冯玉祥第六战区长官部以及山西的牺盟会，参加抗日工作。

在济南，于毅夫曾和张友渔、张克威等向二十九军一八一师师长石友三建议，组成了学兵队，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以后石友三反共，学兵队全部撤退到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这时，他还亲自到驻黄河边上的东北军第四十九军刘多荃部、驻河北沧州一带的吴克仁部、第六十九军贺奎副军长处慰问，

^①于毅夫：《九年来东北人民英勇奋斗的总结》，载《反攻》9卷2期附册。

和驻青岛的五十一军李雨霖、解方、贾陶等取得联系，争取东北军官兵走抗日救国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十月，于毅夫从济南到武汉。三月，他代表“东总”，陪同国民党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去鄂东宋埠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慰问李宗仁和所属全体将士，向他们介绍了不少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的英勇事迹。在宋埠慰问时，恰遇敌机轰炸，墙倒屋塌，伤亡严重，惨不忍睹。于毅夫积极参加抢救工作，从废墟中抢救出了不少被炸伤的士兵和群众。

为了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于毅夫还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张庆泰任团长，奔赴抗日前线慰问演出。战地服务团到达冀中时，受到贺龙师长和吕正操、程子华、孙志远、黄敬等负责人的亲切接见。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撤退前，于毅夫率“东总”迁往重庆。由于刘澜波去延安，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亲自囑令于毅夫重新建立“东总”中共党团，于毅夫为党团书记。成员有阎宝航等。

一九三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公开提出所谓的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不言而喻，蒋介石是要牺牲东北，换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对此，毛泽东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针锋相对地指出，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坚决贯彻这一主张，要“东总”把流亡关内的东北军、东北同胞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打回老家去。党的这一正确主张，极大地鼓舞了东北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抗日人士。但国民党CC系的东北协会、东北党务办事处却同我党唱对台戏。于毅夫同陈先舟、阎宝航商定，由他们二人以

旧日国民党的关系，同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工作。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大家联合起来开纪念会，“东总”贴出了一条写着“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标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国民党新政学系成员、立法委员吴焕章指着标语说：“写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就得了，何必再加上‘到底’两个字”。于毅夫立即尖锐地说：“就是要到底，不到底就没有东北了。”①吴哑口无言。

一九三九年夏，驻贵州省都匀县的国民党陆军高级炮校政治部主任、特务头子伍中定，逮捕了莽大龄等十四名进步学生。此事激起学生公愤，武装扣押了伍中定，封锁了学校电台，掀起了轰动一时的炮校学潮。陈诚向蒋介石报告，说炮校学潮是共产党发动的第二个西安事变。蒋介石命令学生代表郑新潮等到重庆，并责成何应钦审理此案。于毅夫闻讯将此事向周恩来作了汇报。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的支持，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被捕学生获得释放。为了避免郑新潮等同学再次遭受迫害，于毅夫打算送他们去解放区。他把这些同学邀集到嘉陵江边的一个小饭馆里，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政策，最后指出：要想救国，打回老家去，只有到延安，参加共产党和八路军。接着，于毅夫又精心安排，把刘寒、鲁齐、郑新潮、尹珙、赵天平、谢国元等六名同学秘密地输送到延安。

于毅夫在担任“东总”党团书记时，还兼任“东总”宣传部主办的《反攻》半月刊的总编辑。为了团结东北籍的广大作

①于毅夫：《周恩来同志与东北救亡总会》，《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又燕、邻江：《“文人本是革命人”》，《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

家，“东总”邀请肖军、肖红、骆宾基等为编委。《反攻》的任务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策，报道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于毅夫除担负组稿、编辑工作外，还亲自为刊物写了《五十年来东北社会的变革》、《作为中日决斗场的东北》、《谈东北问题》、《九年来东北人民英勇奋斗的总结》等文章。他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半途妥协，不内部分裂，中国不但在长江流域的舞台上可以把日本打下去，不但在黄河流域的舞台上可以把日本打下去，就是在辽河和松花江的舞台上，中国也一定可以把日本打下去！”“从九一八直到现在，关外的义勇军和关内的东北军民，所以能够继续不断的奋斗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坚决相信，只有推翻日寇的统治，才有我们自由幸福的日子，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路子可走”。他还针对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况，写了不少政论性的文章。如，一九三九年六月英日进行谈判，英国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制造“东方慕尼黑”阴谋。他写了《对于英日谈判的正确认识》的社论；在纪念“八一三”上海抗战两周年之际，揭露了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写了《粉碎日寇汪逆的阴谋》的社论；一九三九年九月召开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时，为了敦促国民党实施宪政，实行民主政治，他写了《我们对于实施宪政的意见》等。于毅夫为《反攻》写的这些社论、政论、总结、散文等，尽管题目各异，但主旨都是强调抗战、团结、进步，主张东北籍军民要坚决打回老家去。

《反攻》经常拖欠印刷费。一次，印刷厂老板来索欠款时问：“于先生，你是个有学问的人，去当官还不容易吗，为啥要干这吃力赔钱的傻事？”于毅夫颇有风趣地回答说：“鸣蝉

洁饥，不羨螻蛄秒饱，为抗日救国，再辛苦也值得！”^①老板很受感动，主动将欠款宽限而去。办《反攻》不仅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在政治上更经常碰到麻烦。南方局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经常指示于毅夫：《反攻》刊出的文章，不能向《新华日报》看齐，因为公开阐明共产党的立场，会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干涉，不准发行。他严格遵照这一指示，巧妙地同国民党进行周旋。即使这样，国民党还是视《反攻》如眼中钉，常常扣发稿件。面对这些困难，于毅夫始终抱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正如周志们说：“毅夫从早忙到晚，总是乐呵呵的，好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发愁。”^②

为了及时得到党的指示，于毅夫每隔十天左右就要去曾家岩五十号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董必武汇报工作，并送去《反攻》和由“东总”宣传部副部长关梦觉参与编写的《时与潮》等刊物。在周恩来、董必武的亲切关怀下，《反攻》越办越好，影响日益扩大，传播到东北军各部及山东、河北等沦陷区；对教育、指引青年走革命道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一九四一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准备秘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的民主人士。旧历除夕，《新华日报》社的鲁明要于毅夫到办事处去一趟。于毅夫扔下饭碗趁夜到曾家岩五十号见到了王梓木，王说：组织上得到一个秘密消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上列了一大批人，其中有你。组织意见，让你速作准备，秘密离开重庆。这事，除家里人，对任何人都不要讲。春节第二天，于

^{①②}又燕、邻江，《“文人本是革命人”》，《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

毅夫又去办事处，叶剑英要他立即离开重庆，还嘱咐：由于敌人在机场监视较严，在重庆不要坐飞机，要坐江轮经泸州去云南，走碗町到缅甸，然后坐船到香港找廖承志接关系。当时，于毅夫请求去延安。叶剑英说，在外边有更合适的工作，还是去香港为好^①。他服从党的决定，当夜躲在老友杜清轩（杜春寰）、浦洁修夫妇家里。次日化装成商人，自称医药公司经理王敬斋，离开了重庆。在昆明，他在好友、昆明欧亚航空公司经理杨醒钟的帮助下，乘飞机直达香港。

此时，刘哲来到香港，闲谈时劝于毅夫说：“你素负文名，又正当春秋鼎盛之年，何苦流亡港九，守此清贫？不如回重庆，我和冯庸可以为你在戴笠面前周旋。”于毅夫当即回答：“贫苦清寒，自有乐在其中。我的名字绝不能和特务连在一起！”^②

不久，于毅夫与廖承志取得了联系。此后，他以“东总”负责人身分，继续作流亡港澳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夜之间，九龙失陷，与香港交通断绝。于毅夫乘小艇偷渡，将沦落在九龙的东北作家肖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等连夜接出九龙。又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亲自安排了肖红的住宿、治疗以及撤离香港的事宜。他再三叮嘱护送他们撤退的同志说：“我们东北的这几位作家，是国家的人才。绝不能让他们落在日本人手中。肖红他们一天不离开香港，你一天不能走。”^③“张学铭之子失陷九龙，也是由于毅夫安排的小舢板偷渡过海，送还他父母的。”^④

^①于毅夫：《周恩来同志与东北救亡总会》，载《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231页。

^{②③④}又燕、邻江：《“文人本是革命人”》。

在港期间，于毅夫还参加了先行到港的邹韬奋、茅盾主持的文化界争取民主座谈会；在范长江创办的《华商报》上发表抨击国民党独裁专政的文章和文艺小品。

一九四二年春，于毅夫奉命去广州候船赴沪。他几经周折险阻，终于在同年夏天到达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一九四三年三月，于毅夫遵照华中局转来的周恩来的指示，进入华中解放区。陈毅找他谈话，分配他作新华社华中分社总编辑，与范长江共同主管新闻工作。当时，正值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他要求参加劳动锻炼。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接受他的请求，派他和徐雪寒去淮南路东地区的半塔集合作社及其附近农村作调查。他们背上背包，步行五六十里来到半塔集，白天调查访问，晚上和老贫农一起睡在泥土地上，与贫苦农民一样吃豆饼煮荠荠盖菜（一种野菜）。由于他深入群众，不仅使自己得到了锻炼，而且顺利完成了调查任务。

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于毅夫曾先后调任新四军情报部副部长和联络部部长。他经常往来苏北和上海之间。领导这一带的情报和联络工作，还亲自搜集和整理情报。有一次在上海，他与地下党员李时雨夫妇把一份密写的情报塞进肥皂中，由他扮作跑单帮的蒋“肥皂”带走。在扬州附近经过岗哨时，日军用手拉着他的衣领子，枪口对着他的胸膛，还把他手上提着的那些肥皂打翻在地，从头到脚进行搜查，他镇定自若，敌人没有发现什么，不得不放行。就这样，他安全地把情报带回了解放区。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毅夫奉命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由华

中新四军驻地淮阴，奔赴东北。到沈阳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命他为嫩江省主席。十一月五日，于毅夫到达嫩江省省会所在地——齐齐哈尔。

这时的齐齐哈尔，伪满洲国的汉奸省长申振先尚未离职，伪省府的组织机构仍保持原状，汉奸、特务、土匪狼狈为奸，蠢蠢欲动。而我们只有十余名抗联干部，战士和于毅夫率领的接收省府人员。十一月十五日，于毅夫以党派来的干部为骨干，吸收一些进步人士参加，成立了嫩江省人民政府。他亲自起草《告全省父老兄弟书》张贴市区，扩大了党的影响。

这时，汉奸、特务、伪警察组织所谓“光复军”，极力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并秘密策划暗杀于毅夫。十二月二十四日夜，被“光复军”匪首尚其悦收买了的警卫连门卫，将省府大门打开，“光复军”冲进警卫连大院，开枪打死正在酣睡的连指导员李慈民、排长吴诚谋和通讯员李树林；另一帮匪徒误入于毅夫寝室的隔壁房间，开枪打中省府代秘书长马识途。于毅夫的警卫员范玉胜闻声立即向敌人射击，敌人慌忙踢开窗户狼狈逃窜；于毅夫才幸免遇难。

根据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签订的《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后来中苏两国会谈的精神，苏联需把东北的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人员^①。我党为顾全大局，决定退出东北的城市^②。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于毅夫奉命率领省府干部秘密撤出齐齐哈尔，来到甘南县，将省府机关设在甘南城区

^①张潜华：《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②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第221—222页。

小学。为了扩大人民政府的影响，使齐齐哈尔市人民感到我党仍在身边，于毅夫在很少武装掩护的情况下，和大家一起乘坐仅有的一辆救火车到齐市城边，组织集会演讲，张贴布告，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建立区乡民主政权。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夜，我军第二次解放了齐齐哈尔，于毅夫率领随行人员又进入齐市。

根据省委的指示，于毅夫入城后即部署对反革命活动的镇压。通过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反动官吏，并将潜藏起来的“光复军”成员捉拿归案。随后，又在城里开展了清算、赈济贫民等活动，使社会治安大为好转，西满根据地也进一步巩固。

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这年冬，嫩江省开展了一场深刻的土地改革运动。于毅夫在县委书记和县长联席会议上部署了土改工作后，即亲自带队深入肇州地区，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并揭开了作恶多端的“尹善人”的伪善面目，使土改工作顺利开展。

内战爆发后，于毅夫动员青壮年参加解放军，动员民工支前，动员财力、物力保证军需供应，组织战时医疗机构和安置伤病员，工作搞得很出色。有一次，他发现省府有一个厅派去支援前线的车不好，马不壮，就批评该厅负责人说：“没有人民军队的胜利，就没有人民政权。”并下令让其马上把好车好马换去支援解放战争。

一九四七年春耕时，嫩江省与黑龙江省合并为黑嫩省，于毅夫仍任主席。他带领省府干部组织春耕工作队，并亲自视察安达、望奎、绥化等八县；召开嫩江、讷河等九县工作会议，总结组织春耕生产的经验。同年七月，他发表了《春耕视察

记》，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伟大的土改运动后翻身农民的生产热情。

于毅夫在黑嫩省工作期间，十分重视思想工作。他在《青年们补上十四年这一课》中指出：“成千上万的青年，几乎都不大明了日本统治东北十四年来的历史真象……共产党怎样？国民党怎样？哪些人是积极抗战的？哪些是消极抗战的？哪些人是出卖我东北，出卖国家民族的？就更不知道了。”“许多青年人盲目加入三青团，当了特务还以为是满腔热血，爱国爱民”^①。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向青年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号召青年学习社会科学，关心政治，研究历史。于毅夫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出发，关心和重用知识分子。他在《知识分子的出路任务》一文中，给知识分子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并在实际工作中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在他的提议下，省府的五个厅中，有三个厅（建设、教育、蒙政）是由党外知识分子担任厅长的。他们有职有权，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黑嫩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分，于毅夫十分注意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妥善做好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按照党的决定，达斡尔族和克尔克孜族实行了民族自治，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得到了省政府调配给的枪枝弹药和生产工具，受到了少数民族的衷心拥戴。于毅夫还组织各少数民族代表到内地参观，安排民族干部到省师资训练班和蒙古师范学校学习，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于毅

^①于毅夫：《青年们补上十四年这一课》，载1946年10月13日，《东北日报》。

夫连任黑龙江省主席，被选为东北解放区代表团代表，赴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

(五)

一九五二年秋，于毅夫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协助李维汉处理日常部务，具体分管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作。他同沈钧儒、许德珩、王昆仑、刘清扬、杜清轩、浦洁修、胡子婴等民主人士有着密切的交往，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向党中央汇报他们的建议，同时，又把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及时传达给他们，鼓励他们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作出贡献。一九五五年，原国民党将领卫立煌及其夫人韩权华回归祖国。于毅夫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负责接待、宴请和陪同去周口店参观北京猿人遗址。随后，按照党的政策，在政治上、生活上对卫立煌都作了适当的安排。

一九五六年冬，西安事变二十周年时，周恩来以中央统战部名义举行纪念会，宴请东北军、西北军以及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军政领导百余人。于毅夫受命负责组织这次宴会。会后，他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对于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作出过贡献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及有关人士，一一给予妥善安排。

在这期间，于毅夫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从不居官自傲，始终保持在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时的朴素生活。每逢星期天，只要有空就去北京近郊的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生产劳动，自觉地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

一九五八年，党中央号召干部下放劳动锻炼。于毅夫积极响应，于当年六月到吉林省永吉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还兼吉林市市委书记。一到永吉，他就脱下城里的服装，穿一身带补丁的旧蓝制服，带领县委的同志投入了夏锄劳动，还向全省地、县两级干部发出劳动竞赛倡议。他在江密峰公社包了一块试验田，早出晚归，锄草、施肥，全年劳动了七十多天。他还跑遍了永吉县的山山水水和几百个生产大队，调查生产情况、合作化发展史和干部队伍状况等等，掌握领导生产的主动权。有的同志看他一天跑几个公社，担心他的身体，便在吃饭时，给他多做上两个菜。他批评教育了那些干部，还坚持按价付了款。

一九六〇年，在吉林省党代会上，于毅夫被选为省委书记处书记，分工继续抓农业。为了克服“左”的错误政策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他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与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一起商讨恢复生产和安排好生产的办法。一九六三年五月，于毅夫年满六旬，虽身体不好，仍兴致勃勃地下乡，进行调查访问。他在日记中写道：“六十年前的今天，我出生在双城县辛家窝堡的一个封建家庭中，我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经历，也是旧中国变为新中国的伟大变革进程。今天，新中国象东升的朝阳一样，光芒四射。这样光辉的前程，是我在青年学生时代，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今后，我要下更大的决心，从六十岁的今天做起，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象雷锋那样，毫无个人主义私心，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①

^①又燕、邻江：《“文人本是革命人”》。

一九六四年春，于毅夫回省后，由于几年来紧张工作，过度疲劳，突然摔倒，连续昏迷数日，经医生多方抢救才脱险。他看到自己的伤病难以痊愈，遂向党提出退位让贤。后经中央批准，他改任全国第四届政协常委。

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于毅夫蒙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被关押达七年之久。一九七五年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他被释放出狱。当时，他虽然健康状况极差，又在发着高烧，却急着为仍在蒙冤受屈的老友高崇民、阎宝航写证明材料。他十分关心那些尚未落实政策的党外人士。法学家王之相，曾任九三学社的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翻译过《我在西伯利亚的服务》一书，受到周恩来的赞扬。于毅夫出狱后，得知王之相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便立即向党中央写报告，介绍王之相的情况，建议安排他的工作。不久，王之相原来的工作恢复了，而且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于毅夫还多次写信给中央统战部，请求尽快解决杜重远烈士遗孀和张学铭爱人朱洛筠等人的工作和生活问题。

一九七八年春，于毅夫连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吉林省政协副主席。由于被摧残的身体极度衰弱，在中央组织部的关怀下，于毅夫去广东从化疗养。在那里，当身体稍稍恢复，他就撰写回忆录。一九七九年二月，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和驳斥林彪、康生等对东北救亡总会广大会员的诬蔑，他写了《周恩来同志与东北救亡总会》一文。从广东回来，他的身体仍然虚弱。他对来看望他的老同志说：我对党已经不能做什么了，但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我坚决拥护，党的会议我还要争取参加，也算尽了我的一份心吧！

此后，于毅夫的病情逐渐恶化，以至瘫痪不起，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一日在长春病逝。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于毅夫的档案材料，复制件存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干部档案室。
2. 《于毅夫同志的生平事迹》，1982年6月28日《吉林日报》。
3. 《京报副刊》、《晨报副刊》（1925年），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4. 《反攻》半月刊（1938年—1940年），存重庆市图书馆。
5. 于毅夫：《天翻地覆的一年》，1946年8月15日《东北日报》。
6. 于毅夫：《周恩来同志与东北救亡总会》，《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
7. 钱俊瑞：《学习于毅夫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1983年5月5日《人民日报》。
8. 许涤新：《白山黑水不忘君》，1983年4月5日《吉林日报》。
9. 周而复：《晶莹犹放报春花——忆于毅夫同志》，《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3期。
10. 姜克夫：《严师诤友，终生难忘》，1983年8月12日《黑龙江日报》。
11. 徐雪寒：《缅怀于毅夫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
12. 王光伟：《怀念于毅夫同志》（1982年），未刊。
13. 刘靖：《于毅夫与嫩江省政府》，《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5期。
14. 郑新潮：《党指引我走上革命路》，1981年7月9日《邢台日报》。
15. 赵广生：《悼念于毅夫同志》（1982年底）未刊。
16. 访问肖丹峰、刘靖、宋星池等及于毅夫夫人杜贵绂的谈话记录。

封面设计：王艺光

统一书号：11094·166

定 价： 1.95 元